



陳逸松回憶錄

放膽兩岸波濤路

戰後篇

曾健民

撰述

身為日本殖民時期第二代台灣知識人的陳逸松，成長、求學時恰好遇上全球性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以及左翼社會主義運動的高潮期，受到世界思潮之影響，一方面痛恨殖民地歧視統治，一方面懷抱左翼理想，且在最有活力的青年時期迎來了日本殖民終結、台灣光復、中華民國政府遷台的時代巨變。

陳逸松的一生經歷，足以見證台灣從殖民到戰後的諸多變化。他反日、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當選台灣省國民參政員、就任第一屆考試院考試委員，同時任中央銀行常務理事。1972年被「羊羹事件（花旗銀行爆炸案）」牽連，身受戒嚴統治之害，遂前往日本、美國。不久應周恩來之邀訪問中國，隨後留下擔任人大常委，並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及現代化法律的增訂工作，人大常委卸任後轉任政協常委，晚年赴美定居，被列為海外黑名單而長期不能回到台灣，直到解嚴後的1997年才再度踏上闊別二十五年的故土，三年後辭世於美國休斯頓。

《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放膽兩岸波濤路》是陳逸松的個人生命史，同時也是關於台灣戰後歷程的時代史。他放膽跨越台灣、日本、中國的冷戰鴻溝，開啟了中國、亞洲的新歷史空間和視野，不僅打破社會成見，更突破了兩岸分隔的歷史界限。



陳逸松回憶錄

戰後篇

放膽兩岸波濤路

曾健民 撰述

謹向提供本書重要參考資料者致謝

- ◎吳君瑩提供：林忠勝先生採訪陳逸松錄音帶及吳君瑩女士抄寫記錄。
 - ◎陳逸松家屬提供：林忠勝先生採訪陳逸松時，陳逸松夫人林玲玉同步錄音檔（中研院台史所從錄音帶轉檔）。
 - ◎陳逸松家屬提供：陳逸松日記、手記、札記、書信、其他各種資料。
 - ◎曾健民、陳正德先生提供：「陳逸松文集」初稿。
-

目錄

序 打開新的歷史視野 曾健民

家屬序

序章

第一章 做新的歷史主人——台灣光復和三青團

第二章 做思想言論的前鋒

第三章 慘痛的三月——二二八前後

第四章 走上參政之路

第五章 據理力爭的六年仕途（一九四八年——一九五四年）

第六章 投身實業界

第七章 在白色風暴中受難的朋友——「光明報」事件

第八章 一九六五年——痛失三位文化英才

147 135 125 109 093 081 071 055 037 019 007

第九章	參選台北市長・環遊世界（一九六四年——一九六八年）	159
第十章	「羊羹事件」被逼上梁山，藏書遭趁火打劫（一九七二年）	179
第十一章	衝破驚濤和駭浪（一九七三年）	195
第十二章	訣別與抉擇——代表台灣人民擔任中國全國人大代表（一九七四年）	215
第十三章	參加第四屆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九七五年）	225
第十四章	在北京與老友重逢	239
第十五章	歷史情緣	255
第十六章	一九七六年——新中國最激動的一年	265
第十七章	四人幫後再訪日美一年（一九七七年）	281
第十八章	親歷一九七九年後中國的大轉變	295
第十九章	參與了中國三部憲法的修訂	309
第二十章	參與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法律制定	319
第二十一章	八十回顧	333
第二十二章	轉任政協・告別和希望	351
附錄	訪問陳逸松甘苦談	377
附錄	陳逸松年表	383
	吳君瑩	

序

打開新的歷史視野

曾健民

完成了這本書，總算對陳逸松先生，對家屬，還有對歷史有了交代，雖然必定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存在。從陳逸松先生生動的個人史，我們可以看見戰後台灣歷史新的縱斷面，以這層意義來說，這本書不只是有關陳逸松先生的個人生命史，它更是一本有關台灣戰後的時代史；它突破了兩岸分隔的歷史界限，打開了新的歷史空間和想像。

一、寫作的機緣

寫作這本書的機緣是這樣的。

大約三年前，陳逸松先生的長女陳文惠女士和陳逸松先生生前的忘年之交陳正德先生，通過聯經出版公司來找我，希望我替其先父整理戰後部分的回憶錄。因為他們讀過我十年前

在聯經出版的《一九四五·破曉時刻的台灣》，該書寫了不少有關陳逸松先生在那個歷史時刻所扮演的重要時代角色。他們認為該書十分忠實客觀，所以希望我接下整理和出版陳逸松回憶錄的工作。

其實，我早已讀過林忠勝先生撰述的《陳逸松回憶錄：日據時代篇》（前衛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且曾引用過該書中的一部分資料。而且我二十年來專注於台灣光復前後十年史的史料蒐集和寫作，早就熟知陳先生在那時期所扮演的重要歷史角色，深感其思想和行動的進步性，本來就心懷敬意。同時，我也大略知道，後來他曾衝破反共和冷戰防線回到中國大陸擔任人大常委和政協常委，而被國民黨反共派列入「投匪」黑名單，又被台獨派視為「不愛台灣」、「賣台」，任誰都知道，在台灣只要被貼上這兩重標籤，大多會被打入歷史的冷宮，學界、文化界、媒體都不會有興趣，誰都不敢碰。也許因為如此，陳逸松先生的後半生回憶錄二十年來一直都沒人整理，未見出版，這實在是台灣現代史的一大憾事，對此，我早就感到不平。現在年輕知識人都幾乎遺忘了他，不知道這個人。當然，這是一個選擇性遺忘歷史的年代；台灣戰後歷史，深受中國、東亞和世界歷史的影響，也受到島內多重政治經濟力量左右，道路十分崎嶇而複雜。這使得一般人的生活中，或者一般知識分子的觀念中，充滿了片面和迷思的歷史形象。我二十年來的歷史研究和評論，主要致力於撥開這些歷史迷思，揭露歷史的真實面貌。

我也知道，陳逸松先生後人曾把陳先生的一些資料交給中研院台史所，寄望台史所以公

共的專業，進行整理出版，但都沒有得到積極的回應，理由是說沒有經費。幸好，陳文惠女士首先克服困難，自己投入其先父資料的整理。她依據林忠勝先生三度採訪陳逸松先生時陳夫人林玲玉女士在旁錄音的資料，和陳夫人林玲玉女士的回憶，花費半年時間，在《傳記文學》刊出了〈陳逸松二三事〉系列文章（《傳記文學》通卷五九四——五九七期，二〇一一年十一月號——二〇一二年二月號），首先公開了陳逸松先生從戰後到辭世的後半生史跡。我想起了陳逸松先生一生的理想主義精神，為了台灣社會的進步，他賣了幾棟房子辦《台灣文學》、《政經報》；拋棄家產名位毅然出國，賣一生藏書攢旅費到北京（結果被人趁火打劫）等等；完全超越了個人名利，這種大我的精神，早為時代所遺忘。因此，我不忖固陋，以個人的力量，不計酬勞答應接下這項重大的付託；不只為了整理陳逸松個人的生命史，還為了彰顯其個人史所代表的重大的時代史意義；後者，觸動了我不計名利不計毀譽投入這項工作。為此，我花費了兩年時間，自掏腰包整理和蒐集資料，特別在最近半年，我推辭一切雜務和活動，終日與陳逸松先生進行對話，閉關寫作下才完成了這本書稿。

二、本書所使用的陳逸松資料

本書所使用的陳逸松資料，主要有下面幾種：

① 林忠勝先生和吳君瑩女士，分別在一九九〇年和一九九四年對陳逸松先生進行了長時

間的錄音訪問。以林忠勝先生提問、陳逸松先生回答的方式進行，總共錄下了七十三卷錄音帶（其中有跳號）。本書主要使用了第二十九卷以後戰後的部分。林忠勝先生基於愛鄉土的感情和對陳逸松先生的敬仰，在陳先生晚年盡心力完成了這批錄音訪問，留下了第一手的原音回憶，居功厥偉，令人感佩。這批錄音帶和一份由吳君瑩女士從錄音帶謄寫出來的手稿，由陳文惠女士向吳君瑩女士商借交給了我使用。這批錄音帶包括了陳逸松先生對其一生各時期的口述回憶，內容豐富多彩，可說是第一手資料。只可惜，當時陳先生已八十三高齡，講述內容駁雜，部分口齒不清，敘事跳躍，邏輯不完整，一件事沒說完又跳到另一件事，幾乎沒有一件事有完整的敘述，許多事情都交雜在一起，很難掌握完整內容。即便如此，它還是保留了陳先生經歷的多彩多姿的人生和獨特的感情、思想和敘事。許多歷史的細節在他的口述中活生生的出現。許多台灣現代史人物他都有交往，在他口述中生動鮮活。因此，整體串聯出一部台灣戰後史的史詩，這都要歸功於林忠勝和吳君瑩夫婦於一九九〇年代熱情和辛勤的採訪工作。但這部史詩畢竟只是草稿，每一個部分都要再參酌其他歷史材料，比對梳理，去蕪存菁，理清脈絡，最後才能再現它的原貌。

② 陳逸松先生一生之中最獨特，也是最受爭議，且大家最想要了解的部分，就是他從一九七三年回北京後的十年經歷。關於這部分，訪問錄音內容同樣不清晰，也不完全，脈絡跳躍，很難掌握全貌，幾乎難以辨讀。另外，錄音採訪時陳先生已離開北京十年，

兩岸政治經濟情勢有巨大的變化，天安門事件剛過，在敘述上難免受到大局勢的影響。幸好，陳先生二女兒陳綺紅女士適時提供了陳先生在北京的日記（一九七五年起總共八年的日記）。陳先生有寫日記習慣，每天大小事、心情起伏、論人評事，都有詳細記錄。日記上白紙黑字的記錄就與隔數十年後的口述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日記是一部最完整的堅實的不容改變的史料、個人生命史的文本。由於這批日記的幫助，使本書能夠比較客觀地完整呈現陳先生在北京十年的經歷和思想。

③ 陳先生家屬先後提供了許多珍貴的陳先生的書信、手記、札記和文章，使我增加了參考對照的面向。

④ 自從接手大批訪問錄音帶，著手整理後，經常陷入無法清楚掌握事實脈絡的煩惱，畢竟口述史有它的侷限性。因此我開始四方蒐集陳先生在報刊雜誌發表過的文章，以及前前後後記者採訪他，發表在日本、香港、美國報刊雜誌上的文章，或者是他自己寫下來的手稿。這些都保留了他在各時期的思想和看法，是了解他或評論他的最重要的材料。有了這些資料，對陳先生的思想才有一個公開討論的堅實基礎，不會再落入口水的爭論，或僅憑口述歷史的缺憾。這些文章，請陳正德先生協助翻譯日文的部分，我們計畫編輯成「陳逸松文集」出版，讓大家有個客觀的依據，比較完整的「文本」，以免陷入沒有客觀基礎的無止境的爭議中。

三、浪淘盡的世代

陳逸松先生屬於台灣第二代的現代知識分子。這一代的知識分子，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接受了比較完整的現代教養，同時，殖民統治的民族歧視造就了他們強烈的漢民族意識和祖國情懷；同時，他們又逢全世界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以及左翼社會主義運動的高潮期，大多受到左翼運動和思想的洗禮。因此，漢民族意識、祖國情懷和左翼思想成了他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普遍特徵。他們身擔殖民地之子的重負，一生都是站在台灣人民立場有濃厚的祖國情懷，且兼具第三世界弱小民族的左翼思想。雖然各人表現程度不一，程度強弱不同，有些人的漢民族意識較為濃厚，有些人傾向左翼思想，當然也有人走上完全相反的道路去，這是任何時代都會有的。

這一世代的知識分子，主要活躍於一九三〇年到一九六〇年代台灣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舞台，從日據中後期經光復期到國府撤退台灣。他們經歷了日本戰爭總動員、皇民化、台灣光復、二二八到五〇年代白色恐怖，還有台灣的資本主義經濟之誕生，他們投入社會運動、抗拒皇民化、迎接光復、參與二二八和國共鬥爭，被一波波驚濤駭浪淘盡。有人入獄、有人冤死、有人逃亡。在台灣倖存者不是沉默噤聲，就是在狹窄的政治和經濟空間中求生存發展；更有一大批人先後逃命祖國大陸，如蘇子蘅、蘇新、陳文彬等，無數人在兩岸長期的隔絕和對峙中，後來被稱作大陸的「台胞」。

四、超越統獨的世代

陳逸松可說是這一世代知識人的代表人物。他兼具前述的三種思想和感情特質，在各時期的動盪中走在風口浪尖上。舉一個例子，中村哲（日據期的台大教授，陳逸松先生的好友，戰後成為日本法政大學總長〔校長〕）在一篇〈憶台灣人作家〉（張良澤譯文）中，描述了陳逸松的形象，他說：

陳逸松是繼清廷以來的豪族林獻堂之後年輕一代受總督府敵視的一方之雄……成爲台灣人新生代的中心人物。總督府視他爲異端的原因，是因爲不得晉身官場而想投奔大陸就職於中國政府。戰時中，台灣人的聞名者不管是誰，都被編入「翼贊體制」，但只有陳氏被排擠……

從這一段簡單的描述，我們可以一窺陳逸松在那時期的獨特時代角色，以及其突出的漢民族意識和祖國情懷，這種時代角色和理念貫穿了他的一生。他一生力爭民族平等與尊嚴、追求民主法治以及社會平等，這從他年輕時參加左翼活動，組織三青團、參與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擔任參政員、考試委員、央行常務理事，一直到七〇年代出走北京擔任人大常委的生命實踐就可知；所有這些實踐都爲了追求台灣人的尊嚴、平等和幸福。這不是用今天的「統

獨意識形態」可解釋的。

從這樣的大時代的角度去理解陳逸松的一生及其時代角色和理念，才不至於陷入今天的統獨框視中；換言之，陳逸松的一生超越了今天的統獨觀念。

五、突破歷史局限

他自認為是社會主義者，但實際上他傾向人道主義、有自由主義思想，且常自嘲自己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者，與蘇新不同。在政治上，他主張西方的憲政議會制、多黨制以及民主法治的政治。所以，從大範圍來看，他屬於社會民主主義者。

在民族問題上，他一生最厭惡民族歧視和民族不平等。他經常強調，為了台灣人民的平等幸福，應該追求中國民族國家的普遍解放；他寄望中國的民主和富強，希望中國成為一流國家，如此，台灣人民才會有尊嚴，才有希望，才有出路。他追求民族的平等和互惠，有國際主義精神，因此他大力協助過朝鮮人民，與日本人平等交往，彼此以互相尊重、平等互惠的精神為之，且他一生的知交中以日本人居多。

他不是理論家，而是一個活動家、注重實踐的人。他厭惡抽象的空論，卻一生勤於追求新知識從不中斷。他廣覽群書，愛書如痴，不管在哪裡都先買書，以龐大藏書為滿足，還計畫建立藏書編目。且勤寫讀書札記，譬如在擔任人大常委開會期間，他經常徹夜讀書、調查

資料、寫札記。他認真寫日記，每日大小事，評人論事，都詳實記錄。簡單摘要其日記數則：

•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昨天晚上看《中共黨史資料（一九一八年七月——一九二五年八月）》，看到清晨四點才睡。

• 一九七八年四月八日：讀書抄寫到清晨才入睡（抄一九四九年——九五〇年政府彙編）。

• 一九七八年四月九日：讀《台灣青年》四月號，知郭雨新在東京開座談會，其他關於台灣近況，讀到清晨五點。

• 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二日：去新華書店買《馬恩生平事業年表》、《論無產階級領袖的偉大作用》，其他數十本小冊子。

•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於政協的書店買回《李大釗選集》、《西漢會要》等書回來。

•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日：到中國書店買《辛亥革命前十年間論集》共四本。

其他，他透過香港三聯書局，訂購了許多香港出版的雜誌如：《七十年代》、《廣角鏡》、《南北極》、《爭鳴》等。

他又不是一个「唯文化主義者」；基本上，他都是從政治經濟的角度看文化問題。另一方面，他積極參與並支持文化運動，認為文化是改變社會政經結構的助力，文化向上有助於

改變台灣人的政治經濟地位。

陳逸松個性率真，遇事據理力爭。追求社會的公平正義，自往而不縮。特立獨行，勇於打破社會成見，突破政治歷史的局限。他放膽跨越台灣、日本、中國的內戰冷戰界限，打開了中國、亞洲的新歷史空間和視野；一生追求做一個歷史的主人，而不是奴隸。他的一生不只是台灣現代歷史的縮影，更是一個寶庫，裡面蘊含著許多對歷史對未來的啟示。

本書主要以整理陳逸松先生的訪談、日記、札記和發表文章編寫而成。為保留陳先生的原敘事、原口氣，本書採取了第一人稱的方式撰述。編寫本書時，作者依循一個原則，即只使用陳逸松先生具有公共性和歷史價值的材料，至於其個人的私事，還有流於感情的偏見，絕不使用。另外，為了使材料呈現一定的歷史意義，也為了使讀者易於理解，作者適時加入了一些歷史背景的敘述，但以不脫離陳逸松先生的敘事脈絡為原則。還有，本書因為篇幅的關係，許多有意義的材料不得不割愛。

本書只是對陳逸松先生的後半生進行初步的整理，期讓讀者認識這個台灣現代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典範，從中獲得歷史的啟示。本書只算是拋磚引玉的工作，期待後來的人對陳先生進行更進一步的研究，對資料進行更深入更全面的整理和發展，以呈現陳先生更豐富完整的面貌。

最後，再一次感謝吳君瑩女士慨允提供寶貴的錄音帶，陳家女士們熱情協助提供的錄音光碟、日記、札記、照片等一手資料，使本書得以成形。還有，感謝陳正德先生全力協助，

更要感謝提供我寫作條件的內人尤麗英女士，沒有她的分擔我不可能集中全力完成書稿。阿忠、良哲和鈞凱等年輕朋友還有杜繼平，都在我工作中助過一臂之力，併此感謝。

寫於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家屬序

家父——陳文惠

家父就是有那很嚴肅的外表，我們小時很怕他。但是他有柔情的一面。記得我六、七歲時的元宵節，他帶者我們一家大小跟著舞獅及鑼鼓隊伍，上山下山，走遍全鎮，看他們鬧商家討錢祈福。回家後把我最鍾愛的蓮花燈掛在院裡的樹上。沒想到一陣風吹來把我的燈籠燒掉了。我傷心至極卻又不敢哭，但是眼淚還是忍不住，大顆大顆的掉下來。他安慰我說他一定會再買一個給我。因為他平常忙於公事，從來也沒有買過玩具給我們，所以我並不抱希望。沒想到他第二天上班前竟趕到城裡買一個蓮花燈籠給我，我高興得至今難忘。

等到我們茅塞初開，能夠和他說天道地時又完全不同。記得中學時開夜車準備考試，他小睡醒來，過來和我聊天，說尼采，話歌德，談政治，解析台灣的未來。到午夜要回房睡覺時，

他跟我說，快去睡，不必那麼用功，不需要考第一名，最聰明的是考最後一名，卻不留級，只要不留級就好。然後跟我說他高等學校時和一個朋友比賽爭取最後一名但是又不能留級的故事。

等到我上大學，晚上十點後，他最喜歡泡一壺好茶和我們挑燈夜談，話題天南地北，政治，哲學，歷史，文學，無所不包。當時的大學好友，如黃維幸，姚嘉文，吳成文，陳恒昭等都常來聊到半夜或清晨，後來他競選市長時他們及其他大學朋友如徐泓，陳宏正，陳定南等都組成監票員團隊監督票箱。許多人都說這是他們參政的開始。是他們政治意識的啟蒙。

他也有他豪情萬丈的一面。他常談起他在日本第六高等學校（六高）唸書，那時的高等學校的學生是天之驕子，夜裡成群在街上喝酒，裝醉，引吭高歌，集體到派出所前撒尿抗議警察的不公。居民們卻對他們寵愛護呵有加。他保留了那份狂邁，經常約三兩友好，如王旭雄等到家喝酒划拳，猜酒令、唱歌。王先生唱得很好，他卻有點走調。除學生時代的日本歌，他們最喜歡唱台灣民謠及台灣作曲家的新曲。當時家裡買了一部錄音機，好像只有我會操作，所以不管我急著要做功課準備考試，我都得替他們錄音，然後再一次又一次的放給他們聽。他也喜歡邀集棋友，尤其是他東京帝大的同學，如洪順遜，戴炎輝等到家徹夜下圍棋。天亮又趕去事務所上班。

他覺得台灣人承受了太多的苦難，所以台灣戲曲，包括歌仔戲，都是哭調，他想要改變這種情懷進而改變台灣人的命運，所以斥資和友人拍台語喜劇片電影，但是只拍了《邱罔舍》

一片就無法繼續，除了影片不賣座損失慘重外，國民黨對台語片過分敏感，時加干擾，也讓他們合夥人氣餒。

他保留了家鄉羅東孩提時期的草根性。小時候跟他回羅東時常看他走到半路水田旁，捲起西裝褲腳，走進田裡和老農聊天。他不喜歡攀緣附勢，拒打高爾夫球，認為那是為了和高官顯賈打交道的手段。有次在美國我打高球時讓他坐在車上帶他逛逛球場，沒想到他技癢，拿起我的球桿居然一球打出去。想當年我初學時不知揮了多少叫人汗顏的空桿。他說是因為在日本上學時曾學了劍道，所以對揮桿稍有心得。

他一生不常運動（應該是太忙沒有時間），愛吸菸，不忌口，常說想吃的就是身體需要的。但是他吃得相當清淡。身體相當健康，除基因本質好以外，我歸功於他的嗜茶如命及喜愛洗澡，他選擇住北投溫泉區，所以一天可以至少泡二次。

他一生最重要的知己是家母，他們無所不談，每次開完會或下班回家都一五一十的把所有的事所有的人講給她聽。一餐晚飯可以吃上兩、三個鐘頭，聊天，喝酒，唱歌。而我們小孩都提早分別用餐。所以他敘述回憶錄時家母可以從旁提醒。回憶錄第二冊出版離開他謝世已十五年，幸好有家母的知識及過人的記憶，才得以完成。

他一生愛漢民族，愛台灣人。但是他的信念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並非只要是漢人，或者只要是台灣人就好。他年輕就讀東京帝大時接觸了共產主義，認識了社會主義，所以他的理想帶了強烈的社會主義色彩，摒除了任何不愛民不愛台灣人的政權。他所追求的是一個能

待台灣人以平等，能使台灣人豐衣足食，享受健康快樂，民主，自由，平等的社會。即使是台灣人的政府，如果不能賦於台灣人這些基本權利，就不是他能支持的政權。

他最痛心的事是他畢生收集的極珍貴的書，其中很多是絕版的台灣史料，現在卻落入他人之手，我們都希望有朝一日這些書能放入公共的研究機構，讓世人了解他的用心，讓有心人得以參考研究。

如今他下半生的回憶錄終於即將出版，我們有幸得以藉此緬懷他日常家居的二、三事以誌懷念之情。

化作春泥更護花

——陳綺紅

看著牆上掛的爸爸喜歡的龔自珍的詩句「落花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想到一晃眼，爸爸離開我們已經十五年了，但感覺上他似乎從未離開過我們，他平日的言行教誨，時時縈繞在我們腦海中。

爸爸十三歲就去日本留學，在異鄉努力吸收新知識。在東京大學畢業後，由於不想擔任必須聽命於日本政府的職務，選擇當能獨立思考的律師。在東京開業三年後，決定回台，為

被壓迫的同胞辯護。多年的奮鬥與律師辯護經驗，使他以「審慎安詳」為座右銘。他認為做任何事都要事先謹慎地審思，但是在做了以後，不論後果如何，皆須安詳處之，不要患得患失。所以爸爸在簽署任何文件前，都要詳細閱讀過才慎重地簽名，即使生病時簽英文的醫療文件，也要我們仔細翻譯才簽，這給我很大的啟示。

但是爸爸留給我們的不只是這點，他從來不給我們讀書的壓力，甚至開玩笑說，「讀書不必爭第一，只要吊在車尾就好。」雖然我們不至於吊車尾，但因沒有壓力，可以自由地涉獵於各種學術領域，並且有餘暇體驗生活中的樂趣。我們小時候及中學時期，爸爸常要我們為他按摩肩膀，同時天南地北地聊天。爸爸大學時修的外國語言是德文，常談及歌德及其「少年維特的煩惱」，後來還特地去歌德故居憑弔。他也對英國文學有興趣，喜歡英國詩人雪萊及莎士比亞的戲劇。這對我後來唸外文系有很大影響。他有一套古老的大英百科全書，對我的研究很有助益。我台大外文系英詩的蘇維熊教授是爸爸東京帝大的學長。爸爸也常教我下象棋，說如能贏他就有獎金，我一直努力研究，總算後來有一次贏了他，拿到獎金受到很大的鼓勵，覺得只要鍥而不捨，終能達到目標。從小，爸爸就常跟我們說：「你們每天早上醒來，不論是天晴或下雨，都要告訴自己，『今天是個好日子』。」不管發生什麼事，都要保持心情平靜愉快，記住「日日是好日」，年輕時還不太能體會，後來才領悟到這是修行的好方法。爸爸是「日日是好日」的奉行者。每天都會製造些生活上的樂趣，對生命充滿了好奇，關懷與希望。雖然年紀大了，仍愛動手做書架、桌子及小工藝品。常常幽默風趣地與家人、朋友

談古論今，所以他有很多「忘年之交」。他常說「一切事物都在不斷變化中」，所以他不執著於當年的輝煌，能在老年時坐擁書城，樂在其中。後來我們幫他裝了電腦，讓他能看世界時事，他雖然不太會操作，但嘆了口氣說：「總算沒被高科技落在後面！」

爸爸熱愛旅行，為了解各地風俗民情，並探索台灣的方向與出路，曾獨自環遊世界兩次。當他九十歲時，我報名參加張家界及九寨溝的旅遊團，但後來爸爸身體不適，我想取消，爸爸了解我多年來嚮往旅行，一再鼓勵我去，並拿出他珍藏多年的廣角鏡頭，要我多拍些照片給他看。即使後來我在旅途中打電話問候他時，他也一再說他很好，不必擔心。爸爸就是這樣很少抱怨他身體的病痛。即使在最後兩年進出醫院抽肺部積水及打針，他都很平靜地說：「我不痛，我很好。」醫院的醫師及護士都稱讚他是「最好，最合作的病人」。

有次我與媽媽及從台灣趕來幫忙的妹妹雲端陪爸爸在診所等候醫師，等了很久，爸爸用手招呼妹妹過去，一本正經地說，「我用的藥名與我這醫師同名，因為是他發明的。」看到妹妹信以為真，爸爸頑皮地笑起來。想到這時爸爸還有心情開玩笑，媽媽與我也不禁笑了。

爸爸認為做人處事要有原則，不能隨周遭的環境而改變原則。所以他一生不附會權勢，保持超然的立場。美國德州佛教會的「佛光法苑」的編輯曾訪問過他。問他「回顧過去，如果可以從頭做起，你是否會有不同的做法？」他思惟良久後說：「我看仍是這樣做而已。雖然客觀的環境不能如我們意。」他的一生，因為堅守原則而「無怨無悔」。

爸爸最後住院時，朋友來探病，他從不談自身病痛，而是關心地與他們討論台灣政情與

世界局勢，尤其之前他關心台灣選情，為看到選舉結果徹夜未眠才加重病情。他固然當時為陳水扁當選而希望台灣前途光明，但也擔心他太年輕，經驗不足。朋友忍不住勸他好好養病。有一次病重昏迷不醒，剛好宏意法師與一些朋友來探病，就為他唸佛，不久他就清醒了。後來在「法苑」訪談中，他說他不覺得自己是從鬼門關回來，但是已悟到生死一如的道理。他常研究「自然法」，認為一切行為要遵循自然的法則，而殺人偷盜等就違反了自然法則。他認為人的身體只是一種物質，人老了好像馬匹老了，就再換匹馬騎。但他認為還有一種精神（神識）狀態存在，不斷地相續下去。

爸爸最後在九十三歲病重時，向照顧他的親友，尤其一生相知相隨的媽媽致謝，「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要健康地與你們多相處些日子，但現在已經沒辦法了請你們多保重。」並要我們好好照顧他最放不下心的媽媽。他決定出院回家休養。當晚好友們聽到他出院了，都趕來看他。他仍與他們談笑風生，他們都走後，他對雲端說：「今晚共有十批朋友來！」她一算果然是十批！

爸第二天早上就平靜地往生了！許多師父、師兄姐為他助念時，他寧靜安詳的面容，使一位來探望的朋友以為他正在睡覺。的確！爸爸並未離開我們，他只是化作春泥更護花！

家父——陳雪梨

文惠姐提到，家父每天晚餐時要和家母聊天，將一日之事和她敘說一番。作為家中的老么，小時候跟著爸媽來來去去，在父親的朋友圈裡，被取了個「秤錘」的綽號，好像總是在爸媽的手臂上。也因此，從很小的時候，就聽了許多似懂非懂的情事。父母聊天的時候，時不時就要提醒：家中聽說的事，外面千萬不能去說，如有陌生人搭訕，不要說什麼，可能是特務向小孩子探聽消息！「特務」這個名詞，記憶中好像比什麼叫「電影」還要早知道。確實，當時我們住在北投的泉源路上，是蔣介石上下班的必經之路，家中不定期就有陌生人闖進來「查戶口」，一種莫名的緊張氣氛，像罩頂的烏霾一樣，在小小心靈中留下了印象。

不知始至何時，就知道有二二八這樣的事。家父每次隱晦的談起，就有一種肅殺沉重的語氣。他會談起某某某，二二八失蹤了，某某某，他被槍殺了。他說台北律師公會二二八前有多少人，二二八後剩不到一半。到上小學時，才知道有反共抗俄、殺朱拔毛、共產黨是萬惡的這些話，但沒有多久，就已習慣性地把校長朝會的訓話，國歌裡的「吾黨所忠」當做是耳邊風的反面教材，學校裡、同學們的世界和家裡、大人們的世界，有著不同的肌理和色彩。

另一件和別人家不同的地方是，家父喜歡把「男女平等」掛在嘴邊。可能因為父親是祖母寡母帶大，家中天天和四個女兒相處，他又和媽媽特別談得來，父親確實由心底認為男女

應該平等。文惠大姐考大學時原來是想讀理科，他天天希望她讀法律，繼承他的志業，終於如願以償！回想起來，我的潛意識中還真沒有所謂「第二性」(Second Sex)的影子，從小不喜歡玩洋娃娃，也從來不會因為自己是個女孩，就認為有什麼不可以做的事。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美國甘乃迪總統遇刺身亡，副總統詹森無縫對接繼任總統。爸爸每天盯著報紙，聽收音機，在餐桌上對媽媽和十一歲的我述說著美國民主憲政的穩定是多麼難得。

一九六四年一月，法國戴高樂總統宣布中法建交，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爸爸又是每天盯著報紙，聽收音機。有一天，他面色沉重，在餐桌上宣布他決定要競選台北市長，他說一個變化的時代又將來臨，他希望台灣人能多一些行政人才，不要一碰到變局，就很無助地束手無策。他說高玉樹告訴他這次不準備參選，那只好自己來了。(當時他沒想到高後來還是宣布參選，但那時他已無法退選。)

選舉時，我小學五年級，休了幾個月的課，跟著大人當「秤錘」。爸媽對我沒去上課，好像也不在意，大概是相信我不會留級。對於那次選舉，印象最深的就是爸爸演講時用沙啞的嗓門，聲嘶力竭地講述著沒太多人在意的黨外政見：廢除戒嚴法、民主憲政、都市計畫……

家中，尤其從北投搬到台北後，始終有許多人來來往往。每天下課回來，總不知晚餐桌上會有多少人共餐，每天聽著各式各樣的言論。家中有一個當時算罕見的冰箱，裡面隨時都有吃壽喜燒的凍肉、洗好的大白菜。每來一位客人，媽媽就添一付碗筷，發一個雞蛋，調料

自己來，凍肉、白菜不夠了再拿一盤出來。客人中除了爸爸的酒友、棋友、「文化仙仔」，姐姐的同學、朋友，還有日本客人，美國客人。大家高談闊論，什麼都談，那時的監聽技術大概還沒有太發達。

猶記有一次，爸爸與美國使館一位常來的朋友柯先生談論台灣的前途。爸爸提到波茲坦宣言、開羅宣言、聯合國、人權、民主憲政等等，對著以國際力量來對應國民黨政府的苛政抱著期待。柯先生操著熟練的國台語，說：「陳先生，您要知道，美國人不會為台灣人出什麼力的，美國人是現實主義的，台灣人只有靠自己。」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現實主義」這個名詞。

從小，爸爸要我們不要迷信、不要怕黑怕鬼。他不讓人向我們（至少是我）講鬼故事。北投家中周遭是一圈院子，到晚上除了月光，幾近伸手不見五指。他和媽媽坐著聊天，小孩子們只要繞屋子走一圈，就給一角。哈，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是我的第一桶金！

他常跟我們講一個故事：他大學時和同學打賭，到亂葬崗去過夜。他說他喝了點酒，就去了。當時也不能說沒有點毛毛的。但他壯下膽，演說起來：「請各位知道，我是東京帝大學法律的，各位朋友如有什麼冤屈，可以來告訴我，我會盡力替你們伸冤！」結果，一夜無事，他就此認為沒有鬼神這類的事。

爸爸確實也有著邱罔舍的愛玩鬧、幽默、有點創造力的一面。媽媽說過有次他喝了酒，爬到樹上讓大家找，鬧著開心！他喜歡釣魚、看魚。由北投搬到台北後，住在樓房裡，沒有

養魚的條件。他就異想天開，將樓頂的天台塗了層防水漆，放了淺淺的水，養起耐命的泥鰍起來！當時我還在初中，住在頂樓，霸占著家中唯一的唱機，一面聽華格納的歌劇，一面聽由屋頂漏到接水的幾個臉盆裡叮咚叮咚一下的聲音。這個實驗大概持續了不到半年。

高中時，日本友人介紹了一位日本「救世教」的教主和他的幾位教友來找爸爸。救世教認為可以用心力幫人治百病，基本上，就是集中精神，對著病人舉著手掌相向，病人就有所感！他們在家裡做了幾次示範性的治病聚會，好像對某些人還真有點效果。每日家中，各式各樣的病人居然就多了起來。接著，日本教主就讓爸媽也參加治病的行列。我放學回家，看到媽媽煞有介事，舉著手掌，像個觀音娘娘，在幫人治病。從小的理性主義訓練，讓我忍不住躲到房間裡噗滋噗滋地笑。問爸爸到底在幹什麼，他很嚴肅地說：「這樣特務才不會懷疑我們家為什麼一天到晚有那麼多人出入！」哦，原來如此！媽媽又是怎樣說呢？「人家覺得有效就是有效，能幫到人總是好！」結果，有一天回家，居然看到我們一女中的教務主任也在病人行列。從此，我多了一個black mail的對象。在學校裡遲到早退、逃課，就更有恃無恐了！

講到人的不同，爸爸還有個故事：他和四伯父陳進東同在日本留學時，有次一起參加了一位催眠大師的表演，四伯被請上台接受催眠，師父要四伯集中精神，看著師父的眼睛，然後引導他回去台灣，說：「現在船要開了……船到基隆了，你要下船了，小心台階，一步一步走。」結果四伯真的就做了下台階的動作！爸爸覺得真是不可思議，就要求上台，請大師對他催眠看看。結果，當然是一點效果也沒有。大師說：「人跟人是不一樣的！」

家父左中右派的朋友都有，社會各個階層的人他都能交往，他認定一個人只要心存善念，私心不重，肯為台灣人、為社會大眾做事，他都願意包容、尊重。但對貪污腐敗、假公濟私、壓迫別人的人，他深惡痛絕，能反抗時他要反抗，沒有能力反抗，就避而遠之。

一九七一年二月，幾位日本年輕人來訪，送了一盒羊羹，沒多久，特務就到家裡來把父親和羊羹帶走了。那時我大一，住在台大對面新生南路的一條小巷子裡，家裡的禁書、自己從牯嶺街搜來的各種書刊都跟著我搬出來，堆在小房間的床下、地上，也是萬幸，這些東西當時不在家裡。媽媽特地叫人捎信給我：爸爸被抓了，你暫時不要回家，也別打電話。那時兩個姐姐都已出國了，我的戶口好像還掛在北投，故特務們一時還搞不清家中還有我這個女兒。猶記那時在黑夜裡的台大校園，我茫茫然一個人走著，不久前，朋友們還為了各種議題在這裡高談闊論，大家激情萬丈，但我還能自由多久？會不會牽連到大家？如果被酷刑，我能挺住嗎？走到校園盡頭一個偏僻的公用電話亭，我打了個電話給柯先生，「爸爸被帶走了」，後來知道他馬上將消息傳了出去。打完電話，已是將近深夜，我搭了最後一班公車回家，在家對面隔著寬闊的松江路看附近好像暫時沒人盯梢，我就以最快的動作過了街開了門鎖溜進家裡。媽媽還沒睡，我和她說已給柯先生打了電話，她說她在到處奔走，探聽爸爸到底被哪個特務機關帶走，帶到哪裡。天未亮，我又由家中溜出去。

那盒羊羹，幸好爸爸先放在祖母靈前，沒有打開過。警總的人拿走看了也知道確實是羊羹，不是炸彈，家裡有個壞掉的鬧鐘，爸爸手癢拆過，沒裝回去，特務們原以為是製作定時

炸彈的道具，後來大概經專家鑒定過確認不是。也可能是國外已得知這條新聞的消息對國民黨政府發揮了一點制約作用，沒多久，爸爸終於回家了。我們見到他，恍如隔世！

專制體制下鬱悶的大環境，讓人總有想出去看看的念頭，當時有位朋友在旅行社，幫忙辦了本護照，但並未想到這樣就能夠出去。當時在台灣，大學未畢業就出國是不太容易，也不太常見的事情。一九七〇年秋季進台大外文系後，逐漸地我和一群由高中時代就經常一起的朋友多多少少參與在台灣的保釣運動中，而《中央日報》一九七一年年初有篇社論將三位在美國加州柏克萊分校的保釣健將封為「匪諜」，其中就有一位一直有聯繫的郭松棻。是否信件被攔截了？父親被逮捕時，我們都不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有天那位自小就認識的美國大使館的柯先生在父親被捕後問我要不要出國，我說好啊。於是就在幾天之內，我拿到了美國簽證。父親返家之後沒多久，四月二十五日，我口袋裡揣著家中臨時湊出來的二百五十美元，爸媽送我到松山機場搭機赴美，當時想這一出去，不知何年何月大家能再見面，爸媽的眼神，永世難忘。飛機經夏威夷到三藩市，下機到柏克萊，幾天後再到兩個姐姐居住的波士頓。在波士頓打了幾個月工，九月份到加大柏克萊分校報到重新上大一。當時保釣運動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國際上反越戰、反殖民地、民族解放、社會主義等各種運動絡繹不絕。柏克萊校園內外，每日有各式各樣的示威活動，頗不平靜。我也參加了一個讀書會，保釣人聚會時當個跟班，有空就和台灣的朋友寫信，將外邊的情況告知他們。當時有位台灣的朋友能夠借用到一個美軍的PO Box，抱著分享的念頭，也是應台灣死黨朋友們的要求，我就把一些保釣的刊物，各種左翼書籍，成箱

地寄回台灣。這些書寄的過程確實沒有問題，但接著輾轉流傳時，就不免讓特務們知道了。這些書，後來成了一九七三年台大哲學系事件大逮捕的引子。

一九七一年十月中共進入聯合國，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國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台灣又要經歷一場時代的大變局。一九七二年三、四月之間，一方面面臨由於護照可能被國府吊銷，美國簽證無法續簽，將會被遣返台灣的威脅，一方面由於中共初到美國，人生地不熟，需要找到可以信任的人士為他們在聯合國工作，於是柏克萊保釣的朋友紛紛啟程前往紐約，進入聯合國中國代表團工作。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我也興起了回台大復學的想法，因為要對一個社會起作用，必須參與其中，在海外說說就想成事，是不可能的。

不知為何，爸媽對我及我的朋友們總是超級信任，對我們想做的事，幾乎總是支持。我出國後，聽說媽媽就把我們北投老家的鑰匙交給了宋秩銘。那個新北投泉源路僑園對面的大房子就成了朋友們各種聚會的巢穴。台北松江路的家則成了一座畫廊。聽說爸爸特別願意和我們那群朋友談天說地，有時還跑到台大校園去聽演講，看看年輕人在想什麼、幹什麼。

一九七二年九月，爸爸經由日本來到美國。我大概在十一月時由西雅圖到波士頓見他。當時我已輟學半年多，準備在美國串聯一陣，見識一下美國社會，同時協助一群朋友辦一份左翼雜誌，然後就打道回府，到台大復學。沒想到一到波士頓，才知道父親曾在日本寫了一封建言函給中共，而這封信讓周恩來看到了。經過在聯合國工作的郭松棻口頭傳話，周恩來表示想請父親到中國看看、談談。記得爸爸當時打了個電話給還在台灣的媽媽，說：「玲玉，

你趕緊來，什麼都不用管，來就是了！」媽媽真的就趕緊找了個旅行社辦護照、辦簽證，湊了機票錢，什麼都放下，只帶了點隨身衣物，於一九七三年二月初來到美國。當時，老實說，我是不太贊成父親去中國，因為這樣對我回台的計畫會造成什麼影響很難估計。但父親說這次中國之旅能做到完全保密，外面不會知道才是。他去看看就回來。

為了他即將要赴中國，擔心萬一國府知道了，會沒收財產，於是爸媽就委託一位我社會運動的朋友回台幫家裡把北投的房子賣掉。當時幹這樣的事存在一定的風險，也只有至交的朋友才願承擔這樣吃力不討好的事。當時由於時間緊迫，房子也只有賤價賣出，所得款償還家中的負債，基本就沒剩了。父親珍藏的上萬冊書籍，根據他的指令，交給他日本的朋友郭先生處理，沒想到這批書籍，在他去大陸之後，就被郭先生「沒收」了。一九七三年二月朋友拿了爸媽的委託書回台辦事，三月底他回美時，竟然帶了個晴天霹靂的消息回來：我許多朋友被捕了，有的放出來了，有的還沒放。台灣的朋友要他帶話給我：千萬不能回台灣，因為我人在外頭，大家多少就將各種責任推給我。我已成了黑名單的首位。到這時，我就完全沒有理由反對父親到大陸去看看了。

國民黨可能沒有想到，一個台大哲學系事件，竟然讓陳逸松可以完全無後顧之憂地到大陸去。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爸媽離開中國，在日本住了半年多，於一九七七年七月來到美國，當時我已由UCLA畢業，在三藩市的IBM工作。爸媽在灣區住了一陣，我再開車送他們

到洛杉磯朋友處，其後他們到波士頓找姐姐們，一直到一九七八年一月重返中國，參加第五屆人大的開會。在灣區時，我們約略地談過他在大陸的經歷，當時對文革的了解已比以前多了不少，我可以感受到他仍然是那個有著獨立思考，敢言的陳逸松，對大陸的情況，能夠理解，也有些失望，但當時正值四人幫倒台，華國鋒接班，他對中國的未來會更好還是有信心的。基本上他認為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國處於幾近絕望的處境（以今天的話來說，是個 *failed nation*），不知從何著手，才能救中國。中國共產黨能夠在二十幾年內讓十億人（當時中國人口十億）吃飽，路無餓殍，不再流離失所，人民基本的溫飽健康有保障，政府清廉（那時是如此），中國人沒有被殖民當二等公民，還在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這已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對於還在國民黨高壓統治下的台灣，他關心至極，但深感無奈。對於我不死心，還想設法回台灣的計畫，他沒有反對，只是要我凡事自己當心。

一九八三年，爸媽離開中國，定居在休斯頓，在一九七九年時我已用別名回到台灣在IBM工作，但每年總有幾次出差到美國的機會，他們住到休斯頓後，我就會彎到休斯頓看他們。一九七九年末發生美麗島事件、接著林義雄家受難、陳文成教授被害、江南被暗殺，一連串的事件讓台灣政治生態的凍土開始鬆動，黨外運動逐漸由地底的暗流冒出地表，形成江河。每隔幾個月和父親見面，都要談到故鄉事，他對台灣的關切與熱情，從未稍減。終於盼到一九八七年台灣戒嚴令解除，這是他在一九六四台北市長選舉中就提出的要求，二十三年後終於實現！一九九二年他最後一次到北京，參加第七屆政協開會。途經香港時（當時我

住在香港），他和媽媽特別要求坐纜車去看太平山頂、到淺水灣酒店，這是他倆四十餘年前到過的地方！一九九七年，台灣當局終於解除他的黑名單，在離開台灣二十五年後，父親最後一次回到台灣，應林宗義醫師的邀請，參加林茂生愛鄉基金會的成立。他由北到南，東到西，將日思夜念的台灣走透透。看了許多老友，悼祭了幾位已離去的老朋友，也到祖母墓前祭拜掃墓。關於李登輝，他說：「看（kuang）不出，阿輝仔還真有辦法，這樣子能把國民黨eng倒。」如何讓台灣人民推掉國民黨這座大山，是他幾十年來夢寐以求的願望，那時差不多實現了，他實在高興。但是，他也有點擔心「阿輝仔對日本人不夠了解……」，他說，在他們比李登輝早約十年之前的那幾代台灣知識分子無不對日本人的民族歧視、殖民地政策、高壓手段感同身受、深惡痛絕。台灣先民，為了抵抗日本的占領，不知死了多少萬人。但這些反日、抗日的台灣菁英相當大一部分在二二八及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中消失了。接下來的一代知識分子在日本打大東亞戰爭的時期成長，日本政府為了備戰的需要，以稍微緩和的懷柔殖民政策對待台灣民眾，所以他們比較未能見到日本統治者醜惡的一面，比較沒有被殖民者視作二等公民的體驗，只知國民黨確實不好，有人會認為日本相對較好，又將國民黨等同中國。父親永恆的關心是台灣的未來，認為台灣要避免再度淪為殖民地，台灣與中國必須處理好彼此的關係，要共贏，不要互相抵消。但台灣本身的各種問題，只有盡量靠自己解決。他數十年不變的信念，還是民主、憲政、法治，以及追求公義的社會主義。

二〇〇〇年七月五日，家父在休斯頓家中逝世，享年九十四歲。在他的告別式上，我們

看到治喪委員會的名單裡，花圈的署名中，左中右派關心台灣的人士都赫赫在目，我想他在九泉下當會感到一絲欣慰。

他的墓誌銘上刻著陳家鼐教授的這些文字，好像為他的人生作了一個總結：

異鄉埋俠骨 詩魂應憚歸路遠

風雨憶從容 懿範允澤後世長

寄跡異鄉思故園

百年遺愛在人間

宣揚民主平生志

仗義為公天下先

謹論錚錚異端懼

仁心靄靄孺子歡

泉台此去應難息

好煉瑞石補舜天

序章

一、我的出生和教育

我於一九〇七年出生於宜蘭縣羅東東南門外九份陳家。

父親陳振業早歿，所以自從有記憶起，我只有母親。母親在陳家守寡撫養我，十分艱辛；她在傳統大家族中的各種不平等生活從不屈從，不斷地抵抗和爭取，這無形中讓我知道弱者要自立自強的道理。她對我很嚴格，我和人打架她都先打我，這反而激發我長志氣，決心要做「豪人」（台語：有成就的人），雖然那時我不懂得「豪人」是什麼意思，只知道不要被他人欺負且會幫助人的就叫「豪人」。所以直到今天，看到弱者或貧困的人受到壓迫，我總愛出來替他們打抱不平，我想這是受到母親教養的影響。

一九二〇年（大正九年）是我生命轉折的一年。那年，我小學老師佐藤要回日本，三叔兒子陳進東想跟他去日本讀書。那時去台北讀書都很稀奇，何況去日本讀書，那簡直像爬上



岡山六高後面為操山，其麓為運動場，學生飯後常成群結黨昂步登山。

天國。我去問三叔可不可以一起去，他說去問你媽媽。我永遠不會忘記母親回答我的一句話：「借錢也要給你去！」因此，連同我在內共五人，就以十三歲之齡隨佐藤老師到日本岡山進二中就讀。母親每月寄三十元讓我們寄宿在高原先生家。高原先生在高等女學校教書，一下課他就回來教我們，高原家族對待我們都如自己的孩子一般，我很尊敬他。

考入岡山六高以後，就如出籠鳥，我的思想開始展翅飛翔。高等學校並不大管你的成績，聽說這是仿德國高等學校的制度，學校老師十分博學，大多是可當大學教授的人。高等學校三年，我經常和朋友去旅行，也學會下棋的習慣。我選德語為第一外語，無形中受德國古典哲學和文學的影響很深，馬克思思想自然進入我的世界。在學校的學生社團，我加入了「社會科學研究部」，再加上學校老師幾乎都有左翼思想，當時也有



「不恥群鳳之雞，同聲自然相應。」中華民國十四年雙十節翌日，岡山留日漢民族攝於後樂園。後排左一為吳新榮，前排右四為陳逸松。（吳南圖提供）

東京帝大和京都帝大的學生來學校當學生導師（tutor），都是講讀社會科學的書籍，因此，大家都在理論殿堂中高談闊論。那時正逢日本大正民主期，百家爭鳴，各種思想都有，不管是自由主義或左翼都百花齊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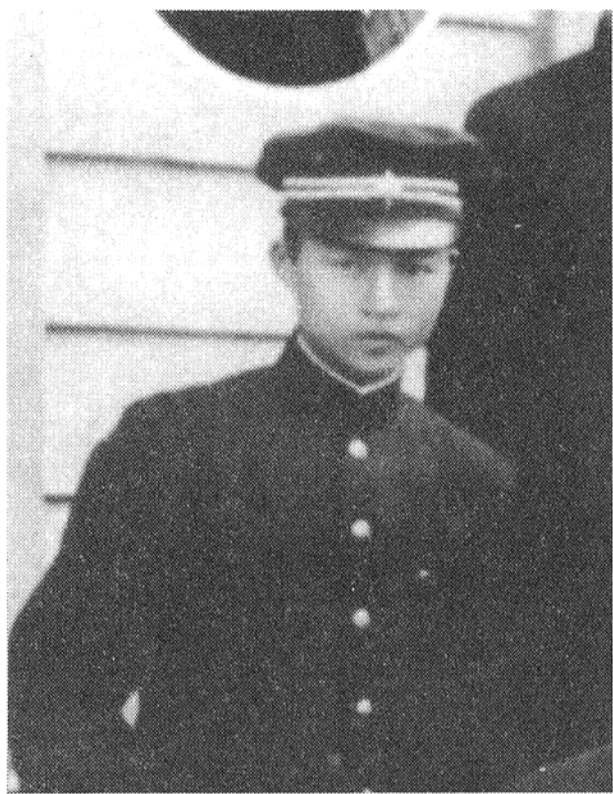
進入東京帝大法學部政治科就讀後，我加入了東大的「新人會」和東京台灣青年會的「社會科學研究部」，因此認識了蘇新和許多左翼青年，結為終身好友。由於「新人會」和蘇新的關係，我又和日共和日本左翼運動發生了一些關係。在日本左翼運動的最後一波高潮期，也是日本警察大舉鎮壓異議運動的時候，我曾經兩次被日本警察逮捕，遭到嚴刑拷打，我永遠不會忘記被八個警察用竹劍從八方打到全身是傷的情景。被釋放後，我在一九三二年於東京帝大畢業，本想走學者的路，但因殖民地人任公立大學教職困難而放棄。我考上律師資格，加入了日本「自由法曹」

團，站上法庭為在「三·一五」、「四·一六」大鎮壓中遭逮捕起訴的日本共產黨員辯護。又為幫助受到地主壓迫的日本農民和受到日本右翼欺凌的朝鮮人勞工，我親訪偏遠鄉下現場，調查事故原因，為他們解決問題，和替他們在法庭上義務辯護。

二、我的思想和文藝活動

東大「新人會」和「社會科學研究部」

東京帝大「新人會」，是在大正年間由宮崎滔天之子宮崎龍之介和其他在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史上很重要的人物共同創立的。它原本兼含濃厚的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色彩，後來轉向共產主義，實為日本時局驟變和日警對社會主義壓迫的結果。當時新人會反對日本軍閥的專橫，且以平等對待弱小民族，特別主張為殖民地台灣人、朝鮮人爭取平等待遇；這種新人會的精神吸引了我加入。當時，參加「新人會」的台灣人只有我一個，另外還有二位朝鮮人。在那同時，東京帝大另外有一個由台灣人組成的「新民會」，但兩者性質完全不同。



1925年，陳逸松入岡山六高。



1930年4月8日，七一會例會兼送別會，左四為陳逸松。

必須一提的是，我參加的東大「新人會」和朱昭陽、陳茂源和高天成他們組織的「新民會」，完全是兩個性質不同的團體。「新民」兩字我不喜歡，因為它的意思是做日本的新國民；日本以殖民地對待我們，我們又要當他們的新國民，那豈不是奴隸思想？而東大「新人會」的精神是主張民族平等以及被壓迫弱小民族的解放，這與當時日本的社會主義潮流普遍支持殖民地獨立運動一樣。我認為台灣人或中國人應該追求民族的獨立和自強，而「新民會」他們認為台灣人只要做新的日本國民就好，這和我的想法有很大的差異。但當時東大的大多數台灣人菁英都加入了「新民會」，我沒加入，所以算少數派。

東大「新人會」於一九三二年解散，原因是日本軍閥、軍國主義抬頭，不但抓社會

主義者，連自由主義者也抓，迫使「新人會」轉向以激烈的共產主義對抗。總而言之，「新人會」的精神原來是站在社會民主主義的立場，後來變成了激烈的共產主義，在日本軍國主義起來後不得不解散。

嚴格說，我的思想主要傾向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原來是求社會全體的平等發展之意，這和共產主義主張階級鬥爭的極端思想不同，這也是我和蘇新他們雖是好朋友，但始終行動不一致的最大原因。蘇新他們看我太溫情主義，不過我掩護蘇新到宜蘭太平山，要不是我的溫情是無法做到的。我在學生時代很苦悶，一時很嚮往左翼社會主義，積極參與東京台灣青年會的社會科學研究部，另一方面也是對左翼朋友如蘇新、林加才、蕭坤裕等人的同情和支持，盡力幫助他們對抗日本的軍國主義。後來新人會一些人被抓，我也以律師身分站在東京法庭為他們辯護，可說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也可說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坦白說，其中混合著小資產階級的情義在。

我不贊成極端的社會主義，也就是反對絕對化的階級鬥爭論，特別在我晚年開始研究易經哲學後，更體會到鬥爭和調合兩者實為一體的道理。

我始終沒加入共產黨

因此，我始終沒有加入共產黨。

我讀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但對階級鬥爭學說持懷疑態度；毛澤東說知識分子是「臭老九」，我不能心服，因為知識分子不是一個階級，它只是每一個階級中的菁英分子，它領導其階級甚至全人類向前進步。我也不能接受「無產階級專政論」，我認為應以人道主義為基礎，尊重人性，然後才有建設社會主義的餘地。否則單用階級鬥爭論，只為了打倒對手沒有第三條路，這反而不好。因此晚年後我開始研究易經，主張陰陽協調，一個階級應該把另一個階級包含進去才對，而不是打倒它消滅它。

在東京，我受到左翼社會科學的啟蒙和訓練，使我能夠用科學理性的態度以及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去觀察世事變化。到了北京，我仍然孜孜不倦地博覽群書，包括毛澤東思想、馬克思著作、中國革命歷史，甚至周易、魏晉哲學。然而，我一生遇事據理力爭毫不退縮，幫助弱者抵抗強權，幫助貧窮的人抵抗有產者，這些稟性大多來自小時候環境造成的，特別來自母親的影響。

我們現在廣泛使用的「共產主義」一詞，是直接挪用自日本人的德語漢譯，我認為這是錯譯。communism 中的 commune 原義是「公社」或「自治體」的意思，因此「共產主義」應該譯為「公社主義」才對。譯成「共產」好像要把所有的個人財產都沒收去，這是大誤解，其實，原意只是把「資本」或公共財產委由社會、公眾管理的意思而已。另外，「唯物主義」materialism 也應翻成「物質主義」，「獨裁」dictatorship 也應該翻成「專政」。最早把「共產主義宣言」翻成中文的陳望道先生，與我同是中國人大常委，我問他這事，他笑說年輕時留

日就直接從日文引用了，現在要改過來實在不可能。我一直認為，錯譯的「共產主義」用語，實在對社會主義運動的展開造成很大的阻力。

現在，我相信易經的宇宙觀。萬事萬物都有一陰一陽，陰陽相生相剋，萬物才會生生不息。凡事有陰陽對立面也有調和面，沒有絕對的調和，也沒有絕對的對立；調和中有對立，對立中亦有調和。譬如社會的階級矛盾和對立，必定發生階級鬥爭，馬克思主義主張打倒階級才能解決問題，我的想法不是用打倒的方式，而是用調和的方式來處理對立的問題，也就是陰陽調和的觀點。再如，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對立，國民黨和台獨之間的對立，有這種對立才有動能，也就是前進的力量，才有今天的場面；但只有絕對的對立會互相毀滅，要如何處理？我認為，只有用陰陽調和的思維，使對立達到更高層次的調和，才能避免互相毀滅而得到互利互進的成果。

我的文藝活動與筆名

年輕時我曾用過幾個筆名，以後就不太用。戰爭中皇民化時期我也堅不改姓名，絕不用什麼山葉、木村之類的日本名字；與日本人交往全以「陳」自稱，他們叫我「陳君」。我想，如果你叫我「陳」會覺得怪怪的，那是因為你有缺點，要不就是我有缺點，彼此間一定有優越感或自卑感在作怪。父母給你的姓你都不能接受，其他你還能做什麼？所以來美國後我的

名字還是「陳逸松」，拿居留權我也不改名。

寫文章，我不主張用筆名，是因為筆名用得多了，變成讓讀者去猜測，文章發表後沒人知道是誰寫的，就發生逃避責任的問題。有人用筆名來罵人，我認為是一種卑劣的行為。除非寫文藝作品，文章內容與別人無關，用筆名又可增加優美感，其餘我不主張用筆名。

記得在一九二五年三月，楊雲萍和江夢筆創刊了《人人》，是台灣第一本白話文文藝刊物。因為他在《台灣民報》上刊登了免費贈閱的消息，我看了報就寫信去要，他寄了第一、二號給我，是一本一張紙折疊成八頁的小刊物。當時我就讀於日本岡山高等學校，而楊雲萍是台北第一中學（約四年級）學生，台北一中專供日本人子弟就讀，全校除了二位台灣人之外全是日本人，台灣人能進這學校非常不容易。當時我正在學白話文，就用「虞淵」的筆名寫信給他，寫得有點粗糙；台灣光復後，他在一篇題為《〈人人〉雜誌創刊前後》文中（一九五五年）提到此事說：

《人人》刊出後，曾得到不少反響。……如陳逸松君就是其中的一人。陳君現在是考試委員，負衡才的大任。當時他是岡山高等學校的學生，寫給我的信是極其「纏綿」的。近年來，彼此都因「俗務蝟集」很少閒敘的機會。寄語陳君，還有沒有當年的綺情？

一九二六年，我們在東京「日比谷」公園附近的「喫茶店」（按：即咖啡廳）第一次見面，

後來成為終生好友。我在東京帝大就讀時，他進日本大學文學科，彼此更有往來。後來他認識了日本《文藝春秋》雜誌的名作家菊池寬，受其影響，說自己是菊池寬的大弟子。我對他說，你們寫文章對社會關心太少。我主張文藝要為社會服務，而他主張文藝為文藝的唯美主義。關於文學與社會的關係，依照我對歷史的研究，社會是基礎，其中經濟第一，再來就是經濟綜合的政治，其上才是文化、文學。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運動應該有機地結合，如果文化運動不與政治經濟相聯結，孤立的文化運動是薄弱的。

當時楊雲萍和蕭坤裕、劉明他們都很熟，但彼此思想路徑不太一樣，他不愛搞政治，我則喜歡參與有社會主義思想的組織，如東京台灣青年會和新人會等，這些相當於現在的新潮流派。不過，我的基本思想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接近人道主義和自由主義，希望增進社會的繁榮和均富。

一九二六年，我也以「虞淵」的筆名在《台灣民報》第八十八號（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發表了我的第一篇文章——〈檄日本留學生創設言論機關〉，批評台灣青年學生「倦怠無力」，不是拚命的跑入陰鬱的「內面的」生活，就是「唯唯諾諾的跪在官僚們面前，脅肩諂笑，得了殘杯冷炙之賜，即以為畢生無上之光榮」。我在這文中呼籲：「我們要覺醒了，把最賢明的個人『自覺感』為出發點，來組織一個有機的言論機關吧！」

「虞淵」出自《淮南子》，意謂太陽下西方是去「虞淵」這個地方，是海的一部分。太陽行走了一天，就是到虞淵去沐浴，洗淨污穢明日再起。用這筆名引喻一個疲憊的人來到我



疑雨山莊庭院一家。

「虞淵」懷裡沐浴，洗淨他的疲憊身體，明日再出發，使他煥發新的氣息之意。

一九四一年，創辦《台灣文學》時，我用「疑雨山人」的筆名寫了日文中篇小說《姐妹》，發表在第一、二期上。¹這有一典故，我曾讀過一本唐朝詩集叫《疑雨集》，該書專門描寫男女間的情懷，十分細膩，很切題，我很欣賞。後來我也以疑雨山人筆名寫了一首詩：

樹多風疑雨

窗外月正明

該詩意喻：外面人多話雜，喧鬧不休，社會不得安寧，但只要心中寧靜，窗外的月色是那樣的美好。

¹張文環主編《台灣文學》創刊號（一九四一年五月），及第二期（一九四一年九月）。



1936年陳逸松攝於大稻埕法律事務所。

後來，我也把我北投的房子取名為「疑雨山莊」。

其實，疑雨山莊外面樹木很多，周圍都是老樟樹，樹葉被風吹得沙沙作響，有如下大雨，但探頭向窗外望，月光卻是那樣的清靜明亮啊！

另外，台灣剛光復時，我在自己創辦的《政經報》上，曾經用過「公為」筆名寫過一篇時評¹，後來終生不再用過其他筆名。

三、黑夜的盡頭

一九三三年三月，我決定離開日本回台灣服務鄉梓，在台北市大稻埕開設了「陳逸松法律事務所」。開始了我的律師生涯，在台北市奠定了我的社會關係。一九三五年，我當選了台北市會議員，踏上了從政之途，雖然這是殖民地式的有限議會，但我借此發揮了替台灣人爭平等的機會。可是，台灣

選舉歌

投票的人免出名

財勢怨恨不免驚

心肝大家着拉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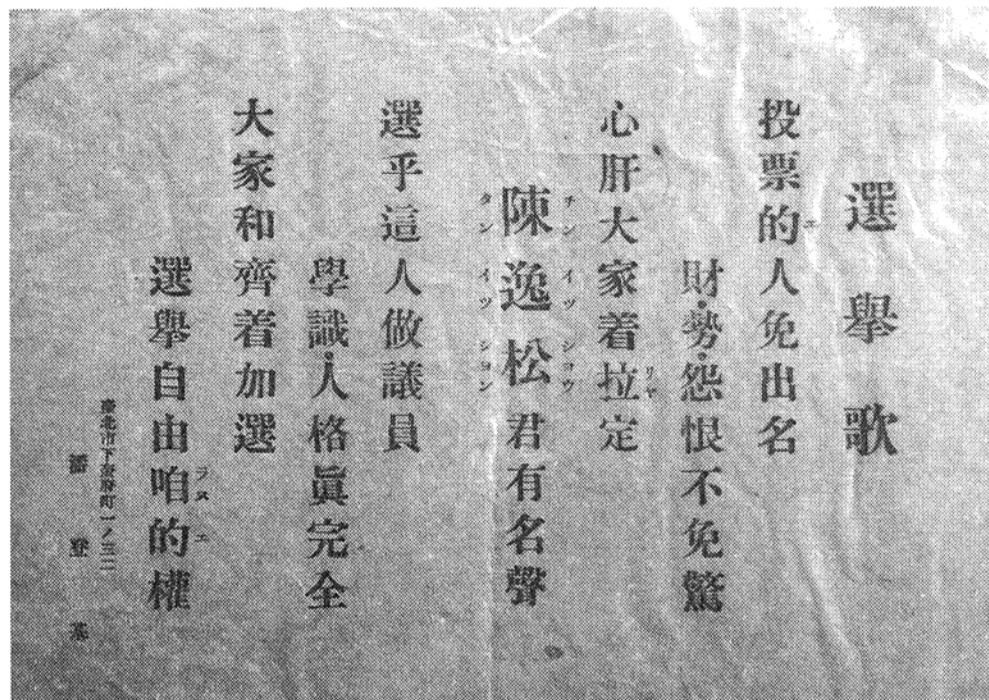
陳逸松君有名聲

選乎這人做議員

學識人格真完全

大家和齊着加選

選舉自由咱的權



陳逸松競選台北市會議員時的選舉歌。

很快就進入了日本戰爭總動員體制，接著，皇民化的波濤巨浪洶湧而來，為了保存台灣人漢民族的尊嚴和生活，我們只有陽奉陰違地進行間接的抵抗。

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當德國納粹投降，歐美沉醉在歐戰勝利的時刻，亞洲還在慘烈的戰火中，台灣更處於惡夜盡頭。然而，最黑暗的時刻也是黎明來臨的前刻。盟軍在太平洋戰區展開了總反攻，六月經過了八十二天的激戰和數十萬人的傷亡，美軍占領了琉球，直逼日本本土；在中國抗日戰場上，戰局也由撤退轉為戰略反攻。日本已處於四面楚歌，山窮水盡的地步。軍國主義指導層早知已離敗戰之日不遠，主和派已通過蘇聯、瑞士向盟國乞降，但主戰派仍高喊「本土決戰」、「一億玉碎」，企圖繼續榨取日本本土和殖民地的最後一滴血汗進行頑抗。

台灣「玉碎」？

在台灣島上陷於孤立的日本殖民者，瘋狂地將台灣「要塞化」，企圖把台灣「玉碎」。皇民奉公會被改組為「國民義勇隊」，訓練學生青年拿最原始的竹槍竹劍準備與登陸的美軍肉搏戰；接著開始在台灣徵兵，並組織「台灣護國勤勞團」全面徵用勞動力在各地築構工事，每日高達二十萬人。

日軍為了趕建軍用設施，一九四四年五月在台北州組成了一「勞動奉公隊」。勞動奉公隊共分二隊，一隊由林熊祥當隊長，調到林口坪頂修建飛機場；另一隊由辜振甫當隊長，被調到宜蘭去。每一隊幹部都由台灣人的「大頭兄」（知名的士紳）擔任，下設總務、調度、會計、炊事，我被徵調負責總務工作。隊員都是來自農村的十七、八歲青年，每一隊約有五千人，集體住在像乞丐寮的草屋。每天一大早天剛亮就起來工作，每天工作十一、二小時，把原來的相思樹林鏟平，趕工修建飛機場。從五月到六月的二個月期間，勞動奉公隊和軍事化管理沒什麼不同。當時有記者來採訪，問我的感想，我說：「台灣人過去從來沒有一起過團體生活的經驗，我要訓練他們過團體生活。」其實我心中暗想，如果把這五千名台灣人訓練起來，組織起來，以後就不得了了。

日本統治者從來就對台灣漢人社會不放心，心疑台灣人會與中國盟軍配合，裡應外合，從背後出賣日本皇軍。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前夕，日本特高在南台灣製

造了「東港事件」。誣指歐清石、吳海水、郭國基等人涉嫌計畫配合中國軍隊登陸而將之逮捕。案件株連千人，嚴刑逼供慘絕人寰，許多人遭凌虐致死。後來，特高又在北部用同樣手法捏造「瑞芳事件」，逮捕李建興家族，且株連七百人。一時風聲鶴唳，全台籠罩在恐怖氣氛中。當「東港事件」擴大株連時，風聞將擴大到中北部抓「不協力者」，所有台灣社會有名者都名列其中，我也名列黑名單，幸好我機智以對而倖免於難。

智鬥「皇政會」

這期間，日本人的極端右翼團體「皇政會」橫行霸道。他們曾經在典禮席上公然質問林獻堂的「祖國」發言，並當眾打了林一巴掌，後來被稱為「祖國事件」。當時台灣人一聽到「皇政會」都畏懼三分，但我這個人從不怕他們，經常和他們爭吵，和他們對抗，因此他們也對我畏懼三分。有一天，皇政會這幫人把台北的市議員和商紳全集合到公會堂（今中山堂），並請了軍部的田中大佐坐在台上，逼台灣人在軍部面前表態對日本的忠貞。皇政會的人劈頭便逼問台灣人：「萬一美軍登陸，你們台灣人是站在美方還是日本這一邊？」這句話一出來就像叫台灣人去死一樣殘忍，大家都身體縮起來，深怕被點到名。陳清波卻一下就站起來說：「台灣人一定盡忠報國，與日本人共生死。」沒想到，卻被皇政會的人斥為：「我就知道你這個人，見了日本人都說好話，這種話我聽太多了，我不聽，我要聽不同意見的，有沒有人？」

我要指名囉！」大家都驚惶失色，怕被點到名。我心裡也感覺不是滋味，這簡直是逼人太甚。果然指上了我，我站起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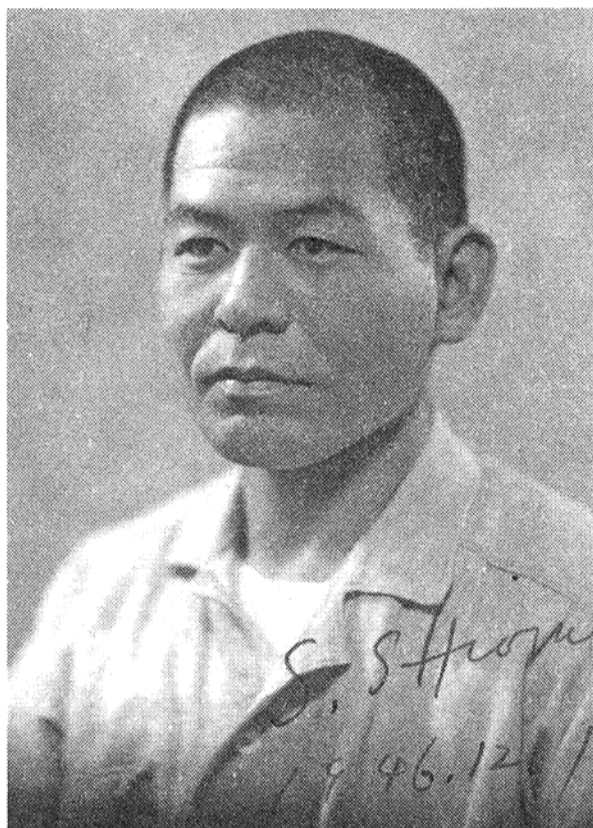
××君，你組織皇政會為的是天皇陛下的政治。今天你要聽不一樣的話，我請問你，你的意思是要我說台灣人反對日本人嗎？是不是這個意思？你這種作風無疑叫我們這些人來挨揍。我們說為日本人死也不行，要是我們都說我們反對日本人，你們一定會打人。你們這種作風不是真正要開會，我不願與你們再談下去了，對不起！我要先走了。

說完我轉頭就要走，這時坐在台上的田中大佐也按耐不住了，拿著劍叫住我：「陳君，等一下，我們來談一下吧！」接著拔出劍向著皇政會的人作欲砍殺狀，罵道：「馬鹿野郎！你們找這些台灣士紳來，就應該好好和他們討論，你們卻在逼問他們，這不是在替國家做事，滾回去！」皇政會本來就怕軍部，這幾個人倉皇收拾桌上東西，一個個溜了。於是換由田中大佐當主席徵詢我們的意見，我站起來說：「目前的政策對台灣人的歧視依然嚴重，改姓名說日語的『國語家庭』配給就多，不改的配給就差，我不願意改姓名是因為戰時困難，大家應該有難同當，這樣人心才能一致，你以為如何？」田中大佐聽了站起來說：「對！你說得對，像皇政會那種作風明明是在逼台灣人反抗，我會叫他們明天就解散。」第二天，果然他發布了命令解散皇政會。

會後，一大群人從公會堂走出來，周延壽、黃啟瑞、張文環等人拉住我說：「陳先生，你真是救命恩人啊！我們都嚇得汗留滿背呢！」對此事我也很不高興，無奈地說：「不得已啊！台灣人還是有話直說才好啊！」

鹽見俊二向我說：日本會敗！

在這戰爭黑雲籠罩的日子，有一天，鹽見俊二（總督府主計課長）來找我一起喝酒。他小聲對我說：「我被調往南洋 Ando 島，後天就出發，這一去，一旦爆發海戰，恐凶多吉少。」他剛結婚不久，妻子不能同去。他轉口問我：「你看日本會贏還是會輸？」我隨口說：「當然贏啦！」但我心裡希望日本會輸，可是看到日本侵攻南洋勢如破竹，新聞又天天報導大勝



鹽見俊二。

利時，又覺得日本會贏。但鹽見鄭重地告訴我：「我看日本會輸，你將之放在心裡，再做觀察吧！」

我心裡明白，他不是騙我。要是高等刑事這麼說我會警惕，他們會故意試探你，套你的話，再去打報告，而我和鹽見俊二是相交很久的朋友，他不會。事實上，他這麼說是有科學根據的，他們能接觸到外國的消息，如英國的《新聞週刊》、美國的《紐約時報》等，台灣

人是看不到這些的。依他統計，開戰後美國的汽車生產數量沒有減少，日常商品的零售價也沒有改變，而日本已買不到米，肉類少到稱兩配給，青菜也買不到；更致命的是，日本缺乏製鐵原料，連台灣的門窗、鍋鏟、鋤頭都拆下來送到日本去。他說依經濟原理來推論，日本這種情況恐怕維持不久，而美國再拖十年都無所謂，因此日本會輸。

我原來打從心裡就認為日本這種非正義的戰爭，一定會輸。它不但不得人心而且到處侵略殺人，人民一定會起來反抗，日本遲早會輸的，這是我從理想來的信念。沒想到，鹽見用這樣的經濟科學的角度去分析日本一定會輸，真讓我佩服，這更加強了我對日本早晚會失敗的信念。

*特記：

本章部分引用林忠勝先生撰述的《陳逸松回憶錄：日據時代篇》，前衛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特此感謝。

第一章

做新的歷史主人——台灣光復和三青團

一、八月十五日——山水亭上的大喜劇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誰都沒料想到，這是一個勝敗、正邪、喜悲乾坤大逆轉的一天。那天，就像戰時沉悶的每一天，日本憲警還是眼露凶光地監視著每一個台灣人。我的收音機外表好看卻不太中用，經常沙沙作響聽不清楚，所以我很少聽它。這一天，聽說中午有天皇的「玉音廣播」就打開來聽看看，還是雜音很大沙沙作響聽不清楚，好像只聽到天皇微弱的聲音說：「……一億一心……作戰……」以為他又是大家繼續為「聖戰」犧牲。這種話，日本戰爭當局一天到晚在講，也就不以為意；遂順步從事務所走到附近的「山水亭」。那裡有東坡割包，軟軟的我很喜歡。沒想到，在那裡度過了畢生難忘的時代大喜劇。

話說，正當我和古井（王井泉）在閒聊時，本來就熟識的台北州高等刑事課的警部補佐

佐木倉皇地跑進來，氣急敗壞地問：「今天的廣播你們聽了嗎？」我沒有特別注意到他臉色的變化，就漫然回他說：「有啊，聽了。」他以前經常來找我，問我對戰爭時局的感想或者民情狀況，這次可能先到事務所找我，知道我來山水亭才又趕來這裡。他又問：「聽了有什麼感想？民間反應如何？有需要報告上級的地方嗎？」我以為他又來套消息，遂敷衍道：「好像陛下宣示一億一心，為國效忠，繼續堅定作戰！」他聽了十分驚愕，以為自己聽錯了，說：「什麼？繼續作戰？哦！那可能是聽錯了，你們稍等，我回州廳再問看看。」他三步作二步地跳下去，騎了腳踏車飛也似地走了。那時，台北州高等刑事課課長是日本岡山人，和我同樣是岡山二中畢業，但他好像沒有唸大學的樣子。我是岡山六高和東京大學畢業，他對我很客氣，但他身為日本統治民族有優越感，並不和我接近，佐佐木是他的下屬。

佐佐木走後，剩下我和古井兩人。古井的兩顆大眼睛瞪著我，兩頰微顫，嘴角漫漫地開說：「喂！不是開玩笑吧！我們是不是聽錯了？日本是不是真投降了？」我說：「佐佐木說的可能是實在的哦！」這中間的十分鐘，我們內心感情的推移是難以形容的。古井細聲地說：「日本若輸去，我們所思念的理想的社會真會實現囉，大家好好努力呀！」於是兩人各自抽起了菸，陷入沉思。

不一會兒，佐佐木踉蹌地跑進來，哭喪地說：「陳樣、王樣，你們大概聽錯了，日本打輸了啊……」我心想他又在騙我，想套話，就回他說：「我沒聽錯啊！就是一億一心啊！」他氣呼呼地說：「沒錯沒錯，日本輸了日本輸了啊！」我和古井兩人四目相觸，以心傳心，

這剎那間，真是乾坤逆轉，日本終於輸了，鹽見俊二兄的預言成真了，只是，沒想到來得這麼快。佐佐木瞬時轉變態度，臉上擺滿歉意說：「日本輸了，啊！陳樣、王樣，失禮失禮了，以後萬事拜託了！」說著說著，像鬥敗的公雞，垂頭喪氣地邊哭邊下樓去了。

古井泡了一盅最難忘的好茶，兩人對視，感慨萬千，這個連作夢也不敢想的一天，竟然來得這麼快。四年是多麼漫長的日子啊，受盡日本人欺侮的日子，與皇政會相鬥的事、田中大佐的事、修建機場的事……這些都一夕間逆轉了。在山水亭的一刻彷彿從黑夜到了天亮。今後終於可以平等做人了！這時刻，古井和我都有一個共同的想法：「這樣一來，大家要有新的打算了！」但是要怎樣打算呢？眼前，我明白，下一刻起，我們將有一個翻天覆地的歷史試煉。

勝利的腳步聲

第二天，台灣唯一的一份報紙《台灣新報》刊出了波茨坦宣言的內容，但真正勝利的腳步聲還聽不到。何況，二十萬精銳日軍仍在，日本憲警監視的目光還在四周，大家的興奮之情都還埋在內心，不敢表露。一直到八月底，台灣人內心的喜悅都不敢表現出來，儘管大家不說話，但臉上都浮現難以抑止的歡喜。在這半個月中，少數日軍日人和台灣皇民階層，因為太過驚愕而無法接受現實，出現了策劃台灣自治、台灣獨立或台灣租借等拒降的行動，但

都很快被安藤總督所制止。

八月二十七日，《台灣新報》刊出了何應欽任命陳儀為中國戰區台灣區受降主官的消息。九月一日，也報導了國民政府任命陳儀為台灣行政長官的消息。九月二日，盟軍在東京灣的美艦「密蘇里」號上舉行了受降典禮，勝利的腳步聲正一步步接近。自此，原本害怕日警日軍而壓抑的民族感情，逐漸顯露而轉變為一片歡慶。

九月一日，有十八名中美軍政人員搭乘日方砲艦來台。他們是第一批登陸的盟軍，主要目的在調查並釋放美英戰俘，為接收台灣作準備。其中有一位國府軍政人員，一位是名銜為「台灣義勇總隊上校副總隊長」的張士德，奉李友邦之命回台發展組織；另一位是「福建省政府顧問」黃澄淵，第三位是國府軍委會中美合作所閩南區指揮部上校參謀黃昭明。

不久國軍上陸，我們幾十人在山水亭二樓前棚俯看國軍的列隊行進。有些人驚訝地叫出：「怎麼戴草笠擔米籬呢？奇怪！」王井泉說：「這就是行動便利，就是游擊戰的勇士，你們不知道利害啊！日本怎麼輸去了！」我也同樣對大家詳細說明：日本只是占據點和線，中國是占面，採取游擊戰術，所以中國才會大勝啦！此刻大家要堅定信心，我們不再是殖民地的被統治者了，我們是國家的主人翁啦！大家都很贊同我的說法，大家都愉快無邊，各人心中抱著天青色的遠景回家了。

二、二青團——迅速匯集的台灣新生政治力量

張士德原名張克敏，台中豐原人。早年曾赴廣州讀黃埔軍校，後返台積極從事台灣農民組合運動。一九三一年台灣左翼運動遭大檢舉，張又赴大陸，以「馬士德」之名活躍在台灣義勇隊，曾擔任李友邦領導的台灣義勇隊第三區區隊長。一九四二年，國民黨中央在台灣義勇隊內成立「三青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部，李友邦擔任團長。張士德以上校軍銜回台後，以「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籌備處總幹事」名銜，準備展開組團工作。大約在九月初，他透過替他修理電器的人來聯絡，找我去。當時日本軍警還到處監視，我一路躲躲藏藏躡著腳尖，走到北門町的「梅屋敷」（現稱「國父史蹟紀念館」，台北車站附近），因怕被日本人看到，就從後面買菜的小門鑽進去。張士德以「日日命令」任命我擔任三青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部「主任」，我很快就成立了三青團台灣區團籌備處。當時台北市在戰時遭盟軍轟炸過，滿目瘡痍，總督府的台北州總務部長陪我到處看，問我要哪一間？我選了當時台北市唯一的一家百貨公司「菊元」，他馬上命令日本人搬走，三青團籌備處就設在這個五層樓的「菊元」百貨上。

剛從日本殖民統治解放出來的台灣人，民族感情高昂，要求實現政治民主和社會正義的情感高漲，都期望有政治團體出來帶領，自己管理自己。三青團的出現，馬上匯集了巨大的社會力量。在日據期從事社會運動、民族運動的人，不論左右幾乎都加入了三青團的行列，



三青團台南分團成立，該分團主任是莊孟侯，吳新榮擔任曾北分團主任。（吳南圖提供）

由於理念相近人脈相通，包括前台共成員蘇新、王萬得、潘欽信、蕭來福等都加入。台灣區團很快就組織起來，我兼任團長，黃啟瑞擔任青年股長，林日高擔任組織股長，謝娥任婦女股長。三青團以當時的行政區域分為五個分團。台北分團主任陳逸松；新竹分團主任是原台灣民眾黨的陳旺成；台中分團主任是張信義，重要成員包括有楊達、葉榮鐘、呂赫若、林碧梧、石錫勳、莊守等人；台南分團主任是莊孟侯，在佳里行醫的作家吳新榮則擔任「曾北分團」的負責人；高雄分團主任是「東港事件」冤案主角吳海水，其他還有重要成員簡吉、楊金虎等。三青團的運作是：規章都由台北制定，各地分團自行運作，遇有事則齊聚台北商量。在我派人告訴吳新榮要組織三青團消息時，他形容當時的心情是：

「真如白日見著霓虹那樣，始接著祖國的吐息，非常興奮。」

自治的角色

從八月十五日到十月二十五日，直到陳儀政府來台舉行受降典禮及慶祝光復為止，這七十幾天中，台灣幾乎處於沒有政府的狀態，日本殖民政府快速崩潰，國民政府又還沒到來，只有三青團扮演了自治的角色，大小事都要經過我們處理。我的事務所和團部，人進人出日理

萬機。日本軍部要來找我談國軍登陸的事，日警北署署長每天要來問我今天有什麼事要做，我說水溝髒道路要清理，他說「是！」馬上下令清理。劉明組織了一個糾察隊，把流氓、頭兄、學生組織起來，晚上要「巡更」，民間有爭吵打架鬧事，他馬上派人去取締，劉明說：「我搞文他搞武。」兩者互相配合。各地方也紛紛組成三青團服務隊，擔當各地治安，保護農民家財，嚇阻日人日軍的破壞行為。當時台灣社會還算平穩，大家守法，充分發揮了自治的精神。整個社會大小事，治安和秩序幾乎都由三青團負責維持。甚至一度風傳我將擔任「台北州知事」，住在我北投家隔壁的一個日本人太太甚至跑來道賀說：「恭喜恭喜，你已是州



三青團社會服務隊。

知事了。」可見得當時人心浮動，因為一切都在未可知之中。

有時我那裡也得兼裁判所（法庭）的角色。戰前日本警察欺侮台灣人，台灣人最痛恨他們。有一天一群人抓住一個日警，架著他到我事務所來，我問緣由，台灣人說：

「這個人是以前的北署刑事，以前他冤枉我，把我抓去毒打，用『番仔油』（汽油）灌我的鼻子，刑我，這傢伙太可惡了！」

我用日語問這日警說：「有這回事嗎？」日警不敢強賴，自承說：

「我錯了，我錯了，我是做了那事，請原諒，請原諒！」

那人不原諒他，火氣更大對那日警拳打腳踢起來。看著那日本人被打得鼻血直流，我對那日警說：

「日本打敗了，你知道嗎？」他低聲下氣地說：「是的，是的，我知道，我們被打敗了，現在已投降了。」我訓誡他說：「像這種事你回日本去可不能再做哦！我是辯護士（律師），告訴你，刑警不可以隨便打人的。」

我轉身對台灣人說：「就這樣了，以後台灣人要團結點，和日本人要和好合作，在世界上也才能站得住。」那台灣人也說：「好了好了，已經教訓他就好了。」

他們臭罵他一頓後放他回去，那日警如夾尾狗一下溜走了。這樣的事，一直到十月五日行政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來到之前，經常不斷上演。

三青團對那些台灣人御用士紳也是反對的。日本人都敗了有人被打了，你當過日本人走

狗的，在新時代還好意思出來嗎？所以我們推行一個口號：

「歡迎陳儀長官蒞台主政，警告御用士紳要退場反省。」

我對新時代的看法

九月二十四日，山水亭陸續來了一些文藝界的朋友。台中清水書局的王仁德、陳紹馨、語言學家吳守禮、歷史學家作家楊雲萍、黃得時等都來了，大家久不見面想談談組織新文藝團體的事。在這裡，碰到了一年多未見的朋友池田敏雄（民俗學家，《民俗台灣》編輯），交談中，我坦誠告訴他對台灣光復後新時代的看法：

- ① 今後彼此的立場完全逆轉了，日本人今後將嘗到的苦頭，我們台灣人過去都已嘗過了。
- ② 幸好，自己過去與總督府保持一定的距離，對於許多事情，始終採取了自己決定的態度。但是，對於一些無法抗拒的情況，深感遺憾。
- ③ 日本人也許會被下令離開台灣，這是大勢所趨，也是當然的事。但就個人而言，把像你一樣的人一律當作侵略者逐出台灣，我覺得並不公平。對於這一點，我會盡力協助。
- ④ 日語不久將會被禁用，日文书籍也並不看好。
- ⑤ 台灣話與北京話文法相同，只是語音有異；從台灣話轉換到北京話，並不如想像中的困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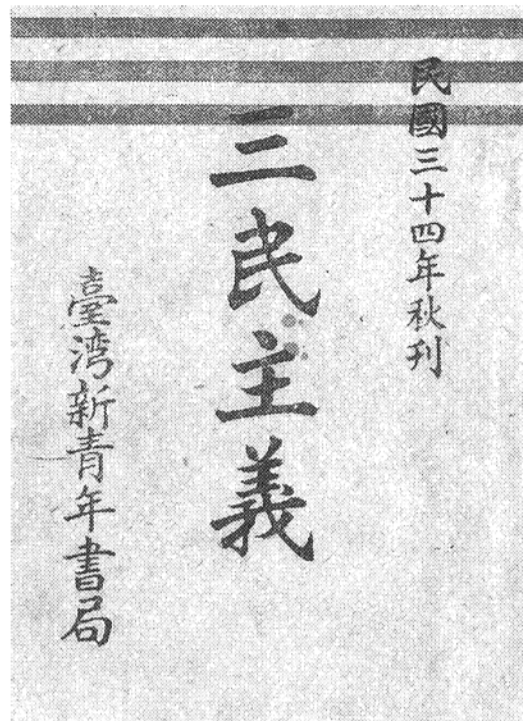
這是我當時對新時代的重要看法。¹

政治上黎明的象徵

十月二日的《台灣新報》，以全版介紹了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性格和政治任務，其中有一段代表性的引文如下：

台灣青年作為中國青年的一分子，有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權利，同時也有義務；因為三民主義青年團是引導中國往正確方向前進的民間政治團體。台灣正逢大變革的新生，在這時候，作為推動社會前進力量的各種三民主義團體，很自然地自發地在台灣各地組織了起來，這是什麼人也無法阻擋的民族力的發現，政治上黎明的象徵。

三青團在這短暫的權力真空期，幾乎成了一個初級的自治政府。它幫助了還未來到台灣的國民政府，在維持社會秩序、治安、戰後重建，以及排除日台舊勢力建設新生台灣的工作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有幸，我在那短暫時期擔任了重要的角色。



1945年秋刊《三民主義》。



陳儀蒞台。

三、十月二十五日——做歷史主人的一刻

十月二十四日陳儀長官蒞台時，三青團和台灣學生聯盟都到松山機場去迎接。當他從飛機下來時，我上前去代表台灣人和他握手，那一刻我確實感覺到他很偉大。他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德國名將很像，留著兩撇小鬍子，個子不高胖胖的。那些日本高官都排在最後面，每個人都頭低低的不敢正眼看，我們則是意氣昂揚，興高彩烈地迎接他。我不禁心想，你們這些日本人，以前你欺凌台灣人，用腳踢台灣人，今天看你如何再顯威風！這實在難怪我們這麼想，台灣人過去五十年，上自父母祖先下至兄弟姐妹朋友，都受過日本人糟踏過，我雖然從小到日本本國去唸書，個人沒受到什麼痛苦或侮

1 參看池田敏雄《戰敗日記》，「台灣近代現代史研究」第四號，日本綠蔭書房，一九八二年十月三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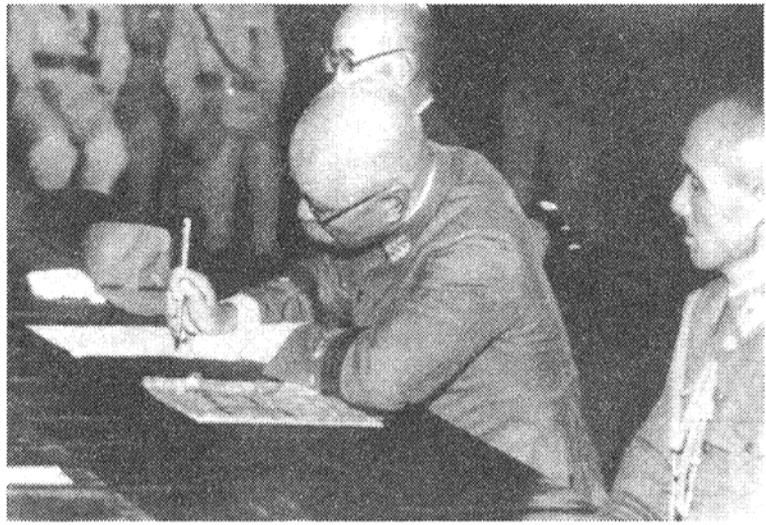
慶祝光復。

辱，但作為台灣漢民族的一分子，民族間的歧視讓我深感厭惡。

第二天，全台激動。早上舉行了受降典禮，下午舉辦了慶祝光復大會。全市張燈結綵，歡慶台灣光復，真比過年還熱鬧。一大早，三青團團員們就到公會堂（中山堂）去幫助布置會場。本來我想帶幾個三青團的人坐到台上，但是當時擔任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第一處少將處長蘇紹文（新竹人）前來干涉，結果只有我作為三青團代表坐到台上。台上除了有公署軍政要員外，還有台人代表以及盟軍代表。台灣最後一位總督安藤利吉大將則在台下黯然肅坐，沒有配刀也不敢戴軍帽，頭低低的。安藤簽下降書後恭敬地遞交給台上的陳儀。陳儀隨即宣布：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台灣省受降典禮。



從今天起，台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
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權之下。

那場面是我一生最難忘的一刻，大家都沉浸在做歷史主人的興
奮中。

當天下午三點，在同一地點舉行了台灣人各界籌辦的「慶祝台
灣光復大會」。大會主席是林獻堂，林茂生則以省民代表致詞，我
記得他說了：「光復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這一句話。現在
想起來，真是語意深遠。我印象更深刻的是，大會上只有林茂生一
個人穿了一襲中式長衫，十分突出；那時台灣人不是穿西裝就是穿
對襟的台灣衫，沒有人穿長衫。那天台北一片歡騰，大家都熱烈歡
迎國軍，到酒店喝酒甚至不收錢。大家都向他們敬酒，雖然語言不
通，但國、台語混合，大致可通。

大家學唱國歌

在日本投降後沒幾天，大約八月二十幾日，大家在山水亭碰面

（或者在我的事務所也不一定，記不清楚了）。音樂家呂泉生也來了。大家都問：「中國國歌怎麼唱，誰會唱？」我說：「我有唱片。」因為在日據時期我常到大陸去，昭和十六、七年間（大約一九四一年），我在當時的上海中華書局買了這張唱片，裡面有國歌，也有當時中國共產黨常唱的〈大刀進行曲〉，也有勞動歌，唱：「手把著鋤頭鋤野草呀……除去了野草好長苗呀……」這樣的歌。我還買了《三民主義孫文全集》，紅皮好大一本。當時攜帶這種唱片或書籍進入台灣的，只有我這種有鬼膽的人才敢；在出入境時，我說我是辯護士（律師），檢查就比較寬鬆。

他們催促說快拿出來聽，我搬出那台手搖式唱機，是接著一支大喇叭的那種。於是「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國歌出來了，他們聽了說，哦！這就是，再放一次聽聽看。呂泉生就邊跟著唱邊記下了五線譜，他說：「我唱一次給你們聽。」於是他就試唱起來，大家也就唧唧哦哦地跟著唱起來了，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唱到流下了眼淚。接著，就分頭用鐵筆刻鋼板油印了許多歌詞歌譜，分發給民眾，還到街頭巷尾去向民眾教唱呢！

那時陳儀還沒來，但大家心頭早已燃燒著共同的一把火，透過唧呀唧呀唱國歌想像著祖國的樣子。



《三民主義理論（日文）》

日本戰敗後，在台日人很淒慘，所有資產都大量賤賣。我因為在日據期當過華南銀行監事的關係，日本人的股票都要廉價賣給我。比如十二元五角的銀行股只賣我二元，而市面價格是十三至十四元，那時我買了幾百股。但後來國民政府下令不准買賣日本人公私資產，我又把這些銀行股票還給了日本人。我讀法律，心想國家的法律要遵守。

後來想起來，太遵守法律也失去一些機會。還有，當時我和羅萬俤、廖文毅、李萬居幾個人共同接收了台北市日本人的戲院，成立「台灣戲劇電影公司」，李萬居擔任董事長。後來中國國民黨來了，稱說黨的經費不足，要求我們把戲院讓給他們，當時大家經濟情況很好，不愁吃穿不在乎那些，羅萬俤說他們要就給他們算了，結果那些電影院後來就成了國民黨的黨營事業。

離開三青團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四日，李友邦以三青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部團長的名義，發布了重

整三青團各級團隊的通知。要求全省各級團隊須依照法令手續重新辦理。因此，須暫停對外及對內的活動，待整理完畢，重新委派各分團及其直屬區隊人員後，方得重新活動。至此，代表光復初台灣人自發組成的最大新生政治力量——三青團，進入了新的階段。

十二月八日，李友邦率領台灣義勇總隊全體隊員從廈門返台。他們剛回來沒駐紮之處，我就為他們安排在第一信用合作社（就是現在蔡萬春的第十信用合作社），共有四、五十個人駐此。一九四六年二月，國民黨中央下令解散台灣義勇隊，「三青團台灣區團部」改稱為「台灣支團部」，李友邦擔任部長。李友邦對我說：「支團部屬省，我是省支團部部長，你是台北分團團長，要受我管轄。」我也不十分在意就接受了。擔任台北分團長不久，大約在一九四六年三、四月間，三青團台灣支團第二科科長洪石柱（屏東人，原新文協中央委員，後曾擔任台灣義勇隊指導訓練組組長）來接掌台北分團職務，我就讓給他了。記得當時我還寫了一個聲明書，登報聲明離開三青團台北分團，從此以後就與三青團沒關係了。

在台灣光復後的權力真空期，大家對建設新台灣的感情最昂揚的時刻，從全省各地匯集的社會進步力量自發組成的重要政治團體——台灣三青團，自此落幕。

第二章

做思想言論的前鋒

一、創刊《政經報》（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政經報

半月刊

目次	
論目前緊急的政治諸問題	陳逸松（一）
新臺灣如何建設	林金堂（二）
糧食問題對策	蔣渭水（三）
提高省民之政治意識	蔣渭水（四）
這一次抗戰的意義	王白淵（五）
我的回憶錄（一）	王白淵（六）
獄中日記（一）	顏永賢（七）
我的所見所聞所感（一）	蔣渭水（八）
政經日誌	蔣渭水（九）

《政經報》創刊於1946年10月25日，由陳逸松出資創辦，為陳逸松和蘇新等人於1945年9月創立的「政治經濟研究會」機關報，是台灣光復後最早出版的左翼白話文刊物。該報社長陳逸松，主編蘇新，編委王白淵、胡錦榮、蔣時欽（蔣渭水次子）、顏永賢。

在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回歸祖國的時代巨變中，台灣社會充滿著未知的希望，一切都要重新開始；同時，社會也受到戰後復原困難和回歸後動蕩不安的考驗，亟需政治團體的領導和思想的啟蒙。這時我已屆四十之齡，正是人生歷練和思想最成熟的時期，

因此懷抱著一股改造社會和建設國家的理想，投入大時代的實踐。除了領導三青團之外，還參與了當時另一重要團體「台灣學生聯盟」的創立；同時，我與蘇新創設了「政治經濟研究會」，並出版了戰後第一本白話文政經評論雜誌《政經報》。

我一向對文化、文學、藝術運動都十分關心，但是我認為政治經濟問題才是根本，只有從政治經濟的角度分析和從事政治經濟的改革，才能真正促進社會進步和發展。

《政經報》全名應該是《政治經濟報》，是半月刊。本來預定在十月一日就推出，但因準備不及，延到十月二十五日才出刊。當時有一位朋友叫張秋龍，在本町三段（現重慶南路）開一家光明社印刷公司，他有學問且忠厚老實，所以《政經報》都由他承印。該報由我一人出資並擔任社長兼發行人，社址就設在我的事務所太平町三丁目九番地。編輯委員最初由我、蘇新、顏永賢、胡錦榮、王白淵組成；後來到了一卷四期，有林金莖加入，二卷五期蔣時欽又加入。從第一期到二卷四期共有九期都由蘇新掛名主編，但實際上第一期是由顏永賢主編，後來蘇新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到宋斐如創辦的《人民導報》去當總編輯，所以蘇新實際執行《政經報》主編的期數可能不如掛名的多。到了最後二期，我掛名主編，但實際上是由從上海回來的蔣時欽執行主編的工作。

這本雜誌扮演了台灣光復初期的思想先鋒。首先，它全部使用白話文，這在當時很不容易，這代表了在殖民統治下被壓迫的民族語言——白話文的復興。其次，它反映了光復後台灣的政治社會現實，且從政治經濟的角度分析和批評了時政。另外，它首先刊出了控訴日殖

殘暴的重要文學作品，我們在第二期開始就連載了被後人稱為台灣文學之父賴和的〈獄中日記〉，這是賴和堂弟賴通堯提供的；在第四期刊出了「東港事件」犧牲者歐清石律師的〈獄中吟——呈林茂生先生〉，該詩提供者林茂生在後記記道：「讀之一字一血，令人切齒痛恨日吏之慘酷無道……而不忍君之泯滅，因揭之以傳於世。」¹文學才子呂赫若在光復後用白話文創作的第一篇小說〈故鄉的戰爭〉，也刊登在我們的《政經報》上，這些，都是對剛過去的殖民統治最深刻的、充滿血淚的揭露和批判。其他，我們也介紹了戰後日本、戰後朝鮮和琉球的問題，評介了國內政治動態和美國的民主憲政。

我在《政經報》上共寫了四篇社論，論及光復後台灣各種政治經濟上的根本問題，特別指出了社會矛盾的特徵和解決之道。譬如，光復不久馬上浮現的食糧不足問題、金融問題、物價問題以及人事問題，我都談到了。我提出了解決對策，包括：主張應明確劃分日資日產的公營化或民營化的標準，中小企業或民生企業應實施公有民營，並讓民間採取自由經濟原則。我在社論中指出，日本投降後崩潰的殖民地產業體系造成了大量失業、米糧不足和物價飆漲的問題，這是致命的打擊，由而造成了社會治安敗壞人心浮動；解決之道，應該先從改善現實生活做起，首先要恢復輕工業和民生產業的生產，逐步重建崩潰的產業體系，如此才可豐民食安定民生，進而恢復社會正氣。而且，還要勵行法治主義和檢舉貪污，以及配合公

1 《政經報》一卷四期，第十七頁，〈歐清石先生的獄中吟〉，林茂生跋。

正公平的人事任用，如此才能弭平日愈嚴重的省籍裂痕。¹

《政經報》受到許多讀者特別是知識階層的歡迎。每一期都發行三千至五千本，發行量算是不錯，但是書錢沒法順利回收，這是一個大問題。我有個侄兒在報社當職員，他經常到全省寄售書店去收錢，有時老闆不在，有時老闆沒錢，收到的書錢還不夠住旅館的花費，因此出版經費難以為繼。不得已我又賣了一棟房子，但還是無法順利運轉，從二卷三期後便嚴重脫期。我記得曾在編輯後記寫到：「我們緩了二期才出這第四號了，對讀者諸位要道歉。但因為我們經濟才量小，又誌代（書款）之回收很緩慢所致。希望讀者諸位，特別是受委託的諸先生特別照料賜助吧。」在最後第二期，我緊急呼籲：「希望各地方受託者緊將雜代金送來，可使我們的《政經報》不夭折吧。」²而且，這時（一九四六年中期以後）物價上漲嚴重，政府又嚴格管制紙張用量，因此，雜誌售價也不得不從二元調漲到五元，這使經營更形困難。

另外是政治問題，《政經報》的言論終於得罪了當道，引起了國民黨的不滿。國民黨省黨部主委反對我們再辦下去，在出版途中省黨部來說要拿去辦，由我出錢讓他們編，他們要督視雜誌以不違反國策云云。我怎麼會違背國策呢？我心懷民族國家，一心一意要建設中國成為一個一流的國家，批評時政是為了除弊興利，使社會定安國家進步，怎麼會違反國策呢？我們不是「要堅守民國三十數年來的革命傳統，廣遍地喚起民眾組織化，以革新眼前的現實生活的諸問題」嗎？³他們說，你們講的話有時不太妥當，譬如：攻擊物價問題，主張不得歧視台灣人，強調實施縣市長民選，實行地方自治等等啦。就這樣，我一心想用言論去追求政



《孫總理演說集 三民主義》於1945年10月由政經報社出版。該書做為三青團學習孫總理思想的讀本，普受一般民衆歡迎，是台灣民衆最早接觸的三民主義。此時陳儀還未來台，陳逸松組織領導的三青團是當時台灣最大的政治社會團體。在日本殖民政府解體之際，三青團負責維持台灣的治安和社會秩序，同時防止日人日軍的破壞，待祖國來接收。

治經濟的改革已不可能，只好把《政經報》結束。最後一期是二卷六期，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版。因此，《政經報》前後總共出版了十一期。還有值得一提的，在出版《政經報》的同時，我們也先後出版了三本書：

- ① 金曾澄編著《「增訂」三民主義問答》
- ② 國父孫中山先生著《三民主義》
- ③ 台北大學蕭其來編著《中國公用語辭典》

- 1 分別刊登在《政經報》一卷二期、一卷五期、二卷三期、二卷四期、二卷六期。
- 2 《政經報》二卷四期、五期「編輯後記」。
- 3 《政經報》二卷六期，第一頁。陳逸松〈現下台灣的政治出路〉。

其中，金曾澄的《三民主義問答》一書銷售得很好。

二、創設「政治經濟研究會」

光復後不久，大約在九月，蘇新從台南北門到台北來，這是我們從一九二九年東京別後相隔十六年的重逢。這十六年間，他在日本人的監獄中度過十一年，我則在獄外在日本戰爭動員體制下過著陽奉陰違的生活。彼此都親歷了日本戰敗台灣復歸祖國的偉大時刻，心中有無限的感慨，真如吳濁流說的：「作夢也沒有想到會有這麼一天。」¹同時，在民族解放後，作為歷史新主人，喜悅中也不免混雜著未明的不安；一切都要重新開始，要清除舊的歷史殘滓也要開創新的時代。在這樣的複雜感情中，想起了一九二九年在東京與蘇新和其他朋友共同參與的「社會科學研究部」，這個雖然短暫但影響我思想深遠的組織。在台灣光復這時代巨變的時刻，有必要以社會科學的方法從政治經濟的角度分析時代並提出解決的方策。於是我們創設了「政治經濟研究會」，我擔任會長。研究會宗旨為：「以研究國際及中國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以貢獻人類之進步為目的，以贊成本會之宗旨與熱心從事於研究者組織之。」²研究會的成員大約有十多位，除了《政經報》的編委蘇新、王白淵、胡錦榮、顏永賢之外，還有王井泉、陳炘、陳逢源等人。

研究會共舉辦過四次討論會，分別針對光復後最根本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進行討論；它

分別以糧食問題、金融問題和物價問題為主題，第四次只有我與陳逢源的對談〈解剖物價問題〉。每次討論的內容都刊登在《政經報》上。

另外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在出版了《政經報》創刊號後的第四天，也就是在一九四五年的十月二十九日，我參加了在原台灣信託大樓上舉辦的「台灣文化協進會」的籌備大會。該會包羅了全省的文化菁英，不論省內、省外、官或民，進步或保守的人都加入了該會。召開了籌備大會後，大約過了半年，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六日在中山堂舉行了成立大會，共有四百人出席，真是冠蓋雲集。會上選出了游瀾堅當理事長，行政長官公署參事吳克剛和陳兼善以及林呈祿、黃啟瑞為常務理事，我和林獻堂、林茂生、王白淵、蘇新等十六人則擔任理事。

三、協助朝鮮民族

對於同受日本殖民和歧視的朝鮮人，因為都是弱小民族，我一向有命運休戚與共的感情，很關心他們受欺壓的情況，經常會幫助他們，這也算是弱小民族間的國際主義感情吧！

譬如，年輕時在東京我參加了日本「自由法曹團」和「日本社會運動犧牲者救援律師團」

1 《無花果》，吳濁流，前衛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2 《政經報》一卷二期，第二十四頁。

等進步律師團體。在東京的「松岡法律事務所」執業（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時，曾冒著生命威脅接辦一個有名的「大船渡案件」；在日本東北修築鐵路的朝鮮人勞工，集體受到日本右翼青年團殺害凌虐的事件。最後總算替他們討回了公道，朝鮮人受害者對我們感激不盡。

日據時期，有一朝鮮人少年叫吳承科，他考取了台北商工學校，但由於民族歧視，學校要他找一位有相當地位的人當他保證人，否則拒絕其入學。他父親在台北後車站巷子內賣朝鮮人參（當時許多朝鮮人來台灣賣人參），住的地方離我事務所不遠，平時都在這附近進出。他父親知道我的名字，就來找我幫忙。我要求他先帶孩子來讓我看看。他把孩子帶來，果然這孩子長得壯壯的，眼睛大大，眉清目秀很「正才」，我看了很滿意就答應替他作保。那時台北商工學校的教頭（教務主任）叫佐藤，是東京帝大畢業也是市會議員，喜歡喝酒與我氣味相投。我去找他說：「這朝鮮人孩子要入學，需要有人保證，我當他保證人可以嗎？」他滿口答應說：「陳先生肯為他保證，當然沒問題。」就這樣這孩子入學了。

後來吳承科回朝鮮成了大企業家，曾回來台灣找我感謝，後來我去韓國也曾去找他。像這樣的關係，當時在我的地方出入的朝鮮人很多。

當時，艋舺有個地方被叫做「蕃薯市」，有許多朝鮮女子在那裡從事特種行業（接客業）。她們都是由日本老闆（人口販子）從朝鮮買來的女孩子。由於殖民地的民族差別，也由於朝鮮人女子比日本人女子價格便宜，艋舺那裡的日本料理店也叫來許多朝鮮女子。那時台灣人叫那些朝鮮女人「朝鮮「夕、一」」，不知「夕、一」是什麼意思，好像有輕視的味道，或許

有較便宜的意思。¹

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依據《波茨坦宣言》的規定，台灣復歸中國而朝鮮則獨立，從今以後我們都是獨立國民，不再受日本人欺侮了。我領導的三青團的政治中心任務，也主張婦女解放與男女平等，給婦女以教育、經濟、政治上的平等地位。我叫三青團團員去將那些「蕃薯市」廢止，解放那些朝鮮女子，把她們全部集合起來。我去向她們說：「妳們已脫離日本殖民統治，朝鮮將成為獨立國家。」那些女子聽了都掉下眼淚哭著說：「就因為家境窮困才操這種行業，家鄉那麼遙遠，要怎麼辦呢？」我說：

「現在國民政府是戰勝國，日本是戰敗國，日本人也將被遣送回去，我會為妳們設法，用船送妳們回去。」

她們聽了很高興，終於可以回遙遠的故鄉了。不久，我把自已六間房子的一間提供作朝鮮人聚會的地方，成立一個叫做「韓國同志會」的組織。當時留在台灣的朝鮮人都在我那裡集會，一星期一次。大家把最熟習的日本學校畢業歌，改編成朝鮮共和國國歌，大家一起合唱。殖民解放後身在異鄉台灣且前途未卜的朝鮮人，大家共同想像著一個想也不敢想的夢中的朝

1 根據日本大阪產業大學教授藤永壯論文〈殖民地台灣朝鮮人接客業和慰安婦動員〉的研究，一九四二年住在台灣的朝鮮人接客婦（包括藝妓、娼妓、酌婦、女給）共有四百六十五人。占當時在台朝鮮人女性總數一千六百七十九人的百分之二十七點七。

鮮國家。很自然地把大家都會唱的畢業歌，用朝鮮語合唱，當做想像的國歌。在我家集會的朝鮮人，都含著辛酸的淚一遍又一遍地唱，曾經同為被殖民民族一分子的我，也加入了合唱，唱著唱著，也不禁流下了感動的眼淚。慶幸朝鮮民族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同時也為台灣過去的辛酸和今日的光復而流下不知是悲還是喜的眼淚。

那些朝鮮女子要求我盡快把她們送回去，我就去找彭孟緝交涉，找到一艘不大的船將她們送回朝鮮。金九聽到這事，還特別寫一張致謝名片叫人送來給我。

當時有很多朝鮮人來找我幫忙，我都盡力協助他們。我曾鼓勵他們說：

朝鮮半島就像東洋的巴爾幹半島，巴爾幹半島的國家民族複雜，沒有一個強國，彼此間常有鬥爭，要是軟弱就易受外部左右，就會發生戰爭。你們一定要強大起來，要有抵抗周遭國家侵略的能力。你們要站在中間立場，保持獨立、自主，建設一個受歡迎和尊敬的國家，這樣才不會再受到外國侵略，所以你們回去以後，莫要忘記這些道理，一定要堅持下去。

第三章

慘痛的三月——二二八前後

一、十日狂飆

二月二十七日那晚，我和黃啟瑞、陳逢源在我事務所樓上聊天。那晚月亮很圓，夜空清澄，我們三人本來想去賞月，就順步走向圓環那邊，因為陳逢源住在圓環附近。到了圓環，看到專賣局的車被推倒，四腳朝天被放火燒，民眾團團圍住有人破口大罵：「你們這些豬仔……」我們三人從旁邊走過，實在沒想到事情會鬧這麼大。事情進展得很快，像乾柴烈火，二十七日當天晚上，消息就傳到了台中嘉義以南，紛傳「國軍亂打人，打死台灣人」；瞬時引爆了民怨，群情激憤，各地方參議會和鄉、村、里民代表會，都自動集合商討處理對策。

二十八日全市陷入混亂。民情激昂，大批民眾沿街敲鑼打鼓，眾口同聲「打阿山」，衝進派出所，搗毀並放火燒掉專賣局台北分局，並包圍行政長官公署。學生也罷課加入行列，

許多外省公務員、商人、憲警都被包圍毆打。是晚，警備總部宣布戒嚴，行人絕跡。次日，三月一日，混亂之勢比昨天更為白熱化，群眾從四面八方洶湧而來，打聲、槍聲、火光混作一團，商家和各機關緊閉門窗，人員紛紛避走，全市陷入恐怖氣氛中。

出面召集解決

經過一天兩夜的混亂後，情勢依然緊張，如果沒有人出面召集大家解決問題，恐怕會演變成無法收拾的狀況。當時我是國民參政員，有責任出面解決，就先召集台北市參議會。記得是二十八日，我碰到市參議員簡裡堉（士林人），叫他趕快召集台北市參議會。接著，三月一日，包括省參議員、參政員、國大代表和民眾代表都很快自動集結到中山堂開會，成立了「緝菸血案調查委員會」。經協商派代表向陳儀提出五項要求：立即解除戒嚴、釋放被拘民眾、下令不准開槍、官民共組處理委員會，以平息眾怒。陳儀全部答應，並在當天下午向全省民眾廣播處理辦法。

記得陳儀還打電話給我說：「事情弄得這樣混亂，你要趕快叫大家處理一下。」這可能是因為國民參政員中林獻堂在台中，台北只有我比較熱心參與事件處理。可是，三月二日情勢變本加厲，眾怒未曾稍戢，各方代表在中山堂開會，決定將「緝菸血案調查委員會」改組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當天下午陳儀第二次向全省民眾廣播，答應更寬大的處理措施，

包括釋放被捕民眾、撫恤死者傷者，增加人民團體代表加入「處理委員會」以容納更多人的意見。

混雜中的五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

三日，擴大改組後的處委會在中山堂召開第一次會議，政府代表也增為七人。處委會決議：派出王添燈等委員會見陳儀，並派出呂伯雄、李萬居等委員赴美國在台領事館請願，在報紙刊登〈急告本市同胞書〉，呼籲：本事件徹底交涉中，請暫為鎮靜，幸勿打人毀物……。

三月四日，處委會繼續在中山堂開會，事態急速擴大，處委會也提高了層次。處委會除了處理二二八事件問題外，還擴大到處理社會政治問題，如糧食調劑問題、糧價、供電、廣播等等原本屬於政府的工作；還有，派出代表向陳儀表達關於台灣政治改革的意見。如此，「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已擴大為全省性組織，且處理範圍也升級到一般社會和政治事務。此時，政府代表已不再出席會議。

想起來，從三月一日到七日的幾天，台北市中山堂（公會堂）彷彿上演了一幕空前未有的悲喜劇。激情的民眾簇擁著省市參議員、國大、參政員等民意代表，還有如蔣渭川領軍的「台灣政治建設協會」等民間團體，各路人馬數千人全匯流到中山堂來。我和李萬居兩人被推舉起草「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組織章程」，因為李是新聞工作者（《台灣新生報》社長），

而我是律師。在大家委託下我們開始討論如何起稿，李說：「你比較懂，我不懂。」就把工作推給我；不得已我緊急寫了一個「章程」，共九條，油印後拿到中山堂去分發。三月五日當天，中山堂一樓內內外外已擠滿了四、五千人，群情激動鬧哄哄的。王添燈正在上面講話，而蔣渭川領導的「台灣政治建設協會」群眾就在下面起鬨，王添燈看到我在下面分發「章程」，很高興，就叫我上台，我拿著剩餘的油印「章程」上台逐條說明。這時，蔣渭川鼓動那些群眾向我吆喝：「喂！陳先生，你這樣就把『大隻交椅』（意指：領導權）拿去坐嗎？」

我回說：

「什麼叫『大交椅』？你那麼愛坐就起來啊！」

「你們這些人真正叫你們主持會議沒辦法，只是喧鬧，只會打架，真正要你們起來，你沒辦法。」

「你講那麼『失禮』的話，好吧，你喜歡就起來啊！」

我要下來時，那些流氓頭受蔣唆使，上前來要揪我。劉明看到有人要對我動武就站了起來，他組織的糾察隊有流氓頭也有會打拳的，人數比蔣的更多，隨之也湧上前來，劉明大聲嚴斥說：「誰敢碰陳先生一下，絕不放你干休！」劉先生很有威嚴，那些流氓也都認識他，氣焰一下就被壓下去，都不敢動我。「文有陳逸松，武有劉明」，這是當時的傳言。我氣憤地將「章程」交出去說：「我不管了，我回家了。」自顧自地走出會場。我這個人說走就走絕不猶豫。後來，會中通過了「組織章程」和「八項政治根本改革草案」。

為此事，後來有人寫說，我就是因為這樣，沒有被通緝。那是毫無根據的捕風捉影，完全是臆測之詞，其實，後來我也被陳儀通緝了。初一後的幾天我都去了中山堂，但事件進一步延燒到全省各地，且愈演愈烈。中山堂內的處理委員會與各縣市分會自主地成了處理事件的政治中心，在吵吵鬧鬧中快速整合了各種各樣的政治要求。特別是省參議員王添燈最為活躍，當時有許多左翼分子都聚集在他永樂町的文山茶行，那裡很寬；像蘇新、蕭來福、潘欽信、林良材、蔡子民等人都集中在那裡，形成一個大本營，成了王添燈的祕書處。他們替他獻策寫稿，安排他到廣播電台廣播，替他在報紙上發表言論。

三月六日，會議由王添燈擔任主席，由我宣讀昨天通過的組織章程，隨後舉行選舉。選出了常務委員十七名，其中包括國民參政員林獻堂和我，國大代表李萬居、連震東等人，省參議員王添燈、黃朝琴、郭國基等人，台北市參議員周廷壽等人，可說包羅了當時有代表性的民意代表。會中王添燈提出臨時動議，他特別擬好了「二二八事件處理大綱」，說明事件始末及處理方針（三十二條要求），並把處理大綱向中外廣播，動議獲全體委員贊成通過。處委會還發表了〈告全國同胞書〉，說明此次事件為要「肅清貪官污吏，爭取本省的政治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

三月七日，處委會通過了王添燈草擬的「三十二條處理大綱」，但是在會場的混亂中，又增列了「十條要求」，由處委會派代表王添燈、黃朝琴、吳國信等人面交陳儀，陳儀看後斷然拒絕。至此，情勢急轉，大家紛紛傳聞蔣介石已派兵即將抵達基隆，因此處委會成員紛

紛走避，運作戛然終止。

王添燈的臉色

三月七日，開完處委會後，王添燈要回家，我們都住在大稻埕方向，他順路送我到太平町我的法律事務所。還記得，到了路口要下車時，我回頭看了王添燈，他面孔毫無生色，死白得像死人的臉孔，我當下心中一震，一種很不吉祥的預感湧上，是不是將有大難降臨，是不是事件將朝向災難性的方向發展？王添燈是處委會的領導人，他的臉色預告了什麼？

果不其然，災難已降臨。當天處委會提出的三十二條政治要求，如解除部隊武裝、縣市長民選、台人治台、言論出版集會自由，還有歸還十五萬噸的糖等等；另外又加到四十二條，幾乎無所不提，有常識的人都會知道，自己手無寸鐵如何去要求？十天來的憤怒、反抗、動亂，所要表達的政治要求終於全部集中寫在一張紙上了，事情也到了一個頂點，一個分水嶺。其實，在三十二條還正在討論的時候，大約五日晚間，蔣介石的大軍已開出（從上海到台灣要四十多小時），七日深夜台北市已槍聲大作，兵來了！

二、兵來了！逃避通緝

到處風聞誰被抓，誰又被殺，人心惶惶，全台陷入恐怖萬分的地獄。劉明慌忙來說看到了通緝名單，我的名字赫然在列，林獻堂排第一，我排第二，林宗賢也有，杜聰明沒有。他要帶我逃跑，因為在家裡危險，一下就會被抓走。那時候直覺已身在戰時前方了，來不及帶什麼東西，說走就走。他帶我走河邊，從淡水河水門出去，那條路很少人出入，一直走到艋舺，在一個淡水河邊人家的房子躲起來。住了一晚後，大概覺得民家不穩就去找陳達元，陳達元的房子在西門町盡頭，港町十三號水門口附近，離河邊不遠。在他家躲了好幾天，那裡有許多人進出，沒碰到林頂立，林不住在那一帶。我曾問陳達元為什麼我也被通緝，他說他也不知道，不過危險就是了，幸好你來我這裡。後來，躲得有點耐不住，心想到底要躲到什麼時候，應該去和陳儀直接談。以前我跟陳儀見過幾次面有熟識，於是陳達元陪我去見陳儀，記得是三月十四或十五日。這時他的辦公室層層警衛都荷槍實彈氣氛緊張。

見了陳儀我直接問他：「聽說你通緝我？」他說：「是的！」

我反問他：「你說我反中央，不知你看到我寫的處理委員會組織章程嗎？」

我將隨身帶著的組織章程拿出來給他看，我說：

「第一條寫著『秉承中央政府之命令處理台北二二八事件的善後』，我們寫著『秉承中央政府之命』，而不是『省政府之命』，這樣，你以為是違背國家的叛亂嗎？你通緝我是沒

有道理的。」

他看了看（他胖胖的，眼睛眯眯的）點點頭說：「我知道了，知道了，你可以回去了！」

我回說：「你只說知道，只說可以回去，但你知道外頭很亂，軍隊會隨便抓人嗎？」

他說：「我馬上下命令解除你的通緝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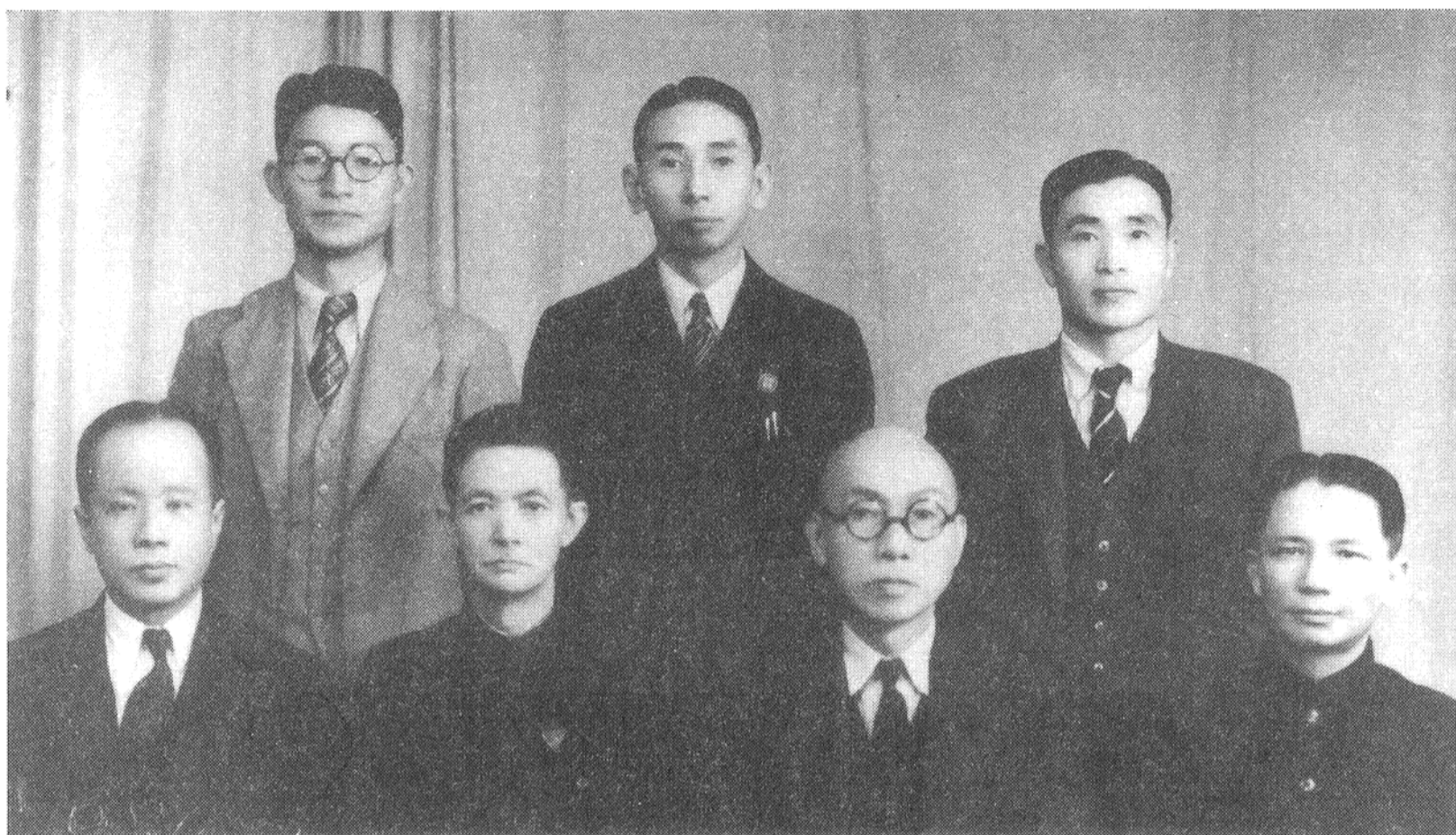
我說：「你的口頭命令傳達到下面已不知何時，我現在出去被抓了怎麼辦？」

他說：「我給你寫條子吧！」

於是他拿出一張紅框的便箋寫：陳逸松一員，解除通緝令。後面寫下日期，並拿出印章隨便一蓋，就將條子交給我說：「要是有人抓你，給他看這個條子就好了。」

我終於鬆下一口氣，走出行政長官公署（就是現在的行政院）走路回家。途中到處有軍人荷槍實彈，我緊抓著那張條子，小心翼翼地走回家。從公署走到大稻埕本來很近，竟然像走了好遠的路。

三月十七日國防部長白崇禧來台宣慰，住在梅屋敷。去年八月我參加「光復致敬團」時，致敬團在南京曾拜訪過國防部，與他面識。於是就直接去找他，他也立刻見我。我向他說明二二八經過，他不停點頭，我說：「聽說抓了許多人，也死了那麼多人，要怎麼辦？」他回答得堂皇說：「中央下令要趕快使台灣恢復平靜。」我說：「平靜也不要抓那麼多人啊！鄉下還在亂抓人，要稍微平和一點才好啊！」他滿口答應說好！好！我說：「這樣我可以回家了吧！你當國防部長應該可以讓我回家了吧！」他忙著說：「可以！可以！」



1947年1月5日，台灣省選出的七名國民參政員成立聯誼會紀念照。前排左起吳鴻森（吳伯雄之伯父）、杜聰明、林獻堂、羅萬俤。後排左起陳逸松、林宗賢、林忠。

我們當選的七名台灣省國民參政員，在爆發二二八事件之前的一月五日就組成了聯誼會。為參加五月二十日在南京召開的第四屆國民參政會第三次會議作準備，但碰到了二二八事件只有暫時停擺。事件漸漸平靜後，聯誼會活動再度恢復，那時，有一位姓孫的外省人來找我，希望我替他找工作，我推薦他擔任聯誼會祕書，處理聯誼會的大小事，記得他吃、住都在我家。這時公署工礦處處長包可永找劉明當台灣工礦公司的董事，劉明向包推薦我，說陳先生做比較好，我就擔任了工礦公司的董事。那是一個接收了日本所有的中小企業如紡織廠、橡膠廠等各種企業所組成的公司，董事中只有我一個台灣省籍。

三、闢「訛傳」

最近，有人依據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在事

件後寫的《帽簷述事》，誣指我在二二八中與軍統的關係，這使我十分氣憤，有必要證明。大家要明白，事件當時，省內省外各路人馬和政治派系的糾葛十分複雜。省黨部屬於CC派，與陳儀的政學派對立，它就像當時的在野黨，其社會基盤不大，對台灣的事「海海」，只不過與蔣渭川等人的「政治建設協會」結合在一起，在事件中只會爭權，經常妨礙處理委員會開會。因此，只憑李翼中個人派性的一方之言，怎可輕信？

我與陳達元、劉啟光、林頂立都很熟，這沒錯，但單憑這一點就質疑我與軍統的關係，太牽強附會。如果要那麼附會羅織，當時我也與陳立夫、陳果夫熟，和警務處的王民寧也熟，還與蔣介石見過面談過幾次話呢！那我是那一派呢？台灣光復初，在台灣人知識分子中我最活躍，組織過三青團，辦過《政經報》，又是律師，進進出出的人太多了，相交相識的人太多了，不能僅憑我與某人熟識就遽下派系的歸屬，實嫌草率，而且以此含沙射影更不應該。況且二二八事件中公私混亂，派系相互攻訐，盛行以公報私，因此不能僅憑隻字片語斷人是非。

陳達元是福建漳浦縣赤湖人，我祖父也是從那裡來的人。記得我有一位「黑皮叔」，也住在漳浦赤湖，曾來過我故鄉羅東住過一、兩年。依輩分，陳達元要叫那「黑皮叔」：「叔公」，因此陳達元算我的「姪兒輩」。由於這層親近的宗親關係，而傳統漢民族社會十分重視這層關係，很自然就接近相交。陳達元在北洋軍閥據閩時期就加入國民黨地下組織，抗日戰爭時參加軍統，還擔任過三青團彰州分團幹事長，一直在閩南地方活動。戰爭末期擔任福建中美

合作所少將指揮官，汕廈指揮站站長。台灣光復後，來台擔任警總調查站主任，一九四七年一月辭職，轉任公署簡任參事。一九四八年獲選福建省監委，擔任閩台監察行署主委。

他為人有正義感，有鄉土感，更重要的是他與我有陳家宗親關係，因此有事就會找他幫忙，他也熱心相助。譬如，一九四八年我獲選考試委員，他也出力幫過忙。一九四六年夏天，好友鹽見俊二被抓去本願寺審訊時，我去找陳達元，他也幫了忙。另外一件事，我曾擔任辜顏碧霞公司的法律顧問，有警備司令部的人向她揩油，她告訴我，我去找陳達元，陳就去找那個揩油的人，硬是叫那人把吞下去的錢吐出來。我的堂兄弟陳進東，是醫生也當過宜蘭縣長，一陣子負債累累，人家要查封他的醫院，後來也去找陳達元替他排解。

劉啟光這人比較多面而複雜。有人說他在大陸出賣朋友，可是他回台灣後幫助過不少以前農民組合的老朋友，也「牽成」了不少人。他不是壞人，很直率，也是有趣的人；然而他有另一面，他很利很會計算，被他「點油」的人一定會被他修理到底。他到底是不是軍統的人，我不知道。我和他開始交往，是在他當華南銀行董事長以後的事。我擔任華南銀行董事，一直到去當央行常務理事為止。他晚年看破塵世，自稱「了然居士」，家中養一隻鸚哥會講：「頭家劉啟光！頭家回來了！」他不時對我說：「養這隻鳥贏過養一個人，人，你照顧他，結果沒用，都背叛你。」

我和林頂立比較少接觸，他比較有流氓氣，公開表明自己軍統特務的身分，毫不隱瞞。林頂立和劉啟光兩人是敵是友，很難分辨。他倆一見面就互相嘲弄，像真又像假，看不出真意。

看似很要好，又有對立，可是頂立有時對啟光講話很不客氣，那時劉就靜默不語，好像有什麼弱點被林抓住一樣。後來，兩人在省議會副議長之爭，也是林贏劉輸。

*後註：

有關二二八事件，參考了左列書籍：

- 一、《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賴澤涵總主筆，時報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 二、《台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藏）》（上、下冊），主編陳興唐，人間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 三、《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一至四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出版，一九九三年。
- 四、《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陳翠蓮著，時報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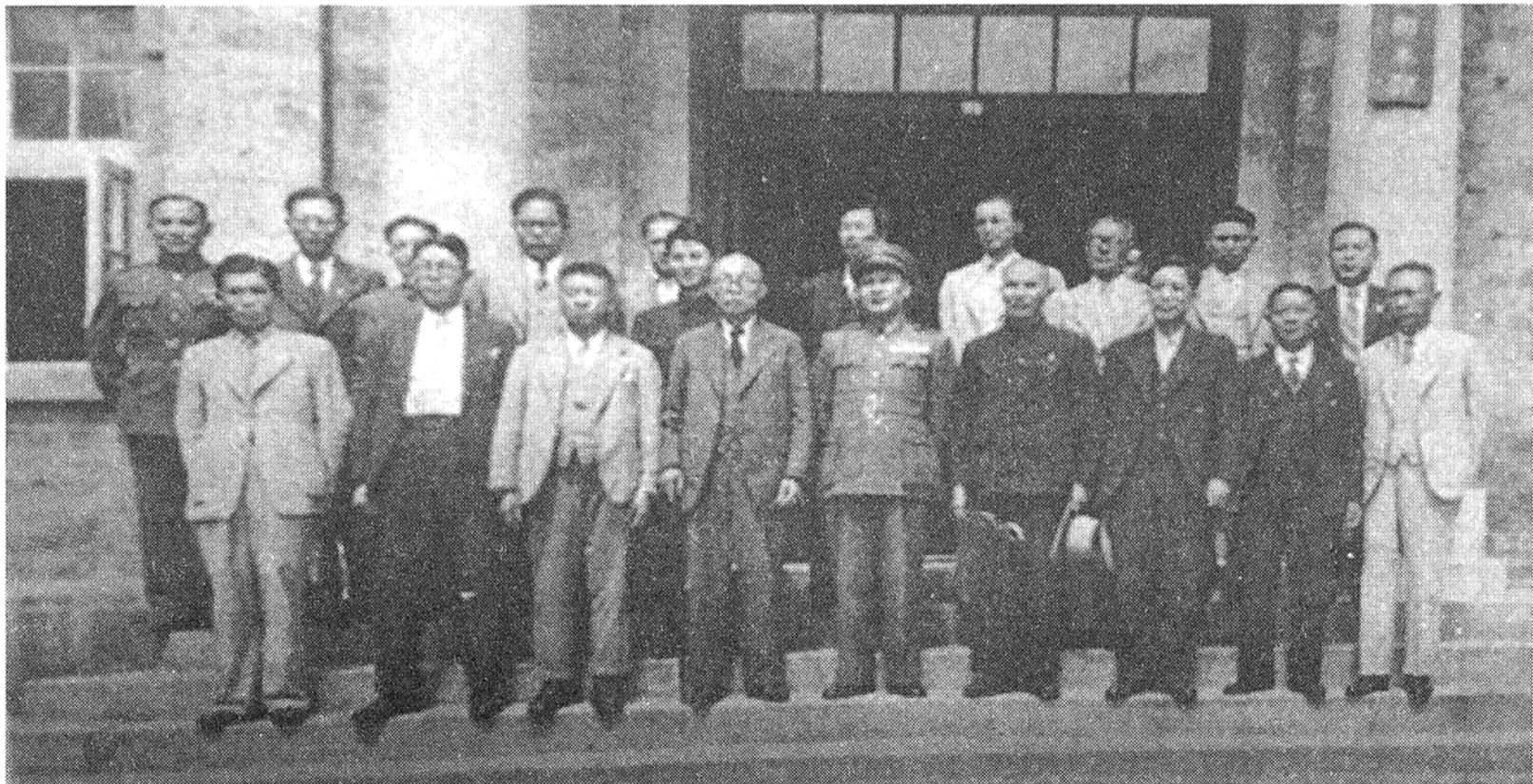
第四章

走上參政之路

一、參加「台灣光復致敬團」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十月五日）

在一九四六年八月舉行的台灣國民參政員選舉風波還未結束，選舉結果還未揭曉之前，我就參加了由丘念台組織的「台灣光復致敬團」，到國內各地參訪。丘念台當時擔任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執委，他有鑒於台灣對中央的隔閡，台灣人又對台灣的政治日漸失望，為增進台灣與中央的相互了解，疏通隔閡，乃於八月邀集台省知名人士組成「台灣光復致敬團」。團員有林獻堂、林為



台灣光復致敬團訪國防部與部長白崇禧合照。

恭、鍾番、姜振驤、葉榮鐘、張吉甫、林叔桓、李建興、黃朝清和我共十人。另有財務委員陳忻，顧問丘念台，祕書林憲、李德松、陳宰衡等合計十五人。

八月二十九日，我們搭飛機到上海。那時抗戰勝利不久，有許多台灣人從中國各地匯集到上海，包括楊肇嘉和陳重光，他們都來歡迎並接待我們。次日，搭火車到南京，黃國書等人也都來接待我們，一行下榻中央飯店。在南京的幾天我們參觀了中山陵、明孝陵，並拜會國民政府各部會，對於台灣有關問題或國共關係問題談論甚多。

九月六日，「光復致敬團」離開南京飛赴西安，我們搭乘陳誠派的國防部飛機，飛機不大，先在洛陽下機後，再轉往西安。在西安大約住了十幾天。我們到各地遊覽考察，九月八日遊臨潼。到西安的主要目的是謁黃帝陵，九月十一晚我們搭十幾個鐘頭的火車，準備直接到黃帝陵。火車很大，車上還有人坐在行李上面。翌日下午二時半，車子開到了一個叫耀縣的地方就沒辦法再過去了。縣政府派人來接我們，說再過去不遠有一條洛川，河那邊就是共產黨的地盤了。這條河水很淺，涉水也能過去，他們不讓我們過去，大概是國共間劃川為界互不侵犯吧。其實，從這裡到黃帝陵只要二個鐘頭，不准我們去，可能是胡宗南的意思。但我想，即使我們那時硬闖過去，共產黨知道我們是台灣同胞，應該不會傷害我們才對。

我們只有在耀縣遙祭黃帝陵。沿途民眾敲鑼打鼓，表示歡迎我們。在一個山丘上，擺著一張像我們常用的長方形高腳供神用的紅祭桌，桌上滿是豬頭雞鴨等五牲祭品，由李建興（林獻堂因為感冒無法同行）代理領著我們祭拜。李建興在日據末期的瑞芳事件中受到極大的壓

迫，幾至家破人亡，他身穿長袍祭服，手持三柱又粗又長的香，流著眼淚，一拜、再拜、三拜，旁邊吹起了莊嚴的古號肅穆感人。圍觀的民眾很多，大家都來看台灣同胞回來祭祖。林獻堂、黃朝清、林為恭、姜振驤、鍾番五人，另有事，並未隨同到燿縣遙祭。

在西安時，我們也拜訪了胡宗南，胡又名鐵軍，治軍嚴格。軍營非常嚴肅，整齊劃一，有如德國軍隊，不亞於日本兵。我還記得一幕，當時李建興尿急想上廁所，衛兵立即領路，回來時胡馬上命令衛兵端水來給他洗手，然後又下命令「手巾！」，衛兵又馬上拿出手巾給他擦手，李建興一一享受了禮遇。可見得胡的軍隊有紀律，當時在中國算最強的了。當時胡非常客氣接待我們，他說：「國軍已將共產黨團團包圍，共產黨已如甕中鱉，無處可逃了！」當時我們也不知道他正在準備攻打延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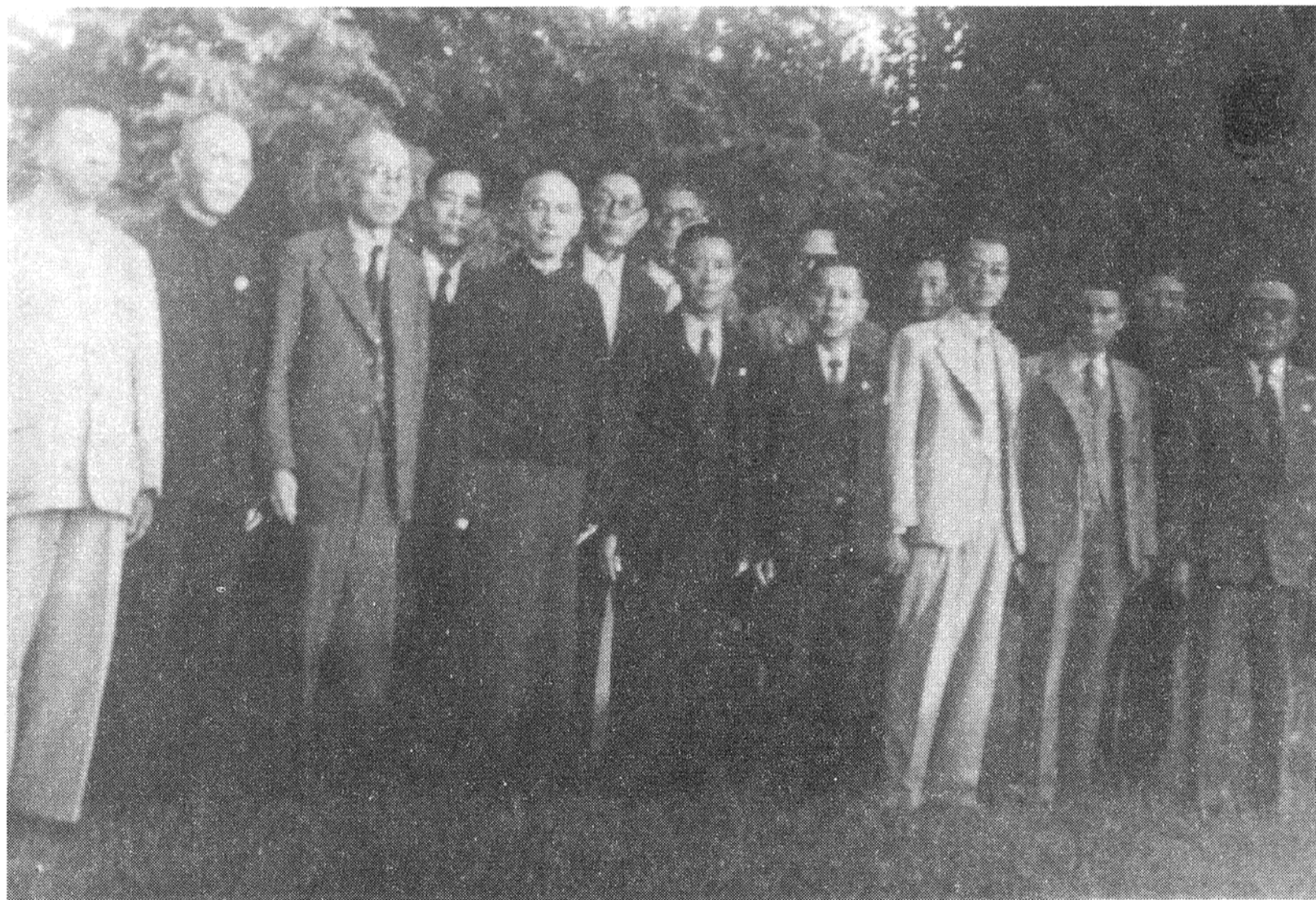
我們一行遊了貴妃池，並下了池洗浴。水池是用白色磁磚鋪的，淺淺小小並不大，當時感覺衛生條件並不好。也去參觀了碑林，正中間有一座廟，我們從入口就開始拜，碑的數目有數百個，碑上都留有拓印的痕跡，黑黑的，這些都是歷代書法名家留下來的寶庫。我們也去爬了大雁塔，參觀了始皇廟。

西安之後我們折回南京，遍遊蘇州、無錫、揚州，到上海後又去杭州遊西湖，再從上海搭船回台灣，十月五日抵台。在上海停留很久，那裡有很多台灣同鄉，像李偉光（李應章）、王麗明、楊肇嘉、陳重光等，吳三連那時也從天津來到上海，當時上海可說是台灣人匯集，往來滬台的樞紐。

九月十七日從西安回到南京後，本想先晉見蔣委員長，丘念台說蔣剛好不在，我們得等他回來，因此，我們先拜會了宋子文行政院長。那幾天南京天天下雨，我們只有無聊地在飯店等待。上海、南京我並不陌生，日據期曾來過幾次。只不過，過去是以日本殖民地人的身分來，而這次是以祖國台灣省民代表的身分來訪，感覺完全不同。山河景物依舊，但這次我們已有了自己的民族國家。回想這一年的鉅變，不禁感嘆於時代的偉大作用。

九月三十日，我們晉見了蔣委員長。事前大家集資，由林獻堂代表致獻蔣「國族千城」及五千萬元。

蔣在陸軍軍官學校的官邸接見我們。憑良心說，他接待人的態度溫和和



1946年9月30日，台灣光復致敬團攝於南京蔣介石官邸前（此照用陳逸松自動相機拍攝）。左起李建興、丘念台、林獻堂、陳炘、蔣介石。右起陳耀昌、陳逸松、鍾番、林憲、林敬桓。

方，並沒有官架子。與他握手覺得他的手很軟，不像軍人的手。會見場面十分融洽，宋美齡也在場作陪。他在官邸請我們吃飯，丘念台早就交代我們不可亂講話，所以大家講話都很小心。飯後蔣送我們到官邸大門，我建議大家拍一張相片，就用我的腳架相機自動拍照，所以相片中我站在後面。

二次見蔣

我第二次見蔣，是在致敬團回台後不久的十月底。

蔣介石夫婦為了參加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台灣光復一周年慶祝大會，於十月二十一日第一次來台灣。也許為了解台灣民情或者為了收攬民心，他在草山的賓館召見了一些台灣菁英，單獨進行一對一的談話，旁邊沒有人記錄。因為我當時已當選參政員，所以也接到通知單獨接見。我還記得見面的情形，他態度很親切，我跟他說什麼他都不停地點頭說：「好的、好的。」我向他報告台灣的物價這一年來漲了十倍，米價從一斤二元飆漲到二十元，民不聊生，他也說：「是的、是的。」和他談了大約三、四十分鐘，因為後面還有人在等著談話，就很快結束了。談話中我還把在南京的全體合照送給他，他應該有保存下來。

二、台灣省「國民參政員」選舉話題（一九四六年八月）

國民參政會成立於一九三八年，是國民政府訓政時期的特殊民意機關。它與一般「議會」不同，對政府只有「聽取政府報告」、「向政府提出詢問案或建議案」，沒有立法權和預算審核權。它在八年間已改選過四次，抗戰勝利後的一九四六年算第四屆，這屆任期應於一九四六年七月七日期滿，本該即行改選，但因國內政局尚未明朗，故決定延長（後來，第四屆國民參政會一再延長，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行憲國代開會前一天才結束）。因此，行政院於七月十三日明令復歸版圖的台灣省，依規定選出參政員人名，限一個月內完成，且應由已成立的台灣省參議會參議員投票選出。但當時台灣省參議會正休會中，只有採用通訊投票的方式，而且有資格投票的人只限於二十九位省參議員（當時林獻堂辭去了省參議員資格投入選舉）。當時台灣各方俊彥都積極投入選舉，如剛從北平回來的洪炎秋，從上海回來的蔡培火都加入了選舉行列，各大報都大幅報導，引發了社會的熱門話題。

我參加了競選，沒花半毛錢，只寫信給省參議員拜託投票給我。其他候選人也都一樣，不可賄選，可說是一次乾淨的選舉。競選期間，公署在公會堂（中山堂）舉行了政見發表會，參加競選的四十多人中，有二十人上台演說。我也上台發表了政見，我一生無論在什麼場合都只說大事不談小事，講的政見都是天下事或民族問題。我認為國民參政會經由選舉產生，有民意基礎，是南京國民政府的最高民意機構，經由這職位應該可以影響國策。我在政見發

表會中特別提到，日本雖然已戰敗，但對日本民族不可輕忽，不可輕侮，要與這民族和平、互助、共存，但我國本身一定要強大，經濟要富強，政治文化要文明發達，才不會再遭受欺侮；美國雖是世界大國，我們中國也不比美國小，假如我們自己能自立自強，也可與美國齊頭並立於世界，共同促進世界和平。在政見發表會上，像我這種談論國際問題，國家天下事的人，絕無僅有。

有一位候選人叫李捷步最為有趣。他上台後就說：「我是李捷步。」然後向前走三步說：「你們大家仔細看，我這個『女婿材』是不是可以，可以的話就投票給我，我再退三步給你們看。」說完就退後三步，沒發表什麼政見就下台了，像今天選中國小姐一樣，一時傳為笑談。參加競選的蔡培火，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中才剛從上海回來，他妻子已過世，台南也沒有房子，我就把太平町房子的樓上特別清理一個房間給他住。等於是，他住在我家，與我共同競選參議員。可惜，蔡培火只得到八票而落選，選後他在報紙上發表了〈敗戰記〉，認為自己吃敗戰的原因，主要是明白主張：「選舉人斷斷不可投票給過去甘心獻媚日人，改換姓名常用日語想做我們台胞的榜樣，卻做了敵人奴化政策走狗的人。」這一「使我的敵對怕死了，結在一起打擊我，我不防備竟反受他們的暗算而打敗了。」其次，因為他不斷主張不要有省內外的成見和隔閡，因而有人宣傳說他「違背台胞利益」而被打敗了。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的爭議。

八月十六日在省參議會舉行了投票。開票結果林忠得最高票，接著依序是：林宗賢、羅萬俔、林獻堂、廖文毅（十三票），其他，包括我在內有林茂生、杜聰明、楊肇嘉、吳鴻森

參政員候選人

廖文毅

台南縣西螺鎮出身。歷修南京金陵大學。美國密西根大學。滬海滬大。得工學士。工學碩士。工學博士學位。曾任軍事委員會。江西省政府。國立浙江大學教授等要職。本省光復後任公務員。隨任技正。及台北市政府公用事業管理處處長等職。熟識中。英。德。法。日等國文字。著作有「軍需工業論」、「日本之糖業」、「炸藥之破壞力及其原理」、「北美週遊記」、「偉大之夢」等。確為本省有數之青年學者企業家及外交家堪以代表本省參政中央政府之人材也。

省參議員諸公 鈞鑒

推薦者 台灣煤炭公會 台灣學友會
台灣電影戲劇公司 前鋒雜誌社
台灣榮字行總經理 一同謹啓

廖文毅參選國民參政員登報自介。



林茂生，光復後曾任台大教授，《民報》社長，死難於二二八事件。

五人都同得到十二票。其中，楊肇嘉的一票名字多一橫，廖文毅有一票污損，都被判定無效，結果楊肇嘉等於落票；之後再由我、廖、林、杜、吳五人抽籤，廖文毅沒抽中而落選。然而，又橫生波折，抽籤當選的林茂生不知什麼原因竟然宣布辭職，引起了軒然大波。

這次選舉，陳儀並沒有干涉，倒是內政處處長周一鶚似乎對廖文毅的聯省自治主張有意見。顯然，這次選舉暴露了光復後台灣上層菁英彼此間嚴重的裂痕。

三、赴南京參加國民參政會，為二二八講話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

二二八事件後，四月二十二日行政院決議撤銷台灣行政長官公署，依省政府組織法改制，陳儀去職，任命魏道明為台灣省主席。這期間，我們這些台灣省選出的國民參政員經常召開聯誼會，一起討論政治議題和交換時局的看法。因為五月二十日在南京舉行第四屆國民參政會第三次會議，我們決定五月一日出發到南京。當時，林獻堂和杜聰明沒有一起去，因為他倆被選任為台灣省府委員，認為擔任省府委員較有實權而參政員是空的，所以不去；至於他們有沒有正式辭去參政員職務，我不清楚。我和羅萬俤則認為，中國抗戰時期以及戰後在正式行憲之前，國民參政會是全國最高民意機關，是現時中國政治最重要的部門，不當參政員要當什麼？

五月一日出發前，林獻堂和杜聰明來送行。一行到西門町現在的紅樓戲院旁邊的八角樓，一家以前日本人開的鰻魚店聚會，記得一起拍了合照。這次同行的有羅萬俤、林忠和吳鴻森，當時林宗賢因為二二八事件遭牽連還在獄中。我們除了參加國民參政會之外，最主要的目的是見蔣介石，直接向蔣說明二二八事件的實情，替台灣人說話。我們出發時台灣還在抓人，許多台灣菁英失蹤，生死未卜，人心惶惶，社會噤聲失語，沒人敢說話。到了南京，黃國書請我們吃飯，席上還有幾個台灣人，當時黃是少將軍階又是國大代表，南京他最熟，我們期

待他帶路一道去見蔣。沒想到他竟然推說上海有要事提前離席走了。

見蔣為二二八講話

後來我們終於見到蔣，這是我第三次見蔣。我向蔣說：中央一定要馬上停止抓人殺人，那些受冤枉者要放出來，他們無罪。他回說：參與暴動的人如何如何包圍占領政府機關，毆打外省人……。我說：那不算參與暴動，他們是不得已才起來反抗，台灣物價高漲民生困苦，省籍間不平等且隔閡十分嚴重。

二二八後，施江南的女兒（當時就讀第一女中）曾寫信給我，要我幫忙找她父親，文章寫得很好很感人，我一直放在口袋裡，就親自交給蔣，我說：「請你看，這女孩的父親是醫生，醫生怎麼可能會做出叛亂的事？被抓去之後現在連屍體都不知在哪裡，他太太女兒到處去找，都找不到，請委員長為他們設法。」蔣回說：「好的、好的。」威嚴地示意在側的吳鼎昌：「快辦！」不久江南嫂果然接到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發的公文，但只寫著「未逮捕施江南一員」；我也接到公文說：「你向委員長所提的人，查無此人！」真是天理何在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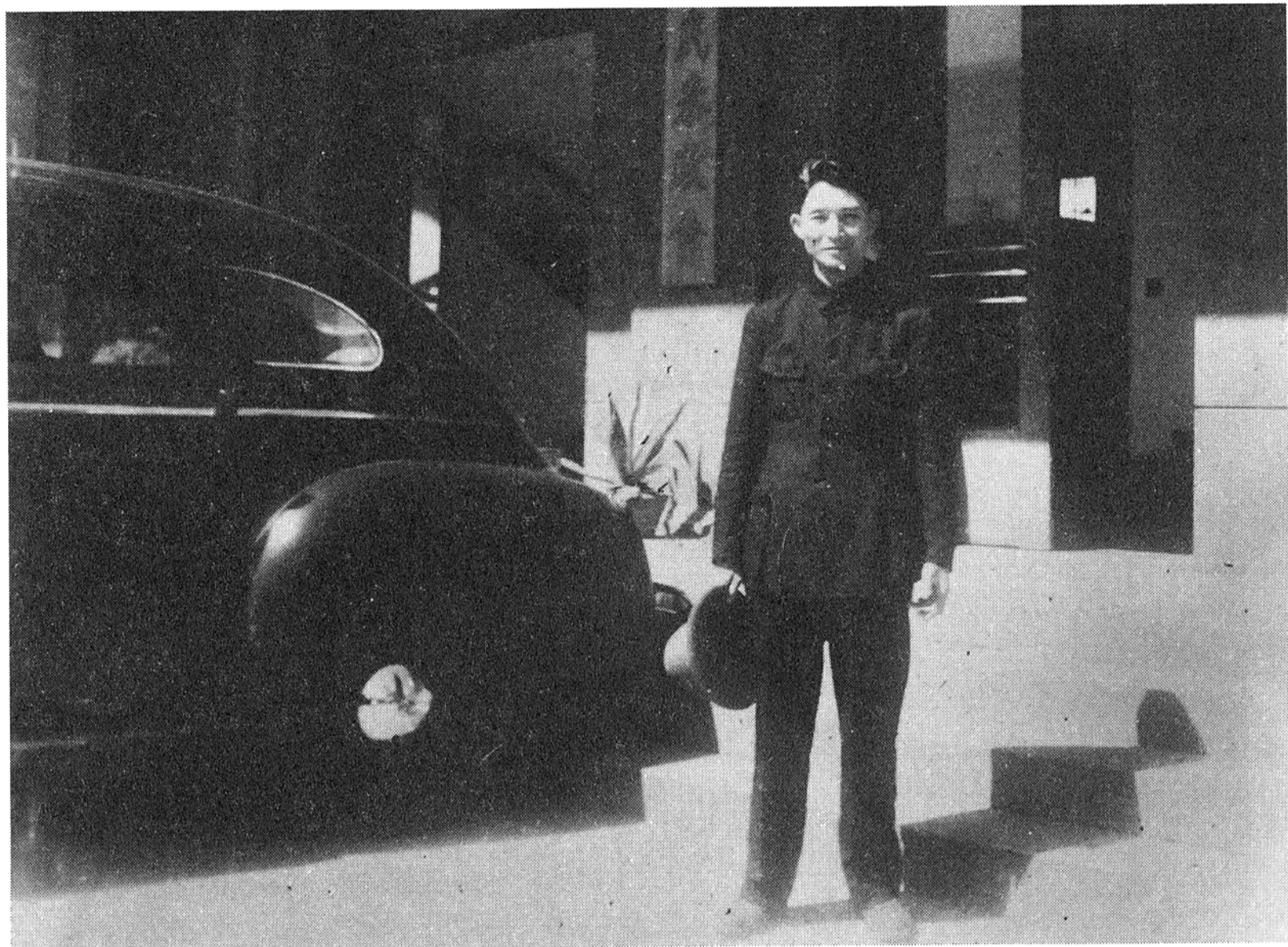
當時同行的參政員吳鴻森的弟弟吳鴻麒（司法官）也在二二八事件中失蹤。他寫了陳請書，我們一併交給蔣，我說：「不是台灣人愛做日本人，是清廷戰敗把台灣人給割讓出去，給犧牲了。」蔣也承認這一點，我說：「台灣人成了清廷戰敗的犧牲品，現在他們回來了，



1946年，宜蘭鄉親送陳逸松赴南京參加國民參政會。前排左起馮正樞、蔣渭川、陳逸松、陳嵐峯，前排右一郭雨新。

你要當他們是自己人回來，不是外人，台灣光復並不是什麼恩惠。」蔣後來說：「二二八這些被抓的人可以放出來！」我抓住他這句話特別再問：「蔣委員長，你說的這句話，我回台灣可以正式公開說嗎？」他回答說：「可以！」

我回來台灣後，在台北市公開演講說：「我見了委員長，委員長說可以放人，所以現在二二八中被抓的人都無罪，可釋放！」可是獄方沒有法院命令不肯放人。後來我走遍全島監獄，到了台東，我進去監獄問：「這裡有沒有人因二二八事件被捕的人？有的話站出來。」結果有幾個人站出來了，我向獄方說：委員長直接告訴我，二二八被捕者一律釋放！獄方果真放了他們。其中有一人非常感謝我，到律師事務所來找我道謝，後來他到我事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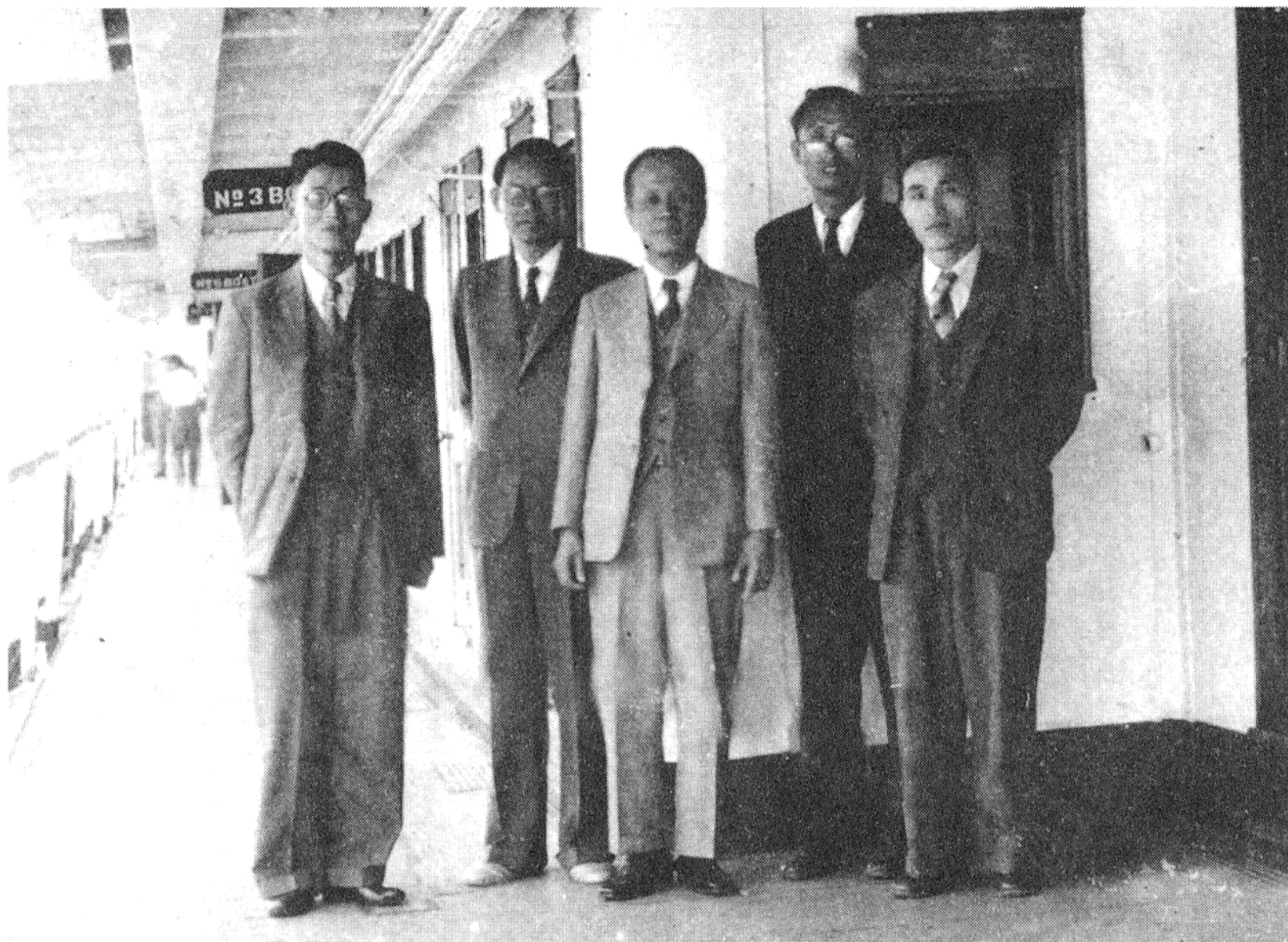
陳逸松在國民參政會前。

所當事務員。不久，蔣渭川、林宗賢等人也都被放出來了。

國民參政會主席張伯苓的一席真心話

第四屆國民參政會第三次會議在南京國民大會堂隆重舉行，此為國府還都後首次在南京舉辦。五月二十日十時，蔣主席和國民參政會主席團主席張伯苓，在軍樂悠揚聲中同步登上大會主席台。出席的參政員有二百多人，政府各機關首長四十餘人列席。主席張伯苓的開幕詞最令我感動，他說：

勝利之初，伯苓是妄想者之一，如今才知道自己錯誤，由勝利的便宜而引起妄想，妄想引起奢想，奢想引



赴南京參加參政會的船上。左一陳逸松，左三吳鴻森，右一林忠。

起了失望。因為勝利來得便宜，我們覺得目前的一切，都出乎意料之外。

他這席真誠的話，似乎道出了台灣光復後我們經歷的由希望、奢望、最後失望的心情。我在台灣的時候早就知道國內也不寧靜，各種抗爭接連不斷。在參政會開幕那天，上海爆發了大規模的青年學生示威運動，要求「停止內亂，實現和平」，國民黨警察抓了不少學生，且關閉了三家民主報社，史稱「五二〇運動」。張伯苓的講話中也指出了這個中國的緊急問題，他說：

國內的和平成爲最緊要的問題，這次開會大可以將國內的和平作爲主題，將和平問題徹底的討論，向政府



在南京國民參政會，與雷震（中坐者）合照。

建議，向人民宣布。

張伯苓在我當考試委員時他是考試院院長，後來留在大陸並沒有隨國府撤到台灣。

見李宗仁，駁二二八日軍煽動說

不久，我認識了同是參政員的廣西大學校長李運華，他與我頗談得來，是李宗仁桂系在南京的重要幹部。有一天晚上，我們談到台灣二二八問題尚未解決，我提議去找李宗仁談談，他果然帶我去見李宗仁。李宗仁看起來像個農夫，手很粗，是國民黨內最大派系桂系的代表人物。我們坐著談了好幾個鐘頭，談到二二八事件時，他堅稱原因是

台灣人受日本軍的煽動。我不以為然，如果這麼說，台灣人豈不都變成受人煽動的愚民了嗎？這種說法，不只蔣介石這麼認為，白崇禧也這麼想，所以我推想，主要是陳儀行政長官公署為了隱瞞自己的失策，把責任歸罪給日本人；這不就成了台灣人都受了日人煽動，才會反祖國？我親歷二二八，深知這是一個推卸責任的說法。我看南京政府上下都以這樣的思維處理二二八事件，不肯也不敢檢討自己的失政，也沒有政治氣度道歉，才會把事情拖到今天。對於這種說法，不管對白崇禧、蔣介石、李宗仁我都說：「二二八事件不可能有十萬日軍在煽動，那時台灣已光復一年多，日軍日人不是都遣返了嗎？還有，台灣這麼小，也容不下十萬日軍而不暴露的，單單十萬人的後勤補給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只不過，李宗仁主張政府應該對台灣人寬大為懷，這點畢竟與蔣介石不同。本來桂系就是國民黨內的最大派系，與蔣有很多矛盾，經常彼此鬥爭。和李見面時，有幾位河南省的代表同席，他們講話比較有天良，聽起來比較通情達理，後來才知道他們都是共產黨的地下黨人，記得其中有一位姓馬的。我所以比較偏左翼，就是因為國民黨一向站在壓迫者的立場，而共產黨是站在反抗者和弱者的立場，共產黨講話與國民黨不同，對於曾經受過殖民統治的台灣人來說比較中聽合心意。

國民參政會落幕

第四屆國民參政會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亦即第一屆行憲國民代表大會開幕的前一天，宣告結束，完成了它在訓政時期的政治任務。

參政會每二個月開一次會，每次大約十天左右，我每次都去南京參加，開完會就回台灣。那時還沒有行憲，國大還未成立，國民參政會是全國最高民意代表機構，所以審議的議題都有關全國性的。譬如，當時美軍在亞洲有大量的剩餘軍用物資，有武器有食物，要撥給國民政府，這些物資要如何分配都要經過參政會議決；還有中央的人事任命如部長級以上的，都要經過我們審議，每次會議蔣都要親自出來與大家見面。不過，說實話，他也需要這些人。

在我擔任參政員期間，中華民國的憲法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開始實施。次年一月二十一日，全國各地舉行首屆的立法委員選舉。我原先想參加台灣省的立法委員選舉，但是國民黨省黨部主委徐白光毫不客氣地向我說：黨部反對你出來選。理由很簡單，我當參政員時向蔣委員長講了很多他們不是的話，回來又開演講會又去放人；還有，我辦政經報時嚴厲批評時政也得罪了當權者，所以省黨部就傾全力打擊我。後來我想，我可以做別的，何必一定要爭立委呢？

第五章

據理力爭的六年仕途（一九四八年——一九五四年）

一、初任考試委員（南京時期）（一九四八年七月十日——一九四九年二月）

國民參政會結束後，我暫時沒有新職。那時福建省監委陳達元和台灣省監委陳慶華、丘念台、陳江山¹、李緞這些人都很支持我。我起先有意擔任大法官職位，這與我法律專業有關係，後來大家討論一致認為我擔任考試委員比較有實質的力量，譬如專技人員和公職人員縣市長的考試都要經過考試院。那時蔡培火是立法委員，正要續絃和廖溫音女士²結婚，我和監

1 陳江山（一八九九——一九七六），屏東東港人，家世殷富乃南台望族。一九二一年畢業於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後入東京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後旋歸故里，開設江山醫院。在一九四一年日警特高捏造的東港事件中，遭冤獄，台灣光復後才出獄，事件生還者僅四人，可謂慘絕人寰。一九四八年陳江山擔任監委，後與杜聰明、陳啟川共同創設高雄醫學院。

2 廖溫音，台灣光復後，宋美齡派廖溫音來台灣組織「台灣省新運工作委員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一九五〇年七月），從事台省婦女運動。台北市復興小學創辦人，長期從事婦聯會工作。

委陳慶華特別到無錫去當男傭相；同時，福建省和台灣省的監察委員也一致推舉我當考試委員，他們打電話來台北要我到南京去。結果，我被總統提名為考試委員人選。行憲後的考試委員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產生。我在立法院行使同意權的投票時，除了台、閩兩省的票都投給我之外，國內其他省的人因為彼此多少有恩怨，且我是台灣來的，又是東京帝大高學歷，所以票都投給我；當時連蔣介石提名的人都沒有通過，我竟然以接近滿票當選，大家都很驚訝。

考試委員與考試院院長同時於一九四八年七月十日就職。當時考試院院長是張伯苓，他是南開大學校長，副院長則是賈景德，而考試委員共有十九位。我對張伯苓的印象很深，覺得他個子高大，有點官僚氣，蔣介石都尊他為師，好像周恩來也是他的學生，可說天下名士皆為其徒，所以相當自負。開會時不太說話，經常拿起議事文件讀一讀就說：「通過！通過！」他沒有跟隨國府來台灣。我們在南京的半年中，國共內戰已在北方開打，時局瞬變，在匆匆忙忙中開過幾次會，也通過了一些議案，譬如有關高等考試的議案等。

與謝娥的對話

當時在南京的台灣省中央民意代表，分別有國代、立委、監委和考試委員，人數不少。台灣銀行特別為我們在南京租了一個叫陶谷新村的地方，讓我們住。這裡以前是一個漢奸的



1946年12月2日，台灣省制憲國民大會代表一行在南京開會後，與蔣介石合照於主席官邸。左三為謝娥。

房子，很大，立委住一邊，監委和試委住一邊，有供差使也供應吃的。如果有什麼需要協助之處只要向台銀說，他們就會替我們解決。

在陶谷新村，謝娥住在立委宿舍那邊，我和謝娥就住隔壁，中間只隔一道木板牆。那時她剛當選立委和宋美齡很要好，經常去宋的地方聊天很晚才回來，因為只隔一道牆，每晚她回來我都知道，我就大聲問說：

「喂！謝娥，妳回來了！」

她大聲回我：「對啊！剛回來，去和蔣夫人談了很久。」

我說：「哦！蔣夫人跟妳那麼要好啊！」

她說：「也沒有啦！只是大家談談而已。」我再跟她聊起來：「喂！妳年紀這麼大了，還不想嫁啊！」

我跟她很熟，她開業的「康樂外科醫院」與我事務所很近，她也曾經是我組織的三青團

台北分團女青年股長，所以我們之間沒什麼客氣的。她回說：

「還沒想啦！為政治，總要放棄個人的家庭生活啊！兩者不能兼顧啊！」

「是嗎？妳有覺悟啊！」

「有啊！既然要參與國事，不這樣還行嗎？」

她在二二八事件剛爆發時，為了平息事件，到台灣廣播電台去廣播，內容遭到民眾誤解，遷怒謝娥。我想那純屬誤會，講話要憑良心，是非要清楚才好。當時她和陳儀較有聯繫沒錯，她相信陳儀說的話也沒錯，錯在陳儀下面的人報告出了問題，以致謝娥的廣播內容惹起民眾憤怒，怪謝娥靠陳儀那邊，甚至有些流氓就去砸她醫院，把醫院東西都搬出來放火燒，使她驚恐絕望。謝娥曾為了爭取台灣人民族尊嚴，在日據末期被日本人關了二年，至死不屈，到台灣光復後才出獄；光復後她積極從事台灣婦女運動。擔任過台北市參議員、制憲國代和立委。一九四九年她對政治灰心，到美國定居，終老美國。

在國共內戰中匆匆離開南京（一九四九年二月）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國府發行金圓券並收兌原來流通的法幣、金銀、外幣。那時考試委員薪水大約金圓券一百五十元。剛開始規定金圓券與美金兌換率為一比五（或六）元，蔣經國也到上海打老虎，物價還算穩定便宜，請一桌酒席才八元，一件皮大衣十五元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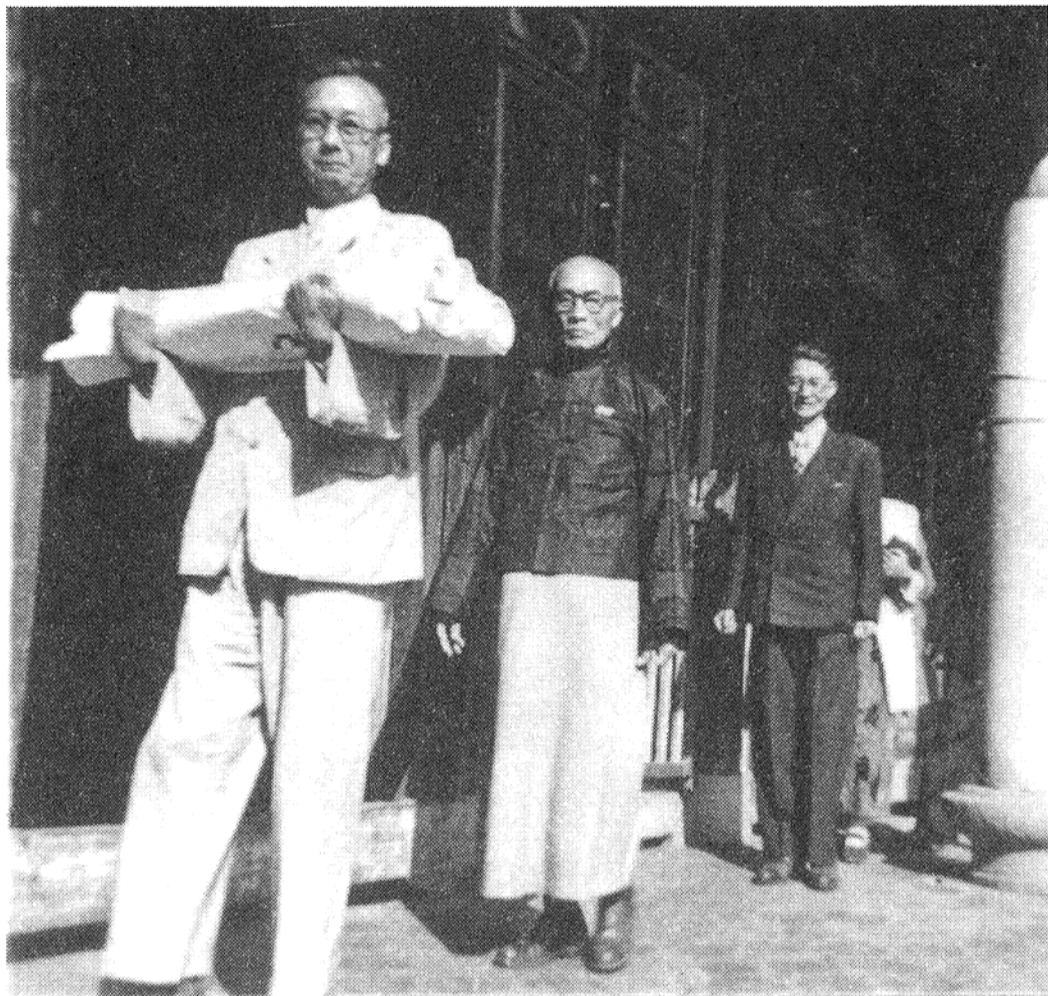
但不久物價壓不住了，天天漲，甚至一天數漲。同時，國共內戰戰火從北方以極快的速度向南方燃燒；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初東北瀋遼戰役解放軍大勝後，戰局急遽逆轉，翌月，淮海戰役（徐蚌戰役）和平津戰役勝負幾成定局。此刻的南京，謠言滿天飛，大家爭先恐後撤離南京，車站秩序大亂，物價猛漲。我到南京中央百貨公司（當時政府嚴格規定一定要開市，否則重罰），有一家鞋店只擺出一隻皮鞋，我進去問：「你怎麼只賣一隻？」他說：「對！只一隻。」，「多少錢？」我問，「三塊五！」他說，我就買了一隻鞋回來做紀念。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蔣介石宣布下野回奉化時，我還在南京；直到當月底北平故都被解放軍「和平解放」後，我才離開。先到上海住在國際飯店，晚上我和太太想出去看電影，大家說不能再出去了，已戒嚴了。我從飯店樓上窗戶看到許多軍車來來去去，後來想，那裡面可能有蔣介石運黃金到台灣的车。那時候要回台灣的機位已經很難訂到了，我們只有拜託台銀幫忙，最後是搭軍用機回台灣的，大概在舊曆過年前後回到台灣。

二、考試院遷台（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四年）

在國府兵敗如山倒的亂局中，政府各單位都紛紛撤離南京，大多數往南遷廣州，也有直接撤到台灣的。

最初，考試院想撤到海南島落腳，後來看到遷到廣州的中央政府也岌岌可危，才倉皇遷



考試院遷台後第一屆高考放榜（於孔廟）。前起杜元載、紐永建、陳逸松。

到台灣。遷台考試院先掛牌在我的律師事務所，地址是台北市太平町三丁目九番地，我事務所客廳暫時成了考試院的辦公室。有人開玩笑說：「是考試院投入陳逸松的懷抱，不是陳逸松投入考試院懷抱。」更有人加碼說：「是祖國投入台灣懷抱，不是台灣投入祖國懷抱。」這玩笑反映了從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到一九四九年國府踉蹌遷台，這短短四年間時局的鉅變，真如乾坤顛倒。考試院暫設我的事務所不久，我向當時的台北市（市長是游彌堅）教育局局

長黃啟瑞說這不太像話，應該替考試院找個公共場所，後來考試院才搬到孔子廟（一九五〇年），最後遷設到現在的木柵（一九五二年）。在木柵，考試院原想配我一間宿舍，因我自己有房子也就沒有接受。

考試院同仁大家都平等相待

遷台後的考試院，先由紐永建暫代院長，後來由原來的副院長賈景德升院長，副院長由紐永建擔任。考試委員有我、張默君（湖南）、盧建曾（山東）、艾偉、黃麟書、盧毓俊等人。



1955年11月3日，考試院同仁聚於北投疑雨山莊為陳逸松慶生。左二陳綺紅、左四馬國財。右起陳文惠、吳裕文、張其昀、盧統駿、陳逸松、陳雪梨、林玲玉、張默君、雷法章、陳雲端。

賈景德是山西產汾酒地方的人，也是清朝最後的狀元。在南京時，我去他家拜訪，他總是拿出汾酒來請喝酒，酒杯小小的、白白的，看起來很珍貴的樣子。來台後，他和我的家庭家人都很熟，經常往來。鈕永建和我交往很深，他知道我了解日本，與日本人交往不卑不亢，曾推薦我擔任駐日大使，但中央黨部不肯答應而做罷。張默君委員曾留過美或留法，其夫是邵元聰，在西安事變時擔任蔣委員長的秘書被打死。她擇善固執議論凌厲，滿腹經綸，不讓鬚眉，就像她寫的字筆尾很厲一樣，大家都讓她三分。有一次在一個會議上，蔣介石在台上說著要如何如何反攻大陸，她正坐我旁邊，就戳我一下不屑地說：「老調重彈！」口氣很重。她很尊重台灣人，認為自己同胞應平等相待。

我經常為了台灣省籍同胞在考試權和專門職業證照認定的問題上，主張要充分考慮台灣的歷史和現實，好幾次我強調：「台灣人不是自己要去做日本人的奴隸，而是因為清廷打敗戰才割讓給日本，所以應尊重台灣人。」張默君委員很贊同我的意見說：「陳委員講的有道理，這是我們大家應該反省的地方，在政策上對本省同胞要充分考慮歷史因素，平等對待。」我經常聽她說「我們對不起台灣人」這種話。在考試院大家都沒有省籍之分，或許我是最高票當選的委員之故，在公開場合我都站在前面，譬如，在台灣舉行第一屆高等考試分發及格證書時，鈕永建（副院長）站在最前面，其次是杜元載（考選部長），再來就是我。

日據時期，我到日本讀書，東京帝大畢業後回台執業律師，又擔任過台北市會議員，與許多日本人交往。有些日本人很好，像高原小吉這樣的人，但很少數；還有那些參與社會運動關係的日本人，雖然思想相近有如同志，畢竟不同民族；何況一般日本人都看我們為異民族，瞧不起我們，從來沒有平等相待。光復後，我和這些外省官員接觸，特別在南京時，並沒有因為我是台灣人而遭受輕視，這使我深深感覺到大家確實是同一民族，自己的同胞。不過國府遷台後，在我當中央銀行常務理事時，為高利率政策經常與他們爭得面紅耳赤，我主張降低利率才有利台灣工商業發展，但是他們為了照顧大陸來台官兵堅持維持高利率，這才使我有不平等的感覺。

對考試權的見解

依照孫文先生五權憲法的政治思想，我對考試權和監察權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考試院的職權主要在選拔優秀有能力的官吏並舉辦專門職業人員的資格考試。對於選考出來的官員不但是要保證其身分保障其生活，而且考試委員應該要定期到各省各地方去，對官員進行定期檢核，成績好的升一級，壞的降一級，如此才能督促官員更加盡其職責。而且，監察院應該要有監察警察權，專門針對官員的貪污和失職查辦。如此，我們才會有廉潔又有能力的官員為民服務。對於我的這種想法，那時除了院長以外的人都搖頭，都說即使考試院願意做，行政院也會反對，他們認為來台灣只是暫時落腳，不久就要回去了，一切回去再說。

為台灣人原專門技術人員的資格爭權益

台灣光復後，許多日據期的專門職業人員如司法官、醫生、建築師、護士等，都面臨資格的認定問題。在我擔任考試委員的六年中，始終為他們爭取權益。依照國府的法令，對於偽政府、敵國政府的學歷、經歷概不承認。譬如大法官黃演渥是日據期日本仙台東北帝大畢業，通過日本高等考試後，一直到日本戰敗投降前，曾經在日本當過判官，回台後也當判官，從七等開始做到五等；光復後他的學經歷都沒用，只有當做初任，一切要從頭開始。還有幾



1953年9月考試院典試評分。左六是擔任考試委員的陳逸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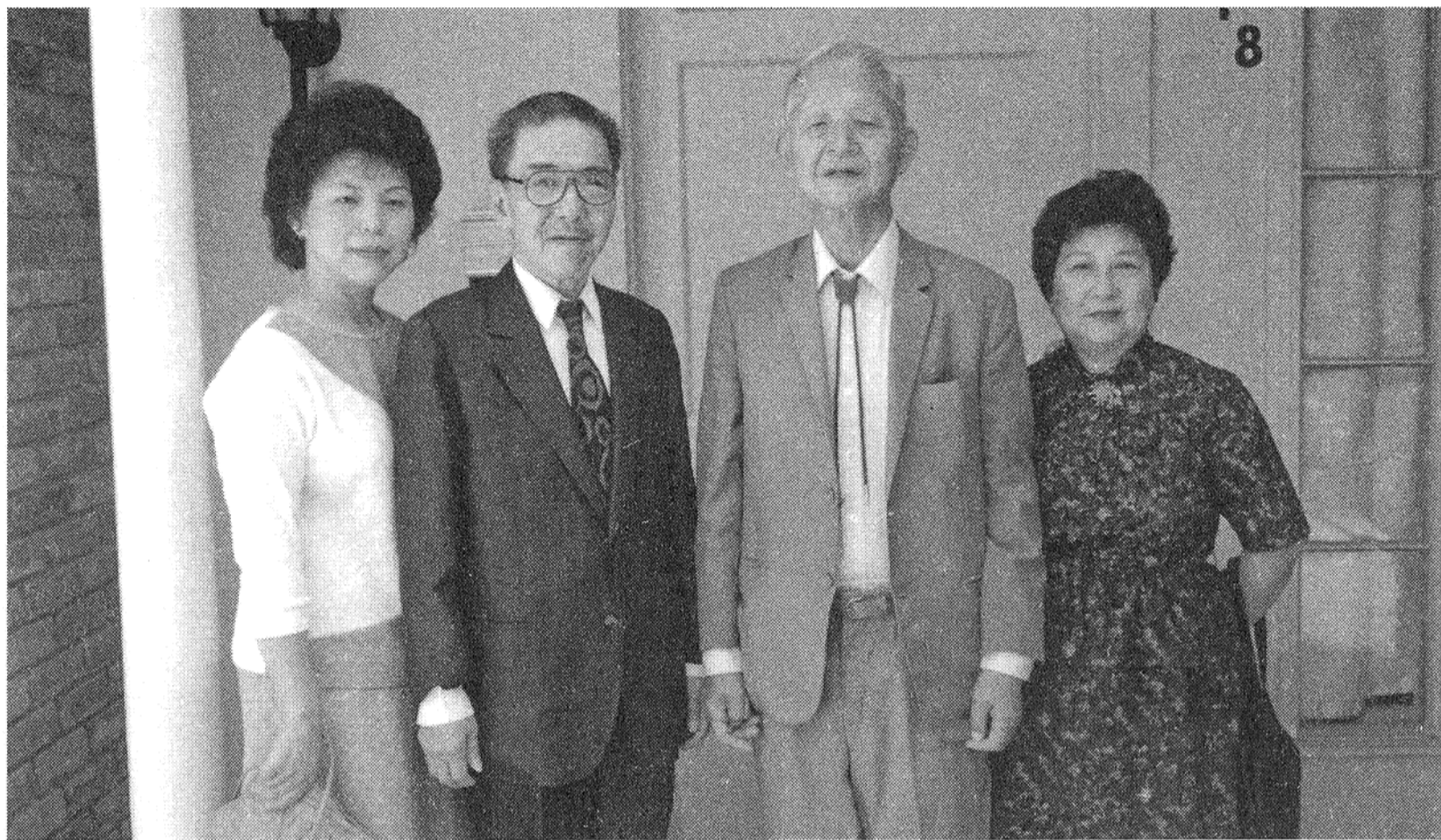
個司法官來找我，訴苦說，陳先生，怎麼辦，要再考一次我們怎會考這種的，這下可糟了，我們的一切都完了。我就在考試院召開會議討論這些人的資格問題時，我說台灣人不是愛當日本人，而是清廷戰敗割讓給人，不得已當日本人，現在台灣已復歸祖國，大家都是祖國的國民，怎可區別對待？何況我們與日本都已講和，日本已不是敵國，因此日本的學歷經歷資格都要承認才對。我的主張沒有一個人反對，連院長賈景德都說這是應該的，因此做成了決議，考試院的決議就是法律。這才使日據期的司法官和律師資格，只要以檢核的方式就承認其學經歷和年資。

醫生的資格也碰到同樣的問題。特別是日本戰時設立的一些二、三流醫學院的畢業生也都來要求認定資格，我也建議要讓其通過認定。至於護士資格，依照中國規定，護

士要高中以上畢業才可報考護士資格，但是，日本的護士是由醫院自行培養的，在醫院當護士幾年後經院長證明就給予護士資格，現在這些日據時期的護士年紀都這麼大了，要如何再去讀學校呢？在我任內的努力下，過去的護士資格都承認了。又建築師問題也很大，日據期台灣總督府設一個簡單的考試就可通過乙等建築師資格，本來依規定建築師須學校畢業後參加高考才能取得資格，但基於歷史問題和現實考量也都通過了。

我這些努力都是為台灣人爭權益，解決了許多台灣菁英在時代變遷中遇到的大問題。這事理應受到肯定才對，沒想到居然還有人因此事誣告我。在日本戰時有一個興亞醫學校，該校畢業生在日本也不被承認，必須經過醫師考試才能通過，但我讓它們通過了，這些人很感激，就集錢買洋菸洋酒等小禮物送到我北投的家，結果因為他們內部鬧矛盾，有人控告他們自己的幹事連我也牽連被告，說是我貪污；還好考試院的同事杜元載陪我向檢察官說明原委才免於難。這事給我很大的教訓，對於熱心為人服務這事感到心灰意冷。

一九五四年，國府通過大法官會議解釋，第一屆國大、立委、監委延任，並即召開國大選出蔣介石為總統。隨著蔣介石的新任總統就職，第一屆考試委員期滿要換屆，莫德惠擔任考試院長，新人新事，我也因此離開了考試院。回想起來，在短短的六年間經歷了台灣光復和中國國共內戰的劇變；雖然在動盪時代中，作為考試委員，我仍然秉持理念顧及現實，盡力為國家為台灣鄉土服務，俯仰無愧於天地。



洪敦南（左二）晚年訪陳逸松夫婦合影。

三、沒有座位的中央銀行常務理事

沒有告知的派任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央銀行隨國府撤退台灣。其時，台灣局勢風雨飄搖，國府撤台驚魂未定，央行並不對外營業，實際的銀行業務都由台灣銀行負責。那時我還是考試委員，有一天，我從太平町步行到城內（當時我沒有個人專用車，考試院的車是輪流備用的），在鐵道部前遇到老朋友洪敦南（他家住在甘谷街）正要回家途中，他看到我就從自用的人力車上跳下來，叫住我興奮地說：「恭喜啊！」我覺得奇怪有什麼事好恭喜的呢？他不相信地說：「你今天還沒看新聞嗎？」我說：「沒有呢！」原來報紙登了我被任命為中央銀行常務理事的消息，但登得小小的，很難注意到。這種事，竟然由一位朋友向我

道喜才知道被派任，事前竟從未諮詢過我。

我告訴洪說：「我都不知道哪！」

他熱情地笑笑說：「來吧！車子讓你坐了，中央銀行常務理事還走路，我玩股票的都坐車了！」

我推辭說：「我走路好好的，不用啦！」

「不行！不行！」他硬把我拉上車，逕自走路回去了。

這事表明了，當時國府是如何倉皇遷台，人事任命慌亂沒準則，只要他需要一個台籍人士擔任常務理事，不管你願不願意就直接指名公布了。我想好吧！既然被任命了，我就認真地做給你看。

沒有辦公室也沒有座位的央行常務理事

我先去找行政院長陳誠。我和陳以前見過幾次面，我向他說看到新聞才知道被任命，謝謝他的厚愛。他說總統也很希望你來做。我心想，本人都不知道，只有你們自己在商量就決定，這種人事任命全世界找不到。當時，央行在中山堂延平南路邊，不大，約只有三個店面大；還沒有什麼人知道，反倒是附近的台灣銀行最有名。聽蔣命令把上海央行黃金搬來台灣的俞鴻鈞是央行行長（一九五四年他受蔣拔擢任行政院長），常務理事有三位，除了我之外就是

吳忠信和張群，祕書由居浩然擔任，都是蔣最側近的人，只有我不是黨政高層。他們發給我很大一張特任狀，薪水比考試委員少一點大約五百元，那時我經濟情況並不好，因為擔任考試委員不得兼職律師，因而五百元在生活上不無小補。

我先去找俞鴻鈞問：「常務理事在哪裡辦公？」他說：「沒有常務理事的辦公室，現在央行剛遷台沒有銀行業務，只有國家物資的調配。」我再問：「有車嗎？」他笑笑說：「沒有！」，「那我坐哪裡？」我又問。我這人就是這麼「青番」（台語：謂不顧情面，據理力爭之意），他也笑笑說：「你來我這裡坐就好。」「沒有車，也沒有辦公室，這是什麼常務理事？」我問，「就是這樣嘛！剛搬來台灣還沒有對外業務。」他說（央行要直到一九六一年才正式在台復業）。

由此可知，我這個常務理事只是掛個名而已，他只是給你可以利用機會賺錢，而我只想做事，不想賺錢。我想，俞大概也心裡想：「你真不會做官！我好像碰到台灣『青番』了。」

不顧情面，只盡職責

央行也有一般的理事但都沒開過會，只有常務理事每個月開一次會。每次開會，都有印好的議案文件一大疊排在桌上，我還在看議案題目，居浩然就開始唸了，接著俞就對大家說：

「各位，有沒有異議？」我才看完題目，內文才看到第二行，他就大聲喊說：「好！無異議

通過！」祕書居浩然就接著說：「好，通過！」接著又唸第二個案……對於這種沒有實質作為的工作，我心裡實在覺得窩囊，就這樣白白被利用也不是辦法；這憑空而得的高位，對於別人來說也許會感激萬分，但我陳某人是白白要位要錢的，我一定要有所作為才行。

那時台灣通貨膨脹很厲害，利息高得驚人，銀行貸款日息九錢，也就是每百元每天的利息九錢，換算年息高達百分之三十二點八五，大約接近四成。假如向銀行借錢來建廠做事業，沒賺到四成的利潤就別想向銀行借錢，這情況對發展民間企業相當不利。有一次開會，我提出臨時動議，我說：「現在央行決定的利息太高，台銀日息九錢，日本卻只有一錢半到二錢之間，兩者差距太大，太不合理。」俞聽了支吾了半天說：「我們從大陸來的官兵帶些錢或金條來，都存在銀行，利息低的話他們就不能生活，安定軍心為要。」

我反駁說：「今天台灣經濟衰退，民生凋弊，解決之道，最重要的是鼓勵生產，刺激產業經濟發展，如此軍民生活才能定安。從整個國家著想，也要把發展產業放在第一位，如果產業不能起色，只顧補助官兵，這不是辦法！」

俞答說：「好吧！再研究看看，再研究看看，再說！」

每次開會我都不厭其煩提出這問題，俞被我弄得頭痛，張群和吳忠信也只有在旁笑而不語。結果，我三年任期中利率降到了年息六錢，三、四年後才降到了三錢。這是不是因為我不顧情面「盡職責」的結果？或者是因為政治經濟大環境的變化所致，不得而知，或者兩者都有也說不定。

我寧可不做官

不論境遇好或壞，我總不忘堅持自己的理念，不會為了怕失去地位或利益而失去原則。就因為我在常務理事任期中經常據理力爭，讓他們頭痛，任期滿就不再續聘了。我走之後再沒有省籍人士擔任央行常務理事了。只有李建興當了監察人，聽說李建興接任後，在瑞芳大開宴席，大舉慶祝。

假如在一個合理的政權下做官，我有自信做得很好。獨裁政府只要聽話的官吏，這樣我寧可不做官。考試委員沒再續任，大概也是因為我在任內替台灣人爭取了很多權益，又沒去逢迎交際。還有，我已深深感到厭倦，在這樣的政府中做官沒有發揮能力的餘地，且我想出來自己做事業，因為做一個清官，越做家庭經濟情況就越差，倒不如出來做事業。

第六章

投身實業界

一、創立「厚生橡膠公司」

（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

在我逐漸對政治感到厭倦的時候，一九五一年末和徐朝風相識了，我常到他那兒喝咖啡。他有一個學生叫鄭晃炎，本來是做橡膠鞋底的，來找他投資，他再來找我，因而我們一起成立了「厚生橡膠公司」。「厚生」這兩字是我取的，因為我鍾愛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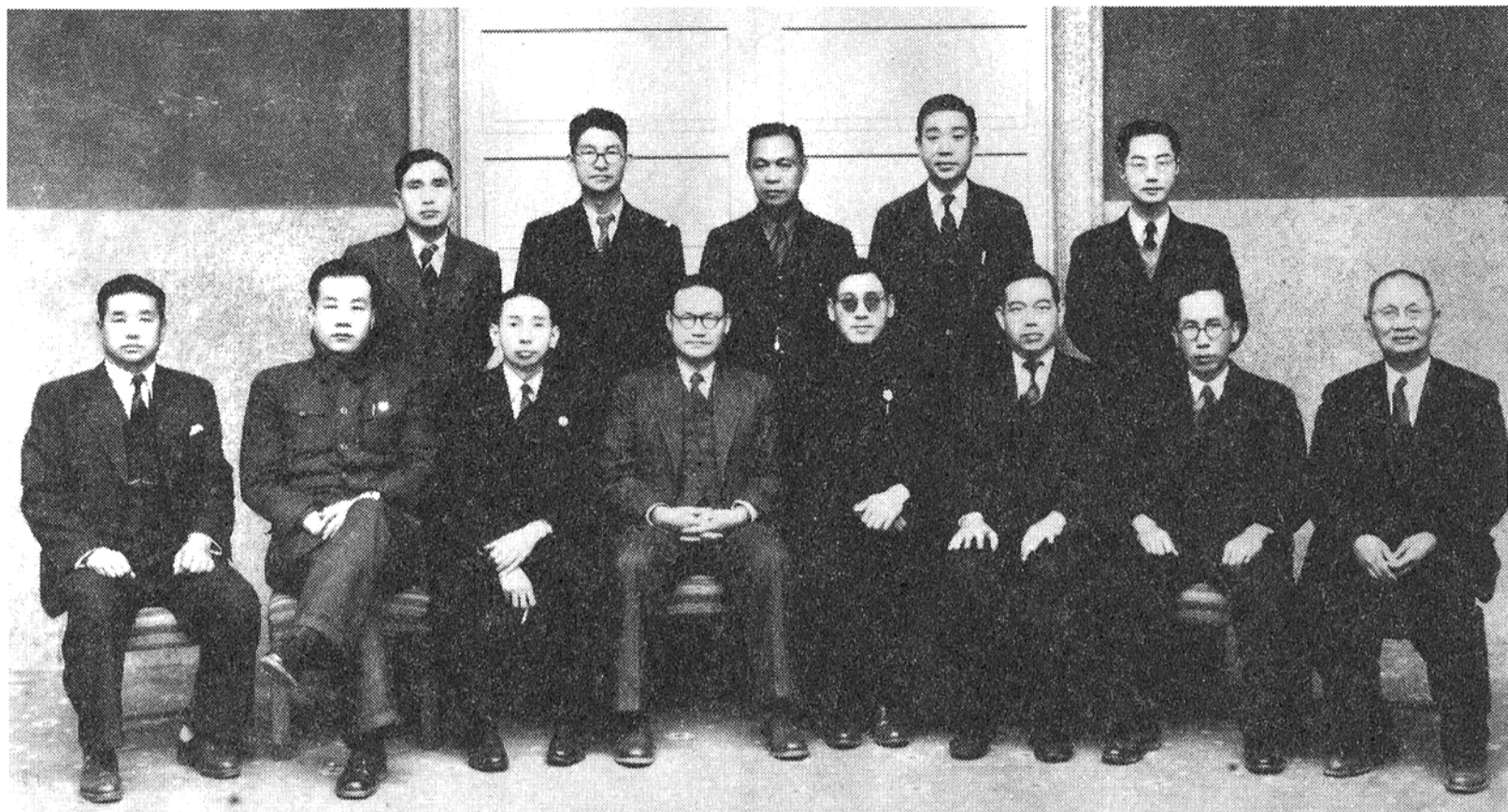


厚生橡膠公司建廠。右二陳逸松，右三徐風楷，右四徐風和。

兩字。公司總資本額一百萬元，主要由我和徐各出百分之四十五，其他幾個小股包括鄭焜炎、洪敦南和呂宗輝。我擔任董事長，徐朝風任常務董事。我認為只做鞋不行，應該要做橡皮雨衣。徐去探聽到軍方最近要把塑膠雨衣改成橡膠雨衣，於是我們請一個姓洪的技師來替我們安裝日本進口的機器。那時塑膠和橡膠在競爭市場，塑膠是何義在做，且他規模比我們大很多；我去找何義談條件，希望他讓我們做，他看我出面，很爽快答應說：陳先生，你第一次來實業界做生意，我無條件讓你！結果軍方的生意就爭取到了，從此「厚生」的生產就上了軌道。我們的工廠設在板橋，占地有一甲多，比我羅東的化工廠還大，是我出面去講通才買成的。

徐朝風管業務部門，下面都是他的人，經常一起喝酒結黨，賣出去的貨經常收不到錢，又不聽我的勸導，於是他們就在「桌下演布袋戲」了。我這個人黑白分明，對這種作風開始受不了了。我對他說：這樣吧！看是全給你還是全給我。他說要退，我說：好，都給我好了！他以為我沒有錢。當我把錢準備好，他卻避不見面了！我想既然找不到人就算了。沒想到，過了幾天他又出來說了：逸松先生，這樣吧，我很尊敬你，我們再做下去吧！我很惱火說：我無法和你合作了，乾脆我的份賣給你好了。就這樣，我拿回原投資金額四十五萬元退出了。從開創、設廠（約一年）到生產共花費了三年的時間。

一一、買賣股票（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



華南銀行董監事合照。後排左一林忠，左二陳逸松。前排左二謝聰敏，左三林宗賢，左四劉啓光，左六陳逢源。

我拿出這些錢後就去買賣股票。那時，股票是當面買賣的，後來才有一個統一的交易市場。買股票時太太在車內等，買出來後再去過股。後來很多人跟著我買賣，一時勢力很大，連上海幫都搞不過我。他們來找我，要我和他們合作，我不接受，結果他們去找別人聯合來跟我拚，我敵不過他們被吃掉了，還被吃掉不少，受到這教訓就收起來不幹了。

三、創設「同泰化工公司」（一九五七年——）

股票收手後，在羅東開醫院的堂兄陳進東，邀我在羅東開石粉工廠。本來我不想要，因為這不是我本行，石粉是什麼我都不知道，又遠在羅東照顧不到，全都與我差距太大。進東說：沒關係，我人在羅東一切由我負責，廠方技術方面就由陳進富來管。後來我們一人出資三十萬元，成

立了「同泰化工公司」。為了向日本買機器，我去借美援貸款。因為我與李國鼎很熟，又曾經擔任華南銀行董事的關係，經過華南銀行很快就借到了一筆美援貸款，是借美元還美元，利息也以美元計算（比台幣利息低很多），只是有匯差的風險。實際上，那時美元不斷地漲，從台幣十幾元漲到二十幾元，構成了極大的壓力。進東說沒關係，公司他會負責，能借多少就借多少，而以我的面子，要借多少就可借多少。

因此，我在一九五七年到日本去購買機器。算來，從一九三三年回台灣後，近二十年未踏上日本土地。我趁這機會再度到日本各地旅行三個月，與許多日本的同學、朋友重逢。那時日本正逢戰後經濟起飛期，日本人稱作「岩戶景氣」，但是一般百姓生活還是很艱苦。我就在大阪看到一座大橋下的空隙睡滿了人，每層二、三十個人，整座橋下就擠了近百人。這些人都是從農村各地來都市工作，無住處的臨時工人。目睹此景，讓我想起戰前三〇年代前後，我學生時代看到的日本佃農和紡織女工的血淚情景。

機器買回來後，工廠還沒有正式生產之前，利息高又有償還貸款的壓力，所以一直在艱苦中經營。再加上進東要經營醫院，又做紙廠、開戲院，根本無暇去經營管理。起初他還有能力償付美援貸款，第二年春天他就付不起了，想退股，我就只有把工廠接下來。這個工廠一直到我離開台灣前還繼續運轉；出來前我交代員工要管理好內部，也託劉明幫忙照顧。後來大家說我「投匪」了，一切都被凍結，工廠也就這樣停工了。

總結十多年的經驗，簡單說：我不會做事業，更不是一個企業家，不是一個做生意的料子。

四、成立「藝林電影公司」——張深切拍電影《邱罔舍》（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



1960年代，與張深切夫婦攝於台中市。左二起張深切夫人、張深切、陳逸松、王井泉。

大約在一九五六年前後，辜京生拍了幾部台語片，內容都是下地獄割舌頭、妻妾勾心鬥角之類的低俗故事。大家都說台灣人很愛看，我卻很討厭也很憤慨。心想拍那種戲會讓全世界的人說台灣人真殘忍，真沒文化，如果有辦法能夠拍一部有文化有趣味性的片子多好。這時張深切恰好從台中來台北找我，談及此事，鼓勵他創作好的電影腳本，我又燃起對文化事業的熱心。張深切原本在北平教書，寫了好多書，有一本叫《孔子哲學評論》，我讀完了整本書，印象很深刻。我和他相識，是因為他在《台灣文學》（日據末期）上讀到我的小說〈姐妹〉，張文環告訴他這篇是我寫的，因此他從北平寫一封信給我說：「你是法律家也會寫小說，實在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光復不久後



於台中霧峰拜訪林獻堂。左一黃得時，左二陳逸松，右一張深切。

他回來，在台中文化界很活躍，與林獻堂、徐復觀、劉啟光等人經常往來。他是南投草屯人，家是地主也是有錢人。

我是站在政治經濟的立場鼓勵他去寫，後來他果然寫出一本電影腳本給我看，說：「我們來做電影事業教育民眾比較快，我們來拍一部不要哭哭啼啼的，有幽默感的，讓大家笑、高興的電影」。這部腳本就是《邱罔舍》，它以台灣民間故事為本，再加入一些他在台中開的咖啡廳中年輕女孩子的說笑吵鬧要素而成。

他找了劉啟光、何永、郭頂順和另一個姓賴的人加入，這些都是台中有名的人，大家共同組成了一「藝林電影公司」。一股十五萬元，我們夫婦各出一股，共三十萬元，我當董事長，劉啟光和我太太當監察人，張深切和林快青（鬼才）是常務董事，其他人是董事，導演是張深切。我們在台中市租下一個二樓的辦公室，很大，客廳紅窗簾很漂亮很氣派，台中人都說我們是有錢的公司，又有銀行界加入，所以買東西都比較貴。拍片前要

訓練演員，於是請專人來訓練，好像在殺豬公。拍外景時，用兩部卡車，道具一大堆便當一大批，出發後，碰到天氣不好還是陰天，一大群人就打道回府，相當花錢。反正，開支沒有節制。管業務的總經理對此很看不慣，說：「這種做法要如何做生意，我們是以營利為目的的。」後來總經理又說：「我們是拍邱罔舍沒錯，但我們以營利為目的，現在有一變通辦法，去拿日本片來混合，這樣才會長久。」張深切不愧是文化仙，不是生意人，他堅持說：「不行，我們公司的目的是文化事業，不是營利為目的，我們要自己拍！」經理說：「如果不是以營利為目的，那麼這些錢用光就沒有了！」張深切還是堅持下去，最後勉強拍下了這部片子。《邱罔舍》這部片子是從一九五六年開始拍，隔年就完工可上映。

這期間有人提供一部叫《再世姻緣》的腳本，張深切和林快清都想拍，張深切堅持要自己寫腳本，自己導演和挑選演員，於是兩人就吵起來了。劉啟光比較聰明，他知道這公司不可能成功，就先退股，同時也走了。《邱罔舍》拍成上映後，本身沒有賠錢而是吃光了，總共有十幾個人一直吃這個片子，而第二部片子又沒有出來。雖然有再計畫，但整個公司已渙散了，那《再生姻緣》也沒有被採用。後來那公司變得不值錢，就送給一個愛歌仔戲的流氓頭。我賠了四十幾萬，張深切也吃了大虧，把台中一個賺錢的咖啡廳賣了。

在台北上映時，我們在長安西路租一間事務所，作宣傳表演貼海報用。那些演員沒有住旅館，宣傳表演完，就住在我北投的家，那邊房子很大。那時請王白淵當事務所主任，但王有一習慣，每次開會不管會議進行如何，到了十點他一定要離席回去，他說：要是晚回去，



五十歲時攝於北投家中。

腳步聲會吵醒太太，她就一夜睡不著。他太太出身艋舺，父親倪炳煌，字希昶，漢學底子很深厚，儒道思想很重，家庭教育很嚴格。

《邱罔舍》上映時，我們是與戲院「做分的」；有的戲院會「跑票」作弊，我們怕被吃掉，就叫大家到戲院去監督，看有幾個人進去戲院賣幾張票。這時，我剛好為同泰化工到日本去採購機器。

張深切是一個有世界觀、宇宙觀的人，他信仰老子哲學境界很高，在台灣研究哲學的人當中我最敬佩他，他有原則有信念。他寫的《孔子哲學評論》是一本很有分量的書，這本書曾跟隨我多年。在台中，他和莊遂性是莫逆之交，與莊遂性和張星建共同合開中央書局。以前我到台中都會到中央書局去買一些進步書籍。後來張深切來台北入院看病，住在松江路六福客棧前面一條巷子內，我常去看他，和他

相談，談到人生坎坷感慨無量。他於一九六五年年底十一月八日過世，恰好在王井泉去世後沒幾個月，死時僅六十一歲，但他很瀟脫，覺得人生自得死而無憾。

五、創設「二十一世紀畫廊」（一九七一年八月）

一九七一年我遭遇羊羹事件後，一般朋友怕被牽連都紛紛走避；只有林良、許乃昌還來找我，李清標的太太也常來，其他不敢來的只有以電話打招呼。我太太說我們的電話好像被監聽，我說沒關係，不要怕他，我們盡管說吧！那些特務還是不放過我，經常來問東問西的，只是態度裝得很客氣，有時還帶點水果來，我已經看透了他們的伎倆，自然也學會了如何應付他們。由於國際媒體大大報導了這事件，在國際注目下，他們也比較收斂不敢亂來。

倒是吳濁流經常帶一些作家來我家坐坐談談，譬如林海音、黃娟等作家常來找我。有一次我還跟這些文化仙一大群人，到新店鷺鷥潭去玩，野餐、嬉水不亦樂乎。他們舉辦文學座談會或文學獎的頒獎典禮，都會邀我去參加。那時吳濁流創辦一本文學雜誌《台灣文藝》，培養了不少台灣省籍作家，也經常向我募款，我本於年輕時資助張文環創辦《台灣文學》的心意，也多少資助了《台灣文藝》，較有錢時就幫忙多些，沒錢就幫忙少些。到了這個年紀，我還是對文化、文學、藝術難以忘懷，認為一個社會在政治經濟上要進步，一定不可缺少文化。因此我有能力就盡量支助他們。

羊羹事件後我心裡就一直想離開台灣，但苦無門路。本於資助藝術家的心意，我於一九七一年八月一日，在松江路的事務所一樓成立了一個「二十一世紀畫廊」。一般，畫家自己的作品不好自己賣，畫廊代替畫家出面賣，從中抽取二至三成的佣金。當時，許多有名的畫家都拿作品來委託我賣，如黃石樵等，我就去找一些有錢有閒的朋友如黃朝琴等人來買，一些日本朋友也來買。一直到我離開台灣前的一年間，畫廊賣了不少畫，我走了之後畫廊還在。

當時在台灣創立「二十一世紀畫廊」，可說開風氣之先。當時還在二十世紀，我卻以「二十一世紀」為名，這本身就要求高瞻遠矚、大膽創新的意義。在開幕之時，我還發表了「二十一世紀畫廊」宣言。大意是：藝術乃鼓舞生活之毅力，不管是繪畫、雕刻或是詩、戲劇，今天的創作要是三十年後沒有人懷念，那就不是今天的好作品。我的意思很簡單，如果你的作品不能經過三十年歲月風浪的考驗，就不是一個傑出的作品。從當時一九七一年開始算起，三十年後剛好進入二十一世紀，所以就以「二十一世紀」為名，有前瞻性也有我對藝術文化的期許。

第七章

在白色風暴中受難的朋友——「光明報」事件

一九五〇年代，隨著國民黨政府撤退台灣，白色恐怖的狂風暴雨也席捲台灣，整個台灣社會籠罩在反共肅清的高壓中。無數左翼的或進步的台灣青年都被抓，被送到火燒島，或者送到馬場町仆倒刑場。我是考試委員倖免於難，但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也是我最尊敬的朋友，卻受到政治的災難，遭受到致命的打擊。一位是劉明，另一位是蕭坤裕，他們都是我在東京讀書時同是「社會科學研究部」的朋友，相識相交一輩子。在白色恐怖中，他們都涉「光明報」案，卻以「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案被判刑入獄。

從日據末期的軍國主義戰爭風暴到光復後的二二八風暴，這五〇年代的白色風暴算是第三波。一九四〇年代的十年中，在時代的巨變中，有三波政治風暴席捲台灣，每一波都有許多台灣的進步菁英蒙難，把台灣一代一代的現代菁英葬送，台灣的現代化真是多難啊！就像王白淵的詩集名《棘の道》（荆棘的道路）。

簡單回想起來：

第一波倒下的是歐清石律師、雷燦南……。

第二波倒下的是王添燈、施江南、林茂生……。

第三波，蕭坤裕、劉明、呂赫若……這次更為全面，一直延續到七〇年代末，我自己蒙受的「羊羹案」算是掃到「風颱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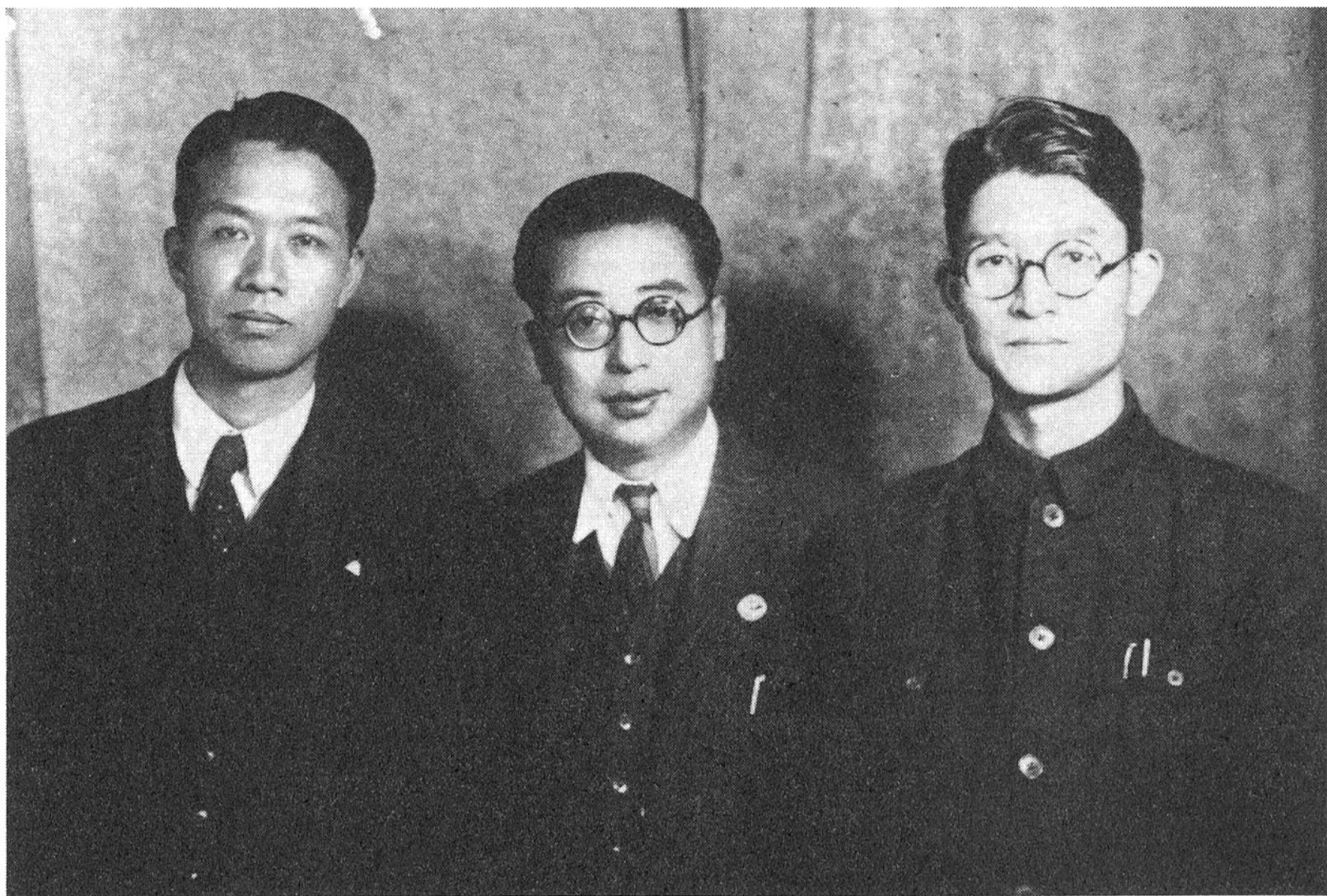
一、劉明——礦業鉅子·堅定的民族主義者

東京「勵志社」

劉明比我大六歲。他比我晚到日本，卻比我早到東京。一九二〇年我去日本讀書時他還在台灣讀中學，一九二三年或二四年他才到日本讀藏前工業學校（即東京工業大學前身）應用化學科。一九二八年我到東京那年，在一位姓蘇的汐止人家認識他，那時他剛畢業準備回台灣。在東京讀書時他成立一個「勵志社」（這時國民黨還未有「勵志社」），以賣台灣筍乾維持活動。他從台灣寄一桶桶的筍乾來日本（他父親劉闊先生在嘉義專銷筍乾等山產）專門賣給日本的一「蕎麥麵店」，在蕎麥麵中加一點筍乾叫做「支那蕎麥麵」。以前日本麵中只加一個蛋或一根蔥，在日本麵裡加筍乾，就是從劉明開始的。他租了一個大房子讓許多沒地

方住的台灣留學生住，不要錢，那些學生拉著手拉車四處去賣筍乾給麵店，賺的錢大家一起用，用來付學費和膳宿費。劉明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感情和反日精神，創設「勵志社」意旨大家要立志，民族應自強，對付日本人要以他們對待我殖民地的態度與之對抗，並且堅持發揚自己的民族文化。他的主張與我相同，我十分感動於他的義舉和精神，常去「勵志社」開社會科學研究會，讀書和討論，那裡的很多學生都參加。「勵志社」的人有四、五十人之多，後來回台灣都各有所貢獻。有一位姓林的，回台灣當《台灣民報》記者；有一位劉阿才和劉明很好，是客家人，當到台灣電力公司的高級幹部；林榮賢也是「勵志社」出身。

有一位郭振乾（郭子春）也是「勵志社」的人。他一生做鉛筆，我們叫他「鉛筆郭」。他到上海去開設「上海鉛筆廠」，中國有鉛筆可能始自他，我和劉明曾經去上海看過他的工廠。光復後，我每要到上海、南京，劉明兄都會拿錢託我帶去給振乾，他非常感謝劉明，常念念不忘。大約在一九四八年，郭振乾和一班上海人回台灣來買板橋一家標售的鉛筆廠，他把這廠也叫做「上海鉛筆」。這家工廠恰好在我的厚生橡膠廠隔壁。以後他又回上海，後來兩岸隔絕三十年，恍如兩個世界。一九八一年，我到福建參加廈門大學六十周年慶，順路到上海，住在上海賓館，顏永賢（後改名顏光）正好認識郭振乾，帶我去找他（建國西路六四三號三十六室），那時他已病重垂危，吊著點滴，還認得我，辛苦地喘著氣說：「逸松兄……代我傳達明兄，我念著他……」我安慰他，求其保重，將來得以在台灣相會。沒想到，第二天他就過世了。真是不可思議，相隔三十年，竟然還能見最後一面，還認得出我，託我傳達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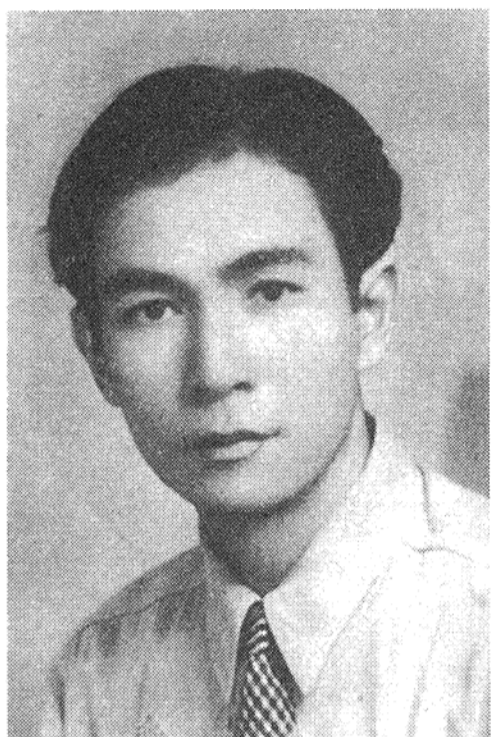


左起劉明、陳儀政府第一批來台接收大員、陳逸松。攝於 1945 年台灣光復初期。

明兄的思念之意。以前我幾次到上海，想找他都找不到，這次奇蹟地見了最後一面。兩岸長期隔離造成了多少的人生悲劇，但在顛沛流離中總還牽掛著一份情和緣。

急公好義的礦業鉅子

劉明是嘉義人，父親劉闊據說是阿里山最後一任山地「通事」。劉明上面有三個哥哥，他排名第四，原名劉傳明。大哥叫劉再生，在嘉義經營全振山山產店。二哥劉傳能，在大陸很活躍，是進步分子，曾以澳門為中心辦過報紙，和國內進步運動和有名人物如梁寒操、徐復觀等都很熟，去過上海也一時去了日本。三哥劉傳來是眼科醫生，在日據期曾經參加過楊肇嘉等人領導的「台灣自治聯盟」，光復後當選台灣省參議會參議員，



呂赫若。

後來當選國大代表。劉明回台後，經過兄長的協助，向基隆顏家承租台陽礦區，在九份大粗坑經營金礦開採，應用他所學的化工知識精煉冶金，結果使振山實業社（這一「振山」二字是我替劉明取的）賺大錢而發跡。他進而在新店、三貂嶺等地租下礦權，大規模經營煤礦，光復後成為台灣省煤礦公會理事長以及石炭調節委員會主委。

成為礦業鉅子後的劉明，一貫急公好義，任俠行善，對朋友慷慨，熱心捐助文化、教育事業，還協助創辦延平學院、開南中學，支持「台陽美展」等等。他常常資助朋友，譬如我當參政員常去上海南京，他會包大紅包給我，說在那邊可急用，有人需要也可幫助。他也資助蔡培火，更資助互稱「親家」的蕭坤裕，蔡培火曾對我說：「劉明仙給我的只是『鼻屎大』，給蕭坤裕的更多。」

涉「光明報」案，卻以「台盟」案判刑

劉明資助蕭坤裕經營的印刷廠叫大安印刷廠（位於現在的忠孝東路和八德路口）；那時候，文學家呂赫若也變賣了台中家鄉的財產去辦這家印刷廠，許多有理想的青年都投入其中。一九四八年底國共內戰形勢逆轉，印刷廠開始印地下報紙《光明報》向社會各階層廣為發送。

一九四九年下半年開始，白色恐怖襲來，九月，保安司令部特務先查獲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及老師編印的《光明報》，案情急速擴大，蕭坤裕先被抓，接著牽連劉明被抓。不知何故，後來保安司令部並沒有以涉「光明報」案，而以參與「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罪名判刑。同案的有劉明、蕭坤裕，還有「石炭調節委員會」的兩位祕書，其中一位是作家吳坤煌；另外一位，是在劉明安排下擔任「台灣省工藝品生產推行委員會」委員的詩人、評論家王白淵。蕭坤裕被判最重十五年、劉明和吳坤煌各十年、王白淵兩年。

奔走救援

劉明被抓後，大家都很恐懼，誰都不敢上門，我到振山實業社去要大家鎮定。他的太太和兄弟四處奔走救援，耗盡家財，聽說送了不少金條。他的三哥劉傳來，來找我設法營救。我帶他去找游瀾堅，游也熱心幫忙，三人搭市長車去找特務頭子毛人鳳，我當面向毛說：劉明是受台灣人敬愛的人，如果被判重刑，對台灣影響很壞，請你多方考慮；游瀾堅也為劉明說了話。結果劉明被判十年黑牢，雖然免於一死，但所有的家產遭沒收，事業也一蹶不振。大約在一九五三年，劉明在保外就醫中父親過世，悔恨無法回去奔喪，我和他親如兄弟，就代替他以老四的身分弔祭其父。

劉明足足被關了十年。出來後，曾想東山再起，但都沒有成功。他是祖國派，認為民族

不能分裂。他知道我回大陸，就說：告訴陳逸松，我有錢也會弄條船偷渡過去！晚年，在解嚴前後，他捐助並參與《遠望》雜誌，聯絡全省各地政治受難人成立「互助會」，和周合源一起推動中國統一事業，一時和新潮流派對立。他也支持黨外民主運動，曾經為蔡有全、許曹德案走上街頭。

二、蕭坤裕——思想水平最高的馬克思主義者

社會科學研究部的講師

蕭坤裕，南投人，家裡開布店。他比我大二、三歲，算是蘇新的前輩。他在讀日本中央大學法學部時，我剛進入東京帝大，同樣是社會科學研究部的成員。記得我到他住處時看到他托爾斯泰全集，他對托爾斯泰的生平和每一篇作品都有很深入的研究；一般人看小說都抱著有趣的心情讀一讀，但他不是，他還深入研究考據。他不但是托爾斯泰專家，更熟讀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這使我大開眼界，對他十分佩服。他腦筋好，又聰明，可惜不愛寫東西。後來，洪敦南太太常稱讚他，說這個人真可惜，他的腦筋之好台灣人當中少有，卻沒留下一點文字。

在社會科學研究部中，蕭坤裕和蘇新都屬於講師級（Lecturer）的人。比如，他向大家講解馬

克思的一本經典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時，還深入分析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二年間法國社會政治革命的情形，大家都認真學習，好像在讀大學的政治經濟學，還有許多註解和引申。蕭最好的朋友是他南投的同鄉張宗田醫師，那時張宗田的母親到日本陪兒子，給兒子煮飯，蕭也一起吃。張的母親纏腳，平時不敢出門，否則日本人一定會盯著看，所以幾乎待在家裡煮三餐給孩子吃。「四·一六」事件日警對共產黨大檢肅之前蘇新跑回台灣，我在事件中被抓，蕭好像沒被抓，之後就沒再見面，他何時離開東京，我不清楚。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台灣光復後，他從大陸回台，曾經暫時住在我家，大家談及前塵往事不勝唏噓，他告訴我離開東京以後到中國大陸的經歷。

回祖國教書

當時有很多台灣人回祖國教日文，蕭坤裕也到南京軍官學校教日文，也教些政治學。不幸，被國民黨特務組職藍衣社的人懷疑是日本間諜，把他抓起來審訊。他告訴特務說：台灣人被日本人欺侮才不得已到日本留學，在日本我搞思想啟蒙運動反抗日本，畢業後心懷祖國才回來教書，怎麼會是日本間諜呢？特務聽了很感動，就把他放了。但釋放時把他雙手反綁蒙住雙眼，用車載到山上繞了一大圈後才把他推下車。下車後已深夜四處無人，只有等到天亮，剛好有一農夫出門工作看到他，才把他鬆綁放了。蕭以此經歷告訴我，許多台灣人回祖

國大陸工作，經常會被懷疑是日本間諜，但只要據理力爭，也不一定會冤枉你。

他歷險後就不再教書，跑去大連投靠開醫院的好友張宗田，後來隨張宗田全家搬到北平，在北平認識一女護士並戀愛結婚。光復後回台灣先暫住我家樓上，記得他和太太抱著老大回來。後來張宗田在松山附近買了房子，他就搬去和張同住，蕭和張兩人是同鄉又是十幾年的好朋友，友情已到了無分彼此的程度。不久，蕭自己也在松山買了房子。

涉「光明報」案卻以「台盟」案判刑十五年，後遭槍決

蕭和劉明在東京讀書時就很好，親密到互稱「親家」，每次兩人見面都互叫：「親家喂！」蕭回台後不久，就到劉明的振山實業社上班。大約在一九四八年底，蕭和呂赫若一起開設大安印刷所，該印刷所主要由劉明出錢，曾出版一些書籍，後來發行地下刊物《光明報》，此為中共台省工委會系統刊物，一九四九年未遭保安司令部破獲，蕭和其他許多人被捕，史稱「光明報事件」。然而，蕭坤裕卻沒有被以「光明報」案入罪，而與劉明一起以涉「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案處刑，遭判刑十五年，但後來卻被處死。其經過是這樣的：一九五七年，周恩來發表了「和平解放台灣」的言論，就在這年夏天，國民黨當局秘密處決了三十四名非死刑的政治思想犯，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屠殺事件，蕭坤裕在同事件中仆倒刑場。聽說當時美國竭力反對台灣和大陸進行和談，蔣氏為向美國表示反共決心，遂下令槍殺大批政治犯。奈

何，一個熱愛祖國、思想進步的人，竟死於國共內戰和美國冷戰的槍下。

蕭坤裕是一個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台灣人中他算是研究馬克思主義最深入的。劉明曾說過：「台灣人很少像蕭這麼偉大的！」我看他這人很了不起，在東京學生時代他的思想水平就很高，主張也很前進、很強烈。他最親密的朋友張宗田醫師的太太曾經說過：蕭坤裕實在很聰明，他說的話如果能寫成文章該多好！我曾鼓勵他寫文章，不知為什麼他都沒寫，真可惜！

生死因緣

聽說，蕭出事後情治人員就住進他家，只要誰來找蕭就一併抓起來。因為這個緣故，蕭的小姨子嫁給了保密局的人。蕭育有二兒一女，兩兒在台灣，聽說有一個做事業很成功。女兒蕭梅在她父親被抓的時候還小，光復後蕭坤裕從大陸帶回來時才三歲，父親被抓去後，由阿姨扶養長大。成人後，她嫁給姓耿的外省人，公公叫耿幼麟¹，耿晚年回北京定居，當過政協委員，真巧就住在我們同一棟樓。蕭坤裕女兒向其公婆說：聽哥哥說，我們的恩人陳逸松先生也去了北京，到了北京請打聽看看。她公公就向統戰部的人說要找陳逸松，找來找去，竟然就住在同一樓的隔壁。蕭的女兒後來改名耿田梅，一九八三年來北京找我，感謝我在她父親被捕後照顧其全家，她現在美國亞特蘭大教書。唉！人世間意想不到的事真多，風雲變

幻，生死因緣，誰知道呢？

三、辜嚴碧霞——文化才女

我還記得很清楚，當時為了《光明報》的事，呂赫若來找我，說他要到日本去請我接管大安印刷所，我因律師業務忙碌沒心力去管理，就推辭了。後來聽說呂去找辜嚴碧霞幫忙，她接受了，就派人去管理，結果辜嚴因涉「光明報」案被特務抓去，遭判刑五年。被囚禁在靠近台北橋的保密局「北所」，所謂「北所」就是辜嚴碧霞被保密局沒收的家業「高砂鐵工廠」。

辜嚴碧霞（一九一四——二〇〇〇）出身三峽書香門第，台北第三高女畢業後嫁給辜顯榮之子辜岳甫。岳甫病逝於一九三六年，接著辜顯榮於次年過世，辜家分產後，辜嚴碧霞接掌「高砂鐵工廠」，是當時有名的「女社長」。她獨力撫養子女，治家甚嚴。同時她也是一個文化才女，曾於一九四二年出版自傳式小說《流》，與呂赫若等文藝家多所往來。我也曾經擔任過她的法律顧問，沒想到她因藝文而身陷囹圄，且喪盡家產。

她有一個弟弟叫顏永賢，在一九三六年就讀北二中時，曾與同學共組「列星會」，講求

1 耿幼麟，原名耿蘊平，前國民黨後勤總司令部第五補給區司令。在台二十多年後移居美國，在美國住了十幾年後，於一九七九年前後回北京，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其妻名徐梅如。蕭坤裕的女兒蕭梅為其三媳婦。

台灣脫離日本統治，遭日警檢舉判刑。光復後，他曾擔任我主辦的《政經報》編輯委員，二二八逃到大陸後改名顏光，住在上海。我在大陸時，曾找過他兩、三次，經常書信往來。後來他全家移民巴西，晚年曾回台數次，後定居台灣。

第八章

一九六五年——痛失三位文化英才

一九六五年，對我來說，是難忘的一年。不知是巧合還是天命，我的三位好朋友，也是台灣文化界的重要旗手，竟然接連著溘世，離開了我們。而且，恰好在我競選台北市長失利的第二年，正是心情低落的時候。

先是王井泉在五月十九日去世。接著，王白淵在剛寫完悼念王井泉的文章且還來不及看到刊登的時候，就在十月三日走完他的荊棘之路；而我尊敬的文明批評家張深切，也竟然在十一月八日走了。他們的過世，等於台灣從日據的大正、昭和到光復後這個崎嶇時代的重要文化旗手的隕落，一個世代精神的告別。

我與他們相交相知，他們的早隕使我備感孤寂。這一切，應該從我的藝術觀說起。

一、我的藝術觀

我就讀岡山六高時，除了參加社會科學研究的社團之外，就是迷上了日本的「新劇」，經常從岡山搭十六、七小時的火車到東京築地小劇場看「新劇」。因為新劇表現了社會底層的感情和反抗以及日本左翼的思想，這與當時日本的時代背景和思潮有關。一戰後，日本資本主義經歷了一次大飛躍，形成了以三井、住友、三菱等五大財閥壟斷的局面，這增強了對都市勞工和農村佃農的盤剝，我目睹了日本紡織女工的哀歌和底層民眾的貧困。在大正民主期勃興的左翼和自由民權思潮的薰陶下，我遂漸傾向左翼的進步思想又兼具自由民權的人道主義情懷，與只講階級鬥爭的馬克思主義有所不同的地方。我主張社會改革和革新，要節制資本和追求社會平等，與孫文思想比較接近。後來流行一種看法，以為不是馬克思主義就不是進步思想，其實沒那回事，馬克思主義只不過是社會主義思想的一部分。

我喜歡戲劇、文學甚至繪畫，就像我除了法律專業之外還廣涉政治、經濟、歷史等學問一樣。我認為文化是改變政治經濟的助力，雖然對現時的政治經濟影響力並不那麼直接，但長遠來看文化的影響力較深遠，說不定比政治經濟的影響力量更大。

我一向主張藝術的社會性，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台灣文藝》主辦的「綜合藝術座談會」上，我有很明確的主張。在談到美術、音樂、演劇等台灣藝壇的問題時，我說：

所謂文化運動，如果與生活分開就不能堅強有力。我想各位當中有不少人在生活上或自己的藝術觀上主張藝術至上主義，然而不管何種藝術，其基礎必定該建立在社會生活上，所以從藝術和社會的關聯程度來看，就知道它是否受到社會支持。我很期望台灣的藝術家能關心社會，保持純正的藝術觀，創造對社會有所貢獻的藝術作品。

從日本回台從事律師工作後，我與台灣的文化界人士廣為來往，都從背後支持他們的文
化活動，自己比較少站在台前，一心想通過文化運動促進台灣人政治經濟地位的向上。

二、王井泉（一九〇五年——一九六五年）——值得永久紀念的人¹

山水亭——台灣文化界的梁山泊

在日本大東亞戰爭期間，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古井兄籌劃很久的純台灣菜館「山水亭」在大稻埕太平町二丁目誕生了。由於古井兄「總站在台灣人的立場來想，求台灣人的社會地

¹ 本節引號內的引文，全取自陳逸松先生在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寫的悼念長文〈大稻埕貳拾年小史之一頁——山水亭王先生逸事〉。

位對日本人的迫近、平等或能超過日本人為目標」的性格，聚集了許多有理想有創作力有批判膽識的文化仙，山水亭成了當時島都文化界的「梁山泊」。以此為中心展開了多彩多姿的文化活動。

當時「台灣人求進步，求現代化，不求被日本人同化，亦不想做日本皇民，這是昭和年代的台灣知識分子所堅持的原則。凡是處在殖民地待遇的任何民族，任何人都會抱這個原則。只有少數口說仁義道德心懷鬼胎的小夥子才會去當御用紳士。」因此，在皇民運動的壓力下，主要通過展現台灣的文化氣息去對抗皇民文化，山水亭發揮了很重要的精神凝集中心。

創刊《台灣文學》

首先，我們從文學著手。在一九四一年創刊，一直出版到一九四三年的《台灣文學》季刊，就是在山水亭這個文化舞台上演的。當時「我這個常想給日本人看看顏色的『手槍囡仔』（台語：搗蛋鬼）」提起了勇氣出資，找張文環和王井泉一起出版，主要想與皇民文學總管的《文藝台灣》打對台。一時許多不滿西川滿日本至上主義一幫的日本文化人，如坂口禊子、金關丈夫、中村哲等，都來我們的《台灣文學》投稿。

台灣色彩濃厚的〈閩雞〉對抗皇民化



王井泉遺墨「誠」字。
(吳南圖提供)

接著，王井泉與林博秋、林庸共同組成了一「厚生演劇研究社」。這個「厚生」的名字是我取的，我特別喜愛這二字，意指希望大家生活豐裕（一九五二年我與徐朝風合組的一「厚生橡膠公司」，也有此緣由）。一九四三年八月，我們推出了一幕由張文環小說〈閩雞〉改編的現代劇（由林博秋編劇）。這是一幕台灣色彩濃厚的戲，在皇民化下禁止穿台灣衫講台灣話的時候，我們一起討論「如何把日本總督府要使台灣人忘記自己是台灣人的政策予以諷刺，用『鼓吹』、『十音』的鄉土音律來表示心底的共鳴來打擊，大家講到上午（凌晨）一、二點才散會。」，「今日想起來，日本軍閥政治下的台灣，尚且台灣人都想出一套手法來保持心奧的鄉愁，實在台灣人太可憐了。」

「古井兄與我時常相顧而笑，有時笑到腹痛肚酸。」

「文環兄關於這一點也與古井兄一樣，他寫的〈閩雞〉一劇是描寫台灣農村中農家的日常生活，毫無稀奇之處，但他描寫出台灣人古老的音樂的世界，台灣人舊來的服裝，古怪青藍的台灣色彩，落後但保留著好處的台灣習慣，這些都是日本人掩目不敢正視的幻象，同時也是現代台灣人知識分子雖在心底並不讚美但都偏偏要給日本人看看聽聽，使其反省殖民地政策之愚（蠢）的東西。」

該劇特別以表現台灣人獨特的生活習俗和色彩，對抗日人的「演劇挺身隊」和皇民奉公

外圍劇團「台灣演劇協會」。我們這個「厚生演劇社」的確有繼承左翼的進步思想，但畢竟與馬克思主義不同。

慷慨樂施、嫉惡如仇的王井泉

那時，古井嫂很辛苦，整個劇團團員都在山水亭的二、三樓吃住，要為團員洗衣煮飯，還要為演出製作道具縫製衣服，古井嫂任勞任怨，毫無怨言。古井這文化仙，有錢時，隨便朋友吃，沒錢時，吃朋友，彼此沒計較。嫁女兒時，他向朋友宣布：「要嫁女兒囉！你買衣櫃，你買大鐘……」大家分配，共襄盛舉，比公社更進步，我分配到買桌椅。他慷慨樂施，但嫉惡如仇，最不齒對權貴阿諛逢迎之輩。

古井兄「熱心文化藝術，但他是用自己的經濟力量盡力來做的，有時候對一些只求自己出名不顧一切，或從藝術文化工作上想撈出一筆錢，或不顧情義只想取得剩餘價值的文化人，他常常搖頭嘆息或破口大罵……他最痛恨有些文化人，只會批評他人而自己的缺點都不自覺，自吹自擂以終日的。或捧場有幾個臭錢而違反民族社會利益得來地位的罪人，竊據分羹分贓的文化，對這些下流，古井只是髮指噴血怒目踢腳的。他有時開口發出『馬鹿野郎』或用短短一句『畜生』，就是對付這類文化人的。」

「古井只抱著一顆沉重多憂多憤的心，度過日本軍閥支配下的七、八年，在台北與進步

的台灣人知識分子共嘗甘苦，同時也在精神上想排除異日民族戰爭成功時，只顧自己的升天不顧自己在地獄的同胞的『小伶俐』『小聰明』的幾個文化仙，在當時就不客氣地明諷暗刺，時常搖頭大罵。」

艱苦的日子

光復後古井重燃熱情，曾經組織「人人演劇研究會」，但沒有出色表現。戰後經濟蕭條，古井很固執，一定要保持台灣菜的風味，而外省人喜歡味道重的，因而逐漸經營困難。一九五三年因租金太貴，山水亭從延平北路（太平町二丁目）遷移到民生東路，「波麗露」旁邊，兩年後就收起來了。完成了山水亭從一九三八年以來，十五年間扮演台北文化中心舞台的角色。古井一家搬到唹哩岸去住，沒工作經濟陷入困境。那時，我的事務所在長安西路，不遠的中山北路有一家雅典照像館，與古井很好，我每個月都拿三百元託照像館轉交給古井，幫他脫離困境，此事大約持續有一年之久。後來辜偉甫用古井的名字買下現在的榮星花園這塊農地，請古井管理花園，古井就一直住在裡面的一間「寮仔厝」（農舍），直到終老。

一九六五年五月，正是春夏之交，古井突然腦溢血倒下去，二度中風，緊急入台大醫院。他兒子王古勳打電話來說父親倒下去了，我急忙趕到醫院，看他躺在床上已不省人事，只有兒子陪他，沒想到他就在醫院去世了，年不過六十一歲。我們將他運回家，他住在當時還未開發

的榮星花園中一間「寮仔厝」，葬式就在那裡舉行。辜偉甫、王白淵、王昶雄、張文環……所有的文化大仙都來了，古井躺在床上用棉被蓋住，旁邊古井嫂、兒子古勳不停的哭，大家勸她別再哭了，死都死了，沒辦法了。偉甫帶來一瓶白蘭地，我們準備一個杯子給古井酌上一杯，我說：「古井，起來喝一杯吧！」大家聽我這麼一說，原來喪氣的臉元氣都來了，都大聲叫說：「古井！起來吧！」人都死了還叫他起來呢！我苦笑說：「好吧！大家來喝一杯吧！」這是古井去世的情景，文化大仙以獨特的葬式送他。那幾天，我天天到「寮仔厝」去看他。

「三王」是指王白淵、王昶雄和王井泉，前一王很愛說笑話。王井泉去世後，我半開玩笑說：「白淵啊！你們都姓王，你們三王會不會相偕而去呢？」王白淵回說：「說三八話，別開這種玩笑！」我嘆息說：「生與死差不多了！」沒想到這句話是個不祥之兆，不過幾個月，王白淵果真去了。三王去了兩個後，只剩下王昶雄，每見到他我就跟他開玩笑說：「你怎麼還沒去呢？」說著說著，與王昶雄已經二、三十年不見了，他還活得好好的，十分活躍，還為民進黨創作流行歌呢！唉！真是天命哪！

值得永久紀念的人

「王井泉先生是昭和初年就在大稻埕過其不平凡的『台灣人生活』，他始終一貫保持台灣人的矜持自重，亦抱著與台灣人同生共死的一種崇高的人生觀，忍苦耐勞為人服務而不自

誇，為台灣青年們不惜其辛辣無比的批評，同時盡其無微不至的親切，自己的一碗飯分做三碗與青年文化人分甘，同過其艱苦的生涯。」

「王井泉君值得在台灣文化史中永久紀念其存在的人。我們後死者應該把他記錄起來，留於後世在此生活的可憐蟲們，做為鼓舞其勇氣的力量。」

三、王白淵（一九〇二年——一九六五年）——荆棘的道路

初識王白淵是在一九二九年三、四月間，我剛入東京帝大前後。當時，我剛到東京，由於台灣青年會的關係大家互相介紹，經常到處跑去找台灣的朋友，劉明也是在那時候認識的。有一位我岡山六高的後輩蘇乘龍，是汐止人，他的哥哥是東京高工的學生與王白淵認識。由於這關係，有一天我去蘇家時碰到了王白淵，記得那天晚上很冷，王白淵蓋著棉被坐在榻榻米上，那時他還在日本盛岡女子師範學校教書，他的著名詩集《棘の道》（荆棘的道路）還未出版。¹一九三二年他在東京和台灣知識人、留學生一同發起組織「台灣人文化社團」，但因成員參加反帝遊行被捕，間接受到牽連而被捕入獄，教職遭解聘。後來與張文環、吳坤煌、

¹ 該書在一九三一年六月一日出版。在他任教的日本盛岡市印刷，發行所為久保庄書店，王白淵兼任發行人。很可能是王白淵自費出版。

巫永福等籌組「台灣藝術研究會」，出版了《福爾摩沙》雜誌。一九三三年夏天，他受到好友謝春木的鼓勵轉赴上海，任職華聯通訊社（翻譯日本廣播電台之日本消息交予中國有關機關）並獲聘上海美專教書。一九三七年，上海爆發八一三事變，日軍發動第二次淞滬戰爭，王白淵遭日軍逮捕押送回台，被判八年徒刑。服刑六年出獄後，來找我幫忙，他說自己的武器只有一枝筆，沒有其他能力，我就通過當時的保安課長後藤介紹他到《台灣日日新報》擔任編輯。

光復後，原來他任職的《台灣新報》（《台灣日日新報》及其他報紙合併後的名稱），由李萬居接收並改名《台灣新生報》，他擔任編輯部主任。此期間，得識幫忙校對的倪雲娥小姐並結為夫妻。他在我的《政經報》上發表了好幾篇文章，還寫了一篇社論。現在回想起來，有一件令我很佩服的事，日本剛投降不久我要組織三青團時，叫王白淵來說：我們大家一起來給他「武」（按：捲起袖子一起幹）。他直搖頭說：嗨！國內三青團是國民黨的特務組織，就是做國民黨的耳目，要監視年輕人的。我說：我們來做的話，不會變成這樣，我們要做青年運動而已。結果他沒有參加，後來事實證明他的預言是對的。然而，當時張士德向我說明台灣三青團是要使國民黨重生的，我也照這麼做了，走了進步的路線，全省進步的知識分子幾乎都加入了，包括楊逵、林日高、呂赫若等。

在二二八事件中，王白淵被牽連入獄一百天，一九五〇年又因劉明、蕭坤裕案被判刑二年。後來時常遭情治人員監視、傳喚或短期拘留。一九六三年再度遭牽連入獄，出獄後因腎

結石延誤就醫導致尿毒症，一九六五年十月三日病逝台大醫院。過世前，他還寫了一篇悼念王井泉的文章〈文化先覺王井泉的回憶〉。我們剛好在五月辦完古井的喪事，大家沉重心情未褪的時候，又遽聞白淵過世，台北文化大仙都情急相告，很快組成了治喪委員會，推舉王白淵至友謝東閔擔任主任委員，悼聯為「抗暴圖強孤島長留典範，披荊斬棘文壇痛失先驅」。八日，在市立殯儀館餐廳舉辦惜別晚餐會，由「三王」的最後一王王昶雄主持。大家發表了哀思，我說：「白淵兄做人平和，對生死不在乎，對於富貴更不足道，不畏強暴，保持了浩然之氣、正氣之道了。他是一個文弱書生，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台灣的壓迫，他是絕對不屈服的，始終一貫保持了民族精神，祈求和平與平等，我們要學白淵兄，繼續保持這種精神才好。」我把他的詩集《棘の道》放在他靈前，吟誦了他在上海時寫的一首詩〈給印度人〉：

繁華的列強租界大街上

戒備森嚴的銀行大門前

……

我們看見 我們看見

全副武裝的印度兄弟

白巾盤繞著黑臉

大英帝國的走狗

上海的要地你們無處不出沒

噢！印度人啊！世界的看門奴

……

你為誰武裝 為誰工作

……

你的槍口對準著誰的胸膛？

這首詩使用上海租界常見的印度人看門人為體裁，鮮明地表現了帝國主義怎樣利用奴隸當管理人，壓迫弱小民族的圖景。讀了令人省悟到眼前荊棘的路還很漫長。王白淵就是在荊棘中倒下去的。王白淵一生坐過四次牢，日據一次，光復後三次，總共大約十年之長。罪名分別為「污辱國體」、「貽害青年」、「叛亂罪嫌」、「知情不報」，看來王白淵的荊棘之道，我們還得繼續走下去。¹

1 最後一位同在一九六五年過世的文化界英才，是有名的張深切先生。在前面第六章已經有與他相關的記述。

參選台北市長 · 環遊世界（一九六四年——一九六八年）

一、參選台北市長失利——初嘗選舉的苦果

一九六四年二月，法國總統戴高樂與中國建交，國際譁然。這事件使在台灣的國民政府外交上受到極大的衝擊，慌亂不知所措，在國際上愈顯孤立。台灣社會則充滿濃厚的不安和瀰漫無望的氣氛。當時我有一個想法：在這局面下，國民政府遲早會走，萬一國民政府走了，台北市政府所有的財產都會被帶走，這樣台灣人民的損失會很嚴重。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要如何防止財產被帶走，我想除了爭取市長之職外，別無他法，這確實是我當時想出來選台北市長的動機——保住台北市的財產，不要被那些官僚帶走。現在看來，當時的想法的確有點天真。

決定出來之前，我曾經找林水泉、黃信介等年輕人談有意出來競選的事，他們笑我說：

你以前從來不投票，現在要人投票給你，這就不對了。我過去不投票，是因為那種選舉是錯誤的，這次要出來競選的根本動機，是看到法國承認中共，這表示中國已成了世界大國，接著許多國家一定會跟在法國後面承認中共，國民黨政府可能會在聯合國站不住腳，國民黨會亂會支持不住。從過去國民黨在內戰中遷逃的歷史來看，國民黨若垮台可能會把台灣的財產搬到美國或南美去。為保護台灣的財產，我要出來競選台北市長。他們還是不了解我要出來競選的動機，結果林水泉跑去替高玉樹助選了。

當時我離開政界已近十年，這期間我看政府亂糟糟，台灣人也沒有統一的意志要去改變現況，因此對台灣的政治根本不太關心。然而，大稻埕一帶的老一輩人，都支持我出來。主要是中產階級知識分子或是商人的上流階層；他們和我相處了數十年，知道我在日據期有能力和意志出來抵抗日本人，因此集中起來擁護我出來對抗國民黨。永樂町的幾個老朋友，在二月間就開始活動。在舊曆過年中就用紅紙寫上「恭賀新年 陳逸松」到處張貼，向市民拜年。這些朋友早已準備抬我出來競選，我只好答應出來搞看看。除了大稻埕的人馬之外，還有師大畢業的謝宗雄（北港人）也帶一群人來，淡水也一群人，這樣各路人馬匯集起來很熱鬧，競選就這樣動起來了。競選總部設在洪敦南的事務所，當時他做股票和開唱片行，在郵政總局與博愛路口。競選總幹事由許尚文擔任，他是大稻埕一帶很有人面的人。那時我經濟不好，沒拿什麼錢出來，本來想不花一毛錢，只靠演說和大学生、知識分子的幫助，打一場乾淨的選戰。

我的競選政綱和政見

我正式提出的競選政綱是：

- 一、保障人民之生活福利
- 二、實行「簡政主義」，改革目前行政上之各種繁複手續程序，便民利民。
- 三、根據憲法力爭縣市政府應有之人事、財政、警衛三權。
- 四、取締流氓辦法在未完成立法程序前暫停執行。

競選政見是：

- 一、建設台北市為世界標準都市，或為東亞民主自由之燈塔。
- 二、整頓交通使其立體化，減少平交道多建天橋隧道。
- 三、防洪以疏導為先，與台北縣聯合整治淡水河基隆河，以免顧此失彼。
- 四、組織各級學校家長會聯合會，統籌福利金安定教職員生活，禁止惡性補習。
- 五、改善警察稅務人員服務態度，以身作則建立可親可愛之台北市政府。
- 六、市有房地出租或被占有者盡速依法標售。
- 七、市營事業應力求改善，非必要者盡速開放民營以利民生。
- 八、勉勵市民要有大國民風度，守法、守時、守信，尊重公共衛生愛護公共設施，謙恭

縣市長候選人競選活動今日開始

止截晚日五廿至天十期爲
人選候勉督卿錫陳
約節法守須必選競

縣市長候選人名單 各縣市同時公告

【本報訊】省選委員會，於昨(十五)日，將各縣市長候選人名單，同時公告。計：基隆、新竹、苗栗、彰化、南投、雲林、嘉義、台南、高雄、屏東、澎湖、金門、馬祖、共十四個縣市長候選人。名單如下：
基隆：陳錫卿、陳勉、陳節、陳守、陳選、陳競。
新竹：陳錫卿、陳勉、陳節、陳守、陳選、陳競。
苗栗：陳錫卿、陳勉、陳節、陳守、陳選、陳競。
彰化：陳錫卿、陳勉、陳節、陳守、陳選、陳競。
南投：陳錫卿、陳勉、陳節、陳守、陳選、陳競。
雲林：陳錫卿、陳勉、陳節、陳守、陳選、陳競。
嘉義：陳錫卿、陳勉、陳節、陳守、陳選、陳競。
台南：陳錫卿、陳勉、陳節、陳守、陳選、陳競。
高雄：陳錫卿、陳勉、陳節、陳守、陳選、陳競。
屏東：陳錫卿、陳勉、陳節、陳守、陳選、陳競。
澎湖：陳錫卿、陳勉、陳節、陳守、陳選、陳競。
金門：陳錫卿、陳勉、陳節、陳守、陳選、陳競。
馬祖：陳錫卿、陳勉、陳節、陳守、陳選、陳競。

違法競選活動將受國法制裁

起球昨飭令各地檢察處
密切注意各項競選活動

【本報訊】省選委員會，昨(十五)日，向各地檢察處，分發「關於違犯國法競選活動之法律制裁」通知，請各處檢察官，密切注意各項競選活動，如有違犯國法者，應即依法究辦，以維國法之尊嚴。

選舉宣傳

選舉宣傳，應注意之事項：
一、不得以暴力、脅迫、賄賂、欺詐等非法手段，從事選舉宣傳。
二、不得以謊言、虛假事實，從事選舉宣傳。
三、不得以侮辱、謾罵、污蔑等行為，從事選舉宣傳。
四、不得以煽動、挑撥、離間等行為，從事選舉宣傳。
五、不得以非法集會、遊行、示威等行為，從事選舉宣傳。

誰是臺北市好公僕

簡介第五屆市公僕候選人政見

【本報訊】第五屆臺北市公僕候選人，政見如下：
周百鍊：主張改善民生，加強治安，發展經濟。
高王樹：主張改善教育，加強交通，發展文化。
李建生：主張改善衛生，加強環保，發展科技。
陳逸松：主張改善社會福利，加強就業，發展社會主義。
李登源：主張改善勞工權益，加強勞工教育，發展勞工運動。

農工各界均認好市長

各界人士均認好市長
競選活動大受歡迎

【本報訊】農工各界，對此次縣市長競選活動，均表極大興趣，並認此次競選活動，將使地方政治，更趨民主化。

本市五候選人助選員已聘定

內政部派員將赴各地
指導選舉

【本報訊】內政部，已派員赴各地，指導此次縣市長競選活動，並聘定本市五候選人助選員。

關渡居民順利搬遷

拓寬工程隨即展開
興建雙溪堤防定今日動工

【本報訊】關渡居民，已順利搬遷，拓寬工程，隨即展開，興建雙溪堤防，定於今日動工。

本省農業日益進步

農村欣欣向榮農民生活改善
農產依據實況提出統計數字

【本報訊】本省農業，日益進步，農村欣欣向榮，農民生活改善，農產依據實況提出統計數字。

利令大撈鈔票

智昏不顧人命
刑警破獲賭博案

【本報訊】刑警，破獲賭博案，利令大撈鈔票，智昏不顧人命。



陳逸松



李登源



李建生



高王樹



周百鍊

預防小兒麻疹疫苗

衛生處昨舉行研討會

【本報訊】衛生處，昨(十五)日，舉行研討會，預防小兒麻疹疫苗。

澳門新設賭地

宣布為實地

【本報訊】澳門，新設賭地，宣布為實地。

今日天氣

國父紀念館
文化學藝界

【本報訊】今日天氣，國父紀念館，文化學藝界。

1964年4月16日《台灣新生報》，刊載競選政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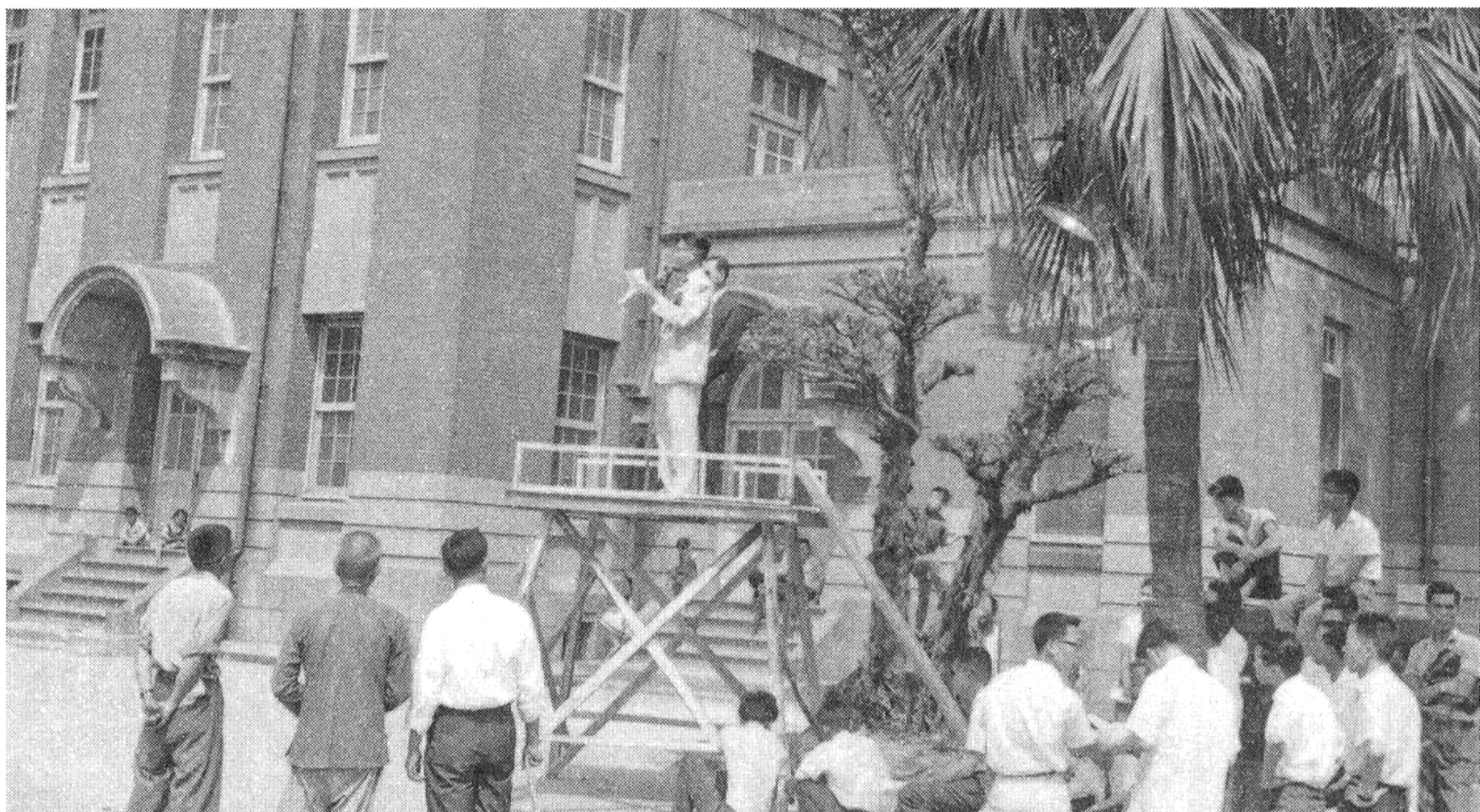
禮讓。

九、其餘政見因限五百字無法詳載，請聽競選演說。¹

我的政見主要集中攻擊國民黨政府，批評國民黨虛偽，口說自由民主卻完全沒自由也不民主，我們要戳破它的虛偽面貌。我主張解除戒嚴令，當時沒有人敢說，大家都怕死了，誰敢說？我是第一個說出來的。我說世界上沒看過這麼長期的戒嚴令，一般是臨戰地區或緊急狀態才需要實施戒嚴，台灣根本沒有戰爭，這兩種條件都沒有，不應該實施戒嚴，要盡快解除，還政於民，實施民主政治。在市政上，我主張建一條陸橋打通重慶南北路，高玉樹則主張車站前面造一陸橋打通東西道路。

高玉樹當選過一次市長，後來和黃啟瑞競選失利。這次國民黨提名周百鍊，他要出來又不出來，一直不表態。在正式登記之前，我曾到他家拜訪，記得他家在大正街三條通口的一幢日式房子。我去時高玉樹、楊玉城兩兄弟出來見面。我說要打敗國民黨提名的周百鍊，民間的力量不能分散，一定要集中。我問他說：你要出來嗎？他回說：我不出來，不出來，聽說你要出來，由你出來就好。我說：你要實說，我可以讓你，要是你要我出來，我出來就不會退。他客氣說：不會不會，你放心，我會全力幫助你的。話猶在耳，結果他在候選人登記

¹ 參閱《台灣新生報》，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六日，第三版〈誰是台北市好公僕——簡介第五屆市長候選人政見〉。



1964年4月，陳逸松競選台北市長時發表政見。

截止的最後五分鐘出面登記了。選局成了周百鍊、李銓源、高玉樹、李建生和陳逸松五人廝殺的場面。高玉樹違背承諾出來，分散了非國民黨的民間票源，我早已註定勝利無望。

競選期間主要是跑演講會，一天三場，早中晚，講到喉嚨都沙啞了，靠喝中藥膨大海支撐。最可怕的是，競選白熱化後各種流氓「奧步」都出來了；派人來搓湯圓的，恐嚇總幹事的，威脅助選員，甚至監視競選總部出入的人，跟蹤、恐嚇，無所不有。到了選戰收場深夜，開始散布謠言，說陳逸松和高玉樹談好了，退選了，各種打擊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結果反國民黨的票都跑到高玉樹那邊，我的紳士態度打不過流氓作風，最後只獲得三千多票而慘敗。自己花了幾十萬，加上朋友捐助五萬、十萬，總共用掉了一百多萬元。為了支付龐大花費，我賣掉了原持有的第一證券公司四分之一的股票，還不斷地跑支票，弄得精疲力竭，唉！真慘。原本立意要為

台灣人保護財產不被國民政府帶走的滿腔熱誠，完全被澆熄了。

選舉惡風

在投票日的前一天晚上，外面紛紛謠傳我接受了高玉樹向我提的四項交換條件，放棄競選（交換條件包括擔任市政府顧問、下屆市長他支持我等等）。許多親友和支持我的人都急著打電話來詢問。我嚴正聲明：

「我陳逸松不是那樣的小人，也不像別人那樣唾面自乾，沒有人格。我希望全市市民不要輕信無稽謠言，請大家支持我，投我一票，我絕對不會辜負諸位的期望。」¹

選戰到了最後幾天幾乎陷入了肉搏戰，大家互相揭底。從高雄老家趕來台北，為另一候選人李銑源助選的郭國基，二十二日晚在龍山寺邊演講時說：高玉樹是個度量狹窄的政客，五位市長候選人中，除了李建生是他御用的第二替身，利用他增加投票所推薦監票員，以及周百鍊是國民黨員外，其餘李銑源和陳逸松均是黨外人士。但高玉樹卻唯我獨尊的不讓別人競選，嫉妒他們兩位無黨無派的候選人，因此我終見不平，出面助選。²高玉樹明明是民社黨

1 《台灣新生報》，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第三版。

2 《台灣新生報》，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黨員，且經民社黨的領袖公開發表聲明支持，他卻偏不識抬舉要偽裝無黨無派人士，而否認他是民社黨員。

民主選舉是英美社會歷史智慧所產生的制度，到目前為止也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可取代，但唯一重要的是，選票不可被金錢或惡勢力所左右。依我這次的經驗來看，台灣的選舉不知不覺中被選舉「中間人」(broker)所操縱，而「中間人」也是在無意中去周轉錢，無形中被人慫恿而介入，因此選舉有如大拜拜，越炒越熱，要如何避免，我也沒有更好的辦法。總之，只有乾淨選舉才能充分反映民意，才是真正民主政治之路。

二、環遊世界之一——初識日美台獨

一九六七年九月，我排除萬難，到世界各地旅行了一年。光復後，自從在一九五七年第一次到日本採購機器之後，十年間我想出國都被國民黨卡住。每次申請都被退回，表面理由說申請不合規定，其實是怕我出去後講國民黨的壞話。這次，我以同泰化工董事長出國考查的理由，找了相當有地位的保人才核發護照給我，期限有十三個月。後來，保人向我太太說：「你一定要叫陳先生回來，不然要害慘很多人。」那時很多人出國就不回來了。我想國民黨動不動就刁難，我要趁這機會出去玩個痛快，且我已年近六十歲，我在年輕時就喜歡旅遊，趁走得動的時候到世界各處去看看，以償宿願。我賣了一個礦山拿了幾十萬，提著兩個行李

就出發了。九月四日，星期一，和我太太含淚揮別中，搭十三點二十分的日航飛離台北。一小時不到就抵達琉球那霸機場，有一日本人來接我，那人叫「多喜」，這人後來與台獨分子有關，當時我在日記中不敢寫，這事有必要先說明。

王育德和日台獨

我和王育德很早就認識，主要是因為他的哥哥王育霖與我很熟。王育霖是我東京帝大的後輩，在當新竹司法官時抓貪污很努力，有正義感，二二八期間被打死。王育德和邱永漢很好，兩人在二二八期間逃到香港再到日本。大概在我選完台北市長之後，王育德看到我公然反對國民黨，就託一位「多喜」的日本人，送一本他的著作《苦悶的台灣歷史》給我。這位「多喜」是日本靜岡人，娶琉球太太住在琉球，他做貿易常出入台灣，來台灣做生意也兼替王育德等傳達消息，所以他是一個中繼站。「多喜」共來台找我五、六次，他愛喝酒但不太談政治，可是一直說琉球應該獨立。我說：琉球這地方應該獨立哦！因為日本人看琉球人不起，而琉球一半以上的風俗習慣來自中國，姓氏也與日本不同，且中日之間也需要一個琉球這個獨立國家。「多喜」很同意我的主張，這樣我就成了琉球獨立運動的倡導者，這事如果讓日本人知道，一定會怪我在搞鬼。後來，一九七二年美國把琉球還給日本作為保有駐日美軍基地的條件，琉球距離獨立又更遠了。其實，琉球會不會獨立，要看中國的國力，中

國國力大就有可能，可是中國一直沒有那種力量。

王育德的書主要是寫台灣過去受「外來政權」的統治和欺侮，並沒有談到台灣獨立的問題，他寫作這本書時主要反國民黨，還沒有發展到台灣獨立的問題。這本書有一論點我不同意，那就是他稱讚辜顯榮，據說當時辜寬敏出錢支持他的《台灣青年》，所以筆下不敢罵還稱讚他。因為《台灣青年》雜誌沒有什麼人買，只有在東京神田的內山書店寄賣。後來我到日本都到內山書局去把它的舊期全買下來，所以我有全套。

之後我到日本，都會先到琉球，一方面是「多喜」的關係，另一方面是去找認識的救世教部長山根幸一。他在台灣傳教的時候得到我的幫助，成為好朋友。言歸正傳，我到琉球後的第二天，去看琉球古舞，再去當年太平洋戰爭時日軍進駐的「東堀」參觀，當年日軍牛島大將沉迷的琉球古酒很合我口味。在此我做了詞憑弔：

琉球戰跡

卅年又到琉球 欲逗留

戰後看來無跡 入壕溝

何所見？東西戰 何時休

豈是古來如此 罷貔貅¹

九月七日，我搭日航經福岡、大阪到東京羽田機場，王育德來接我（後來一九七二年八月我來日本時，也是他來接我的）。自從光復初年和他哥哥一起在山水亭上觀看迎國軍之後，這已是二十年後的見面了。當時王育德很尊敬我，可能是他想拿我這張牌子，可以做頭，這樣台獨就可以叫得更大聲。可是後來我去大陸之後，他就開始罵我，變成了敵人。這次的見面，被國民黨特務弄得怕的要死，日記也不敢記。見了王育德後，我又寫了一詞：

長相思

你佬清 我佬明 兩佬見面相默迎

誰知離別情

你淚潛 我淚盈 不堪回首話故城

雀隨烏鴉鳴

那時我有個感想，整個台灣不是烏鴉就是麻雀，吱吱喳喳的，各人都說自己有辦法。我對王育德說，你我都老了，你有很清楚的想法，我也有我明白的理念。

這次到日本見過戴國輝和劉進慶，他們都是東京大學的後輩，劉是學生會長。也見了黃

1 即不要戰爭之意。



美、日台獨運動者 1974 年在美國合影。左起蔡同榮、郭榮桔、張燦鎣、周焯明、黃昭堂。

昭堂、宋重陽（日本人），但沒見到高英傑。有一個金美齡請我去會館和一群學生討論，我問他們：「你們要台灣獨立嗎？」「是的！」我又問：「你們要如何獨立？」他們答：「依人民的意志就可獨立。」我說：「譬如沙鹿人說要成立一個沙鹿共和國，大家都同意了，這樣可以嗎？」他們答：「可以啊！」我說：「在田中間要獨立成共和國可以嗎？」金美齡回答說：「沒有關係啊！」

第二年，一九六八年，我要回台路過日本時，見到一個支持台獨的日本人遠山景久。他說：「台灣人只是口頭上說說而已，其實膽小如鼠，要暗殺蔣經國還不簡單，我一個旅館曾經看過他一個人，和我擦身而過，但台灣人膽小沒種！」他又說：「我援助台灣沒什麼野心或要求。」後來他說了一句話：「要是以後真的獨立建國，鐵路權利給我就

好，我沒有其他要求。」我心裡想，鐵路最重要了，怎麼會沒有什麼野心呢？這個人在開酒店並經營關東收音機公司，和我們碰過幾次面。後來王育德請我們吃飯，我偷偷對王說：「你們對那個遠山要注意，他說要是台獨成功，他要鐵路經營權呢！」王說：「哦！你見過他了？」

「他這樣講嗎？以後不要再見他了！」

在日本，拜訪了岡山六高的同學和老師。還去找林益謙（林呈祿之子，東大畢業）介紹了國際旅行社，為我安排世界旅行行程，開出了二十幾張機票，總共花了十萬元。就這樣，備妥了我的環球之旅。

初萌芽的美國台獨運動

在日本拿到了美國和加拿大的簽證後，十月十八日我離開日本，在夏威夷火奴魯魯玩了二、三天，二十一日飛西雅圖，然後到舊金山。到了舊金山，專程去柏克萊大學找一位國際關係的 Scarapino 教授。他是義大利裔的美國人，支持台灣人的獨立建國運動，台獨分子沒有一個人不認識他。大約在一九六六年，Scarapino 曾經和遠山景久進行了一次越洋電話的對談，談台灣問題，內容大概和王育德的主張一樣。對談刊登在日本的大報紙上，占很大的一個版面。兩個人一代表日本一代表美國，大談台灣獨立問題。當時我還在台灣，登刊對談的報紙是琉球的「多喜」拿來給我看的，給我很深的印象。我路途迢迢刻意到柏克萊去找他，

主要的目的是想進一步了解他支持台獨的動機，作為我思想的參考。深談後，給我的印象是他對國民黨政府極度不信任，國民黨政府曾拒絕他入境，他闖關不成被送回來，後來在美國國務院的協助下才進了台灣。總而言之，國民黨在台灣所作所為令人不服。後來，再也沒有聽到 Scarapino 和遠山景久再談支持台獨的話了。

後來我再到洛杉磯、匹茲堡等地，也到華盛頓 D.C. 去辦二十二個國家的簽證，只有葡萄牙沒有辦。

在華盛頓、芝加哥、紐約等地我都住 YMCA，會員價便宜，一天只要五、六美元，我一路上盡量節省。我進出紐約好幾次，曾住過台灣俱樂部，一晚只要一美元，睡地毯上，很多台灣人來紐約沒地方住都住這裡。

在紐約和張燦鑒、陳宏志這些年輕人見面，講了什麼不記得了，總之是罵國民黨，罵他們欺負台灣人。那時候國民黨還在戒嚴，只要被懷疑思想有問題的年輕人都會被抓，大家都活在恐懼中。而且，要出國也不容易，有些學生一上飛機就氣憤地吐一口痰，一進美國海關就撕掉護照，許多父親都交代孩子畢業後不要再回來。實際上，我離開台灣時也覺得台灣人無依無靠，沒有力量去對抗國民黨政府。那時候所謂的台獨，言論上在日本有一個《台灣青年》，但影響不大；在美國的台獨運動大約在我去紐約的時候才剛開始，那時他們才剛剛開始收集全美留學生的名冊，準備全美串聯，我也參與了收集名單的工作，還看到他們印發的第一本名冊。當時大家只是反國民黨，反對二二八後國民黨對台灣政治經濟政策的獨裁統治，

以及對台灣人的不平等措施，至於要如何對抗，那時還茫然不知。當時張燦鑒等人也不是那麼堅決，只是到了後來，許多年輕台灣人專家、教授出來了，有了社會力量，才愈來愈堅定。大家離開父母、家鄉旅居國外，又不敢回去，內心只有怨恨，久而久之從反國民黨走上了台獨的路。那時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有關大陸的消息，美國比較少日本比較多，大家對大陸尚未有惡感，甚至還希望大陸幫他們打倒國民黨；那時大家真的有那種期望，因為台灣人對國民黨無可奈何，自然寄望於大陸。而且，那時美國掀起了反越戰和民權運動的熱潮，到處充滿了反體制的激進思想，在這背景下，台獨運動從一九六七、六八年才開始成長起來。

廖文毅回台——英雄末路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四日，在日本搞台獨運動長達十五年的廖文毅，與國民黨政府談妥條件，聲明放棄台灣獨立運動回來台灣。當時黃朝琴在國賓飯店請他吃飯，另外找了幾個老朋友蔡培火、許金德還有我，大約七、八個人作陪。那晚，飯店戒備森嚴到處是特務警憲。老朋友離別十幾年後重逢，都高興萬分。大家談起光復初和羅萬俔、李萬居一起接收日本人戲院成立台灣演劇公司的往事（後來被國民黨接收去），還有選參政員，選制憲國大的事，皆感慨萬千。他在海外為台獨運動奔波太久也太艱苦，聽說當時有幾個日本政客支持他，如藤山愛一郎等，不過財力的援助不能持續，且參加運動的人進進出出不穩定，在日本和王育德也談不來。王育德

曾對我說：廖這個人夜郎自大，沒幾個人，還沒有一點頭緒就自命台灣共和國大統領。我覺得他不是真正的政治人物，也不是有真正的絕對的敵對意識，而是被逼上梁山憤而走上這條路。聽說他這次回來是以發還被沒收的財產為交換條件，還有，利用他年邁老母的呼喚動之以情，他只有放棄一切回來，真是英雄末路啊！國民黨安排他擔任台南曾文水庫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之職，其實是閒差，被冷凍起來，以後再也沒有與他見過面。

三、環遊世界之一——黎明的國度

環遊歐亞大陸

離開美國飛往英國倫敦，於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抵達。去看了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校園清靜人很少，有如一箇巨大別墅。三月三日到比利時，去滑鐵盧參觀，三月六日到了巴黎，在巴黎住了將近四、五十天。有一位在法國的朋友 Kovenock（中文名：柯逸山）介紹我一間最便宜的旅館，一天只要五元美金，房間很小，廁所在外面，因為便宜我就住了很久。Kovenock 是美國人，太太是法國人，但他反對美國對台政策。他曾經在台灣留學很久，從事台灣農村研究，會講道地的閩南話，在台灣期間與我一家人都很熟。在法國，我去過里昂、馬賽。三月二十四日到德國法蘭克福、柏林、漢堡、慕尼黑等地。然後坐火車到奧地利維也納，

去找那裡的日本駐維也納大使法眼晉作，法眼是岡山六高畢業，但慢我六、七屆，他和我六高低一屆的同學宮內勇很要好，這次見面是宮內勇介紹的。記得宮內勇和另一位同學美村，還在讀六高時，在日警「三·一五」左翼大鎮壓中被捕，被關了五年或十年。本來我想從維也納去捷克玩，結果被拒入境只有折還。四月九日離漢堡到丹麥哥本哈根，然後去北歐瑞典、挪威玩，四月十三日在奧斯陸得一首詩：

初春林下白斑斑

瞅見小湖皺波寒

瑞典興行歸望急

挪威亦可散漫漫

四月十六日再回到巴黎，正好碰到巴黎五月學運，因為進不去才離開，結果沒看到一九六八年五月學運的現場很可惜。四月十六日到瑞士日內瓦住湖邊，五月一日抵達義大利米蘭，在義大利去過威尼斯、羅馬、拿不勒斯等地遊玩。五月九日，從羅馬到希臘雅典，過去讀西洋史都是從希臘開始，對雅典非常景仰，但實際去一看都是石頭山又沒樹木，與想像不同，後來去看了石頭神殿，覺得很雄偉。本來接著想到土耳其，結果沒去成。後來直接到貝魯特再到以色列的耶路撒冷，耶穌基督走過的路我去走了一遍，耶穌背十字架爬的那坡我

也都爬了上去，也去看了哭牆和巴比倫十二銅版法。那時以色列剛戰勝埃及，街上的人看起來神采飛揚，建國之熱誠正高揚，周邊回教國就有不如以色列的感覺。五月十七到十九日在伊朗。

五月二十二日到達印度。在印度期間覺得很難過，衛生條件很差，印度的上層階級很富有，但大部分人很貧窮，貧窮致使國民道德低落，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但從他們的眼神看來，都有聰明和智慧之光，他們的眼睛很美很利，如果將來有政治社會的徹底改革，必有前途。五月二十六從印度飛曼谷，到清邁舊地重遊，感覺比三十年前繁榮許多。這次沒有到新加坡就直接到香港。六月七日再回到東京，六月底我內人從台灣來日本與我會合，兩人到日本各地玩了三個月，最北去到北海道，九月十五日才經過琉球回到台灣，總共到世界各地玩了十二個月又二十幾天。

《黎明之國》——新中國的景象

在日本，我們看了一部描寫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紀錄片《黎明之國》，深受感動。這是一部由岩波映畫製作所在一九六七年十月出品的長篇紀錄片。由有名的女導演時枝俊江帶領攝影隊，從一九六六年八月到翌年二月深入北京和中國東北地方，走了二萬公里，拍了八萬呎的膠片，第一手記錄了中國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的真實情況，是全世界唯一深入大陸且全面傳

達中國文革的紀錄片。從這部片子，我看到了當時的中國思想進步、乾淨和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片中出現的新中國真正的清潔乾淨，沒有性病、妓女、乞丐，水溝打掃乾淨，沒有紙屑、沒有蒼蠅蚊蟲；後來，一九七三年我到中國時，證實這是真事。在台灣聽說過中國大陸全國同時敲鑼打鼓捕殺吃掉大量穀子的麻雀，我以為是在開黑色玩笑，其實是真事。以前國民政府時期，我每到中國大陸都要帶殺蟲劑，睡前棉被周圍撒一撒才敢睡，否則夜間所有的蚊蟲都跑出來攻擊人。從這部片子，讓我看到新中國進步的景象，中國人自立自強的姿態，完全脫離了舊中國的貧窮落後。這埋下了日後我想回中國大陸去看的原因。

開闊眼界

我為什麼會花那麼多錢和時間去環遊世界？主要是被國民政府悶得緊緊的，心中很不滿。日據時代我們雖是殖民地，但出入比國民政府時代自由；且我喜歡旅行，那時我大約每年都要出去一次。國民政府把人關得死死的，每申請出國，要保人且必須薦任官幾級以上才可以，還要保人服務機關蓋章；即便你具備了這些條件，如果他不讓你出去也可以任意把你擋下來，對此我內心十分憤慨。既然這次它准了我十三個月，我一定要玩到期限滿為止。我旅行的主要目的，是想看世界各國，各民族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生活，做為參考，以長見識，開闊自己的眼界。作為一個台灣知識分子有必要了解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和百姓的生活，這樣才

不至於落為井底之蛙。

此次旅行回來後，心情比較開朗，凡事也看開了，就想把公司好好整頓一下。那時公司在羅東主要賣滑石粉還有生產大理石製品如花瓶、菸灰缸等。然而，當一切正在上軌道時，沒想到，一九七一年竟飛來了橫禍。

「羊羹事件」被逼上梁山，藏書遭趁火打劫

（一九七二年）

一九六〇年代末，美國和中國的關係開始起了根本的變化，大大動搖了在台灣國民黨政府的國際地位。首先，中國與蘇聯開始交惡，美國想拉攏中國對抗蘇聯；另外，美國亟欲從越戰的泥沼中脫身，而中國是越南的後方基地，如果沒有中國的暗默妥協，美國想要體面地從越南撤軍是不可能的。因此，美國開始打破五〇年代以來東亞的冷戰格局，開始尋求與中國接近的道路。

一九六八年，當選總統的尼克森隨即與中國大陸展開乒乓外交。一九七一年，七月，尼克森國安助理季辛吉走訪北京；十月，國府喪失了聯合國席位連同在各種國際組織的代表權。翌年二月，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發表「上海公報」，宣布了「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美關係正常化」等重大決定。同年九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搶先一步完成了

中日建交。這一連串蔣國府的所謂「姑息逆流」，引發了政權的外部合法性危機，動搖了內部統治的正當性，台灣社會內外的反國民黨的感情受到極大的鼓舞，各種反國民黨政府的運動風起雲湧。再加上兩次的世界性石油危機，台灣經濟受到極大的衝擊，這些島內和島外，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綜合衝擊，導致國府政權處於「內外政經複合性危機」中；只有靠強化特務統治製造恐怖氣氛，以維持政權的穩定。從六〇年代末到七〇年代末的十年間，國府特務機關四處逮人，製造了不少政治案件。

一、羊羹大禍（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九日——二十二日）

一九七一年二月初，有一個日本人學生忽然來我台北市松江路的住家，說要見我。我因為另有要事請他稍待，過一會兒，他說另外有事要先走，留下了一盒日本羊羹和餅乾，說改天再來拜訪。我不疑有他，順手把羊羹放在書架上母親照片前面，一直沒有吃，沒想到因此大禍降臨。

大約過了兩星期，二月十九日晚上八、九點左右，我飯後在睡覺，阿端去看電影，小的住在台大附近宿舍，只有我們夫婦倆在家。忽然有里長來說要查戶口，我太太問說這麼晚了還查戶口？他說有啦！有時也會有啦！我太太說那麼你坐一下我去拿戶口名簿。那些人問說陳先生在嗎？我太太答說在啊！你要找他啊！那我去叫他。他們說不用啦！我們自己上去。

於是三、四個人就跟著上來，對我說處長要找你講話，我問他們有什麼事？他們拿出軍法處檢察官的搜索票，二話不說就兩邊各有一支槍抵住我，也不讓我換衣服，也不讓我帶盥洗用品，說改天再請太太送來就好。就這樣抓住我，把我帶到樓下推進一部計程車，從松江路直接到博愛路的警總保安處。當時我也不知道被帶到什麼地方去，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像被暴徒綁架一樣。只記得臨走前有一個人用台語對我太太說不要緊，一下就回來了；我想每一個都這麼講，要抓你去死刑也說等一下就放你回來。

一進入保安處，他們馬上露出猙獰面目對我進行疲勞審訊，三、四班人馬輪番對我疲勞轟炸，每班兩人輪流逼問，從深夜到第二天的下午二、三點。後來的兩個晚上，連我睡覺旁邊都有一個人站著看，不知怕我怎樣。後來才知道，這案子牽涉到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二日台南美國新聞處爆炸案，還有一九七一年二月五日美國花旗銀行台北分行也發生了爆炸案，都是日本台獨聯盟主謀策動的；炸藥則藏在羊羹中，由日本帶進台灣來。警總在偵查所有與這日本羊羹有關係的人時，找到了我。他們反覆逼問我，知不知道爆炸案？有沒有參加策劃？和那日本學生有什麼關係？日本主謀是誰？知不知道羊羹裡有炸藥？我也反覆回答說：那爆炸案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那日本學生我也不認識，更不知道羊羹裡有什麼東西。他們問說羊羹哪裡去了，我說放在書架上我母親照片前，動都沒動，不信你們去拿來看看。他們馬上到我家去拿走羊羹送去化驗比對，結果什麼都沒有發現。事後我想，幸好當時沒有把羊羹吃掉，否則必定有完沒完，不知會被折磨到何時。

對於這些特務的逼問，我很生氣說：「你們這樣野蠻，同樣無影的事反覆問那麼多次，你去叫一個腦筋好一點的來，我曾當過考試委員你知道嗎？是總統任命的，你們的高等考試或縣長資格都經過我的手，你們知道嗎？我和蔣總統也熟，見過五次面，你們去問他，看看我的為人會做這種事嗎？」後來他們派了一個軍法官來，態度比較溫和，問了話後，羊羹檢驗又沒炸藥，就準備放我，因為二十一日是星期天不放人，所以等到第二天二十二日才放我出來。前後共被關了三天四夜。

要釋放我之前處長出來道歉，說真對不起。他們說要有人做保來帶我回去才行，我說豈有此理，我沒做錯，是你們冤枉人，錯是你們，怎麼可以叫我找保人呢？結果他們打電話找我內人來當保人把我帶回去，他們還假惺惺地用處長的車把我送回家。

後來聽我內人說，那晚他們來抓人時，她真怕有一本書被查到，幾乎嚇死了。當時有一本向朋友借來讀的毛澤東《矛盾論》，小小一本的放在桌上，如果被發現到那就完了，當時白色恐怖戒嚴下讀「匪書」會被判重刑的。結果，桌上凌亂他們沒看到這本書，卻看到一個拆開的鬧鐘以為與定時炸彈有關，把鬧鐘拿走了。要是那本書被查到，不但我遭殃，連開三省堂書店的李沛霖也會被抓去。

無異於異民族的殘暴

我當時已六十四歲，年事已高，況且我是律師學法的人，資歷和社會地位都有，就因為人家送個羊羹就來抓我，且粗暴地用槍押著我去疲勞審訊，我的尊嚴受到極度的侮辱。這使我想起了一九二九年就讀東京帝大時，二次被日本警察抓去嚴刑逼供的情形。日本人抓我，怎樣打我，我都可以忍受，因為我們是殖民地人，是被壓迫民族，不管日本人如何欺負我，心裡總覺得我們有祖國，還有對祖國的希望。可是沒想到自己的民族和國家來了，無法無天的作為，竟然無異於外族的殘暴。我對國民黨政府已徹底絕望，看清楚他們為了自己的政權絕不會相信台灣人民。我連一絲希望都破滅了。

我也對日本台獨運動的做法感到氣憤。你們站在日本不停地喊台灣獨立，卻不顧在台灣的人死活，這樣，你們才能在日本那裡大登新聞說你看台灣有人搞台獨，被抓了。還好，那時我的老朋友中村哲先生，馬上出面援救，把我被抓的消息告訴日本《新潮周刊》，叫一位人權運動家川田泰代寫一篇報導，大力聲援我。這時，日本人反而成了自己人，而同是漢民族的國民黨政府卻成了壓迫者。那時，我女兒陳雪梨馬上打電話給美國大使館的柯先生，把我被捕的消息告訴《紐約時報》；還有，後來自己也受難的謝聰敏，馬上透過管道把消息傳出去，引起國際注目。這些相助和義行都大大減輕了我受難的程度。

這案件通稱「台北美國銀行爆炸案」，抓了不少人。在我被放出來的隔天，他們又抓了

謝聰敏和魏廷朝。那時有人在台北市散發大批傳單，內容是：「歡迎外省人參加台獨，歡迎李敖參加台獨。」因此又逮捕了李敖，然後再逮捕了吳忠信、李政一、劉辰旦等六人。嚴刑逼供，企圖屈打成招，栽贓羅織，但因四月《紐約時報》的報導造成轟動，才把謝聰敏、李敖等人判八到九年不等的刑期。

二、走上「梁山」

決心出國

一九七一年二月被抓去出來後，心裡就一直想出國。

那時，國府退出聯合國，接著美國承認中國大陸，看起來國府已是窮途末路，遲早要倒台。雖然如此，國府特務還一天到晚抓政治思想犯，大家都生活在思想和言論的恐懼中。況且這些特務還不時來找我「打招呼」，糾纏我，使我生活不得安寧。這使我徹底對國府絕望，開始積極尋求出國的途徑；雖然我已六十五歲步入初老之境，但還是決心離開這樣的困境另尋新天地。為此，我好幾次申請出國都沒批准，找了許多人去打通關節也都沒成。

一九七二年邱永漢回國，我去找他談，告訴他我想要去美國看小孩和孫子，需要保證人，請他幫忙。他答應當我保證人，且去說服國民黨當局基於人道應該讓我出國。沒想到，國民

黨終於發給我護照和出境證。邱永漢是我在一九五七年到日本採購機器時認識的，他當時在日本開一家投幣式自動洗衣店，那時我正好在做股票，所以教他投資股票的方法，後來他才開始玩股票，竟然成了有名的股票名家。

拿到護照和出境證後，我毫不遲疑地立刻買了機票，身上帶了僅剩的九塊美金，提著兩箱的古董，於一九七二年八月匆匆登上了飛機，因為現金不夠，只能夠買到飛往琉球的機票。到了琉球後，我去找世界救世教的部長山根幸一，他很熱心幫助我，幫我賣了一些古董，還送了我五十萬日幣，解決了經濟窘境，使我得以繼續到日本和美國。日本的世界救世教很早就到台灣傳教，他們先去找郭水潭，郭建議他們來找我，我覺得他們的教義很有道理，就讓他們在我松江路的辦公室宣教，後來他們在南京東路成立了一「世界救世教中華民族總會」，發展得很成功。由於這層緣故，我與山根幸一結了深厚的友誼。

寫意見書給中國國務院

到了日本後，我馬上聯絡了昔日六高和東京帝大的同學，他們不是在政界就是在企業界，都相當有成就，有些人還身居要津。大家歡慶再聚，也買了我的一些古董，解決了盤纏羞澀的問題。也找了從事台獨運動的友人，如成立「台灣獨立聯合會」發行《獨立台灣》的史明，還有組織「台灣青年社」，出版《台灣青年》的王育德。他們在反蔣上是一致的，但都各說

各話，沒有明確一致思想和策略；雖然他們在反國民黨上我贊同，但他們的台灣民族論我不能苟同。

我一到日本，有很多反國民黨政府的人都來找我，如東京大學的劉進慶、戴國輝等，他們都想要了解台灣的現況。那時美國已承認大陸，日本又與大陸建交，整個世界潮流都如此，大家的想法是國民政府早晚會被中共所併吞。那時候認識了熱心從事人權運動的川田泰代女士，她曾積極為被國民黨特務綁架的陳玉璽奔走救援，還為此寫了一本名著《良心的囚人》。經由她的引介，我認識了當時在日本神戶的一位中國華僑總會負責人林伯燿先生。林先生夫人是台灣人，他對台灣的問題十分關心，也對國民黨欺侮台灣人十分不滿。他說中國對台灣的實況並不了解，建議我何不根據台灣的實情寫一份建議書給中國國務院，讓其了解台灣實情。於是，林先生叫一位女留學生來幫忙，我就口述我的意見她筆錄下來，經我修改訂正後再拿給林先生，林先生就轉交給中國國務院。要不是林先生的特殊關係，信是不可能送到的；更沒想到，周恩來總理竟然親自看了我的意見書。我的意見書大略寫了幾個要點：

- ① 概述了國府撤遷台灣後一直到現在的政治狀況，特別提到國府壓迫台灣人民的情形。二二八事件中，許多人被整得很淒慘，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中，有不少的青年學生被槍斃，在槍斃之前他們都高喊「毛澤東萬歲！」他們知道共產黨要消滅國民黨，而國民黨要殺他們，他們自然希望共產黨來救台灣人，這是很普通的想法。

② 在國民黨壓迫下，有許多台灣進步菁英先先後後逃到中國大陸，如謝雪紅、楊克煌、蘇新、蕭來福、蘇子蘅……等人。他們原先希望借你們的力量打倒國民黨，現在他們在做什麼，我很關心，希望你們要重用這些人，他們真心愛祖國而且是思想進步的左翼人士。

③ 請你們了解，台獨是國民黨政權壓迫下的產物，不是帝國主義的走狗。請你們以後不要再說「台獨是帝國主義的走狗」這樣的話。

周恩來總理請我回去看看

把意見書交給林伯耀後，我就去美國波士頓女兒處，也到了紐約去看其他的孩子和朋友。當時在聯合國工作的郭松棻向我說，周恩來總理看了我的意見書，正急著找我，邀請我回去北京看看。還有，他們也從紐約派人到波士頓來找我，告訴我上述旨意。那時，美國總統剛訪問過北京，和周恩來、毛澤東會談並發表了「上海公報」，引起了極大的震撼，大大動搖了國府在台灣的地位，也影響台灣人的前途。而且當時在美國風雲一時的保釣運動正湧現回歸祖國的熱潮，在美國的台灣留學生保釣第一團已經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到北京訪問（王正方、王春生、陳恆次、李我焱、陳治利等五人團）。

因此，我興起了回大陸去考察的意念，一方面想看看大陸的建設情形，去了解北京的對

台政策如何；可以的話給他們一點建議，為台灣人爭取尊嚴和權益。另一方面，也想趁機去看看二十幾年不見的老朋友如蘇新等，我經常掛念他們。於是就決定等內人平安到達美國後，到大陸走一趟。我深知這個決定將面臨極大的風險，首先在台灣方面，我可能永遠無法回去了，而且將喪失一生的財產和地位，還有可能引起朋友的誤解；在海外，可能會得罪台獨的朋友，引來罵名。可是，我一生，從年輕走來不就都逆著風浪前進嗎？在台灣的雷震說我是被逼上梁山的，「被逼」是有，但自己選擇「上梁山」的成分也有。我到美國本來想依靠兒女頤養天年，好好度個晚年；這個破釜沉舟的決定，又使我再次千山獨行，走到兩岸波濤的風口浪尖上。

三、一生藏書遭「趁火打劫」

我一生好讀書也愛書如痴，甚至到大陸的十年間一有空就去買書，生活中盡量安排讀書的時間。在我離開台灣時，家中已有數萬冊的珍貴藏書，這些都是我從年輕到老一生的知識寶庫；有重要的台灣史料、日本及德國的文學巨著、社會科學名著、法律專業書籍乃至古籍絕版書。我曾請人估價過，當不下數千萬日元。

郭榮桔請宗像隆幸交涉買書

因為匆匆出國，手頭很緊，就想割愛藏書來做盤纏和日後生活費。我把這件事告訴王育德，他說東京的「台獨聯盟」支持者郭榮桔對台灣史料很有興趣，我那些藏書是研究台灣史所不可缺的。於是他去告訴郭榮桔，郭叫熱心的日本人台獨支持者宗像隆幸（中文名宋重陽）來跟我交涉，說要買我的一部分有關台灣的藏書，成立資料中心。但直到我啟程赴美前，郭榮桔都一再拖延議價，等我到了美國後只有繼續用書信交涉。三月三日，宗像來信開出了條件說：一、郭願出六百萬日幣（以當時的匯率日幣二百六十元兌換一美元，折合美元二萬三千元，當時波士頓一間房子只要幾千美元）買書。二、而且把書從台灣搬到日本的一切手續和運費全由郭負擔。三、契約成立時先付一半書款，運上船後另一半付清。他還說，我知道你要去中國不再回台灣，我會派一個沒有政治色彩的人到台灣祕密進行，一切不必操心。我馬上於三月七日寫好三份契約書以及書籍移交指令書寄給他。契約書上明記：

雙方同意我在台北市松江路一六二之二號二、三樓中所有台灣關係的書籍（包括政治、歷史、法律、文化、社會、藝術等）以六百萬日幣成交，且以買方電匯一半書款到位時作為簽約成立，另一半書款於四月三日止全部付清。另外的書籍移交指令書發給台北公司的管理人翁朝基先生，請他見到拿這指令書來的人就把台灣關係的書籍，包括《台法月報》（從日本統治台灣開始至日本戰敗為止的法律月刊，從第一卷到末卷我都收藏）、

《稅務旬刊》、《法令專集》、《地方文獻》等都要交給他，但不包括英文、德文還有日文法律書籍，以及與台灣無關的書籍。清點移交完畢後，請他在移交指令書上簽名。

一場噩夢的開始

本來我想，依常理事情應該會順利進行，沒想到這才是一場噩夢的開始。三月十九日，宗像來信說，我的書籍要寄出國外非常困難，若我去了中國恐怕許可更困難。他收到了契約書和指令書，但完全沒有談到錢的問題，那時我急著準備去大陸，即使五百萬日幣我也賣了。三月二十六日，我在波士頓發了一封信給他，說我曾經以郵包寄過許多書籍給中村哲、鹽見俊二等日本友人，都沒有什麼問題，你只要以十公斤為一包，寫上不同收信人，應該不會困難，請你盡速進行並寄書款來，萬事至急。並請他在我去中國後與我內人聯絡，信可寄來我女兒處。後來郭榮桔知道我馬上要出發了，就要求除了有關於台灣書籍之外，還要其他我全部的藏書，我不得已只好再寫第二份移交指令書給他，請翁朝基先生代為移交。宗像他們就把書搬到萬華，再運到日本。就這樣，書被搬走了，錢卻一毛也未付。四月五日，我從波士頓出發前夕緊急再給他一封信，說我依照承諾什麼都給你們了，我是向友人借錢出去的，請務必依約把書款寄來。

行前的信寄出去後，宗像又來信，四月四日寫的；信是我內人收到的，那時我已到了北

京。他說：郭先生說書他不要了，我要去找看看，有沒有其他人會要這些書。他還說：不知要多少天才能搬完，要是你已去了中國，那萬事就更難了，在搬出中說不定王先生會受到政治牽連……他還想用國民黨來恐嚇我。結果，書都搬到東京了卻一毛錢未付，才說要另尋買主。

如果不是他們早說要買，我還可以另想辦法；既然說要買，我就照承諾履行，希望他們依約把書款匯來。我去大陸也沒打算要讓中國政府出錢，只想以旅行者方式去，這些書款已足夠我用。沒想到，他們居然趁我急著要去中國の間隙，把書搬到東京卻說不買了，這與趁火打劫有何不同？

我四月十二日到達北京，十六日就與周總理見面。他們本來要為我拍片，我反對，我說我不願意公開，因為這些書的問題未解決，太早曝光不好；另外，我還想要回美國。

書像被綁架去的孩子，有什麼辦法？

八月十六日，宗像來信說書已運到日本但沒地方放，另外需要倉庫費，不得已搬到郭榮桔那裡放。事實上，書已在郭手中了。我剛從台灣到達日本時，有兩大行李箱內有古董，拖去美國嫌太重，就暫時寄放在郭處，也都沒拿回來。另外，我曾寄很多書給法政大學校長中村哲，還有隨身帶的東西來美嫌重也寄放在中村哲那裡，後來中村要搬家叫宗像去搬走，也

都拿到郭榮桔那裡去了。

到了北京後，我還陸續請日本朋友幫我討還，都沒辦法。一直拖到一九八二年，我託日本國學院大學教授向山寬夫去交涉，還有林伯耀、簡蘇梅等日本華僑朋友也來商量幫我討還這些書。向山教授為我奔波很多次，到最後沒辦法，在我要離開日本前，向山教授建議要告他，否則會超過時限。這才請了一個律師去告他。他還一再拖延耍賴，逃避證據調查，狡辯取書的經過和書的來源。我因人在美國出入不方便，無法親自赴日處理，花了很多時間和律師費，最後還是沒有結果。律師勸我和解，向山教授說就像被綁架去的孩子，在人手中有什麼辦法？經過幾次討價還價，竟然僅以七十萬日幣（相當三千元美金）和解；扣除一成律師費以及其他費用，我實際拿到的，還不到原來講好價錢的十分之一。就這樣，我費了一輩子心血收藏的珍貴圖書和知識寶庫被趁火打劫搶走了，實在心有不甘。

因為我背叛了台獨？豈有此理！

他還揚言，說因為我背叛台獨，所以他有權沒收我的書。這種可笑的歪理竟然說得出口。我既非台獨分子，何來背叛？還有令我更痛心的事，聽說與我長期交往的朋友王育德對此事竟然說：絕對不還他，我是不送羊給敵人的，這是買賣！我很氣憤，他竟然把我當敵人看待，欺侮我到這種程度。我一生愛台灣，為台灣人爭尊嚴，希望台灣人有光明的前途，這是誰都



1983年8月18日與張良澤（左）攝於東京赤阪東急飯店。

知道的；我有許多台獨的朋友，但我並不認為台獨是台灣最好的選擇，所以我從沒參加過任何台獨組織。雖然我同情他們，也經常為他們說話，但我看不出日本的那些台獨組織能對台灣做出什麼有利的事情。我最初太信任他們了，總以為要獨立建國的人，人格應該高尚；我自己是律師都照約定履行，沒想到他們竟然把我一生珍愛的書籍趁火打劫去了，如此背信棄義的人，要如何獨立建國呢？對他們我更不抱希望了。

張良澤先生我本來不認識。一九八二年，他替我翻譯了日文小說〈姐妹〉刊登在《台灣與世界》上，一九八三年五月張良澤寫信來北京，因而互相通信認識。同年八月，我經日本到美國時與他見了面，當時他在筑波大學任教，還邀請我到他的學校演講。當時我向他提起郭榮桔占有我藏書的事，他聽了表示十分憤

慨，我也請他幫忙替我討回。後來台獨表彰他對台灣文化的貢獻，頒個文化獎給他，態度起了變化。他很喜歡書，曾說書比他生命還重要。郭榮桔死後，聽說那批書不知怎麼到了他的地方¹，我也不清楚，但他也沒有表示要歸還我的意思。現在那批書到底流落何處？這麼大一堆書總有個去處啊！怎麼連個去處都不知道呢？這都是因為我不是台獨才會這樣嗎？

1 據陳逸松先生四女陳雪梨轉述：我在今年（二〇一五）九月到台南真理大學拜訪過張良澤先生，得知在郭榮桔過世後，郭太太請當時在日本大學任教的張良澤先生幫忙處理這批書。張教授這才發現，這批被陳逸松視如生命的書，二十餘年來竟然被鎖在一個嚴重生鏽的四十呎貨櫃，堆放在郭先生工廠的一個角落裡。打開貨櫃後，發現書籍已受潮發霉。後來張教授設法盡力搶救，也僅有不到一半的書勉強可以救回。現在這批書籍存放在台南真理大學的台灣文學資料館。

第十一章

衝破驚濤和駭浪（一九七三年）

一、勇往直前——從波士頓到北京和平賓館

從波士頓取道巴黎、巴基斯坦回到中國（一九七三年四月六日——十二日）

中國大陸那邊已經急著要我去，且周總理想要見我，正在等著。駐聯合國的中國職員告訴我說不需要任何證件，在任何國家只要與中國有建交的使館或聯絡處，只要我說出陳逸松的名字，他們自然會接待我。於是我決定叫內人暫留在波士頓，繼續聯絡藏書的後續問題和處理台灣的財產，約好以北京蘇子蘅的住家為聯絡地址（北京市中關村科學院宿舍內十樓二〇二號）。當時中國和美國尚未建交，法國是唯一與中國建交的西歐國家。我申請了法國的簽證後，於一九七三年四月六日從波士頓出發前往巴黎，開始了我人生另一個未知的旅程。

抵達巴黎後我叫了一部計程車，那司機很不親切，拿了車資和小費卻不幫提行李，我只有自己提著三十公斤的行李走進中國駐巴黎的大使館。大使館的人安排我住使館旁邊的一家旅館。巴黎我以前住過一段時間，就趁機再走走回顧一下。在巴黎住了二、三天後，使館發了一份歸國證明書，就搭上了法航的班機。當時已事先說好，我是祕密回去的，不願意公開，且打算只去參觀六個月後再回到美國。

飛機經雅典飛到巴基斯坦首都喀拉蚩，再轉搭巴基斯坦航空到上海。當時巴基斯坦航空是西方世界唯一飛中國的航班。不久之前，季辛吉、尼克森也是經這路徑到中國。當時不敢取道香港，因為那裡國民黨特務很多；就有台灣人趁到香港旅遊之便，去大陸的國貨公司逛，結果被監視拍照，回台後就被抓去。

搭了三十幾個小時的飛機後，於四月十日抵達上海，有一位國務院派來的侯職德先生（後來都叫他「老侯」）來接我。一直到一九八三年我離開北京，老侯都擔任我的助理工作，從傳達消息、住宿起居、行程安排都由他一手包辦；他還是我下棋的對手，也經常為了思想和作風的問題與我激辯，有時還生悶氣，翻臉，但彼此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在上海住了一夜，本來他們要我搭飛機到北京，但我要求坐火車，可沿途看看中國的農村。火車的設備比國府時期改善很多，十分乾淨，分軟臥和硬臥，我和老侯坐同一軟臥。火車從南京、蘇州經濟南、天津再到北京。車窗外一片綠油油，感覺樹種了許多，以前我去過河北，都是赤荒一片；讓我驚訝的是，河北竟然有種稻米的水田，以前山東以北是沒有水田

的，可見得現在灌溉系統做得很好。後來我到各地方視察，方知大陸每一縣都有水庫，這是國府時期不可想像的事；且當時大陸實施公社制度，使農村的生產力大增。

在火車上過了一夜後，於四月十二日到達北京，蘇子蘅來接我。被安排住進金魚胡同的和平賓館。這是一座清朝的王府，有三、四進的四合院，加上中國式的山水庭園，十分幽靜。寫《紅星照耀中國》的美國名記者斯諾每次來北京都住這兒，許多重要的國賓也都下榻這裡，當時這裡還住有柬埔寨的遜王西哈努克親王。

這趟將近一星期回歸中國的旅程，路途曲折充滿險阻，需要無比的勇氣去衝破政治的驚濤駭浪。這使我想起了好萊塢影片中經常出現「衝破鐵幕」的英雄畫面，也想起了國民黨政權經常大大宣傳的從中國大陸跑出來的「自由義士」。我的旅程也算是衝破「鐵幕」，只不過，這個「鐵幕」不是那個「鐵幕」，而是由國民黨政權的內戰和美國的冷戰給台灣人民設下的「鐵幕」，我去衝破它而已。

中國，對我們這個世代的人來說，不是陌生的國度更不是異國；在日據時期它是我們的祖國，我經常來來回回；光復後，我們這麼熱烈歡迎它，我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二月國共內戰的三大戰役快要結束之前，都經常往返南京，後來才倉促回台，上海是我最後離開大陸的地方。一九七三年四月十日，二十四年後再度踏上上海的土地，並不陌生，只是清醒地知道，這裡已是新中國！

廖承志宴請，談日本問題

四月十三日晚，我接受了國務院外交部顧問、老革命家廖承志的宴請。在座的還有國務院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羅青長部長、郭達凱局長和李金德祕書長，他們三人以後都與我在北京實際的生活、工作和活動有很密切的關係。當時廖承志已預定一星期後，以中日友好協會會長身分率團赴日訪問一個月，他為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了特殊的貢獻。

他父親是中國國民黨黨元老廖仲愷，母親何香凝為中國國民黨左派的重要人物。他在日本東京出生（一九〇八年），八歲才隨父母回國。十六歲加入國民黨參加各種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十九歲（一九二七年）退出國民黨赴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參加中國共產黨東京特支組織的社會科學研究部活動；次年，因參加抗議日本在濟南製造的五三慘案，被日警逮捕後驅逐出境。回中國後加入中國共產黨，一生獻身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他曾數度被捕入獄，都奇蹟般地生還，可說是出生入死的人物。他年齡與我相近，又有留日背景，日語講得很流利，他知道我在日本求學的經歷也十分驚訝，又幾乎與他同時期在東京參加左派反日活動，所以談起來十分親切熱絡。他這個人很豪爽，說大不說小，心無城府，有江湖氣，喝醉酒就天下大亂。另一方面，他通曉五國語言，擅長詩詞、書畫、戲劇，是一個才華橫溢的人。晚年被尊為「廖公」，只有周總理稱他「小廖」。他和日本人相處得很好，為中日友好關係打下深厚的基礎。且歷任國務院僑辦主任，港辦主任和歷屆全國人大代表，曾與我同為人大常委。

一九八二年七月，在他去世前一年，曾發表致蔣經國先生的信，殷切期望台灣當局捐棄前嫌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實現祖國統一大業，該函在海內外產生深遠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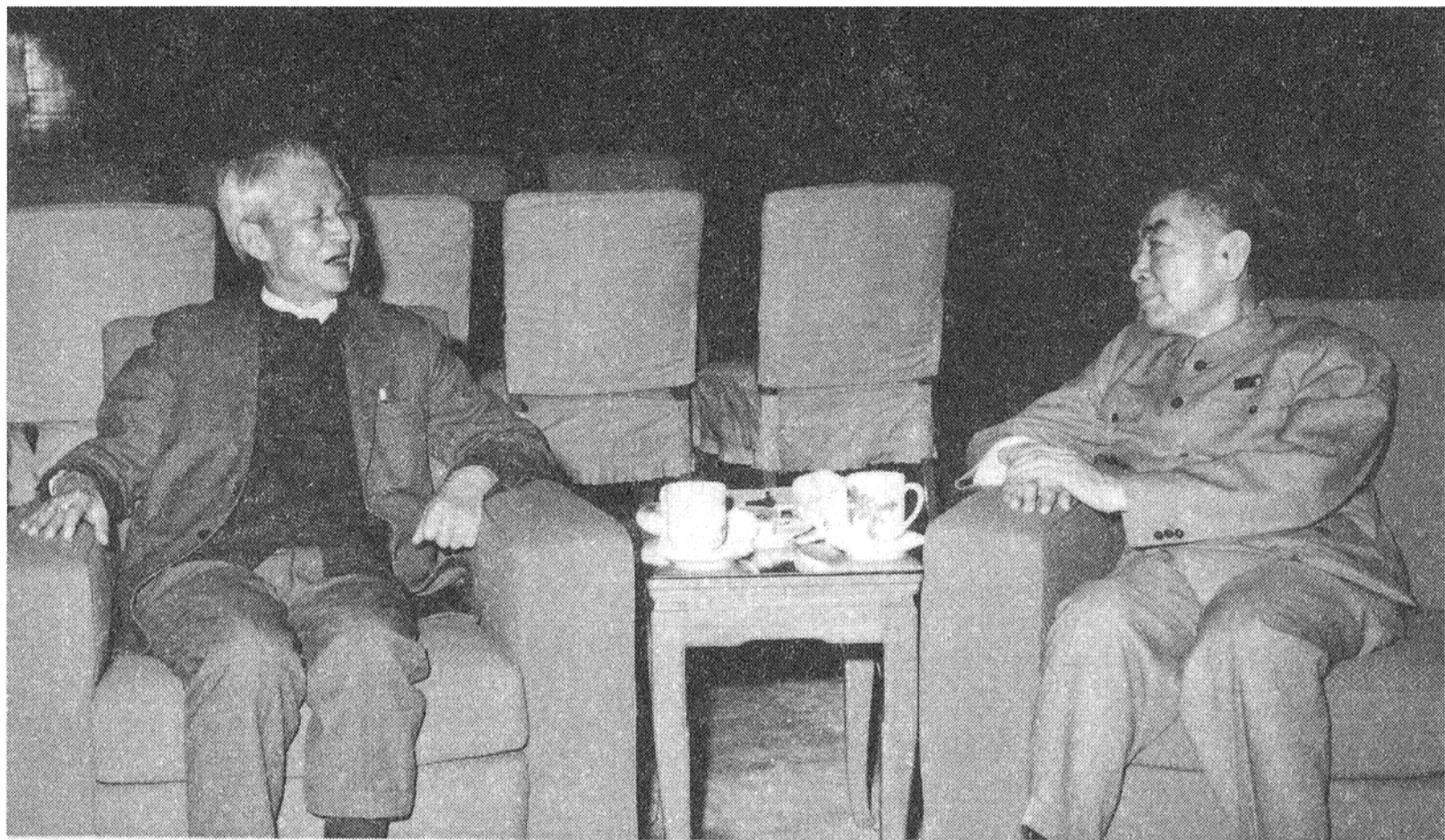
席上，我們都談到中日關係。他說中日間要世世代代永久和好。我說永久和好是空話，和日本民族之間要求永久萬年和好不戰爭，不容易哦！最好簽定不戰條約，三十年或五十年，要有個期限約定，彼此不動武。我現在也是這麼想。日本是鄰國也是經濟大國，事實上日本一直都在研究和準備核武，只是不公開且規模不大，一旦他們要發展核武，一夕即成。廖承志和日本社會黨議員帆足計和前駐蘇大使法眼晉作都很要好，而這兩人都是我的好朋友。帆足計是我岡山六高和東京帝大的同學，在促進中日建交上最有功勞，是中日建交的「掘井人」。以前日本與中國還未建交也不通航的時候，帆足就冒著生命危險突破封鎖，繞道蘇聯進入中國，和中國領導人會談，因此和周總理也熟。那時日本反共氣焰十分高漲，有學生到機場示威，威脅帆足說：回來要和他算帳！後來時勢變化很快，現在整個中日關係都改觀了。

十四日我去市內參觀。十五日去長城上八達嶺，當天霧很濃不能遠望，但桃、李、梅花盛開煞是美麗。再轉去看明十三陵的定陵，下去地宮參觀，其規模浩大，與五年前（一九六八年）到以色列看過的猶太人大衛王之墓相比較，真是小巫見大巫，且不遜於埃及王石墓。十六日去東方市場百貨大樓，人山人海，中午在東來順吃涮羊肉，當夜羅青長部長請客，郭、李同席。

二、與周恩來總理二次見面深談

第一次與周總理見面（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七日）

四月十七日，老侯一早就拿來四篇有關一定要解放台灣的文章來，說今晚七點在人民大會堂和周總理見面。當晚周總理和夫人鄧穎超宴請我，同席還有廖公、羅青長部長、郭達凱局長、李金德祕書長等。先在人民大會堂的一個大客廳見面談話，然後到另一室宴請（忘了不知是在台灣廳還是在江蘇廳）。飯後再談，前後談了三個鐘頭，大約在十點結束。在這三個鐘頭的會見中，主要圍繞在台灣問題和日本關係兩大議題談論。席上也請了林麗韞來準備翻譯，他們以為我只會日語不會講普通話，所以一開始和周總理談話時，她靠近來想翻譯，我用普通話說：「不用了，我會普通話。」後來才都用普通話交談。當時大陸一般人聽到台灣人會講普通話都很驚訝。最初大家講些客套話，周總理問我七十了嗎？我說才六十八，我想可能是因旅途勞累，從巴黎到上海、北京一直沒好好休息，有倦容的關係吧！我問他年輕時是什麼時候去日本留學，他說是一九二三年。那大概是我中學畢業要上高等學校的時候，但他在日本停留時間並不長，所以日語不行。



1973年4月17日夜，與周恩來總理談話。

台灣人自己當家作主

周總理說，我的信他仔細看過了，他自謙說對台灣所知不多，有許多事情看不太清楚，最近與幾批從美國回來的台灣留學生面談過，但仍然不知道詳細情形，希望找機會和我多交流，增進對台灣的理解。我向他詳細說明了台灣經濟的實況，告訴他台灣並不像他們宣傳的那麼窮。我說在大陸的台灣人，如蘇新、蘇子蘅等人，他們都很愛國很優秀，你們要重用他們。他答應會重視這問題。關於台灣問題，他表示獨立不可以，都是同一民族怎能獨立？而且也不可能成功，且國民黨不是那麼好對付的，他們對付國民黨幾十年知道其作風，不是台灣人喊獨立就能獨立的。將來要是雙方統一後，他要聽台灣人的意思，讓台灣人自己「當家作主」。我問他說：你們說要「解放台灣」是什麼意思？我以為「解放」大概是用

軍隊占領，他回答說：就是要台灣人自己「當家做主」，政治的安排要問一般大眾，依照大眾的意思決定。

依照我的理解，周總理所說的「台灣人民當家作主」，是指：首先，台灣的大多數勞動人民，包括工人、農民、小市民、中產階級和民族資本家，成為真正的主人，其實質就是擺脫一切壓迫和剝削；為此，台灣人民自己的自覺很重要，必須促成這種「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自覺。其次，統一後必定會有很長的過渡期，以推進社會主義的改造，至於改造案或政治綱領，最好由台灣人民自己提出來。第三，統一後，一定會維持與現在相同的生活水準，絕不下跌。

要與日本簽「不戰條約」，並要求日本賠款

關於中國與日本的關係，我說我從小在日本唸書，很多日本的同學、朋友現在在日本政界、企業界都是名人，自民黨、社會黨、無黨派的議員我都熟，我很清楚他們的想法和行事作風。日本是可怕又可敬的鄰國，與日本交往，單靠空泛的「友好」、「親善」辭令是不夠的，最要緊是簽下「不戰條約」，保證三十年、五十年內雙方不可輕啟戰端，如此才有保障。對於我的建議，他在傾聽但不置可否。另外，我也向他提議應向日本提出侵略賠償之事。因為，海外留學生經過科學精算，認為我們應該向日本求償千億美元，曾長期居留日本的郭沫若，

也在報紙上說過要求對日本求償六百億美元。據我了解，田中角榮要訪問中國之時，心裡早有盤算，準備以五百億美元的賠償作為與中國建交的條件，結果中國沒有提出要求。如果得到日本賠款，不但可以解決中國外匯不足的問題，更可用來建設中國。結果周總理表示，毛主席已經和人家談好了，我們不好再和人家講什麼。我說：要向日本借款不容易，倒不如向他們要求賠款。他說：要他們賠款，如果他們將舊機器推給你，名義上賠了，實際上沒什麼用。我說多少都要要求，要是他們以機器代償，我們要看可用才算，且可分幾年賠償。周總理又說：日本不好是軍國主義不好，日本人民沒什麼不好，如果我們要求賠償，日本政府會向日本人民加稅，那麼還是日本人民受苦。那時候中國想要打開外交局面，周總理主要想爭取到日本的友好邦誼，且一切以日本人民為重，這是他的大戰略布局吧！

我也向周總理談起，中國要生產耕耘機等農業機器，油管部位需要精密的鋼板，正好日本「新日鐵」有生產大量的精密鋼板。「新日鐵」的董事長永野重雄又是我岡山六高的同學也是好友，他希望把鋼板賣給中國，我想一方面可幫助日本，另一方面中國也有需要，可促成中日間的互助互利。總理說：我們缺少外匯怎麼買？我說：永野表示，用中國的原油與之交換即可。總理覺得很有道理，立即吩咐機要秘書馬上交辦。果然，這筆中日間的貿易在這年夏天成立，以大慶油田的原油交換新日鐵的三十萬噸鋼板。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政府的辦事效率很高，比較之下，國民黨政府的官僚效率就太差了。

我們也談到了國民黨的問題。我詳細談了我當過參政員、考試委員等職務的感想，認為

國民黨只為其黨派的利益，並不以民族利益為重。再談到法律問題，我說：在日本我專門研究憲法和財政學，現在是掛牌律師，所以我對國家憲法、財政等根本體制問題很有興趣。他說：這樣最好，現在我們法律尚未整頓，民法、刑法都沒有，刑事訴訟法也沒有，很需要這方面的人才和意見，可寫個意見書給我。其他，也談到世界局勢問題，我認為暫時不可能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現下民生問題最重要，特別是第三世界生活水準還很低，應該先致力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準，他很同意「民生第一」的意見。事實上，他很重視人民的生活，自己生活也很簡樸，在北京搭大眾交通工具，衣服破了補一補再穿，這種精神令人敬佩。最後，他親切問我內人何時到北京，等她到了想再請我們一起吃飯，再找機會好好談。

陪同周總理與墨西哥總統上大寨（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這期間，墨西哥總統埃切維里亞（Echeverria）來中國訪問，他是西方國家領袖中最早訪問中國者之一。他是一位社會主義者，也是一位律師，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很感興趣。二十二日，周總理邀我與墨總統一起到山西大寨人民公社參訪。我和墨總統分乘二節火車，周總理有時會過來和我談話，都是談一些農業改革問題、中國糧食問題和人口問題等；也談到台灣問題，他說無論如何要統一，到時台灣人民有意見，就不客氣的拿出來談。火車從北京經石家莊到山西陽泉，再搭乘汽車到昔陽縣大寨公社。下車時民眾列隊歡迎，敲鑼打鼓，舞龍舞獅，煞



1973年4月23日，陳逸松、周恩來與墨西哥總統訪大寨。

是熱鬧。四月底陽光很強，大家都像農夫一樣戴斗笠，隨行有二、三百人，大約費了四、五十分鐘才爬到山頂，大家都汗流如注。總理和墨總統也都一起爬，可看出周總理有點勉強，那時候他已有病在身，為了國務，為了國家前途，他還是強忍到最後。一層層的梯田蜿蜒到山頂，山上有蓄水池，有種果樹。一行繞山看景走了二小時，沿途都可看見「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的標語。

大寨原是一個非常貧瘠的地方，全是石頭地沒什麼泥土，水源也困難。每個去大寨參訪的人，都要挑一簍泥土或拿一些泥工上去，當作手信，改造土質，表示對大寨精神的尊敬之意。每有外賓來，中國都會邀請他們去參訪大寨，讓外賓看中國就是這樣克勤克苦一步步建設起來的。我

們還去參觀模範農家，一進去就看見一個燒柴的大灶，再進去有稍微高出的地方就是床鋪，有一層棉被蓋著，下面是草蓆，再下一層用乾草當褥。這使我想起小時候在羅東老家，也是用稻草鋪在草蓆下面，冬天可禦寒。新婚夫婦的房間，有一個衣櫥，旁邊有鏡台，大家都把棉被疊得整整齊齊地供人參觀。每一家看起來都一模一樣，那是人民公社，公社制度對窮困的人來說很好，生活安定。

觀看紅色藝術，了解一般人民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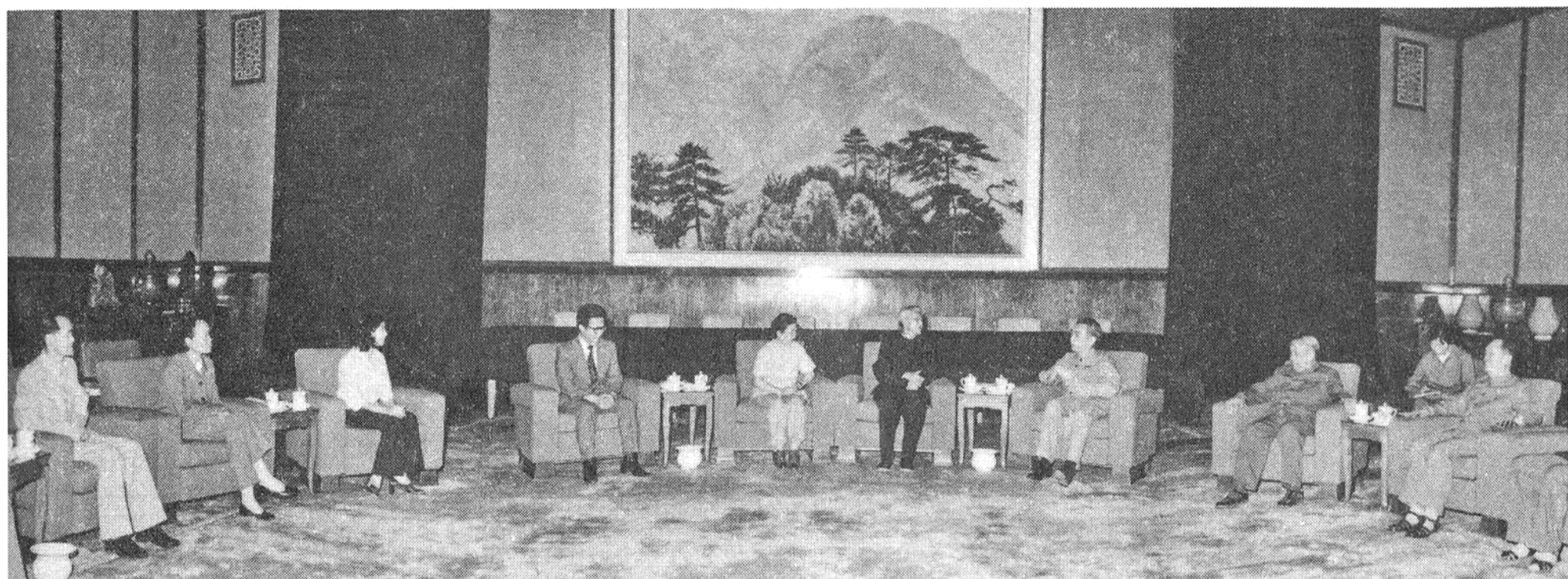
和平賓館庭園中的桃花已落英繽紛，接著是牡丹盛開，時序進入了五月。在我內人到達之前，我到處參訪。曾陪墨西哥總統一行去看了「一場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五月一日勞動節在中國是一個大節日，我去人民劇院看了「平原作戰」、「地道戰」兩齣抗日劇，也看了一場朝鮮電影，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觀看紅色藝術，感慨很深。

我們到北京近郊參訪了「中朝友好人民公社」。公社總面積有一百六十平方公里，人口七萬八千，有一千一百戶人家。公社從事農業者有六萬多人，下分十區，區下又有大小一百二十四個生產大隊。公社設有衛生醫療處、養老院、收信中心、牛舍、卡車中心等。我們參觀了三個社員的房子，每一勞動力普通年收三百元，一家可能有二、三個勞動力；公社採取工分制，較努力者得一工分，較差者〇點八分，按勞計酬。有一天，我要求不要人陪同，

想自己一人到北京市走走看看。我從王府井大街走到東華門的城河，河中有許多草魚游來游去。我悠然自在漫步到南角，看見有一個人在曬太陽，就上前與他談話。他說正在治神經痛並伸出手給我看，他說他是理髮工人，和愛人二人賺一百四十元，政府補助二元，房租用去四元五角，三個孩子一起每月才花一百元，還有四十五元的儲蓄。談話中他問我哪裡人，我說是福建人剛從美國回來，他說中華牌香菸一般人不抽的太貴了，一包大概要一塊錢。從這一個月的體驗，我覺得大陸物價便宜，社會經濟平等，一般人的生活也安定。我去訂作了一套人民裝，也買了人民帽，因為宴會上穿西裝太顯眼，別人一看就知道從外面回來的；而且這邊大家都穿人民裝，應該入鄉隨俗，這樣外出行動才比較方便，有事問人，人家不會把你當外人反而把你當作同志，辦事也方便。

周總理宴請我們全家（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九日）

五月十八日，大女兒一家三人來到北京；隨後內人也於六月十二日到達。他們都和我一樣繞道巴黎、巴基斯坦來到北京，路遙迢迢，全家得以在北京相聚實屬不易，大家都歡喜無比。六月十九日，周總理特別設宴接待我們一家。同席的還有廖承志夫婦、蘇子蘅、林麗韞、羅青長部長、郭達凱局長、李德全祕書長、侯職德、章文晉。一歲多的外孫女由蘇子蘅公子蘇民生抱在宴會廳外，等宴會結束後才抱進來給總理看。宴會上原本要林麗韞幫助翻譯，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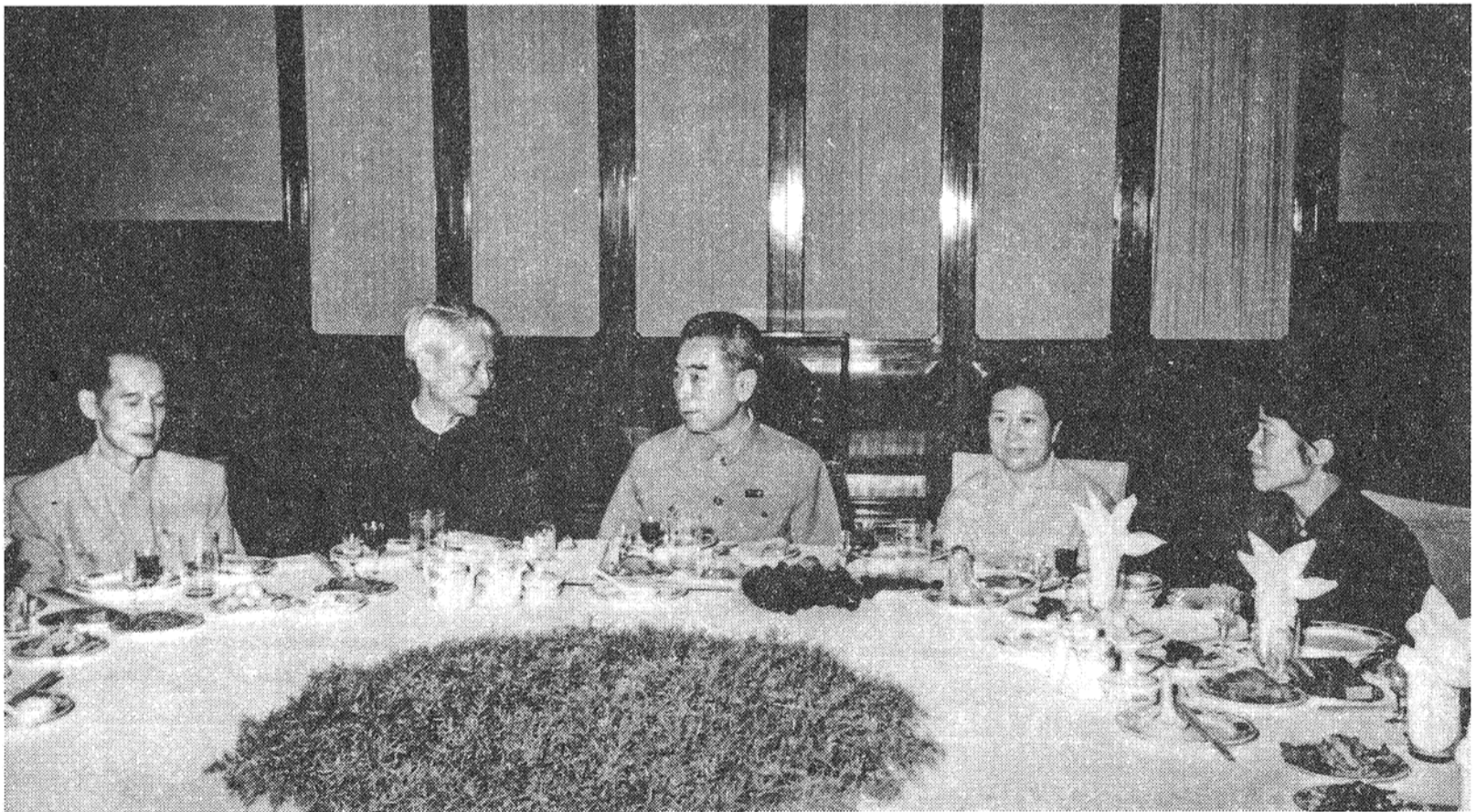
1973年6月19日，周恩來會見陳逸松、陳夫人林玲玉與大女兒、女婿於人民大會堂。

現我們都會講普通話也就不翻譯了。

席上，周總理詳細詢問了台灣的民生社會生活狀況，我說台灣並不像大陸宣傳的生活窮苦，這種宣傳徒讓台灣人反感，台灣雖然經濟正在起步，沒什麼外匯，但社會民生尚稱安定。話題又回到台灣問題上，我再次問他：「你說解放台灣是要台灣人當家作主，具體是什麼意思？」他說：「要讓台灣社會、台灣人民自己作主人，至於要實行何種制度，用何種方式來治理台灣使其更加融合，這以後再討論，但會聽台灣人的意見。」他從來沒有說過一切由中國單方面決定的話。台灣領土的歸屬問題，他的解釋是應該依照波茨坦宣言，這是國際性合議決定的事，沒有什麼爭議的。他一再強調：「台灣獨立不能接受，一定要解放台灣，讓台灣人當家作主，統一以後會聽台灣大多數人的意見。」我提出前此在日本寫給他的建議書，再次強調說：「總理，我常常聽到你說台獨是帝國主義走狗，這話台灣人聽到會內心不服，因為事實上台獨並非受帝國主義指使，而是因為反國民黨政府才走台獨的路，台獨是國民



1973年6月19日，周恩來與陳逸松家人攝於人民大會堂。前排左起黃維幸（陳文惠先生）、廖承志、陳逸松、周恩來、林鈴玉、經普椿（廖承志夫人）、陳文惠、翻譯員。後排左起侯職德、章文晉、林麗韞、羅青長、李金德、蘇子蘅、郭達凱、陳遂。



周恩來宴請陳逸松夫婦，蘇子蘅（左一）、林麗韞（右一）作陪。



陳逸松夫人林玲玉與周恩來握手。

黨政府對台灣集權統治的產物，希望以後別再說這種話了。」總理認為我的話有理，就當面答應說，我周某人絕對不再講這種話，要是有再聽到我講，你可以來責備我。果然一直到他過世為止，都沒再聽到他講，連他的幹部也都不說了。

我向總理表示，我預定回來六個月，這期間請你讓我到各處仔細看看，要是你講得有道理，我出去以後可為你說話。他說，你既然辛苦回到祖國，想去哪裡都會讓你看，有意見盡管說，大家可以互相討論。我說想去最北方的珍寶島，他說可以可以，那裡是第一線，過去不給人看的，其他你想去哪裡？我說想去看少數民族，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海南、四川的少數民族，還有青海的鹽湖等等，他滿口答應，實在很有誠意。我再說，陝西黃帝陵以前在國民黨時期沒去

成，國民黨說共產黨會打我們才沒去成；他說你們被國民黨騙了，既然是台灣同胞回來，我們無論如何都歡迎的，哪有打的道理。於是他指示祕書安排我們去祭黃陵，以了我宿願。他不但保證我可以自由進出中國，還說，共產黨說話算話。

周總理和我們從晚上八點多談到清晨一點多，他毫無倦容，其間還有人送藥給他吃。後來我們才知道，其實他與我們會談時已身罹絕症。我們也不太了解當時中國還在四人幫控制中，周總理除了要處理繁忙國務，更要在政治風浪中居間協調，保護了不少同志。我得以順利在中國生活居留和工作，全得助於他的愛護。當晚他興致很高，反應靈敏，對於世局瞭如指掌，也問了還在就讀哈佛大學法學院女婿許多問題。他通情達理，待人溫煦，且高瞻遠矚，雄才大略，真不愧為中國的世紀偉人，難怪大家都那麼敬愛他。

三、陝西謁黃帝陵 · 江南行（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八月三日）

六月二十二日，和女兒一家五人搭中國民航機到西安。到了西安後，先去半坡考古地參觀，出土的文物都陳列在博物館，到了那裡才見識了中國共產黨對考古的重視和進步的情形，令我感動。次日，搭小飛機到延安，參觀窯洞和中國革命根據地。二十五日，省政府派了三部車載我們從延安出發到黃帝陵，這次不必再遙祭，而是由共產黨直接送我們到黃帝陵；時代的鉅變和個人命運的渺小，不禁令人興嘆。二十六日，搭飛機經鄭州到上海，夜宿東湖招



1973年，攝於延安毛澤東窯洞故居前。左起嚮導、陳逸松、林玲玉、侯職德。

待所。二十七日，參觀孫中山故居，也去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參觀，晚搭車到杭州，住西泠賓館。再折回上海，我女兒女婿一家人於六月三十日離開上海經歐洲回美國，他們在大陸總共停留了一個多月。七月六日，在南京與陳秀美（陳若曦）會面後到無錫，想一覽中國第三大湖太湖的美景。那時太湖還沒有遊覽船，他們說湖上路線危險，沒人走過。我要求他們想辦法，最後無錫革命委員會主任為我們弄了一條船，叫兩個技術員領路，七月九日經過五小時航程到達蘇州市外的東山，沿途風景優美，湖水很深，但暗礁多，或深或淺水路複雜，真不虛此行。在國民黨政府時代我來過無錫一次，印象不好，那時

無錫人下午都在屋簷下打麻將，不管有錢沒錢都打，風氣不好。這次來，就覺得乾淨多了，治安也好，尤其杭州西湖水很乾淨，南京玄武湖也很漂亮，讓人心曠神怡。

在蘇州去看蘇繡研究所、寒山寺和參訪工人療養院（有社會主義色彩），當晚住宿太湖飯店。其後，去殷墟看甲骨文，參訪林縣的水庫、發電廠還有菜園湖人民公社。七月二十一日，從徐州往曲阜車上我發高燒不退，恐染肺炎，本來說要送我到濟南省立醫院才有辦法，但車程還遠又恐車行顛簸病情加劇。遂到曲阜一個軍醫院就醫，住院二個禮拜，病中正好可以看看些參考資料充實充實自己。八月三日回到北京，稍事休養後，去天津走了一趟。我原定只在中國停留六個月，準備十月離開，但距十月還有一點時間，就到東北去了一趟。

訣別與抉擇——代表台灣人民

擔任中國全國人大代表（一九七四年）

一、東北行

參訪大慶油田

九月六日從北京飛哈爾濱，住在位於松花江畔的黑龍江省招待所，這是一個很好的地方。第二天坐遊艇往西走，到太陽島沙洲，這是松花江和嫩江的交匯處，從這地方開始，松花江往北東方向走流入黑龍江。七日，去有名的大慶油田參訪，其面積廣達六千平方公里，是世界十大油田之一，在一九五九年被發現開採。油田工人報告了艱苦的開拓經過：當時技術人員大都從新疆玉門油田調來，那時一切保密，接到通知明天就出發到大慶，只帶個人的臉盆

日用品和睡袋帳篷，在北大荒天寒地凍中日夜工作，等油田開發一定程度後，慢慢家屬才來。每天，男人去開掘油田，女人就組織起來合力蓋土屋，展開了「大慶石油大會戰」。油污的工作服就用大鍋煮，破皮鞋、手提袋，破布全部再回收使用，大慶油田工人的吃苦奮鬥精神真令我感動。當時中蘇關係惡化，蘇聯調回全部的科技人員和資料，並向中國要債，中國只有上下團結一致，勒緊褲帶艱苦奮鬥。一九六九年二月二日爆發了珍寶島衝突，中蘇間交惡，一時劍拔弩張。毛主席為了預防蘇聯可能發動攻擊，號召全國人民「深挖洞，廣積糧」。這次我特別要求周總理讓我到珍寶島去看個究竟，以判斷中蘇孰是孰非。我算是第一個被允許去參訪的海外歸來之中國人。外國人中也僅有一位英國記者路易士來過，但那是一九六九年之事，以後，這裡除了軍隊外沒有其他人來過。

登上珍寶島

九月十日，我從哈爾濱搭火車準備前往珍寶島，車內乾淨，但氣溫寒冷，車內沒熱氣，他們倒熱水瓶的開水給我洗臉。約七小時車程抵達東方紅站，當地部隊派四部吉普車來接我們，車行三小時後到達五林洞指揮部，這裡是要進入珍寶島的前線，我們在一間簡單清潔的招待所休息。次日下午再搭吉普車到饒河縣，這天碰巧是農曆八月十五日中秋節，月亮隱約可見，饒河縣副主委設晚宴招待我們，席上有烏蘇里江鮭魚等佳餚。第二天，從饒河搭一艘

一百噸的船順著烏蘇里江而下，後面有蘇聯炮艦全程跟蹤，靠蘇聯邊界沿岸大約一公里就有一個守望台清楚可見，上面站有蘇軍朝中國這邊守望，而靠中國這邊聽說都挖地下壕看不出來。那時離爆發珍寶島衝突後還不到四年，雙方都保持嚴重警戒，空氣還十分緊張。珍寶島是烏蘇里江中的一個小島，面積只有〇點七平方公里，它距離中國岸邊只有二百公尺，水淺與陸地接近，早期與陸地相連；而距離蘇聯對岸卻寬達一千公尺且水深湍急。依我的法律見解，根據國際公法，兩國界河，無特殊契約時，應以河道中線為界；如此判斷，該島主權應屬中國，蘇聯不對。後來蘇聯也承認了錯誤，歸還該島。我登島參訪時，先去看一個碉堡，戰士正在進行政治文件學習，一人宣讀後大家都要進行討論，島上蚊子成群任拂不去，蚊子又大又猛，戰士都在臉上戴防蚊網。

參訪延邊朝鮮族自治州

離開珍寶島後，到長春，再搭火車到延吉，入住延邊賓館已是九月二十一日。這裡是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是我向周總理要求參訪的少數民族第一站。我們先去延吉大學訪問，該校創立於一九四九年建國初期，本來只有五十六名教職員，書籍九百本，現在有四百多名教職員，有三十多萬本書籍。此校是專門培養中學師資的師範大學，分六系，已有畢業生三千多人，百分之八十為朝鮮族。朝鮮族必修漢語，漢族也必修朝鮮語（諺文）。該校教育方針是

以傳授學生思想為主，培養學生分析和解析問題的能力；過去劉少奇的教育方針是關門讀書為個人奮鬥，現在改為學習不脫離生產，德、智、體三育並重，為勞動階級服務。第二天，我們去參訪長白山人民公社新豐大隊，該大隊於一九五八年成立，現在有三百二十七戶，一千八百二十六人，有七百八十個勞動力，分為八個生產隊，面積三千七百多畝，水田有二千八百多畝，豬六百隻，有魚塘，牧場。再去江農邊劇場看朝鮮歌舞劇，也去看朝鮮民族特有的運動會。

延吉在圖門江邊，過一條橋就是北朝鮮。橋不長，中間是國界，兩邊都有邊防管出入境，但兩邊關係親切，走過國界也無所謂，只要不過到橋對岸去就好。因為兩邊有親戚關係的人很多，只要說一聲，填個表，就可以過去。日本殖民時期有所謂的「間島問題」，這並不是講島嶼的問題，而是指延邊這地區的朝鮮人抗日問題。當時許多抗日的朝鮮人都跑到延邊來，延邊成了朝鮮人抗日很強的地方，因此日本人稱這地區的抗日問題為「間島問題」。

九月二十三日到吉林，順便到小豐滿遊覽（又叫松花湖），二十四日到瀋陽，二十六日到大連，二十八日回到北京。九月三十日陳秀美（陳若曦）來北京，十月一日國慶，我參加了國慶園遊會。

二、答應周總理安排，擔任全國人大代表

從東北回京後，當晚，羅青長部長來問候旅途狀況，並轉告周總理的意思，要我多住一點，說國內很快就要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進行修改憲法、制定法律，希望我代表台灣人民擔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在修法、立法上多盡點力。我說必須讓我出入自由才願意，他重申周總理的承諾，說共產黨說話算話。我再說，子女都在美國，台灣也有許多雜務必須去處理，可以先讓我回去，等開會的時候再回來嗎？他說上次開第三屆全國人大是在一九六五年，已將近十年沒開，現在正積極準備召開第四屆人代會，隨時可能開會，現在不宜遠行。當時台灣人在中國全國人大中一直沒有代表，我願意為台灣人做事，就答應留下來參加。第四屆全國人大原預定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召開，但是十一月沒開，老侯去問，說過年就開，我說要先回美國一趟，但是他們說開會在即，不宜遠行。

當年八月二十四日到二十八日中共舉行了全國代表大會，八月三十日舉行了第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選出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等五位副主席，以及包括毛澤東、周恩來在內的王洪文、康生、張春橋、葉劍英、董必武等二十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員。依常理，黨中央委員會召開後接著就要召開全國人代會，但並沒有召開。我看可能是四人幫和周總理這一派之間的鬥爭還繼續著，使新一屆的全國人大無法順利召開。

決定在中國大陸留下來擔任人大代表，的確是這兩年流離困頓中的一次重大抉擇。我訣

別了過去，將來的道路已很清楚，我的餘生，將代表台灣人民致力於中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建設。

這也宣示了我與國民黨政權徹底的決裂，清楚地站在它的對立面。我也知道，國民黨會用怎樣的把戲宣傳我「投匪」，用各種方式打擊我，可能我一生再也回不到故鄉台灣。我的決定也一定會使台獨憤怒，如王育德等人，他們會盡全力抹黑我，罵我「台奸」，不明事理的鄉親朋友也一定會受囿於反共宣傳或狹隘的鄉土感情，對我的選擇不能諒解。但我也知道，會有更多的朋友支持我，或許在心中，在暗中……。雖然我已六十八歲，已屆退休之齡，但我仍抱著遠大理想，代表台灣人民的利益參加新中國的政治。

三、南方之旅（一九七四年五月十日——九月十八日）

因為人大會議還沒有召開，我就趁機到南方各省各地走了一趟。從五月十日出發，一直到九月十八日才回到北京，足足旅行了四個月。出發前，他們說你儘管去看，我們以國賓之禮接待你，因此所到之處都受到禮遇。這得感謝周總理的承諾，所到之處一點都沒隱瞞，什麼都開放給我看。沿途由老侯全程陪同，安排照顧無微不至。他盡職責全心工作的精神令我感佩。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日上午從北京飛廣州，廣東革委會主任兼省長林李明來接待我，他是

漳州人說閩南話很親切，我在廣州住了十天，他來找我談了好幾次。在廣州期間，我去參加了廣州舉辦的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廣交會）開幕典禮，會有世界各地的生意人來買中國的出口產品，台灣的生意人也有來，但很少，日本人主要來買中國的農特產品。展場也有機械類產品，我仔細看了，機器雖不是很精密，但譬如用來製造機器軸心用的切割機這類機械已經出來展覽了，第三世界的生意人都來買，還買了不少，這是我親眼看見的，內心很感動。中國大陸在國民黨政府時期沒有什麼民族工業，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因為打破了舊社會，工業就發展了起來。二十幾年來中國機械工業的進步，使我刮目相看，台灣不會比他們好，但如果中國沒有繼續進行改革，腳步就會停下來。這是我參觀以後的感想。

五月二十日到了海南島海口市，去看苗族石屋大隊，又去紅旗鎮，去三亞，二十四日到達海南最南端去看「天涯海角」，一時興起寫了一首七言絕句。後來到華僑農場休養二、三天，二十八日從海口飛回廣州。五月三十日，開車到新化溫泉途中，車子顛簸得厲害，路況不大好，我被震得骨頭脫節似的，全身疼痛動彈不得，老侯叫公社的醫生來醫治，到了新化療養院，外科醫生帶針灸師為我治療，老侯找了地方上一流的醫生來為我診療，病情遂逐漸好轉。再回廣州後，於六月二十一日從廣州出發經惠州到海豐。這裡是中國紅色革命的歷史要地，一九二七年彭沛在這裡建立了海陸豐蘇維埃政府，是中國第一個農民政府。當時毛澤東還只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彭沛已在這裡領導農民軍與陳炯明軍隊進行拉鋸戰，彭、陳兩人都

是客家人。

經汕頭，六月二十四日到達漳州，老侯叫一位陳應龍中醫師來為我治療尿急，本來我一個鐘頭就尿急一次，很不方便，陳醫生醫術很高明，在我肚臍下三吋處用長針針一下，以後就三、四個鐘頭才一次。七月經泉州，到湧泉寺，十九日到福州。後到南昌、九江。八月十一日到達廬山，在廬山賓館住了六個晚上。八月十九日經吉安到井岡山，在井岡山賓館住了五天，仔細參觀了各戰略要地。下山到永新、萍湘，八月二十八日湖南省政府派人來接待我們，經長沙到韶山，住了三夜，仔細看了毛澤東故居。房子是土造的，分正身、戶龍，門框是木料，房子比周圍貧農好一點，稍微有點土地，算不上富農。房子的戶龍後面有石磨、土籠、臼子，這些和台灣農家一樣。戶龍是毛母親住的房間，看起來沒有比我母親在宜蘭九份的房間好。那房間掛有一幅相片令我印象深刻，是毛的母親要去長沙看病的情景，看似他兩個弟弟抬轎，毛當後衛，那時毛好像從師範學校回家來；那轎子也沒台灣的好，只是用木板稍微釘一下，就把人抬起來。

九月七日到桂林住了三夜，到陽朔，又回桂林。九月十七日從桂林飛回廣州，天氣酷熱。次日，從白雲機場飛回北京，下飛機時北京氣溫冷到十六度，蘇子蘅等來接機。

四、參加二二八紀念會，公開來京消息

一九七四年是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十七周年。以前，每年逢二月二十八日都由台盟

舉行紀念會或座談會，因為台盟（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就是二二八事件中逃亡香港的謝雪紅、蘇新等建立的。今年，中國共產黨準備開紀念會，這是中國共產黨建政後第一次開二二八紀念會，以前都只紀念五二四事件¹，這是一次重大的轉變。二十日，郭局長來找我談，問我願不願意參加由政協全國委員會在北京舉辦的「紀念台灣省人民二二八起義二十七周年」的座談會，並問我願不願意對外公布我到北京參加這個紀念會的消息。我原來是祕密訪問中國大陸，準備六個月後就要離開，所以一直不願意他們對外公布消息。這時既然已答應擔任人大代表，並決定留下來，所以我答應了出席二二八紀念會並對外公布消息。二月二十八日，早上老侯來通知紀念會將在下午五點召開，並把我的講話稿拿去打印。後來改為六點開會，老侯來接我到人民大會堂。這篇講稿是我和蘇新討論後由他起稿的，主要是蘇新的意思，他是依照中央的意思寫的，後來他叫我把文中的一句「準備以武力解放台灣，但不排除和談之可能」這一句刪除，現在想起來，這篇文稿非常不合我的意思。

開會前，徐萌山先自我介紹，並將我介紹給蔡子民、李玲虹（蔡的夫人）、吳克泰、陳炳基、蔡嘯，還有沈雁冰（茅盾）、莊希泉等人。座談會由政協副主席許德珩主持，先由中

¹五二四事件，又稱劉自然事件。乃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爆發的，大規模攻擊在台美國大使館的反美事件。起因於當時一位駐台美軍射殺了台方軍人少校劉自然。由於美軍享有外交豁免權。美軍軍事法庭宣判殺人美軍無罪。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爆發了台灣民眾大規模的抗議行動。民眾包圍且衝入美台北大使館，砸毀汽車、家具、焚燒文件，且包圍美軍協防司令部（USTDC），衝入台北市警局。在台北市警察的鎮壓中死三人，傷三十八人，一百人以上遭逮捕判刑。

共中央委員廖承志代表中央講話，再由政協副主席傅作義發表書面講話。原來發言順序我排第三，不知何故主持人臨時叫台籍中共中央委員蔡嘯先講話，然後才輪到我講。接著有林麗韞、周一良、王芸生、馮友蘭、李純青、蔡子民、謝冰心、吳英輔、榮毅仁、方宜、陳炳基、田富達等共十六人發言。其他參加座談會的台灣人有陳文彬、陳木森、林玲玉、林盛中、蘇子蘅、甘瑩、江重光、魏立、魏正明、李玲虹、吳克泰、陳炳基等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代表和在北京的台灣人代表。此外，還有西藏籍人大副委員長阿沛·阿旺晉美、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李達、周建人、沈雁冰、羅青長部長等人大常委、政協常委、委員、各界人士，一共一百多人，堪稱盛大。

隔天《人民日報》登出了「不久前從台灣省回到祖國大陸的台灣省知名人士陳逸松先生」消息，並摘錄了我講話內容，全國報紙也都登出了二二八紀念座談會的消息，當然我到了中國的消息不脛而走。很多老朋友這才知道我到了北京，紛紛和我聯絡。沒想到福建的鄉親也知道了，都寫信來問；更好笑的，竟然有人寫信來認親，有人說我是他小時候送人寄養的哥哥，更過分的是有人硬說他是我在日本生的兒子，要我承認並要求我寄一本字典給他。我不堪其擾，只好把這信件交給國務院去處理了。

參加第四屆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九七五年）

「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產生和職能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依據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第一屆全代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召開。其代表的產生方式，是由上一屆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確定名額，分配給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解放軍和中央黨政機關，再由上述各地區和機關的人大常委負責協商選出參加全國人大會議的代表。台灣省全國人大代表是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解放軍和中央黨政機關中在中國定居的台灣人協商選舉產生。全國人大代表每屆任期五年，每年舉行一次會議，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召集，有必要時可以召集臨時會議。代表向國務院或各部委提出質問，經過全代會主席團或常委會提交受質問機關，受質問機關必須向全代會或常務會負責答覆。人大代表非經全代會許可，或閉會期間經常委會許可，不受

司法機關逮捕或審判。全代會在每屆會議開始的時候，選出主席團和祕書長、常務委員會，並通過本次會議議程。

人大常委會是全國人大會的常設機構，設立辦公廳，在祕書長領導下工作。常委會會議由委員長召集，每月兩次，必要時可增加。常委會職責包括：解釋憲法、監督憲法的實施、制定和修改法律、解釋法律；在人大會閉幕期間，審查和批准有關國民經濟和發展計畫，國家預算在執行過程中所必須的部分調整方案；監督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工作；決定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各部長、委會主任、祕書長的任免；決定駐外全權代表的任免；決定同國外締結的條約和重要協定的批准和廢除；決定特赦；決定宣戰等二十一項目之多職責。

一、第四屆全人大的台灣省代表

在第四屆全國人大會召開之前，全國人大會一直沒有台灣籍代表。當時散居在中國大陸各地的台籍人士大約有四萬人，一直沒有全國人大代表，這十分不合理。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二日，第三屆人大常委會通過了周總理的建議，在第四屆全國人大中設台灣省代表，並通過了十三名台灣人代表名單。這個決定當然是通過黨系統的運作協商產生的。第四屆人大台灣省代表，除了我之外還有林麗韞、王碧雲、李辰、陳木森、蔡子民、馮炎火、林德時、張



1975年1月17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台灣代表全體攝於北京京西賓館。前排左起林德時、田富達、陳逸松、林麗韞、李莉、張桂珠、王碧雲。後排右起馮炎火、蔡子民、鍾維旺、李辰、陳木森、陳丁茂。

桂珠、田富達、鍾維旺、李莉、陳丁茂等十三人。

他們都是在不同時期，各有不同的歷史背景和原因，回到中國大陸的台灣人，在他們身上反映了中國和台灣現當代歷史中曲折的一面。

林麗韞（一九三三年——），台中清水人。一九四〇年隨家人移居日本神戶，在日本神戶擔任華僑商會副會長的父親支持下，於一九五二年十九歲之齡，經香港到北京，就讀於北京大學生物系。後來被調到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擔任核心小組成員，開始了長達二十年的中日民間友好交流工作。早期曾擔任中共最高領導人，如毛澤東、周恩來等的日文翻譯。一九六三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七三年起連續五屆當選黨中央委員，並當選第四

至第九屆的全國人大常委，一九八一年擔任首屆全國台聯會會長。

陳木森，嘉義人，一九四〇年赴日就讀東京慶應義塾大學醫學部。日本投降後，加入日共地下組織，並積極參加華僑總會、華僑醫院會等進步團體活動。一九五三年八月，響應周總理提出社會主義祖國建設亟需專業技術人才的號召，和一千多名華僑同乘日輪「新安輪」回到中國大陸。回國後一直默默工作貢獻於中國基層醫療工作，一九七五年起連任三屆的全國人大代表，後又連任三屆全國政協委員。

李辰（一九一五——二〇一一），嘉義人，原名邱林淵，台大醫學博士，眼科醫生。

一九三九年考進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後留校擔任助教。光復後升任台大醫學院眼科副教授及附設醫院眼科主任。在同班同學許強（中共在台工作委員會——中共地下黨員）的影響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偕同台大皮膚泌尿科醫生吳萬輝（嘉義人，後改名周輝榮）、婦產科醫生王經授（後改名陳文）一同離開台灣，經香港於一九四九年到達解放區，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歷任大連醫學院教授、貴州遵義醫學院副院長、廣東暨南大學教授、副校長。

蔡子民（一九二〇——二〇〇三），彰化人，原名蔡慶榮。一九三九年赴日進早稻田大學政治學系，台灣光復後擔任東京《華僑日報》總編輯，於一九四六回台灣創辦《自由報》並擔任總編輯。一九四七年積極參與「二二八起義」後到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後，歷任對台廣播的編輯工作，後轉到外事工作崗位。曾任第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第

六、七、八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九屆全國政協常委。

其他，田富達是台灣原住民，他在台灣光復後參加國軍被調往中國大陸打內戰後留下來。王碧雲，解放軍文工團音樂家。李莉來自上海，是李偉光（李應章）的孫子。張桂珠，來自廈門的年輕紡織廠女工。林德時，來自天津的工人。鍾維旺，客家人代表，他是日據期被日本徵調到海南島當兵，後留下來當農民。一九七五年的第四屆人大代表中，有許多出身工農兵的代表；再加上老中青三結合的特色，反映了文革期間的政策方針。

二、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經過（一九七五年一月）

一九七五年一月召開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出席代表有二千八百六十四人。

決定開會前夕老侯才來報告何時開會，有點神祕，可能是四人幫還在的關係。當天很晚才出發，有車子來載，並沒有告知要去什麼地方，還囑咐內人不要告訴別人我去開會之事，若有人問起，就說陳先生去天津旅行。車子繞了一大圈到了一家賓館，後來又才知道是京西賓館，後來又移到前門飯店分房住下，要求我們不可與外界聯絡，包括寫信、打電話都不可以，說是怕開會中有人破壞。

五日到十一日，住在賓館的各小組先舉行預備會議。預備會議是按照代表的選舉單位分別組成小組，大一點的單位如湖南省分成十組，四川省有十幾組，台灣省人口少只有一組。

台灣省小組由林麗韞主持，她是中共中央委員，負責主持討論和聯絡工作。小組預備會議，從早到晚開會，有時晚上也開，大家都針對大會議案進行認真討論。依規定，各代表的小組在全代會大會之前，應就全代會、常委會提出的關於會議的準備事項交換意見；在大會會議期間，就全代會、主席團提出的議案進行小組討論。

一九七五年一月八日到十日，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由周恩來主持。會議討論了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決定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政府工作報告》以及全代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成員候選名單等，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

一月十三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全體大會。會議議程包括：（一）修改憲法；（二）審議政府工作報告；（三）選舉和任命國家領導工作人員。大會上，我和林麗韞、李莉、田富達四人被選入主席團，主席團有二百十八人，開會時坐在台上面對大會代表。大會由朱德主持會議，張春橋代表黨中央作《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周恩來代表國務院作《政府工作報告》。十七日，再舉行全體大會，全體代表一致通過了修憲報告和政府工作報告，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出了一百四十多人的常務委員，朱德擔任常務委員會委員長，以及董必武、宋慶齡等多位的副委員長；並選出了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各部部长和各委員會主任。我和林麗韞被選為第四屆全人大的常務委員。

從一九七五年一月起，我擔任全國人大代表開始有了工資，薪水是三百二十元，其中

二百五十元是我的份，七十元是我內人的份。另外有一大優惠，住在和平賓館的吃和住都免費，而且朋友來找我請客所花費，只要我簽字就可以報銷。本來我說請客的花費由我自己負擔，但是老侯說這是國務院的決定。

三、大會結束後的重要活動

大會結束後，一直到六月人大常務委員到西南考察為止，有一些重要的活動。

二月三日，新聞記者來採訪我，談我從台灣回來的經過和感想。

二月二十八日，參加了二二八紀念會，我發表了講話。

三月十二日，我出席了孫文逝世五十周年紀念會。

三月十八日，舉行第二次人大常務委員會會議。會上余秋里副總理進行了政府五年經濟計畫的報告；李素文副總理報告了遼寧省南部海城營口震災（七點三級）救援的經過；還有，會議通過毛澤東提議特赦二百九十三名戰犯，並予以公民權的決定。

三月二十日，七位海外留學的進步青年回國訪問，包括郭松年、廖秋忠、許金珠、吳國禎等五男二女，我出席了他們的座談會。



1975年3月在老華僑飯店，陳逸松夫婦與保釣團合影。最左邊是郭松年，後排左一廖秋忠。
(吳國禎提供)



1975年5月在北京金魚胡同，左起陳逸松夫婦、蘇新夫人翁乃玉、吳國禎、江重光。(吳國禎提供)

釋放戰犯

三月二十三日，在北京飯店舉行了特赦戰犯的接見會和宴會。代表政府的接見人有葉劍英、華國鋒、吳德三人，我和劉輝、貴峯、徐中澤、宋希濂、董其武等十九人當陪客。被接見的特赦戰犯有二百九十三人，其中包括原蔣介石集團的軍、政、特戰犯二百一十九名，偽滿州國戰犯二名，偽蒙疆自治政府戰犯一名。

葉劍英一個個接見他們，場面很感人。本來在國共內戰中互為敵對廝殺的人，今天在這裡和解，昔為仇敵今成朋友，彼此都熱淚盈眶。而且政府十分寬貸他們，做衣服給他們、給生活費、生病免費治療，日後行動自由，要去哪裡絕對不會管；要去香港要去台灣都可以，且提供旅費。許多人出去以後又跑回北京。有一位原國民黨將領，其妻子在台灣想去香港接他回台灣，但國民黨不敢收拒絕他入境，後來竟然在香港上吊自殺了，真是國共內戰的時代悲劇。

四月五日，蔣介石逝世，這消息是我在四月七日參加董必武的追悼會上知道的。當時中國大陸對他蓋棺論定，定他是民族敵人。我們以台灣人的立場直覺到，二二八和白色恐怖中那些朋友死得不明白，且他平時對台灣人差別的對待，這兩項使我不禁想：蔣介石，你怎麼可以用這種統治對待同一民族的台灣人？那時在北京的台灣人，包括我在內都想，蔣介石死了，兩岸大概會緩和些，大家可以快一點回去，沒想到事與願違，兩岸緊張對峙的局面竟

然拖了這麼久。

四月十四日，福建有一位叫陳肇政的漳浦同鄉來信。這我才知道，我的渡台祖父陳輝煌原來在漳浦家鄉排行第三，老二叫陳輝豹，老大不知叫什麼名字。陳肇政算來是我的侄兒輩，跟陳達元一樣。輝豹這房有個叫陳清泉的渡台，其子叫陳烏鍵，是台北醫學校畢業，比蔣渭水早，在羅東當醫生，早年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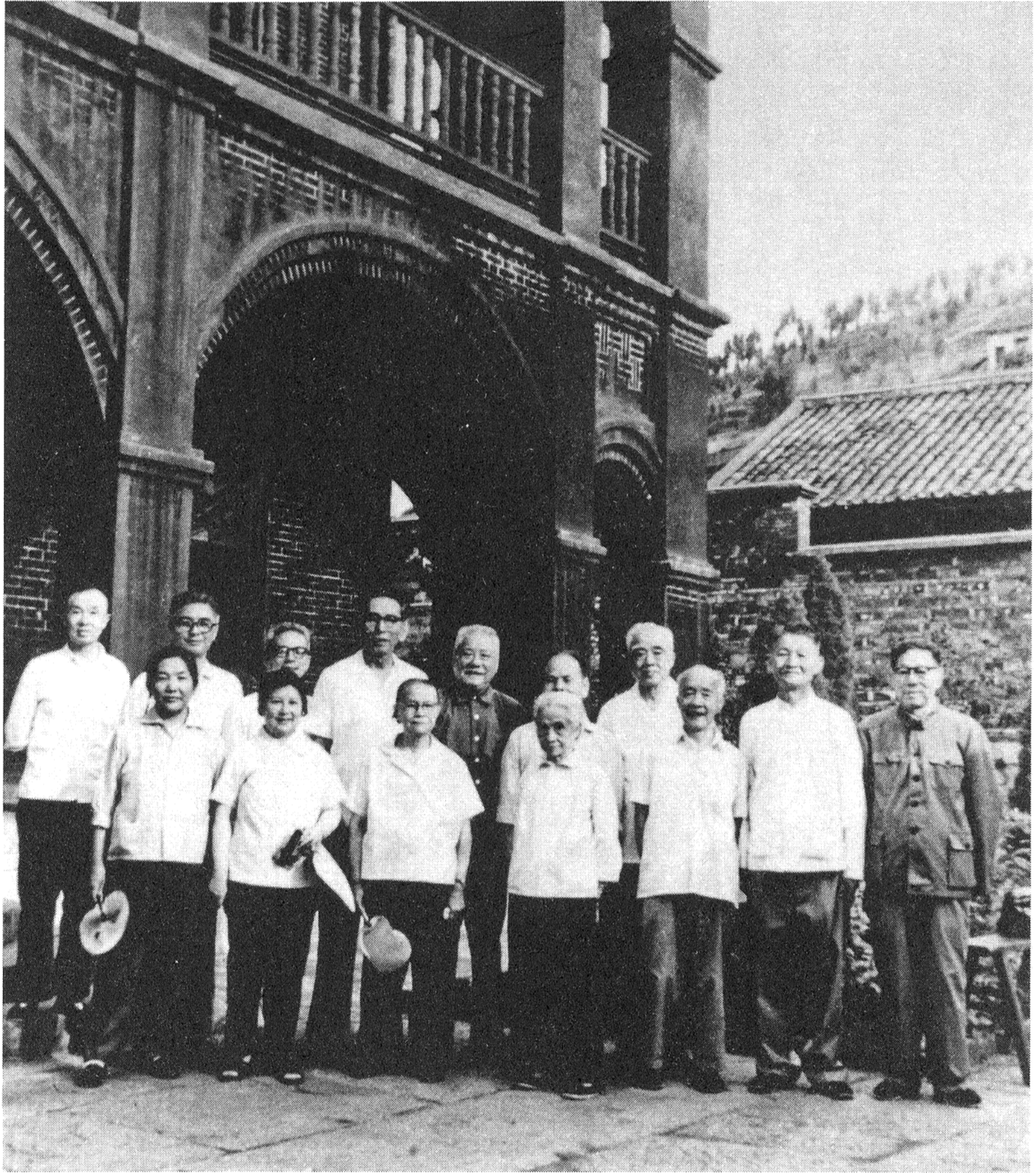
四月二十七日，在八寶山烈士公墓參加林麗韞之父的追悼式。

五月二十七日，中日間第一次通航。

西南考察團

一九七五年六月八日，人大常委會舉辦的四川、雲南、貴州、兩湖西南考察團啟程。全團包括十九名工作人員在內，共有五十四人。分為三組，我和內人編入第一組，第一組由胡愈之、沙千里、王芸生、馬正佶擔任召集人。同一組的藏族人大常委阿沛·阿旺晉美，後來成為我的好朋友。

我們先從北京飛成都，後搭乘十六、十七部的車子浩浩蕩蕩到處參訪。從六月九日到十七日，主要以成都為中心到各地去考察聽取各地省市同志的匯報。先去都江堰，又去杜甫草堂；到德陽看第二重機廠製作發電機之輪軸，再去參訪武侯祠、望江樓和電子工廠、蜀錦



1975年人大常委西南考察，攝於貴州遵義會議堂前。前排右起沙千里、陳逸松、胡愈之、沈慈九（胡愈之夫人）、胡闕文夫人、林玲玉、阿沛·阿旺晉美夫人。後排右起孫曉川、胡闕文、阿沛·阿旺晉美、馮正信、榮毅仁、孫起孟。

廠。在德陽考察了孝威公社，有一養雞生產大隊女幹部，用濃重的四川口音，比手畫腳地為我們講解了一個多小時，大家都聽累了。

六月十八日，我們從成都搭成昆鐵路到昆明，全程一〇九六公里。經渡口市（按：現名攀枝花市），停留了兩天，考察和聽取匯報。這裡，攀枝花工業基地與成昆鐵路、六盤水煤礦是三位一體的；都是中國在一九六五年的特殊歷史時期，作為三線建設的重點部署，在共產黨領導下調集全國的人力和物力建設而成的。一九五六年毛主席在「論十大關係」中，提出了「內地建設」。一九五八年，在成都會議上批准了「攀枝花鋼鐵基地建設」，成萬的職工調集西昌。一九五九年右傾機會主義進攻，停止了建設拆散了隊伍。一九六四年，毛主席指示還是要搞，他說：打仗起來怎麼辦？攀枝花問題不只是鋼鐵問題，而是戰略問題。他再指出：你們不去安排，我要騎毛驢下西昌，沒有資金，可把我的稿費拿出來！現在不進第三線，就是不革命。一九六五年，中央十個都會調集五萬多職工匯集荒僻山區，進行艱苦的建設。

成昆鐵路穿越地質大斷裂帶，設計和施工之艱鉅前所未有。沿線山勢陡峭，奇峰聳立，溝壑縱橫，貫穿了原被高山峽谷、大江大河所封閉的四川西南和滇北地區。動員了四十萬的築路大軍，在短短五年間（一九七〇年）完工營運，堪稱人類鐵路史上的奇蹟。

一九六五年將原名攀枝花改名為渡口市（按：一九八七年又改回攀枝花市），成立了人民政府、人民委員會，以工業區黨委統一領導。將原來僅有數戶民家山高地險的荒僻之地，建設成數十萬人的鋼鐵釩鈦能源工業基地。攀枝花除了生產鋼鐵之外，伴生鈦的存量，世界

第一，伴生釩，世界第三；除了是中國四大鐵礦區之外，還蘊藏鎳鉑等各種稀有貴金屬。

六月二十四日，到了昆明，參訪了昆明機床廠、雲南民族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石林。七月一日到貴陽，七月六日抵達遵義。由市委向我們介紹遵義在中國革命歷史的重要一頁；一九三五年一月二萬五千里長征到了遵義，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擴大會議，確立了毛主席在黨的領導地位。這是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中，確立了毛路線，在極端危險中挽救了黨和紅軍。我們參訪了遵義會議紀念館，且拍了一張全體照。它是磚造木構的兩層樓建築，原是貴州軍閥的私人官邸。

第十四章

在北京與老友重逢

一、在北京與蘇新往來的點點滴滴

兩岸對峙二十年後的重逢

一九七三年我排除萬難回北京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去探望分隔兩岸二十幾年的舊日同志和老朋友，除了前面提及的蘇子蘊之外，就是我最掛念的蘇新。我一到北京就要求見蘇新，當時他還在河南的「五七幹校」，後來被調回北京。我從東北參訪回來後請國務院的老侯去找他，要他到和平賓館來見面，蘇回說要看看，車子開到他家請他來，還說要考慮考慮。結果第二天，十月十八日（星期日）上午九點多，蘇新自己跑來和平賓館。經過二十多年驚濤駭浪的歷史折難，又得重逢，自然感慨萬千。彼此間，仍有難以忘懷的舊日同志情誼，自



右起蘇新、陳逸松夫婦、林加才，攝於1973年。

然也有二十年分隔兩個世界後的陌生和隔閡。

見面時他竟然比起大拇指說：「老陳，你不要以為你這麼『賢』（台語：了不起）。」我十分驚訝，他大概想你別以為人家款待你那麼好，你就以為很了不起了，我說：「沒有啊！我那有多賢，你別這麼想。」他說：「你要知道，你今天因為是台灣人回來才優待你，說淺顯點，台灣如果解放了，你也會受擔。」我說：「那些你不用煩惱啦，你也不必『惡』我（台語：「凶」之意），我回來是因為想看你們舊日同志，想你們在這裡沒受到重視，所以才寫了一封信給中央政府，周總理看了才叫我回來。」「在東京時，為了保護你，我被日本人抓去打得死去活來，在日據時代，如果要做義勇紳士我比許丙他們多幾倍的資格，我都不去做了，為了辦《台

灣文學》和西川滿對拚，我賣了房子；光復後為了建設新台灣，我也賣了房子搞《政經報》，你也當了主編，這樣，我的為人處事，你還要懷疑嗎？」

我說：「隨便你怎麼想，我會盡我的力量去做！」

後來話題轉到一九三〇年，年輕時他在宜蘭太平山活動的情形，談起阿素的事，那也是他很在意的事情，而那件事我最清楚。

我們一起吃午飯，到下午二點他才離開。

我們的左翼青春

我上東京帝大不久就認識蘇新，那是一九二八年間，恰是日警發動「三·一五」大逮捕左翼那年。我在岡山六高三年間都參加社會科學研究部，屬於辯論部的人，比較活躍，因為這關係，很快與蘇新接近，加入了青年會的社會科學研究部。他經常揹著一大包無產者新聞到處向朋友分發，看來和日本共產黨有關係。在台灣青年中他是最進步分子，年輕有活力有理論，最出鋒頭。我繼張聘三之後擔任東京台灣青年會社會科學研究部的教育部長，和蕭坤裕、張宗田、劉明、林加才、吳新榮、楊景山等都是積極成員，也都是好朋友。我們定期集會研讀馬克思主義，當時的蘇聯史大林已掌權，布哈林被排擠，我們都是拿史大林之列寧主義書籍作學習對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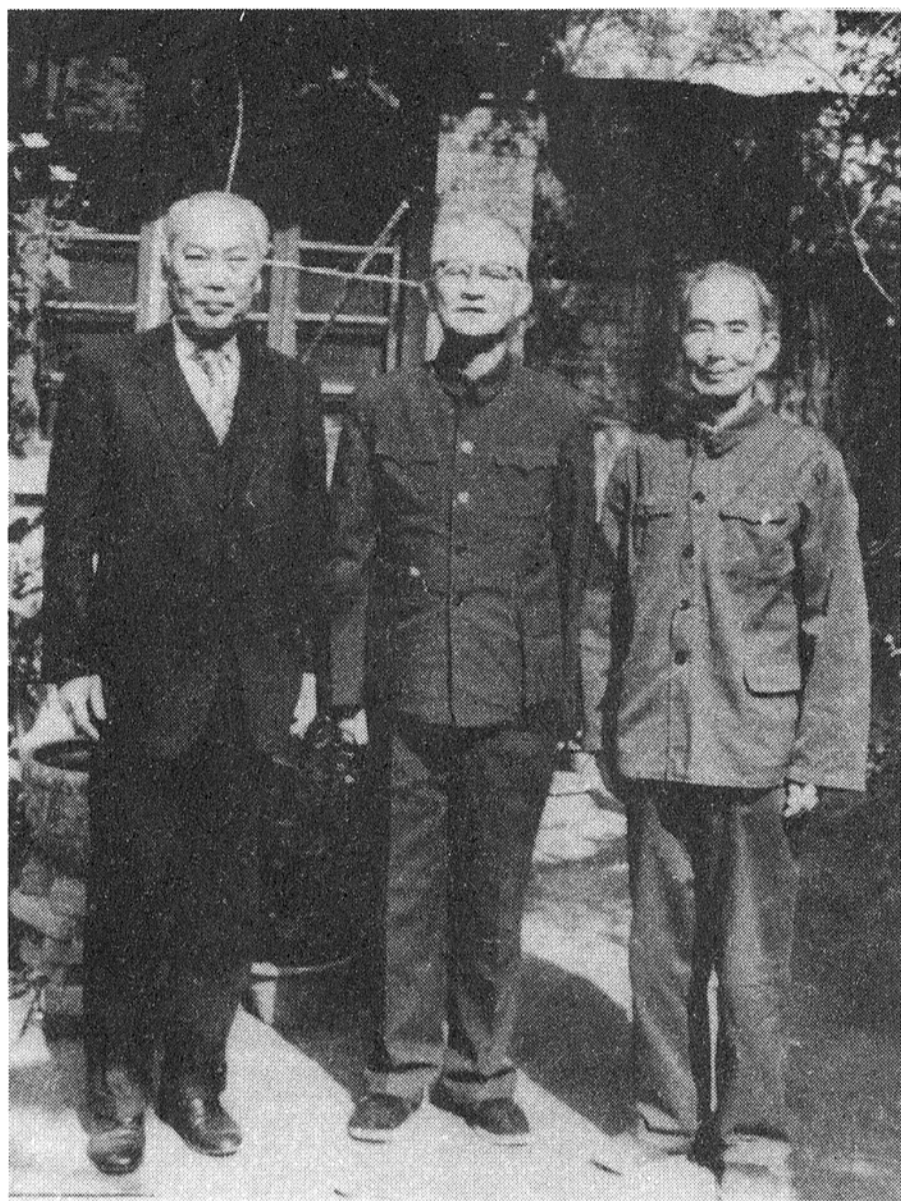
大約在一九二九年的年初，蘇新大概已知道日警又要發動一次大鎮壓，準備回台灣，要

我替他找個地方好躲藏。我問他為何不回台南佳里，他說不行，回佳里身分馬上暴露會被抓。因此我介紹他到羅東找我朋友——文協成員盧清潭，盧清潭介紹他上太平山當伐木工人，從事工人運動。後來蘇新在一九三一年被捕，直到一九四二年才出獄，總共被關了十一年之久。出獄後，我曾介紹他到一家新聞社工作，不久他就離開，先到彰化一礦泉公司工作後回佳里。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台灣光復，蘇新北上來和我一起辦《政經報》，他當了幾期總編輯，不久就到宋斐如的《人民導報》去工作，直到二二八事件爆發，他離開台灣到香港和謝雪紅創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

在北京與蘇新來往的日子

一九七四年的元旦，蘇子蘅夫婦帶孫女小華來，大家一起唱解放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之歌，這是當時最出名的歌，調子輕鬆樸素，大家都會唱，是一萬五千里長征時解放軍唱的歌。第二天早上十點蘇新來，我送他一隻錶作紀念。大家談到台灣的將來，談到台灣是自己的故鄉一定要解放，那時說「解放」就是打倒國民黨解放台灣人民的意思，說解放台灣不是現在說的用武力，沒有想那回事，只不過萬一會用武力也說不一定，但大家還是想一定要用和平的方式在政治上求解決。

蘇新在北京只有與蘇子蘅、陳文彬、蕭來福比較常有來往。最初他和王萬得也沒有講話，



1973年，左起林加才、陳逸松、蘇新。

我勸他們說大家年紀都大了，來到這裡，就要好好相處才對，大家要多聯絡，後來才有往來。他們以前是同志，卻變成陌生人一樣，經我中間勸說才漸有來往，以後見面彼此就很親切了。後來蔡子民夫婦也和蘇新經常有往來了。在大陸的台灣人都分散在各地，有在河北、雲南，也有在海南島的，都是在不同時期不同原因到大陸，中國大陸那麼大，分開就找不到人了。

一講到謝雪紅，蘇新就氣得半死，咬牙切齒。本來兩人在台共時期就有對立，到了中國大陸，一九五一年中共華東局台委會整黨時，蘇新就被檢舉在「台共事件」中「自首變節」，甚至還加上「暴露黨機密」的罪名。在文革中，他還被定為「叛徒」，清除出黨，並令其退休，此即為蘇新自嘆「三十年黯淡」的意思。

我問他文革中下放都做了什麼？本來他不太講，後來來往密切了，他才說要鋤地種菜，也要挑東西，本來被迫要遷戶口到河南鄉下去，他太太堅持不肯，他說幸好沒遷，否則要回北京可比登天還難。小孩子比較不利，說是黑五類的孩子，要參加「少年先鋒隊」都沒資格。



1976年，陳逸松夫婦、王萬得夫婦攝於北京鼓樓旁的王家。

我與他再見面時，他還未被「平反」，沒黨籍也未恢復原職。那時已文革末期，由於中美關係逐漸解凍，許多海外留學生或華僑陸續回來看，我也曾帶舊金山的愛國華僑趙先國，還有保釣團的留學生如郭松年等去找他，他都很親切地接待他們。

蘇新的處分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六月才「平反」。「平反」的內容是：撤銷處分，恢復黨籍，恢復原職。後來他到台盟搞台灣研究工作，寫有關台灣革命運動的歷史，和有關台灣的政治社會評論。他更下工夫做台語的研究，曾把寫好的一部分原稿拿給我看，要我替他修改。他一直保有的《廈門音辭典》是我送給他的。這本辭典原是一位在福建住很久的英國牧師寫的，由上海基督教印刷廠印行，看起來很精美，它比蔡培火推行的台灣話羅馬字拼音更早出版，我在日據時期就買過一本，可惜沒帶出來。

一九七四年，我到福建旅遊時，就請廈門市主委幫我去找一本，他說現在街頭買不到，不過會盡力去找，結果他不知從哪裡找到一本，可能是從別人那裡要來送給我的。回北京後，我拿這本辭典送給蘇新說：「蘇仔，我找到這本書了。」他如獲至寶，直到死前他還在用這本書。我知道他在研究台灣話，就盡力協助他完成心願。

一九八〇年七月，蘇新率台盟總部代表團赴日本參加旅日台胞懇親會。在日本訪問了東京、橫濱、神戶、大阪等地，受到旅日台胞和華僑的盛情接待，會見了三、四十年未見的老同志、老朋友，林加才正在生病，他也去看了他。去日本時蘇新身體已很弱，下樓梯還要人扶，他是勉強去的。他在日本共十八天，恰巧那時我也正在日本參加六高的同學會，只不過，我在日本停留三個月。

蘇新在日本期間，曾有一晚與我不期而遇。

一九八〇年暑假，我參加岡山六高八十年祭來到日本。七月二十六日我到距東京三小時的濱名湖遊玩，住在湖邊的Loyal Hotel，恰好碰到台胞訪日代表團一行在同飯店內舉行歡迎會，蘇新、徐萌山、葉仁壽都在，我們一起大為熱鬧了一番。

蘇新走了！

本來與蘇新住在同一院子的楊焯林大夫與周義美大夫移居到日本後，不久（一九八一年



1943年9月，蘇新與蕭不纏結婚，攝於彰化。
(藍博洲提供)

一月初)，蘇新也搬到新家去（朝陽區勁松二一三樓第八樓）。剛搬過去不久，我去探望過他。他本來就有肺氣腫的老毛病，菸雖然戒了，但有胃病，人很瘦，我每次出門旅行回來都會買些補品給他；去看他那天，我看到他腳下方似乎長一寸圓的樣子，但精神還不錯，他相當關心美麗島事件後的台灣政局，也相當憂慮。在談話中不知怎的，我忽然注意到他家向北，也沒熱氣，很陰。

當年年底（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他竟然過世了。一大早，他靠坐在床上和太太談話，說著說著就過去了。他太太馬上叫他兒子蘇宏打電話給我。我過去看他，他還躺在床上，形容消瘦安詳地走了。他一生信仰社會主義熱愛祖國和鄉土，歷經坎坷困苦，現在他油乾燈盡了，無痛苦地越過了陰陽界。看著老友의 遺容，使我想起了當年王井泉過世的情形，我去看他的時候他也是躺在床上，只不過有許多台灣的「文化仙」圍繞著他。蘇新就沒有那麼多的台灣「文化仙」送別了，備感孤伶。自從我母親去世後，我送走了不少老朋友，在北京也

瞻仰了周總理、朱德、毛澤東、郭沫若等革命家的遺容，在沉痛中送走了遺體也告別了一個時代。

風雪中送蘇新到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

蘇新的追悼會本來要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舉行，後來因為他曾擔任過全國政協委員，或者是因為他的女兒蘇慶黎正在台灣搞反國民黨左翼民主運動很有名氣，因而改在政協大禮堂舉行。追悼會由政協的劉蘭濤主持，北京統戰部致追悼詞，總結了蘇新一生的奮鬥。蘇新過世前曾擔任全國台盟理事和研究室主任，而當時的台盟主席是蔡嘯¹，祕書長是徐萌山。因此，出席追悼會的大多是台盟的人。

追悼會上，關於蘇新在台灣夫人蕭不纏和北京夫人翁乃玉，誰的花圈擺前面的問題，大家有不同的意見。台盟認為蕭應排前面才對，我認為翁二十年來與蘇新結縭共患難，從生病到過世都由她一手照顧，且生養了兩個乖巧的兒女，含辛茹苦，應該排在前面才對。最初翁為蘇新做的祭品被放在一邊，後來才又被排了上去，翁也無可奈何，因為在場安排的都是台

¹ 蔡嘯（一九一九至一九九〇），台南人。一九三七年在福建參加閩西南抗日第二支隊（新四軍前身）。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群眾工作部、聯絡部副部長，軍銜大校，是大陸台胞中最高軍階者。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三年任台盟第二屆主席，他與林麗韞兩人都是台胞在中央的代表人物。

灣人團體。我認為台盟的安排，不近人情。

追悼會結束後，大家送蘇新到政協大門口就走了。我和翁乃玉一行人送蘇新到八寶山公墓。那裡是專為對中國人民革命事業有功的人安厝的地方。那天，北京下了今年最大的雪，寒風刺骨。風雪中我抱著蘇新的骨灰罈將之安放上去，深雪風寒象徵了他的一生。我和他結交一生親如兄弟，雖然各自走的路不同，但理念和感情相近相親，我回北京的目的之一就是想見他，如今他走了，我蒼茫若失。

在追悼會上沒看到蕭來福。蕭精神恍惚不定，變化無常，一下子到泰山旅行，一下子又跑回醫院住，行動不定，就是不回家。雖然他行蹤不定，但不會迷路，總會好好地回來。

送走蘇新不久後，住在美國紐澤西州的楊煥西寄來一封信，對蘇新逝世表哀悼之意，並隨封寄了美金二十元，要我轉交給眷屬。我拿去蘇新家交給翁乃玉，自己另拿了五十元給她表慰問之意並作過年之用，另外交代小乖蘇宏一定要回信向楊煥西致謝。

餘波——楊煥西案

沒想到，楊煥西在一年後，一九八三年一月返台時，竟然被台灣警總逮捕。警總先公布消息說他在美國參加台灣同鄉會涉「台獨」案；後又改口宣稱：楊煥西於一九三一年在東京與蘇新、陳逸松、王萬得共同研究社會主義及共產黨理論，後因陳逸松等二人「相繼投共」「充

任中共官職」，楊主動寫信到大陸給三位朋友表達「附共」之意，因此有「通匪」之嫌。

這案子轟動各方，引起美國議員的關切，最後從原先的涉「叛亂」案迅速裁定為「保外管束」。這案子讓我再次體會到，國民黨政府的恐怖統治，其特務組織真是無所不在。楊煥西寫信給我竟然會被探知。寫封信就定罪「通匪」。

事實上，事情經過是這樣的。

楊煥西先從美國寫信給我，要我催中共早日解放台灣，我沒回信。後來蘇新去世，他發第二封信付了美金二十元作為蘇新的香奠，但蘇新家屬沒有寫信致謝，楊竟然寫信給王萬得，問他我有沒有把二十元轉給蘇新家屬。另外，他在被警總逮捕的前一個月，又寫信給我說郭雨新在政治上徬徨的情形。沒想到，楊從美國寫的這些信竟然被國民黨特務截獲，成了楊煥西「通匪」的證據，通我們這些被國民黨認定的「匪」了，真不可思議，也太可惡，太恐怖了。我深知國民黨特務網的厲害，因此在美國與重要的朋友通信時，如與川田泰代、林伯耀等人通信時，都會互相約定我用「谷和人」的化名。

見到蘇明芳和蘇慶黎一起

一九九二年，我再度回北京時，蘇新女兒明芳偕同其先生及母親一起到我住的公寓來見面。我特別交代明芳，你父親和我很親，雖然我不是共產黨員，他曾因逃避被捕，我介紹他

到羅東去找我的好朋友，我的朋友因而喪失了生命。以人情論，我和他親如兄弟，所以我代你父親向你明芳講（明宏不在場）：「也許你父親沒對你們交代什麼，但你一定要知道他的心意，對你母親一定要照顧到最後，無論你環境如何，一定要孝順你母親。」兩人都感動得幾乎落淚，她母親也眼眶泛紅。二、三天以後，蘇慶黎和明芳一起來找我。慶黎當時因病到北京醫治，台聯會很照顧她，開刀住院都是免費。我和慶黎曾在紐約見過面，當時謝理法、謝聰敏都在紐約，記得謝聰敏曾說他沒興趣與慶黎見面，因為見面她都談階級鬥爭的事。

二、蕭來福的側影

針灸醫生蕭來福

有一次，去探望文彬的病情後，我搭公車在中華路下車步行到西城區關才胡同蘇新的家。蘇新和楊焯林住在同一四合院，房子是有「正身」、「後龍」的建築，沒陽光，溼氣重有點陰森。楊焯林是醫生，常照顧蘇新開藥給他服用。在那裡，我來北京後第一次見到蕭來福。蘇新太太翁乃玉煮一手好菜，楊焯林也來和大家一起吃了晚飯。飯後不久，我讓蕭來福試針，用針灸治療喉嚨沙啞。北京天氣乾冷，火爐燒生炭，有熱氣但很乾。當時蕭來福看起來很正常，他回去後，蘇新告訴我說蕭精神有點失常，因文革的衝擊精神異變，但是我們在言談之間並

不感覺他有異常。

三月二十六日，我再到蘇新家，老蕭也在。大家談起一九二九年春我在日本介紹他們找羅東盧清潭去太平山工作的事，回顧四十多年前激越青春的一頁，大家都感慨無量。那天我內人讓蘇新太太翁乃玉針灸，我則讓蕭針灸。晚飯後楊炳林大夫來，一起談天，九點多蘇新送我到公車站，上車揮別。

我在東京讀書時就認識蕭來福，後來他可能與蘇新一起回台灣。我覺得他是非常好的人，個性溫和，講話緩和有條理；蘇新則很「利」（台語：尖銳），講話用切的用頂的。蕭早年是共產黨員，與蘇新一起工作，後來蘇新與蕭的妹妹蕭不纏結婚。台灣光復後，他曾寫過一本書《台灣解放運動的回顧》，當時他和潘欽信都加入了我主持的三青團。二二八事件中，他和蘇新都在幕後協助王添燈，事件後逃到大陸。到大陸後，在廣播電台工作，文革期間被審查，未派工作，他就去圖書館研究針灸，買了幾套日製的針灸工具，學成後當了針灸醫生，被派到醫院工作。當時蘇新身體不好，蕭就把擔任他針灸工作助手的翁乃玉介紹給他，蘇自己曾說過：「當時我也不敢想再娶。」但蕭說：「沒關係，我會向我妹妹解釋。」如此，翁乃玉成了蘇新的太太，一手照顧蘇新二十幾年，育有二子。

蘇新說：老蕭的病難痊癒

記憶中，我曾在一個車站前看到蕭來福跟著一些人跳上一堆木材上，高喊「毛澤東萬歲」、「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並且大聲批評政治。我也曾聽說，有一次他在景山公園大喊「毛澤東萬歲！」。他有一個孩子很孝順，只要他出門都跟著，為他提藥瓶，怕他走失。蘇新太太翁乃玉說，他自己領了薪水自己會放得好好的，自己會到黃山等各地去旅行，自己回來。

蘇新在一九七八年九月，寫給老同志詹以昌（原名曾昌明）的一封信中提到蕭來福，或許可側面了解其真實情況，信中說：

他本人不承認有病，拒絕治療，也不吃藥，也不打針，也不住院。……老蕭這個病，是文革時受到衝擊，說他是叛徒，歷史反革命，托管派，政治包袱很重。據了解，老蕭的醫院，並沒有把老蕭定為什麼……因為他是一個群眾，文革時，曾受審查，被鬥，這是人人有份，並非他一人。所以沒有受處分，也沒有降級，仍然是醫生，原工資。像這樣的問題，也沒有所謂「平反」的問題。

在另一封信中，蘇新寫到：

蕭來福老兄，絲毫沒有好轉，現在仍住在他的醫院，不回家，與他愛人的關係很不好，不知何因？……老蕭的病痊癒的可能性是很少的，因為他的思想以及思想方法都有很大缺陷，年老？固執起來，僵化了，就沒辦法。¹

1 蘇新給詹以昌信件引自藍博洲編《永遠的望鄉——蘇新文集補遺》，時報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歷史情緣

一、蘇子蘅——初到北京最密切的老友

我到北京前後，與我關係最密切且最早見面的人，就是蘇子蘅。就如前述，在日本我寫給周總理的建議書中，有一重點，就是要求重用在中國的台灣人，其中指名了蘇子蘅。在我從美國出發回大陸前，將來在北京要住哪裡還不知道，為了聯絡方便，便交代家人以蘇子蘅住處為聯絡地址。初次從上海到北京，在北京車站迎接我的唯一台籍人士便是蘇子蘅。剛到北京不久，大約在八月以後，我和內人先去蘇子蘅家拜訪，他家是在中關村中國科學院的公家宿舍，當時他和



蘇子蘅與甘瑩夫婦。

同一機關的人家住在一起，出入很不方便，互相有怨言。我去拜訪後，有關單位才給占房的人另一間房子，搬了出去，才解決了蘇子衡的「家事」。

蘇子衡原名蘇子衡，到大陸後才在「衡」字上加個草字頭。他是彰化人，比我大兩歲，在岡山六高他比我高一屆，彼此在年輕時就認識。後來他考入仙台的東北帝大工學院應用化學系，在學生時代就從事左翼抗日反帝運動。因染肺病，一九三七年才畢業，後返台一段時間，一九四一年他西渡中國大陸，在北京大學擔任化學系副教授。在內戰中，他到張家口晉察冀軍區工業部工作，後來就一直在中國科學院感光化學研究所工作。我們見面時，他還是全國政協常務委員，後來曾當過台盟主席，在一九九六年過世前一年才得以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其妻甘瑩乃台灣名人甘得中的女兒，甘得中日據期與林獻堂共同推動台灣議會設置運動。甘瑩一到大陸就由蘇新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外語學院教日語。蘇子衡為人忠厚是一位好好先生，雖然他一直未被批准入黨，但他很感激共產黨，他說如果沒有共產黨他活不到今天，他說資本主義社會競爭太厲害，我認為他講得有道理。甘瑩較精明能幹，後來因為信件私密的問題，我們才開始有警戒。

我們在北京和平賓館一共住了三年，這期間蘇子衡夫婦一星期大概來個三、四次，彼此十分的熱絡。譬如，我的日記記著：十月三日（一九七三年），蘇子衡夫婦到，其子蘇明生、女兒蘇華也一道來，大家一起唱台灣歌。

二、語言學家陳文彬——神州統一期明日

與陳文彬、蘇新三人聊了一整個下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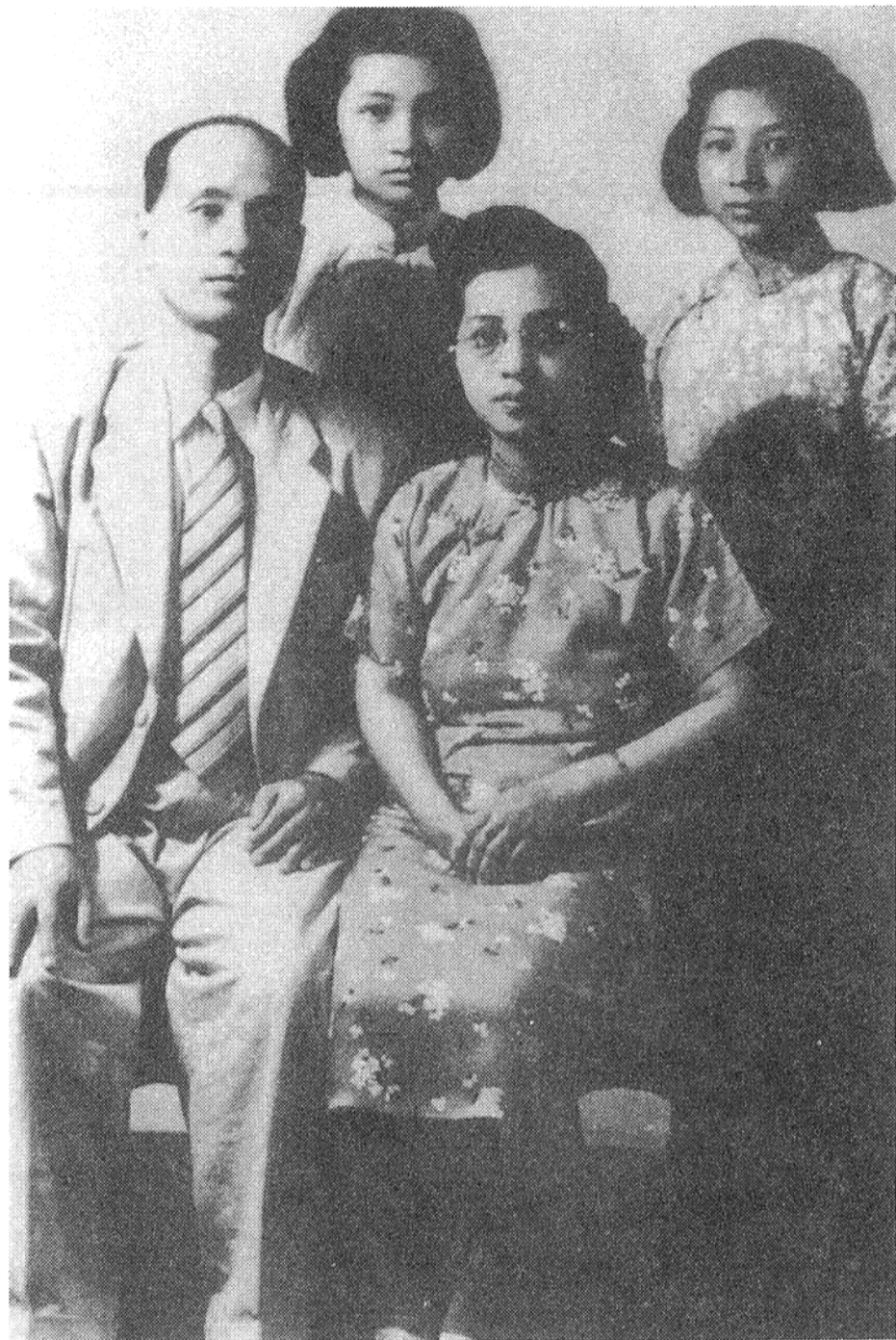
一九七四年二二八紀念會結束後的第二天，陳文彬來找我。正在聊天時，大約十點多蘇新打電話來問昨天開會的情形怎樣，我告訴他文彬在這邊，他也跑過來。三個歷盡滄桑的人無所不談，特別談到王白淵和呂赫若的死，大家不勝唏噓，文彬更是含淚哽咽，他和白淵、赫若都很熟。文彬是一個有感情、有熱血的人，不是冷酷的人。

陳文彬於一九〇四年出生於高雄燕巢，他祖父因西來庵事件被日警拷問致死，自小埋下了深厚的抗日民族意識。他在一九三〇年畢業於日本法政大學後，到上海復旦大學任教，



陳文彬接受《人民中國》記者採訪。

一九三四年再到日本法政大學執教。日本戰敗投降後，他與日本愛國僑胞一起組織了台灣同鄉會和東京華僑總會，均被選為會長。一九四六年陳文彬全家回台，就任建國中學校長並在宋斐如（當時的教育處副處長、台南人）主辦的《人民導報》擔任主筆。二二八事件中，他為了保釋被捕建國中學學生赴警備司令部交涉，結果學生被放回，陳校長卻被拘押到五



陳文彬全家在台灣時的合影。

月方才釋回。一九四九年爆發台大師院學生的「四六事件」，全省開始軍事戒嚴，陳文彬在友人區巖華（宋斐如之妻，一九五〇年白色恐怖中被殺）的協助下逃離台灣赴北京。

陳文彬是一位傑出的語言學家，長期從事文字改革和拼音文字的研究。在大陸先後任職人民大學、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研究員、中國語言學會理事。當選第三、四、五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台盟總部理事。他還參加了《毛澤東選集》第一、二、三、四卷的日文翻譯工作，並編寫了一本日本版的《人民中國》，為中日友好交流貢獻不小。我問他說：《人民中國》編寫的內容那麼好，是真的嗎？我回來看並不是這樣。他說：是的，文革之前真的是這麼好。文革時他也被下放，一些書都當廢物賣掉，但他自己並不太說過去如何吃苦的事。

當天，我們三人一直聊到下午六點才分手。

在病榻邊

分手不到一個月後，他竟因病住院。三月二十二日，我去醫院探望他，在病床上他傷感地說大概不久會死，遺憾沒辦法回台灣了。我安慰他說：「文彬仙，你要堅強點，台灣現在還不能回去，不久就可以回去了，你身體要保重才可以回去，否則你就盼不到回台灣了。」他點點頭笑笑，結果真的痊癒了。他有二個女兒，一叫陳惠貞，另一叫陳蕙娟，長得很漂亮，講日文和日本人一樣流利。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一日，北京天氣寒冷還有殘雪。昨天在招待會上碰到陳文彬女兒，她說文彬病重，醫生說約略二禮拜之餘生云。想去探視他，但天氣太冷身體又有點不舒服，就由內人玲代我去首都醫院看他，王大夫碧雲也一同去，我在名片上寫了問候語託內人給文彬兄：「文彬老兄勛簽：聞你住院，不勝繫念，希早日康復為台灣老鄉盡一臂之力！」

內人玲回來說文彬能夠讀，且讀後向我點點頭。

在病榻上聞蘇新噩耗而悲痛萬分的陳文彬，一年後也走了。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同樣是陰寒的隆冬，我搭國務院的車到八寶山參加陳文彬的追悼會。周培源讀追悼辭，林麗韞、徐萌山、甘瑩等都參列了。在凜冽的寒風中，我走上墓園，這裡是我回北京後，來了無數次的地方，送走了周總理、朱德……順路看了許多烈士的墓碑，也看了許多遺影，蘇新、蔣瑞仁（時欽），現在是陳文彬……。又回想起二十年前送走的王

井泉、張深切、王白淵……真感慨萬千，老朋友都凋殘零落，或許我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陳文彬詩稿中有一首〈懷念宋斐如，區嚴華二烈士〉：

病床心事有誰知？廿餘年來未息時，
華姐志貞成白骨，斐兄英烈竟沉屍，
神州統一期明白，故里終歸展赤旗。

三、蔣時欽——蔣渭水次子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又是北京隆冬，剛好三天前台灣爆發了高雄美麗島事件。早上，我們到八寶山公墓禮堂參加「陳玉堂同志追悼會及平反儀式」。陳玉堂就是蔣時欽（瑞仁）老友回國後改的姓名。追悼



陳逸松（右）、蘇新（左）在陳文彬病榻旁。

會上，除了蔣時欽妻傅莉莉（原名傅百合），及其二子一女蔣維華、蔣和明、蔣維春遺族外，還有蔡子民、李玲虹、吳克泰等台胞領導列席致悼辭，但沒有容許遺族親友致辭。光復初同在《政經報》工作的老戰友顏永賢（後改名顏光）在上海趕不上來，蘇新身體不好也不克前來。

蔣時欽是蔣渭水的次子，戰前到上海在報館工作，接觸到中國左翼文化和共產主義思想。抗戰勝利後回台灣，先到《政經報》當編輯，並以蔣瑞仁筆名發表台灣要高度自治的評論，後來參加蔡子民編的《自由報》。二二八事件期間組織「台灣省青年自治同盟」投入反國民黨運動，遭通緝逃到香港從事中共地下黨活動。一九五〇年新中國成立後，先到福建工作，後轉任北京在中央廣播電台從事對日本廣播；其妻傅莉莉是內人玲的小學同學，先在電台當會計，後調到廣播學院擔任日語教師。依稀記得，在二二八事件期間，蔣時欽和顏永賢兩人曾到我法律事務所來辭行，前往大陸以後兩岸分隔，三十幾年恍如分處兩個世界，直到我回北京才得再見。

我在北京期間，傅莉莉經常帶孩子到我住處，一起聊天，也經常陪內人玲一起上街購物辦事，十分親近。

四、陳秀美（陳若曦）——像做了一場夢，還是一起走吧！

陳秀美（陳若曦）及其夫婿段世堯，早在文革初期的一九六六年就舉家回大陸定居。他

們的勇敢決斷，在美國的台灣留學生中造成轟動。回大陸後，秀美及其夫卻音訊杳然。大家都想知道他們的下落，回去的人想找他們也找不到。因此謠傳紛紛，甚至有傳說：這個人一定很重要，大陸不知在哪裡祕密訓練他們，以後解放台灣大概要重用他們。因此，在我決定回大陸時，就有台灣留學生囑託我到大陸後一定要找到她。這事，我就告訴老侯和郭局長，請他們協助安排與秀美見面。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我們在上海送女兒一家人回美國後，專程前往南京，於七月六日與秀美夫婦見面。當時，他們夫婦任教於南京華東水利學院（現河海大學）。在與秀美見面前，老侯事先告訴我們說：我要給你們心理準備，聽說他們夫婦要申請出國，不過現在正在工作中，他們要是沒提起就不必問他們了。老侯也很周到，還拿了一些紀念品要我送他們。我們見到秀美後，老侯就走開，他怕我們怪他處處監視，並說一個鐘頭後再來接我們。我和秀美夫婦私下談，其夫沉默不大講話。我問你們來這裡好嗎？他們答說很好，什麼都說很好。我忍不住說：你說什麼都好，可是我聽說你們要申請出國，他們嚇一跳，後來才道出實際情況。他們和工作單位處不好，遭為難，段因經歷文革風浪一定要出去，秀美並不這麼想。當時她先生已從下放地回到南京教書，二個孩子都在上學，是回到北京後生的。秀美則是從下放地提前結束回來。她最初以為發生什麼事，怕是不是又有新麻煩；她個性隨和，易與人相處，和大家交情都不錯，大家都叫她還是回去一趟看看。

回北京後，我向國務院反映他們的願望，並要求把他們調到北京來。國務院極力要留住

他們，特別是郭達凱局長很幫忙，把他們調來北京，給他們好條件，升薪水配住宅，因此秀美一家人都來北京暫住在華僑飯店。段世堯怕再來一次文革被鬥，還是想出去；秀美比較無所謂，她表示：我在這裡也住得習慣了，和人都談得來，他們現在對我這麼「好禮」，再住下來也好。本來他們想只段世堯一人出去，秀美母子留下來；但秀美又不忍讓段一個人單獨出去，就說像做了一場夢，還是一起走吧！後來兩夫妻決定一起出去。於是國務院命令其工作單位南京水利學院准其出去，一家人於一九七三年底到了香港。但那單位似乎不太願意全力配合，所發文件有記載不完備之處，使他們到了香港後小孩無法入學。他們又火急寫信給我，我向郭局長說，才又急忙補了一張證明，讓小孩得順利上學。

秀美在北京時已和我們很熟，幾乎無話不說。她常告訴我們一些他們在文革中遭遇的事。內人鼓勵她說：如果是事實，出去後就把它寫出來。果然，她到了香港後以陳若曦筆名發表了短篇小說〈尹縣長〉，在海外造成轟動，也引發了爭論，有人說她對，有人說她不對。在香港住一年後，她移住加拿大再到美國，最後回到台灣。

五、天文學學家劉彩品

我還在台灣正想出去時，就稍微聽過劉彩品的名字，知道她在日本反國民黨的事蹟。劉明告訴我劉彩品是他的姪女（是劉明二哥劉傳能的女兒），在大陸很有名，到大陸後可以去

找她。當時劉明表示有機會他也想要去大陸，不要留在台灣。我到了日本時，日本人權運動家川田泰代也告訴我劉彩品事，希望我到了大陸可去找她。到了北京後，我們就告訴郭局長想見劉彩品，當時她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擔任研究員（全中國最重要的天文台）。不久，大約十月初，劉彩品帶著兩位小兒子到和平賓館來找我，我空出一個房間讓她住，兩個男孩正調皮的時候，高興得在床上跳來跳去。後來她來找過我幾次。她擔任過第六、七、八屆的全國人大常委，當過台盟理事，她也是第一個主張送熊貓給台灣的人。

她是嘉義人，在一九五六年留日，讀東京大學天文系。一九七〇年她拒絕再用國民黨的護照，也不願意申請日本國籍，在〈致蔣幫的斷絕關係信〉中宣示：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決心行使行動和良心一致，拒絕支持一貫代表買辦利益的台灣國民黨，堅決同七億五千萬的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反對人民的公敵——國民黨。

雖然日本政府給予她「無國籍人士」的居留權，有許多日本進步團體也聲援她，一九七一年經周總理的安排，劉彩品和同樣研究天文學的日本人丈夫木村博，舉家遷居南京。

一九七六年——新中國最激動的一年

一九七六年，我經歷了新中國最激動的一年；那一年，也是中國革命歷史轉折的一年。

一月，周總理去世，接連著以追悼周總理的形式在四月五日發生了第一次天安門事件；七月，朱德過世；七月底，發生了唐山大地震；九月九日，毛澤東過世。十月底打倒「四人幫」後，華國鋒升任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我到北京也屆滿三年，從三月開始，因周總理已過世我就想出去走走，到美國看看兒孫們。經過一番手續，終於在十一月二十三日飛離北京，先到日本後到美國。

一、周總理逝世（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整個北京都哭了！

在我到北京剛剛度過第三個元旦的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早上，一通電話把我從睡夢中吵

醒，是日本《朝日新聞》社駐北京記者田所竹彥的電話，他告訴我周總理在昨日（八日）上午九點五十七分長逝了！我吃了一大驚，他以記者的身分馬上採訪我，要我談談對周總理的感想，我說：

我與總理見過三次面，共深談過十小時左右，印象非常深刻。總理對台灣很關心，台灣人所掛慮的事，他都很周詳考慮過了。不過，他說關於台灣的事，詳細的做法，都要與台灣同胞商量進行。

上午十點多星吟來說，一早就從收音機聽到周總理去世的消息。

夜晚老侯與老武二人來，提交我一份「周恩來同志治喪委員會」的通知信，通告明天一月十日在北京醫院向總理遺體告別，請我於四點半到五點半之間前往參加。侯、武二人都很沉重，說總理在一九七二年就知道罹患癌症。內人玲聽到噩耗，在旁泣不成聲。

十日，天晴但寒冷。下午四點專車來載我到北京醫院。下車後隨著長列進去，署名後掛了喪章進入靈堂，看到除了一個「恩來戰友，小超哀悼」的致哀牌子之外，什麼文字都沒有；看了再看「戰友」、「小超」幾個字，眼淚不禁奪眶而出。「小超」是周總理對鄧穎超的暱稱。再進去，看到總理橫臥在靈堂中央，胸部以下用中國共產黨旗覆蓋著，總理面容如故，眉毛濃密不變，只是唇邊呈黑色枯竭，使我想像他最後幾天的痛苦，淚如雨下，看不清周圍了。

看到羅青長同志淚眼相逢，又不禁悲從中來。繞了一周後，就與周總理遺體告別了。外面寒風凜凜，找了好久才找到我的座車（因匆匆忙忙忘了問車號和司機名），又沒穿大衣，全身凍透回家，內人玲還在悲傷中。

一月十四日，下午三點與內人玲二人出發去天安門前「人民英雄紀念碑」。沿途看見一陣三、四十名的人民群眾捧著總理遺像和花圈走在前面，後面群眾的陣列在長安東街綿延幾公里，在路上默默而行。我們看到一隊「北京市水電工業局」的群眾，捧著鎚子和鐮刀的紅牌正在休息，遂決定跟隨這群進入廣場。行列進行很慢，步行一小時才到達碑前，有一領導唸了追悼文及誓辭。大家默哀敬禮後，照原路走出長安東街。

一月十五日，下午二點十五分，坐車到人民大會堂，參加總理告別式。大家先進新疆廳休息後三點入場，大廳已站滿人。人大及國家幹部站好後，治喪委員會的人進來站在我們前面。鄧小平副總理致二十分鐘的悼辭，全場哭聲四起，悼辭畢，大家行到總理骨灰罈前敬禮，然後對鄧大姐及遺族致悼意而出。

雖然四人幫禁止大家戴黑色「腕章」，但大家都佩戴。我問人何處可買，他們說布店都有，大家都排隊去買，一個一、二分錢。很多民眾在家中掛上周總理的照片、供花、披黑布條，自發地表示哀悼。我也買了一幅掛在室內牆上，蘇新也掛了，可見得民眾普遍對他的敬愛。

當他的遺體要送到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的時候，從長安大街到八寶山沿途民眾大排長龍送別。本來民眾捨不得讓他的遺體火化，鄧穎超出來宣布那是周總理的遺囑，要求大家體諒，

否則就違背了總理的心願，大家才哭著送別。那些執行火化的人也哭了，整個北京都哭了，實在是非常感人的一刻。後來我碰到兩位日本人，一位是藤山愛一郎外相，他說他一生除了父親去世掉過眼淚之外，就是周總理去世讓他落淚；另一人叫岡崎嘉平太，岡山一中出身，後來當過日本航空董事長以及中日友好協會會長，他也對我說，聽到周總理過世掉下了眼淚。他們都很敬佩周總理，知道他雖然是站在中國共產黨立場，但口頭上從不說階級鬥爭的問題，和日本人或亞洲人交往先講團結，為建立新中國煞費苦心。

周總理生前交代，骨灰要稍停放於人民大會堂台灣廳，表示對台灣同胞的關心，所以在台灣廳停放了一夜後，分成很多部分撒在全國各地。在我與總理的幾次見面談話中，他真誠地說其實台灣同胞都是我們自己的同胞民族，最後大家終究要統一，至於如何統一，那要和台灣人民商量，他講了很多次「要和台灣人民商量」。後來，葉劍英在「葉九條」中不寫和「台灣人民」商量，只寫和「台灣當局」商量，我提出不同意見說，你可要和「台灣人民」商量才好，後來才改了。

就如我在日本《朝日新聞》的採訪中所說的：

「周總理一向從台灣人民幸福的觀點出發，周詳考慮問題。聽到他說台灣問題的解決要和台灣人民商量決定，使我感到安心。他為人溫厚，通情達理，感情和理論兼備，真不可能再碰到像這樣偉大的政治家了。」

二、第一次天安門事件（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自有擒妖打鬼人

四月二日，是一個陰冷又下著小雨的天氣。我走路到天安門前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去看人山人海的群眾自動集中在這裡，為悼念周總理獻花獻詩文的情景。有幾萬人，從二、三天前就不斷聚集在那裡。人潮甚為激昂，我擠入碑前，左腳布鞋被人踩脫去，急著撿起來，裸著腳被人推了幾十步才穿上去。我抄了一首掛在碑上的詩：

紅心已結勝利果，碧血再開革命花

倘若魔怪噴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

六點半才回賓館。

四月四日，清明節，近百萬激昂的民眾集結在天安門，或暗或明地表達要打倒極左派。

四月五日，獨自坐二號車去前門，但長安街不許通過，由南河沿南下到反帝路，在前門站又不許下車，已是人山人海，到了珠市口才下。買了幾本書後步行向人民英雄紀念碑直去，但是到了外交民巷前面有民兵阻止不許進去。遠遠望見紀念碑上的花圈全被撤清，但群眾簇擁在上面和周圍民眾估計有十萬人，我徘徊後，右折出外交民巷，共走了八、九公里，晚上七點才回到賓館。次日，聽說天安門前相當騷動，抓了很多人。

四月七日晚「聯合公報」報導：中央決定提華國鋒為第一副主席及國務院總理，並剝奪鄧小平一切黨內外職務，只留黨籍云。次日，《人民日報》報導了「中共中央任華國鋒為第一副主席及國務院總理」的消息，還有關於「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詳細報導。

三、人大委員長朱德過世（一九七六年七月五日）

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夜八點半，人大常委會來電話通知說九點要開會，當時我正和老侯在下棋，匆促結束等車子來接。九點十分出發到人民大會堂，從南門上二樓小會議室。九點三十五分開會，吳德副委員長報告說朱德委員長於今天下午三點一分去世。接著李素文報告說八日向遺體告別，九及十日開放弔唁，十一日追悼會。散會回來，才告知內人玲，兩人內心沉痛。

七月八日，下午四點老武帶車來，我搭車去北京醫院，向朱老總遺體告別。我簽名掛黑喪章進去，隨著長列緩緩前進，瞻仰老革命家朱德同志遺體；他面貌如生，肥胖長身宛然睡大覺，三鞠躬致敬而別。七月十一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追悼會，華國鋒總理致詞後，我們進去向骨灰罈敬禮，前後半個鐘頭結束。

四、唐山大地震（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八月十七日）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昨夜極悶又下暴雨，老侯與我下棋到凌晨三點多，他回去後，我正在看書準備睡覺，忽然天動地搖，發生了我未曾遭遇過的大地震，持續了大約二分鐘。台灣常有地震，我們比較不怕，就鎮定地把棉被蓋在頭上以防萬一。地震過後我跑出去看，和平賓館有些住戶的屋頂塌了一大部分，落了一地磚瓦。老侯跑來看，關心我們的安危，許多人驚恐萬分，大家商議結果，怕地震再來，要大家暫時到大型旅行車上避一避。那時紀律很好，賓館經理自己家裡都不顧只忙於公務，地震後馬上來緊急處理。晚上又來一次相當大的地震，出去看到金魚胡同那邊的磚造煙囪還在大動搖，罕見的奇觀。後來才知道，這次大地震是以京津唐為中心，平均有七點五級的強震。次日老侯來，說這次地震唐山地區特別厲害，有八點多的強震，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房屋倒塌，死傷慘重。老侯拿來二張行軍床和蚊帳，排在車子左邊近屋簷下，給我們睡得舒服點，老侯警告說地震緊急警戒可能要持續十數天，要大家小心注意。

八月二日，走去王府井，進入錫拉胡同看看，許多土石造的牆壁被震落不少，再去東安門南街，道路兩側都是民眾搭的臨時帳篷，民眾好苦，但都毫無憂色。八月三日，老侯來電話說情況好了一些，可回到房裡睡。八月八日，夜明星稀正是立秋好時節，但災情未定，令人不安。八月九日晚，帶著生活必須用品搬到新勞動人民文化宮（前清大廟後面），軍用帳

篷搭得很好，特別為我拉了室內燈，以便我讀書用。只有在吃飯、洗澡時回和平賓館。

八月十六日，老侯來說昨夜解除了緊急警戒，但和平賓館為前清木造四合院不甚安全，準備搬到他處，今天先回和平賓館整理行李。和平賓館的一二四房和一二五房，是我從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二日來到北京後入住的地方，一直是我的老家，共住了三年四個月又四天。搬離此處後去的新住處不知會住得比這裡更久嗎？次日晚，我與和平賓館的員工告別後，搭車搬到北京飯店三〇二一房，這裡成了我的新住處。

唐山原來是一個風景不錯的地方，地震前我們曾去過一次。當時同行的老侯曾對我說過，你別以為風景不錯，此地原來是有名的開灤煤礦，下面是空的，萬一地震來了不得了。英國資本在這裡挖煤礦挖了近百年，怎麼不會空呢？沒想到竟發生了特大慘劇，死了四、五十萬人。

這期間，政府在北京市木樨地著手蓋了「部長樓」，供給部長級以上及人大代表居住。那時這樓算是北京最堅固的建築，可抗震七、八級，共有十四樓的建築。老侯很親切，叫我去挑一套，他叫我看到合適才搬進去，搬進去就不能換了。經過數次到工地現場勘看，我挑了一個十一樓方位適當的房間，有四個臥房、兩衛浴加上廚房。後來我從美日旅行回來，在一九八〇年才搬進去住。自從離開台灣在外奔波近十年後，我終於可以安家落戶，又有一個藏書的房間了。

五、毛澤東主席去世（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

唐山大地震後一個月的九月九日，下午三點《朝日新聞》社的田所竹彥來訪，在談話中李金德來電話說：毛主席在今晨零時十分逝世，先予通知。田所聽到這重大消息，匆匆離開。四點，收音機就播出了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及軍事委員會公告的毛主席逝世全文。五點，我與內人玲特別步行到天安門，對毛主席遺像敬禮後，再走過廣場去「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沉默致哀。有《人民日報》記者問內人，內人說台灣回來的。次日朝，北京飯店販賣店的服務員說對外賓免費供應黑色腕喪章，我們取了二條戴上。

九月十一日，下午四點老武帶車來，提示「毛澤東主席治喪委員會」的信，今天下午五點在人民大會堂向毛主席遺體告別。坐車到人民大會堂，從北門進去後到右邊小廳堂等候，人大及政協常委在那裡集合（蘇子蘅也在）。等到五點，一起進入弔唁大廳，排一列走到毛主席遺體邊敬禮默悼而出。九月十三日，朝五點再出發到人民大會堂，分兩邊四人並列走進弔唁廳，向毛主席遺體致哀。

九月十八日，參加天安門上的追悼大會。下午一點搭車在如潮的人流中到達中山公園，碰見榮毅仁、王芸生、孫起孟和蘇子蘅等人，一同進人大、政協休息室，三點前登上天安門前架設的席位，面對著天安門廣場上百萬工農兵整列而待，場面浩大。王洪文擔任司儀，華國鋒講悼辭，到三時三十五分全體向毛主席遺像（新設特大黑色）三鞠躬後禮畢。

六、粉碎四人幫大遊行（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

一九七六年十月中旬，外間就廣傳中國發生了政變，有四位要人被捕的消息，還說在上海有幾萬人示威云云。

十月二十一日朝九點左右，我從北京飯店三樓（三〇一二號室）看下去，長安街有大遊行；用望遠鏡看，看到有一打倒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張春橋四人幫」的標語。我與內人二人趕出去看，乃是浩浩蕩蕩的大遊行，鑼鼓炮竹喧天。因天氣太冷，想回樓加衣而與內人玲失去聯繫。乃向天安門獨自步行，在途中與內人相會。隔日，從早到晚，前面的長安街熱氣騰騰，一隊隊人潮像井岡山的紅軍，至誠為人民的精神洪流，可見得大眾對過去空論派數年的囂張，表現出百分之百的憤怒，所有圍觀的內外民眾都深受感動。

第三天，從八點開始我就被鑼鼓鞭炮聲吵醒，從窗外望去，從東單方面紅旗林立，旗旌飄揚，人潮湧向天安門，川流隊伍到黃昏方止，可能有幾十萬人。十點稍過，郭局長和老侯來，郭局長說明這次事件之概要：王、張、江、姚四人幫老早就被毛主席識破其野心，毛主席屢次勸江青要有自知之明，但毫不悔改以致有今日，這數年來國家大事受這四人幫之干擾很大，以後國家之前途會更為光明，建設會加緊進行云。因為司機下午也參加遊行，所以十一點稍過他們就離去。郭局長的談話是依照筆記說明的。

二十四日朝，老侯拿來特急函，是北京革命委員會的招柬，內容為：「為熱烈慶祝華國

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熱烈慶祝粉碎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的偉大勝利，定於今日下午三時，在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百萬群眾慶祝大會，請參加」；又附寫著憑東上西紅禮台，內人是上西四台。下午車來接，到中山公園後分上觀禮台，參加群眾有近八十萬人之多。大會開始後，由吳德講話，接著解放軍、工農兵、紅衛兵、貧下中農等代表講了一個半小時後，群眾大會結束。

七、北京惜別（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周總理去世給我很大的衝擊，不禁回想起這三年來，從衝破各種禁忌和樊籬回來，在中國大陸經歷了大小事情，三年恍如隔世，遂興起了出去走走的想法。由於周總理的盛



與溥傑夫婦攝於北京。右起林玲玉、陳逸松、溥傑、田所竹彥夫人、田所竹彥（《朝日新聞》駐北京特派員）、溥傑夫人。



1976 年陳逸松與溥傑，攝於北京和平賓館。



1976 年攝於北京和平賓館。左起溥傑夫人、史迪威將軍大女兒、陳逸松、史迪威將軍二女兒。

邀我才回到中國大陸來，也是有感於他溫厚的人品和對台灣人民的關懷，還有對我的生活和行動上的寬厚，才讓我決定留下來並擔任全國人大常委的職務。現在他已過世且人大第一次會議也已結束，我就想出去走走，看看外面的變化，去日本探訪友人和去美國探望子女。

三月，我就把這想法通過老侯傳達上去。老侯回來說：勸我暫時不要出去，但如果仍堅持要出去的話，沒有問題。本來他們要給我由公安局發的公務護照，當時中國護照全由公安局發，但我堅持要由外交部核發的個人護照；經過他們研究後，終於在五月十八日由老侯拿了外交部發的護照，是公民普通護照，可前往世界各國，有效期限五年，後來我用這本護照入境日本和美國時，還引起一陣轟動，大家爭相傳看。

但是，美國的簽證卻遲遲沒發下來。當時認識了來中國訪問的史迪威將軍（Stillwell）的兩個女兒：Nancy Stillwell Estabook 和 Alison Stillwell Cameron，她們剛好同住在和平賓館。由於《朝日新聞》田所竹彥的邀宴，認識了她們以及前清遜王之弟溥傑和其夫人，以後就常有往來。經過她們的熱心幫忙，我才在九月順利拿到美國的簽證。至於日本的簽證，也承蒙田所的從旁協助，在十月才拿到。

自從毛澤東去世後，整個北京有一股沉悶的氣氛，情勢不明朗。十月初林盛中來，就說他的單位已貼出華國鋒同志為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的大字報；田所來也說他看到一樣的大字報。老侯也好幾天沒來，僅來電話說羅部長還病重，郭局長、廖公也都住院中，可能要到底才能成行；並說，出去前中央會有人和我會晤談話，請我稍忍耐。一直到月底，正式舉行

了「慶祝粉碎四人幫」、「慶祝華國鋒任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的群眾大會後，政治情勢才逐漸明朗，但是中央似乎還在忙著安定政局。閒時去朝陽門內部書刊書店，也沒什麼新出版的東西，陳列的書籍顯得少了許多，或許是「運動」的關係吧。

到了十一月中，才正式決定在二十三日離開北京先飛赴日本再到美國。我先去向蘇新告別，提些香菸、水果、衣衫等禮物去，內人在別室與翁大夫（翁乃玉）談話，並接受其火撥治療，我與蘇新談話惜別，送他一枝原子筆方便寫作。辭別時，他們送我們到辟才胡同外，我們上車互為揮別。此別，何時再見，一時難說，不禁一陣心酸。十七日夜，老侯陪我們到人民大會堂會晤幹部，有李金德、熊向暉、蔡嘯、林麗韞、郭達凱出席，大家晤談道別。次日，參加人民大會堂徐向前副委員長的送別宴，同席的除了昨夜幹部以外，有廖承志及夫人經普椿、林平、蘇子蘅，大家交談國際局勢甚為熱鬧。十九日下午，郭達凱局長來，帶我們到北京醫院去探望住院中的羅青長部長，老侯在門口等候然後一起進去，病院十分清淨，羅部長精神很好，他說周總理生前很關心我們，也很關心台灣同胞，希望我們出去要十二分小心，不要被壞人利用。

二十日上午九點，老侯來飯店說，上面同志要來看我，所以叫人來把一些雜亂的箱子行李搬到別室、陽台，也不明說是誰，高深莫測。到了十一點，才知道是周總理夫人鄧穎超要來看我們。本來要到三樓房間來見面，但飯店經理說有地震警報堅持在一樓座談。鄧大姐一如往常十分親熱，很平易近人。她說，總理到病逝前一直很關心我們，也囑咐他的骨灰要稍



1976年攝於北京。前座左起林玲玉、小川夫人。後排左起日本駐北京大使小川、陳逸松、田所竹彥夫人。

停在人民大會堂台灣廳。所以在八寶山火化後送回人民文化宮給一般人民弔唁三日，而後送回台灣廳停放一夜，翌日移到大廳開追悼會，再稍停台灣廳後，分成很多部分分撒到全國各地去。鄧大姐再三追述總理對台灣的關心，也希望我把這心意傳達給海外的台灣同胞。她談到十二點五十分，再三惜別後離去。離別前，我向她提出兩項要求：一是《海霞》影片中有一情節中的對話不適當，該片演到在發現壞人時說：「你是『台灣』來的！」這句話中的『台灣』應改為『蔣幫』；二是，文革以來對從台灣回來的人有另眼看待的問題，往往被視為「有海外關係」而受到不同對待，希望能趕快改正。鄧大姐隨即與李金德祕書長討論，認為應速改善。老侯送鄧大

姐出去後，再上來房間說，文革中受到苛待的不只是台灣人云。黃昏，我們到蘇子蘅家，向甘瑩與蘇民生告別。晚上林盛中來惜別。

二十三日早，在老侯、老武和郭局長的送別中，搭七點五十飛機經上海飛日本。送別中，連愛和我辯論吵架的老侯也泛著淚光。老實說，這二年多他對我的照料真是無微不至，經常陪我下棋到凌晨，十分感激他無私奉公的精神，真令我感佩。

四人幫後再訪日美一年（一九七七年）

一、在日本停留一個月——低調中受到熱烈的歡迎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十二月二十七日）

十一月二十三日清晨飛離北京後，本來要到東京但我在大阪就提前下機了。先把大件行李託運寄到救世教好友山本通子家，然後兩人數次轉車終於到深夜才抵達鎌倉，住進預定的旅館。鎌倉在東京南方的神奈川縣，搭電車到東京大約要二、三個小時。我這種安排，主要為了避開國民黨的耳目，因此連日本記者或日本特務急著找我都找不到。他們去問我的日本友人也是我的保證人法眼晉作，他也不知道我在哪裡。當時國民黨政府的反共戒嚴仍然十分可怕，何況我衝破這種政治網羅到了北京，在國民黨眼中是「附匪」、「叛亂」之徒；而且，我又擔任中國人大常委，是四人幫被抓後第一個從中國出來的政治人物，成了各方矚目的焦



攝於東京法眼晉作宅。左起法眼晉作、法眼夫人、林玲玉、陳逸松。

點人物，我必須十分謹慎小心。

住在鎌倉的一個月期間，林伯耀數度來訪徹夜談論，有時他也會帶愛國華僑簡蘇梅、《朝日新聞》社論副總主筆三好崇一、現代亞洲文庫會長小澤正元來，他們都十分關心中國和台灣問題。還有，在我離日前夕，《朝日新聞》的友人吉田實來旅館，進行徹夜訪談，約好了在我離日後隔兩天，十二月二十八日在《朝日新聞》上發表。

我經常搭電車到東京，去找人權活動家川田泰代，以及林加才、蔡江霖、林歲德、簡蘇梅等在日本台僑，還特別拜訪在靜岡地方開業的宜蘭同鄉楊坤焰醫生。在東京會晤了日本友人，也是岡山六高的前後輩同學法眼晉作（國際合作事業團總裁）和永野重雄（日本商工會議所會長）。法眼曾擔任日本外務省次官和駐蘇聯大使，與他見面時正好福田首相上台，我以個人和同學的身分向他保證華國鋒體制十分安穩，他答應兩三天之內一定去拜訪福田



1978年春，與日本眾議院副議長岡田春夫會談。

氏，迅速在締結中日友好協定中寫入反霸權條款。另外，也會晤了中日友好協會常任理事田中稔男、現代亞洲總編輯白西紳一郎、石堂清倫等人。

有一天，我特別住進東京大倉飯店，與林伯耀及其兄林伯叡和日本社會黨國會議員田英夫會談。接著，與日本著名的國會議員宇都宮德馬見面；宇都宮一生站在「反戰和平」運動的第一線，並致力於促進日本和蘇聯、中國、北朝鮮建交。後來他一直擔任「中日友好協會」會長，是中日友好事業的「掘井人」。有一次記者問他「為什麼喜歡中國」時，他不假思索說：「如果喜歡日本，那一定會喜歡鄰居和鄰國，不是嗎？」他一生訪華五十次以上，多次受到中國領導者的接見。

十二月二十七日是我離日的一天。一大早林伯耀到鎌倉來，叫了一部計程車直奔橫濱華僑街簡蘇梅的店，與川田女士、蕭承恩老先生、日本《共同通信》社記者會會合，大家熱鬧一番。下午搭車到羽

田機場，中村哲夫婦、林加才、陳重光等已在機場貴賓室等我們，大家舉杯互道珍重再見。我托運的行李超重，簡蘇梅替我交了二萬元超重費。她還把自用手錶送給內人玲，內人返送她我在瑞士買的項鍊，互作留念；林伯耀還特別為我換成頭等艙，讓我一路舒適飛行。在許多老友也是同志的盛情送別中，飛機向東行，在機上過了一夜。

翌日上午到達夏威夷，幾個朋友 Lonny Wigg 和 Reinecke 博士夫婦都來接機，安排我們和記者及中美友好協會的人座談。我們也見到了陳玉璽。在一九七七年的最後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晚八點，我們揮別了夏威夷的朋友直飛舊金山。

二、歷遊美國一年——遍訪各地愛鄉愛國學生和僑胞

一月一日零時抵達舊金山機場，開始了我們一九七七年的美國之旅。許多老朋友到機場來迎接，有郭雪湖及其子松年、女惠美和剛到美國不久的彭德夫婦，還有趙先國等。我們先分別在彭、郭兩家住了幾天，這中間到加大柏克萊和許多華裔科學家田長霖等座談，談論十分熱烈，他們都很理智又很愛國；還有，幾乎每晚都和許多從各地來的青年學生進行座談，當地的報紙《時代報》和《大公報》都刊登了我們活動的內容。

我在日本《朝日新聞》上的問答

郭松年說，十二月二十八日日本《朝日新聞》已刊出了我在日本出發前的訪談——〈與陳逸松的一問一答〉。他說該篇訪談對美國當地的左右派都有很大的影響。在這〈一問一答〉中我主要闡述了對時局想法：

一、四人幫之後的中國

四人幫之後，葉劍英、李先念、譚震林、徐向前等指導老幹部，都支持華國鋒新主席的誕生。中國的將來與過去四人幫獨擅的時期不同，有很清楚的展望，沒有什麼不安的問題，而且在北京，鄧小平很有人望，我想，他復出只是時間早晚。

二、台灣問題

與周總理的三次深談中，周總理再三表示：

- ① 台灣的大多數勞動人民（包括工人、農民、中產階級、民族資本家）必須當家作主。
 - ② 為此，最重要的是台灣人民的自覺，有必要促進台灣人民的覺醒。
 - ③ 台灣與中國統一之後，可能有相當長的過渡期，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應該怎麼做，希望台灣人民自己提出方案，要聽台灣人民的意見。
 - ④ 即使台灣復歸了祖國，台灣人民的生活水準也絕不會降低。
- 另外，這完全是我個人意見，對於蔣幫，應該在適當時機，事前通告後進行行政接收，

但一定要避免同胞相殘。

三、中美關係問題

美國卡特總統任內應該會進一步推進中美關係正常化。至於，關於中美關係正常化中的台灣問題，中國的原則很明確：

- ① 廢止台（華）美協防條約（廢約）。
- ② 駐台美軍撤出（撤軍）。
- ③ 斷絕與蔣幫的外交關係（斷交）。

這純粹是我個人的見解。如果美國真擔心中國會以武力解放台灣，美國只要單方面宣稱「嚴重關切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就好，美國沒有必要對中國有更大的要求。中國堅持台灣問題乃內政問題，絕不會與外國約定不使用武力。

四、中日關係

中國農業機械化需要大量良質鋼板，中國可以輸出過剩的石油與日本交換輸入鋼板，此乃緊急課題，從這觀點來看，中日關係只要站在平等互惠、互通有無的立場，必定有光明的前途。至於締結「中日友好條約」的事，只要在共同聲明的第七條加入「反對霸權」條款即可。

五、中蘇關係

我這次出發之前，與解放軍元老徐向前將軍有一次長時間的面談，話題大多談到蘇聯的擴張主義和霸權主義問題。我試問他蘇聯將來可能會自我節約的問題，他笑說你與美國前國

防部長的想法一樣，他斷定蘇聯不知自制。其實，我到過珍寶島視察，依國際法，河流的國界線在中央航道，珍寶島位置離中線遠，近中國岸邊，因此屬於中國領土是清楚明白的事。

中蘇關係要改善，除了蘇聯以具體行動改變其態度之外，別無他法。然而，我們也並不是什麼事都要激化對立。

洛杉磯激辯（一九七七年一月五日）

一月五日我飛到洛杉磯，曾宗緯來接我到劉國安家。劉家來了二十幾位青年男女。我因旅途勞頓，座談會前就已感覺惡寒，講話不太順利。會上，我說明四人幫被揪出來後中國形勢大好時，有一個年輕人不服氣，激烈責備我否定文革，且態度不遜面帶怒容。我就說明，應該照毛主席所講的「文革七三開」。但席上議論太激烈了，我亦連日來旅途奔波，講話太多過於疲勞，先前就感覺末稍神經不自如，一時太生氣舌頭不靈，要講也講不出來，有如中風徵兆，大家嚇一跳，急忙扶我上樓休息，蓋上電毯才好一些。請來醫生為我診治，說因為太疲勞再加上情緒激動，需多休息。

一月七日，我到了德州休斯頓二女兒家，才得以安靜休養恢復健康。

三月二十六日，我應彭德的邀約又到舊金山，趙先國與雪梨來機場接我。彭德準備在五月一日去北京，行前想跟我好好談一談。在舊金山主要住在趙先國的公寓，他們用車載我到

處去與朋友見面，參加聚會，談論或時事座談。

四月三日，到柏克萊大學與項武義、王鏞、田長霖、何明修等愛國學人座談。我說請大家不要陷入理論的鬥爭，要以四個現代化為中心課題，對中央提出建議為好。

國民黨反共右派對我發動輿論攻擊

四月十二日，老趙弄來十一日的《明報》，其中有一特稿專對我批評。又十日的《新報》也有更大一篇批評我，劉明朝、魏火曜、戴炎輝、康寧祥、陳進東等親友都被動員說了話。在旁邊的胡廉說，我們對這些造謠不要生氣，他會給《大公報》寫文章予以反駁。四月十八日，女兒來電說《中央日報》造謠，趙浩生去電要我闢謠，內人玲說不要管它。郭松年說，許多台灣留學生想聽聽我在大陸生活的感想，因為他們最近看了許多報紙說我不會再回大陸。由此可見，國民黨政權或一些反共派正在發動輿論抹黑我，甚至連不明事理的台灣親友、學者、政客也被動員起來，批評我。

在芝加哥、紐約與愛鄉愛國僑胞學生熱論

五月一日深夜，我們從舊金山飛芝加哥，林孝信到機場來接我們到蔡德音家，與蔡夫婦

互敘久闊。在芝加哥的幾天，每天都有從各地來的學生、僑胞，我和他們座談，還有人開了十多個小時的車來參加，他們愛鄉愛國的精神令人敬佩。六日到了底特律，八日到費城住李騰芳、紀乃虔夫婦家，次日，飛抵波士頓大女兒家。途中，到處與熱心擁護祖國關心台灣的學生或僑胞聚會談論，在談論中使他們更明白最近國內的政治路線和展望。

五月二十八日，到趙浩生家，來了許多耶魯大學的教授（張光直、陳光宇、陳得貴等）和留學生大家一起座談，大家都不了解四人幫這些年來的罪惡行徑。當天開車到紐約住進趙浩生在紐約的公寓。五月三十一日，到《美洲華僑日報》社出席座談會，還有《群報》、《台聲》及《海內外》的記者參加，我的談話有一要點：就是台灣問題有兩個過渡期，一是今天開始到解放期之間的過渡期，這時台灣人民革命起來打倒反動派，中國政府大概不會反對；第二是解放以後進入社會主義時期，有一個改造過渡期。六月二日，李文泉來接我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與兩位參贊談了一個小時後告辭。四日，張范雄和林景煌二人開車載我到聯合國會議場參訪。

在華府參加中國聯絡處的盛會，與郭雨新談台灣解放問題

六月六日，與趙浩生一同搭車到美國首府華盛頓。龍繩文（龍雲的第五個兒子）來接，住進他景色幽美的別墅式公寓。七日，到中國聯絡處見黃鎮大使、韓敘副大使、馬北強、田

友等。黃大使請我們吃晚飯，有趙浩生、龍繩文、李振翹、張捷遷同席。八日上午，郭雨新、翁啟元來座談，下午朱養民來座談後，去參加「全美華人協會」的歡迎餐會，有一百多名各地僑領、學生參加，出我料想之外的盛大。

在華盛頓的十日間，與傅涇波（前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祕書）、朱養民、何連玉等許多華僑學者見面。大家都憂心如焚地談到國內四人幫後的問題，亦希望國內多容許海外同胞回去探親或定居，貢獻其專門技術，以期中國早日達成四項現代化。有些人不願拿美國籍，等了二、三年，想回去定居貢獻所長都沒得到回應而頗為困惑，真值得同情。

我與老朋友郭雨新見了兩次面，深入長談。知道台灣島內民眾很不滿蔣幫的高壓政策，有如動亂前夕，他希望祖國能夠從各方面（物質、精神兩面）切實幫助島內民眾的抵抗運動，以人民革命推翻反動政權。我相信祖國政府不但不會反對，反而會幫忙；但我看國際情勢複雜，政府應付世局，很難確定何時著手解放。後來，我寫信給正在北京的彭德，說老郭希望他能夠與中央負責人詳述他的願望。

波士頓會王育德，談台灣解放問題

六月二十三日，我從華盛頓飛回波士頓女兒家。

八月九日早上十點，王育德來波士頓附近的羅德島某大學舉行的台灣同鄉夏令營演講後

來訪。互敘久闊後，熱談台灣解放的問題。他還是不了解大陸的社會狀況，以為我再回去就不能再出來了，勸我暫時不要回去；他認為照現況如果台灣與祖國統一，不是台灣人民的幸福，他希望大陸能使台灣人民有更多各種自由，他對台灣的社會主義改造是不反對的。一直到下午五點，五郎（一九七二年就已認識，張信凱）來接他，我一時認不出，他也沒有一句見面禮。幾天後，花俊雄來電說：王育德在 *Queens* 的演講會上說，某一從大陸出來美國的中國人代說，在大陸的台灣人也感覺到自己是一等公民云，我回說，我沒說過這種話。

七月二十一日，彭德從桂林來信說，與羅青長部長談了我的事。因中美建交在即，他想早點回美國與我及郭雨新共同商量準備，如果我能去舊金山見面，飛機錢他要付云。後來，趙先國從舊金山打電話來，我告訴他八月底會到舊金山，他說大家歡迎我去，房子隨時可用，中美建交已不遠，大家應好好準備才行。

舊金山的不安秋天——何時回去的意氣之爭

八月二十七日，離開波士頓飛往舊金山，老趙和湯錫章來接，住進趙先國的公寓。這裡比波士頓近郊的 *Winchester* 閑靜，適宜休息寫作。九月十六日，從北京回來的彭德來訪，說與老侯見了二次面，他轉達了老侯的話，老侯說：「陳老，外間有各種謠傳，所以快一點回來好。」但並沒有明確講我什麼時候回去最適當。我認為應該要向華府的聯絡處確認才可決

定什麼時候回去，而老趙等人以為老侯的傳話是要我趕快回去，為此彼此間有點意氣之爭。因此，我打電話給華府的龍繩文託他問大使，中央對我有什麼指示。在等待華府的回音期間，正逢十月一日國慶，下午去花園角看共和國成立二十八周年展覽會；晚上去中華文化中心看老趙的話劇排演，演出陳映真同名小說改編的話劇《將軍族》，劇中老趙飾演老兵，趙太太演台灣鄉下婦女，排演得很好。散會後，搭老趙車回公寓時突然發現門是開的，室內一片凌亂，竟然遭到小偷的洗劫；收音機、錄音機、錄音帶，還有六百元美金全被偷走了，損失慘重。我與內人兩人只有無奈相看，且感到極度的不安和悲憤。

此後要怎麼過，這才是我們的大問題。

華府黃鎮大使轉達我續任第五屆人大常委

十一月三日，幾經聯絡，華府聯絡處參贊謝啟美來電，說大使要我去華府一趟與我會談。七日深夜我飛離舊金山奧克蘭機場，在黑夜中飛向東北方的華府。八日，在華府見了黃鎮大使，黃大使說中央決定推薦我為第五屆人大常委，要我回去定居。我說如果能一、二年內出來日美等國，擔任疏通內外的橋梁作用，則符合海外僑胞的希望。大使說應該沒問題，不過要再明確請示，我說再等數天看看。十一日，聯絡處參贊謝啟美及田友來訪說，中央已有回電希望我們明年一月中可回去，再出來之事可依照國內辦法出來探親，現在還難預定下來云

云。十六日，我們飛離華府到休斯頓女兒家。

一九八七年一月，在朋友送別聲中經日本回北京（一月十七日）

從十一月二十六日到十二月十九日，近一個月的時間，我們到德州奧斯汀、奧克拉荷馬州的諾曼、丹佛、聖路易士等地旅行，再回到休斯頓。旅途各地都受到愛鄉愛國留學生如王義雄、周本初、李乃信、黃建寅等人的熱情接待。十二月二十八日，再飛到舊金山見老朋友。一月二日，這些朋友替我舉辦了送別宴，有九十多人參加，大家都熱烈發言，託付了甚多意見要我向中央政府進言。

一月五日，離開舊金山飛東京，六日晨抵達東京，有葛彥順、陳和協兩書記、川田泰代、郭雪湖、汪義正、泉鴻之（日本《共同通信》社外信部次長）來迎接，見了許多老朋友，為安全計，特別換了幾處住宿飯店。十七日早上，林伯耀來飯店，我打電話給法眼晉作介紹了林伯耀，並託法眼幫忙許多因逾期居留的罪名被日本政府收容在橫濱拘留所的台灣同胞，助其釋放（另外我附了一信，又附了一張被拘留者名單，以及我在美國一年的言論集複印本，請林伯耀轉送他）。法眼說林伯耀要去的時候，可先打電話給其祕書，約好見面時間。下午，在許多老朋友的熱情相送下飛離東京，到達北京機場已是晚上九點，老侯、郭局長、徐上元來接機，還是回到闊別一年的北京飯店住房。

在美國期間，國民黨當局不斷散播謠言，中傷我，說我「逃回自由世界」、「想在美國定居」等等。這次我再度回國，以實際行動打破了蔣幫的謊言，真所謂「謠言止於智者」。在我到達北京次日，日本《朝日新聞》刊出了我在日本時接受記者採訪的記事¹，在文末我強調了：

在四人幫時代助長了社會主義不要法律的風氣，然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還是需要法律制度。我作為一個長期研究和從事法律工作的人，願為整備（中國的）法律制度起一點作用，並願為實現國家的「四個現代化」盡微薄之力。

1 《朝日新聞》，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八日，〈中國全人代常務委員陳逸松談訪美一年經驗〉。

親歷一九七九年後中國的大轉變

一、一九七八年第五屆人大會議記實（二月二十四日——三月七日）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到三月七日，我參加了第五屆人大會議。第一天，我帶著行李到前門飯店台灣團人大代表處報到，被安排與吳國禎住同一房間。台灣團人大代表共有十三人，除我之外有田富達、林良材、林麗韞、李辰、陳木森、吳國禎、江水生、林敏敏、鍾炳松、蔡子民、馮炎火、林德時。第四屆的陳丁茂轉任北京市人大委員。李莉、鍾維旺都轉任全國政協委員。這次會議不像上一屆那樣保密，入住前門飯店後，可以打電話給內人，告訴她我住房的號碼。

第五屆人大台灣團中，新加入一位從美國回來的年輕學人吳國禎，增添了活力。吳國禎於一九四七年生在台北，一九七六年獲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博士，並於紐約城市大學進行博

士後研究。一九七七年起任職於中國科學院化學所近二十年，一九九四年獲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二等獎。曾擔任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常委、台盟中央副主席。

下面是人大會議經過。

二月二十五日，先召開大會的預備會議。宋慶齡主持會議，會議中選舉李先念為祕書長，選舉主席團，還有通過大會議程。我被選為主席團成員。會議後，馬上召開主席團第一次會議，推選主席團常務主席，通過大會日程，並確定大會副祕書長人選。

二月二十六日，第五屆人大正式開幕。由葉劍英副主席主持會議，華國鋒總理作政府工作報告。

二月二十七日，住前門飯店的台灣團全體代表，在團長林麗韞房間開小組會，討論政府工作報告，我講了話，提出具體改進意見。

二月二十八日，早上小組繼續討論政府工作報告。下午在人民大會堂台灣廳舉行二二八起義紀念會，廖承志、董其武和我講了話。

三月一日，在人民大會堂開人大大會。華國鋒主持會議，葉劍英作修改憲法報告，他講到二十一世紀中國會變成怎麼樣的時候，聲淚俱下，我也含淚聽之。

三月二日，台灣團代表開小組會，討論憲法修改草案和葉副主席的參考報告，我講了許多憲法參考提要；又通過政府領導人名單。夜晚開主席團第二次會議，主要工作：一、聽取各代表團討論政府工作報告及憲法草案及修改意見情況，決定提請全體代表討論。二、通過



1978年3月6日第五屆人大台灣代表團與華國鋒。第二排右一陳逸松，三排左一吳國禎。
(吳國禎提供)



1978年6月，華國鋒在人民大會堂與人大台灣代表團合照。(吳國禎提供)

五屆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委員、祕書長的候選人名單，以及高等法院院長、高檢長候選人名單，提請各代表團討論。三、布置討論總理人選。四、通過投票辦法。五、通過監選人名單，指定總督票人。

三月三日，台灣團代表開小組會議，通過主席團提示名單。

三月四日，上午開小組會議。夜晚開主席團第三次會議，討論名單等案，決議提請大會通過。

三月五日，下午三點，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第五屆人大大會。通過新憲法（七八憲法），以及國家領導人名單（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祕書長、人大常務委員、總理、高院院長、高檢察長等）。我以三千四百五十八票高票當選常務委員（有兩票劃叉號）。

三月六日，早上大家到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台盟）集合，一起參加慶祝五屆人大開會成功的遊行。下午，華國鋒來看台灣代表團，華主席說八年建設打下基礎，解放台灣是沒問題的。

三月七日，下午與林麗韞一起參加五屆人大第一次常委會，通過駐外大使任免案以及兵役法修改案。

二、一九七九年——中國大轉變

一九七九年是中國大轉換的一年。首先，全國工作的重點轉移到建設社會主義四個現代

化來。其次，是中美建交實現了中美關係正常化。再次，是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把台灣回歸祖國，完成祖國統一提到具體日程上來。我親歷了這個大轉換，親身感受到轉換中的希望和憂慮。

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二十二日）

大轉換從一九七八年年底開始。

十二月十八日到二十二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全會通過了：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在民主集中制中，特別強調民主與法制，強調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高度評價「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在經濟管理體制中，讓地方和工農企業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認真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克服平均主義等等。

中美建交（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十二月十六日，宣布中美正式建交。華國鋒主席與美國總統卡特分別在北京和華盛頓發表中美建交「聯合公報」。這天早上十點，電視實況播出了華國鋒招待內外記者的問答，正

式宣布中美兩國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同時斷絕與台灣國府的外交關係，確定在三月一日起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館。「聯合公報」重申了「上海公報」中雙方一致同意的各項原則，美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人民只同台灣人民保持文化、商務等非官方關係。

當天晚上，日本《共同通信》社和《朝日新聞》記者都先後來採訪我，要我對中美建交和台灣問題發表意見。由於我的身分發言要十分謹慎，否則容易引起誤會（譬如今年五月底，我對共同社和法新社發表了有關中美建交問題的意見，被誤會，曾引起軒然大波），因此這次我一一寫下我的意見交給記者，並聲明這純屬個人的意見和推測。第二天，北京積雪盈寸，早上吳英輔、王阿雄夫婦、江重光夫婦、吳國禎夫婦、廖秋忠夫婦、倪一偉、武進、謝文雄、陳兆賡等十四位保釣運動歸國的年輕學人，陸續來我住處。大家共同舉杯慶祝中美建交，聽台灣民謠，大談時勢，歡聲而散。我的岡山六高同學、前日本眾議院議員帆足計，也特別發來賀電說：「喜賀實現中美外交正常化，開啟台灣和平解放的道路。」十九日我參加了政協舉辦的中美建交討論會，我起來發言，希望大家注意到台灣民眾的情緒。

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人民大會堂開常委會，由烏蘭夫、耿飆主持。會上分發了「中國人大常委會告台灣同胞書」原稿（紅印、會後回收）給大家討論。許多人發言，林麗韞也發言，我贊同把「三十年」的字句改為「八十多年」，又在「中國已努力四個現代化」加上一「正在整頓民主法制」的字句。次日，召開五屆人大常委會五次會議，聽取黃華外長報告中美建交

情況，又通過〈告台灣同胞書〉，以及通過國務院部長、最高檢察院的人事任命案。

三、對台政策大轉變——

從「寄望台灣人民」到「寄望國府當局」的〈告台灣同胞書〉

一九七九年元旦，由中國人大常委會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這標誌了中國大陸對台灣政策的大轉變；由原本只寄望於「台灣人民」轉變為寄望於「國府當局」。對此，海外和大陸的「台胞」都極為錯愕。在這同時，年底台灣爆發了美麗島事件，國府以暴力鎮壓了民主運動和逮捕了許多民運人士，這給海內外的台灣人民造成極大的衝擊。在北京的我和台胞都憂心忡忡，台盟和政協也舉辦了許多次關於美麗島事件的報告會和座談會。

我應《中國新聞》社的邀稿，在美麗島事件爆發後不久，憤憤難平地疾書了〈驚風駭浪大時代！不要怕！——告台灣同胞書發表一年有感〉，我說：

〈告台灣同胞書〉剛發表了不久，自海外回來的同胞們許多人告訴我，看了這一份宣告書，好像是〈告台灣國民黨當局書〉，不似做一個中國的中央人民政府與離別八十多年的台灣人民講話的家信，不夠親切……

我進一步解釋，現今國府掌握軍警特：

而台灣人民身無寸鐵，又無充分團結一致的集體，做中央政府立場，只有通過和台

灣當局商談，結束現在的軍事對峙狀態，以便創造和平解決的前提和安全的環境。

我期許：

台灣同胞應大觀於此，對眼前之驚風駭浪不要懼怕，只要團結一致大力頂住，奮勇努力，建設民主康樂的社會。

在這同時，中共中央也開始轉變對大陸台胞的政策。九月發出了〈關於落實居住在祖國大陸的台灣同胞政策的指示〉，指出現居住在祖國大陸台胞同胞約有一萬七千人，應「一視同仁」，並在各方面「優先照顧」，並要求地方政府落實，列為重要工作之一。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全國台胞的首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會議宣告成立「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全國台聯），推選林麗韞為首任會長。

「葉九條」的衝擊（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

進入了一九八一年，這種傾向愈來愈明顯。

六月三日，北京替逝世的宋慶齡舉辦隆重的國葬，在唱國歌和國際歌聲中，將宋名譽主席安喪於上海萬國公墓。十月九日，首都各界人士隆重集會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胡耀邦、鄧小平、華國鋒等都出席了紀念會。九月三十日，葉劍英以向新華社發表談話的方式，闡明了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提出有九條建議（葉九條）。它包括：共

產黨和國民黨對等談判，實行第三次國共合作，共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以及為實現統一的建議。自此，北京的對台政策，完全由「寄望於台灣人民」轉變為「寄望於國民黨政府」。不久，全國政協舉辦了一次無黨派人士對葉九條建議的座談會，我在會上講了：目前，國民黨政府很難接受葉九條和談的原因有二：

- ① 國府固執於中國正統（所謂「漢賊不兩立」）。
- ② 國府與台灣人民之間的矛盾尚未解決。

有一天，開常委會出來，碰到葉劍英。他說，這九條建議對台灣人是好的；我搖頭說，這樣過去反國民黨的人不都變成了罪人，國民黨卻變成了你們的親戚朋友了。葉劍英回說我們是自己人，國民黨只要來談就好。我也向統戰部說，你們只想找國民黨談，對台灣民眾一點都不尊重；他們說現在國民黨掌握政權，不找他們要找誰？我說，台灣也有民主黨派還有「黨外」呀！為什麼不找他們談呢？

中國共產黨的對台政策，從周總理時候的「寄望於台灣人民」轉變到今天的「寄望於台灣國民黨當局」，可說是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對大家打擊很大。不只我一個人失望，所有曾經受到國民黨壓迫起來反國民黨的人，所有把反國民黨的希望寄託在中國共產黨，希望中國共產黨幫助他們打倒國民黨的人，都會感到失望。他們包括二二八後回到中國大陸的台胞，

還有海內外所有從事反國民黨運動的台灣人。

葉九條使海外的反蔣愛國運動失去了信仰和認同，許多人開始迷失、徬徨，使運動失去了動力而消沉，取而代之的是台獨運動的興起。

日美愛鄉愛國進步運動的退潮

在這前前後後，我亦感受到北美和日本的留學生、華僑進步運動，逐漸失去了動力，大多已解散了。譬如，我在一九八〇年六月到日本的二個月期間，林伯耀只來找我一次，川田泰代和簡蘇梅等人也只見過一次面，與一九九七年我在日本時大家經常聚會徹夜放談，縱論時局和台灣解放的熱情相比，消褪了許多。

同時吳英輔在台盟報告了在美國生活兩年的感想，讓我印象深刻，他說：

- ① 保衛釣魚台運動起來時，在美國統一派占上風，是主流，曾經有五十多個刊物；現在一個都沒有了，左派都各自孤立，銷聲匿跡。現在，台胞都不看《美洲華僑日報》了。
- ② 對目前的國共合作，台胞不了解。
- ③ 統一派沒有共同的語言，他們說大陸不關心台灣人民，且台灣人民在爭取民主當中大陸卻提出國共合作，太不合時宜。
- ④ 台灣島內已出現了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力量，得到相當多工人小市民的贊同。

四、大陸社會的變動

百花齊放，大字報

一九七八年四月，我有機會到北京大學訪友並在校園散步，眼看校園仍然荒廢，但樹下池邊到處都有學生專心在唸書或筆記本，這是四人幫後的新現象。我們也看到學生只有一碗飯加鹹菜的清苦生活，又看到許多大字報，大多是對過去受到四人幫之害的人出來訴冤的。

中共召開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中共中央把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爆發的天安門事件，定性為「革命行動」，並給被捕受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復其名譽。之後，大字報就如百花齊放地出現在西單的民主牆，近半公里的壁報聚集了數千人觀看。我經常搭公車去看，有時還手抄其內容，譬如「毛澤東有功也有過」的內容聚集了很多人。我從大字報知道有學生出版了《群眾參考消息》，為了鼓勵他們，我寄了二十元給他們，一方面捐助一方面訂閱，那學生叫夏訓健住北大紅三樓宿舍。他還派一位學生胥青到北京飯店來找我。他們有一股年輕人的熱情，希望中國先有民主法制，四個現代化才能上軌道。以後他們經常到飯店來找我，有時還帶德國的女記者來。幾個月後我對夏訓健說，近來我的工作和研究很忙，無暇顧及其他事務，希望他們自己掌握好自己的工作。

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召開五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時，討論了北京西單牆大字報問題。

許多委員批評，別有用心的人利用西單牆大字報進行違法活動，擾亂社會秩序。不久，北京市革命委員會通知，今後大字報一律改在月壇公園內張貼，因此，十二月八日起西單民主牆全部被刷清。

從物價到社會新現象

我們剛到中國時，物價便宜一般人的生活簡樸。我去理髮只要五角，這還算貴的；內人去燙髮需出示歸國證明書，即外面來的人才可燙髮，大陸女性都留直髮。郵資也便宜，一般信函每二十公克，本埠四分，外埠八分。我去口腔醫院做一副假牙才花十七元，一副眼鏡才二元，一開盲腸只費一元五毛錢，一本專業書籍只要二、三分錢，看場電影五分。一般人民一個月的生活費，只要八元就可以過了。後來一直漲到十元、十五元，但還算便宜。當時，人民幣與美元的匯兌比大約二比一，我去銀行兌換二百美元只換得三百九十元人民幣。在我還未正式擔任全國人代委員之前沒有領薪資，只是吃住免費，其他開銷得自付。要回北京前，賣藏書又遭趁火打劫，一毛未得，只有在出發前向朋友借了幾千美元充當盤纏應急，還好物價便宜，總算支應得過去。

那時，雖然物價便宜生活安定，但是都講集體利益沒有個人自由，個人能力沒有發揮的機會，一切都要按組織的安排。我們買東西都到友誼商店去，這裡的東西好，且應有盡有，

但一般人不能在這裡買，要有外匯券或者外國專家的證明才可以買。有一次我帶日本朋友去，就被店員告知不能買。這個友誼商店只專門賣給外國回來的或有特殊身分人，當時算是特權商店。另外，當時也有一個內部供應站，叫做「特供」，要副委員長以上的人才資格享受。我算部長級待遇，沒有「特供」的資格，連當時的羅青長部長都沒有。

到了一九八二、八三年，開始出現了個體戶，買東西就可以議價了，也開始有了較多選擇的機會。

這種生活，在一九七九年開始有了大變化。

理髮費居然漲到五元，幾乎漲了十倍；在北京飯店點一條油浸魚要價三十六元，漲得厲害。在社會風氣敗壞上，開人大常委會時，有委員痛心疾首地批評現在社會風氣不好，大男人竟然燙髮穿喇叭褲；胡喬木批評說：當今年輕人心目中沒有國家沒有民族，只有個人的將來，很可憂慮云。在街頭開始出現了行乞的現象，有一次，我們與林盛中到一間廣東餐廳喝生啤酒吃小菜，有一女人走過來對玲說：「是鄉下來的，帶孩子上訪來，請給幾毛錢。」玲給她五毛錢。又有一男青年笑笑過來談，我聽不太懂，盛中說，他要吃我們剩下來的。

我在北京的生活也開始起了變化。一九七九年底老侯來說，自十二月起我在北京飯店餐廳吃飯的消費，由原本簽名報銷改為國務院每日給我十二三元飯錢由我自付。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我住在北京飯店時，每次要去餐廳吃飯都感到頭痛，不知會點出什麼樣的西菜或中菜。又，每要入門心裡都很沉重：怕看那麼多人，大多是歐美中東人，又有

那些使我想起在美國女兒們的女服務員；更怕見到那些嫁得歐美人而傲岸對待中國人的那些「屑桶面」(Saitang-a-ming)的中國女人。

參與了中國三部憲法的修訂

憲法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大法，擁有最高的法律效用。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先通過了一個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直到一九五四年召開第一屆人大第一次會議才通過了第一部憲法（通稱「五四憲法」）。其後，一九七五年第四屆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七五憲法」，一九七八年第五屆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七八憲法」，一九八二年第五屆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了「八二憲法」。現行憲法就是「八二憲法」，它經歷了一九八八年、一九九三年、一九九九年、二〇〇〇四年的四次修訂。隨著「改革開放」的腳步，在一九八八年增加了「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範圍內存在和發展」，同時增加了「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的條款，二〇〇〇四年加入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尊重和保證人權」的條款，逐漸納入了私有財產權的規範。

我擔任過第四屆和第五屆的人大常委，親歷了七五、七八和八二，三個憲法的修訂。會



人大常委會開會情形，第二排左三為陳逸松。

議期間我個人力量有限無法有所作為，但我盡我的職責和良識良知提出了許多意見。

一、文革末期的「七五憲法」

一九七三年我回去的時候正是文革末期，四人幫的力量還是很大，在周總理的特別照顧下，我並沒有受到文革的影響。

一九七五年我擔任第四屆人大代表時，看到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在一九七〇年召開的第九屆第二次中全會通過的「憲法修改草案」，其總綱第二條竟然寫著：

「毛澤東主席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元首……林彪副主席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我認為把個人名字寫入憲法本來就很奇特，更不可思議的是，竟然指定接班人。因

此開大會期間，我看到周總理就向他說明這不合理，他聽了只是摸摸頭哈哈大笑。後來我才知道這問題在共產黨內部也鬥爭了許久。還好，人大通過的七五年憲法的總綱並沒有加入這條，取而代之的是：

「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國領導思想的基礎。」

當時仍在四人幫的控制下，七五憲法是在文革還未結束的時期產生的，其中反映了四人幫思想。譬如在文化領域要「為無產階級服務」、「為工農兵服務」、「與生產勞動結合」等等字句都是。相對地，周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就理性務實多了，他重申「兩步設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時間，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的現代化，亦即「四個現代化」。

這「四個現代化」的思想，在四人幫倒台之後，反映在「七八憲法」和「八二憲法」中。

二、在修訂「七八憲法」中的提案

一九七八年二月十六日，人大常委會舉行了「憲法修改座談會」。幾天前老侯就已送來憲法修改草案，我研究比較了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七五年的兩個憲法版本，提出了我的概論：

①我國憲法是軟性憲法，須實施一、二十年後才可修改，所以對於修改憲法要慎重審定。

②序言中有一句「一定要解放台灣」，應該加上「早日」兩字。

③憲法不應提及某個人，只可提及其人之主義思想。個人崇拜也不合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④同意不設國家主席，因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全國最高權力機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就是國家元首。

至於對憲法修改的提案有：

①第二條第二項，應修改為「國家允許非農業的個體勞動者，在法律許可範圍內，從事不剝削他人的『有償』個體勞動」。理由：有償勞動不需限制。又在基層組織統一安排，容易發生流弊。

②第十條中的「不勞動者不得食」以刪除為宜。理由：這句話原為社會主義運動初期的口號，中國已是社會主義國家，生而殘廢或因故喪失勞動能力者亦可得食，且國家已於第五十一條等條項中規定須加以照顧，故這條文前後矛盾，文義唐突，不宜加入憲法條文。

③第四十條宜加入第二項（依原憲法八十七條宗旨）「國家依法律規定供給必需的物質上的便利，以保證公民享受這些自由。」理由：國家如不供給，譬如出版自由就無法享受，但須待法律逐步規定其實施方法。

從二月底到三月初召開的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期間，我提了許多憲改意見。三月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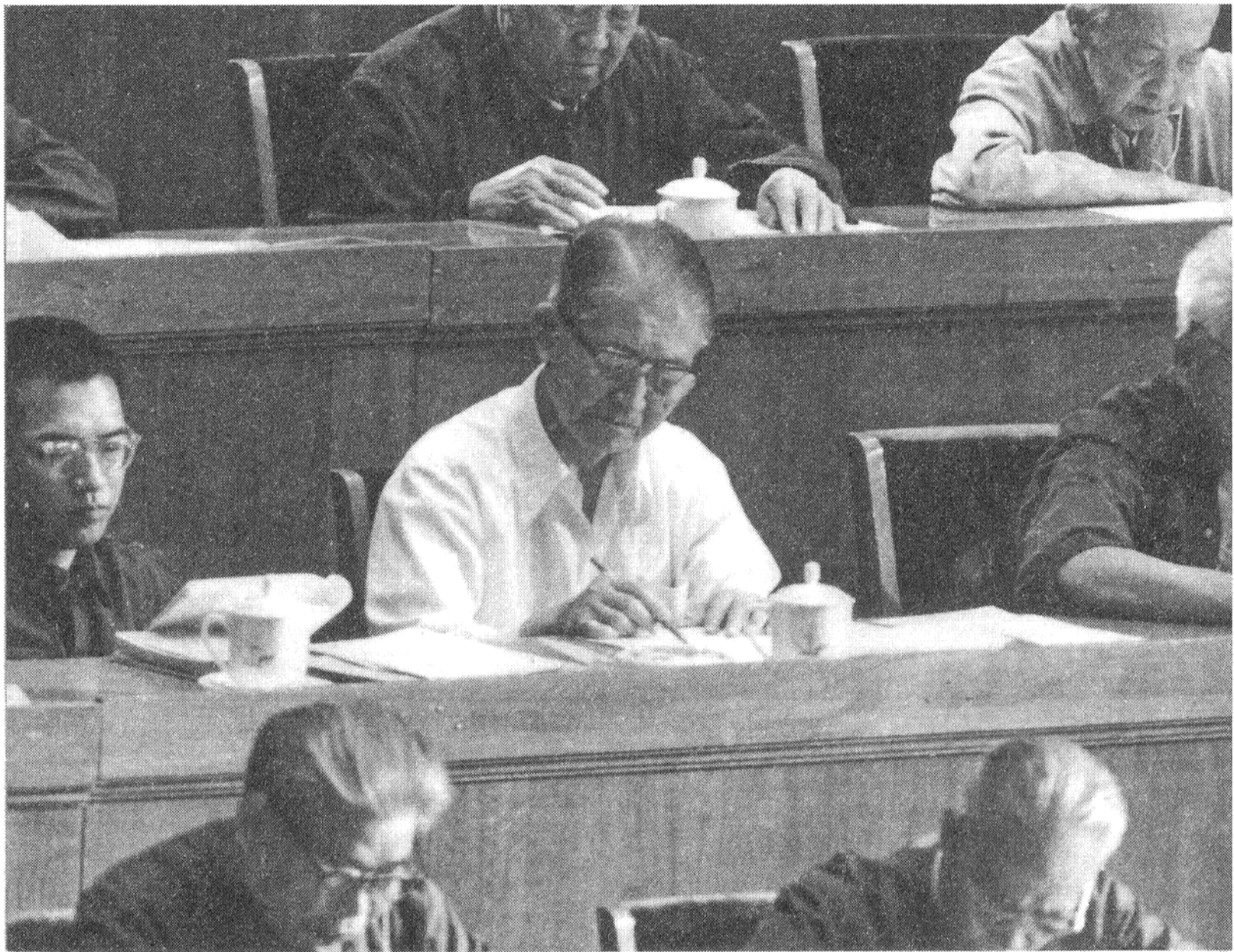
日通過了「七八憲法」，其中還保留不少文革的基本思想。後來經過第二次大會（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二日）的修正，把文革中成立的地方各級革命委員會改為各級人民政府。還有，經過第三次大會（一九八〇年九月十日）的修正，才逐漸反映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要求。憲法第四十五條，是關於言論自由的規定，後半段記有「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條文（所謂的「四大自由」），黨方面向全人代常務委員會提出刪除這段的提案，大家充分討論過，我提了個人意見，認為：只要在四大自由前加上「依法行使」四字即可，沒必要刪除。但這還是少數人的意見，大多數人認為四大自由曾遭四人幫惡用來整肅人，刪除四大自由並不等於消除言論自由的原則，因此順大多數委員的意見刪除了這四大自由。

另外，在這次大會上通過了依「黨政分離」原則，華國鋒辭去總理，以及四位副總理的辭職，決定由趙紫陽接任新總理。

三、訂定「八一憲法」的前前後後

「八一憲法草案」的特點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到五月四日，舉行了第五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公布了「新憲法草案」，當時我恰好在美國，日本各地旅行，但也看到了修改後的新憲法草案內容。



陳逸松在人大常委會議上聚精會神審閱議案。

這個建國以來的第四個憲法，基本上，否定了文革中的七五憲法和打倒四人幫後的「七八憲法」中許多過左的教條主義，繼承和發展了最初的「五四憲法」的內容。它由序言和四章一百四十條的內容構成，比較具有現代國家憲法的精神。其主要修改的地方有：

- ① 序文中寫入了辛亥革命的歷史和中華民國的創立。
- ② 規定各政黨、國家機關、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
- ③ 把政治協商會議（政協）定位為統一戰線組織。
- ④ 承認外國投資和中外合辦企業。
- ⑤ 設置指導全國武裝力量的中央軍事委員會。

- ⑥ 國家主席、總理、中央軍委主席等採取任期制。
- ⑦ 承認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
- ⑧ 恢復五四憲法的國家主席和副主席職位。
- ⑨ 廢除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三個世界論」和「社會帝國主義」等用語。
- ⑩ 取消了「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的規定。
- ⑪ 在有關公民權利條文中，取消了人民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所謂「四大自由」）。
- ⑫ 新增設「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的條文。這條文主要面向香港、台灣回歸的設計。

我對「八二憲法草案」的看法（摘自日本《讀賣新聞》·《產經新聞》）

這個新憲法草案公布不久，我人在日本，《讀賣新聞》（五月十三日）和《產經新聞》（五月二十六日）對我進行了長篇專訪，我對「草案」表達如下看法：

- ① 總言之，新憲法反映了中國現在主流政治的主張，擴大了中國政治的民眾基礎。它再次強化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權限，全人大作為最高的國家權力機關，在休會期間由

常委會執行。現在，人民代表大會在縣級單位已實施直接選舉，我希望將來很快會在省級單位實現直選。

② 新憲法規定各政黨各團體必須遵守憲法、法律。這是一大進步；以此為界，將來中國共產黨與其他黨派地位平等，共產黨的獨大指導將退居精神面的層次。

③ 憲法上的國家中央軍委有可能逐漸取代黨的中央軍委職能，軍將由黨的軍隊轉型為國家的軍隊，亦即漸次強化國防軍的性格。因為憲法規定統帥軍隊的是軍委，而軍委的任命必須由全國人大和常委會通過。這從新憲法草案中已不使用「解放軍」的名稱即可窺其一、二。

④ 增設「特別行政區」的條項，主要是面對將來台港澳問題的解決，預先提出了新構想。而將來特別行政區的具體內容如何，則有待談判的結果，再由全國人大訂定法律規範之。

⑤ 新憲法草案序文加入了「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創立」的歷史論述，與去年（一九八一年）發表的「葉九條」有關，亦即「承認維持台灣現狀」的祖國統一論。

關於台灣問題，「七八憲法」序文中有關台灣的規定是：「一定要解放台灣完成統一大業。」而新憲草改寫為：「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部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

在人大會上提出憲改意見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到十二月十日，在北京舉行了五屆人大第五次大會，會中通過了新憲法（八二憲法）。在開會期間，我先在京西賓館台灣代表團小組討論上發言，後來我在回答《中國新聞》社記者的採訪中，提出了四點憲法修改意見：

- ① 「四個堅持」與「各政黨應服從憲法與法律」的規定之間，是否有矛盾？希望黨能夠僅止於精神上的領導。
- ② 黨與國家皆設「軍事委員會」，是否會發生意見不一致的情況，希望將來改為只有一個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使領導一元化，黨軍成為國軍。
- ③ 新設的特別行政區，是否可明定在一定年期中不可變更，使台港澳人民有信心。
- ④ 似可刪去「無產階級專政」的字眼，留「人民民主專政」就夠了。

「八二憲法」的精神和沿革

「八二憲法」規定四項基本原則作為總的指導原則，強調以經濟建設作為國家的工作重點，明確規定今後國家的根本任務是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它規定公民在法律前一律平等，任何組織或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關於公民的各項基本權利的

規定，更加切實和明確。在國家機構方面，它加強了人民代表制度，將原來屬於全國人大的一部分職權交由它的常委會行使。恢復設立國家主席作為國家元首的代表。它規定國家領導人連續任期不得超過兩屆，這就取消了實際上存在的領導職務的終身制。

其後，「八二憲法」經過四次修改後沿用至今。

① 一九八八年，七屆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增加規定「國家允許私營組織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存在和發展」，同時將有關條款修改為「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規定轉讓」。

② 一九九三年，八屆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將「社會主義初期階段」、「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及「改革開放」正式寫入憲法；將「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取代「人民公社」，將「市場經濟」取代「計畫經濟」。

③ 一九九九年九屆人大第二次會議，將「鄧小平理論」寫進憲法序言，將「反革命活動」修改為「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活動」。

④ 二〇〇四年十屆人大第二次會議，確立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指導地位，同時增加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條款。

參與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法律制定

一、建立刑事法典——訂定刑法和刑事訴訟法

一個國家的刑法是僅次於憲法的重要法典之一。新中國刑法的立法工作歷經了艱難曲折的過程。建國初期，曾由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著手完成了「刑法大綱草案」和「刑法指導原則草案」。一九五四年舉行第一屆全國人大大會時，經過長期的研究和辯論，於一九五六年僅公布了一「刑法試行草案」。不久，反右鬥爭席捲一切，一九六六年又爆發了文化大革命，法律只有靠邊站。直到四人幫倒台文革結束後，一九七九年中共召開了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決定把黨的工作重點轉換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來，社會主義法制的建設才成為重點工作之一。

在法制委員會上首倡「罪刑法定主義」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召開了五屆人大常委會下新設立的「法制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法制委員會」共有八十名委員參加，都是有法律素養或實務經驗的老健將，看來平均年齡有七十歲以上，作為唯一台灣籍委員的我也已屆七十二高齡。會議由剛被平反復出的彭真委員長主持。我在三月十七日的法制委員會上發言，首先倡議「罪刑法定主義」以及「死刑犯的執行不應該公開示眾」的主張。我要求：①在刑法修訂二稿中的第八條前面插一句「違背憲法之規定」，以及第一項最後附加上「非有法律明文規定的犯罪不受處罰」等字句，以明確規定「罪刑法定主義」；②又提議第三十七條「死刑用槍決的方法執法」之「執行」等字句，前面加入「於監獄內」四字，以明示死刑不可公開示眾執行。

通過刑事法典

從三月到六月舉行了許多次法制委員會，大家冒著酷暑認真地研究再三討論，我也經常徹夜研讀法律書籍和資料，提出我個人的法律見解。法制委員會終於向人大常委會提出了刑法、刑事訴訟法和其他五種法律案，再經修改後，向五屆人大會第二次大會提出，而於七月一日得到正式決議通過，在七月六日公布。並且依刑法第六條規定，於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

正式生效。

就這樣，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建國三十年後，第一次成為有正式刑事法典的國家。

不完全的「罪刑法定主義」

在審議刑法的過程中，也有委員和我的主張一樣，要求犯罪概念要更明確以實現「罪刑法定主義」。法律最要緊是「罪」與「刑」要法定，什麼是罪，什麼罪應課以什麼程度之刑，罪與刑要以法律明確規定，如此才不會「枉」也不會「縱」。我在東京帝大時讀的牧野英一刑法（亦簡稱「牧野刑法」），就是主張「罪刑法定主義」，這一直是我奉行的信念。然而，彭真並不支持完全「罪刑法定主義」，他主張要留餘地，說中國地廣人多情況極為複雜，當然會發生沒有明文規定的犯罪案例，碰到這種情形罪刑應該可以類推。我說：這樣執法者權力太大，會濫用權力，且人民無所適從，這不合法治。最後，在刑法中保留了但書，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將刑法分則中沒有明文規定的犯罪，用類推的方式判刑；這總算進了一大步，但距離實現「罪刑法定主義」仍有一段距離，實為遺憾之事。一直到十八年後，一九九七年十月一日實施的「新刑法」，才體現了「罪刑法定主義」精神，該法第三條規定：「法律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

完成了「刑事訴訟法」

「刑法」屬於刑事實體法，而「刑事訴訟法」則屬於刑事程序法。在中國，這兩法都於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同時生效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一直到一九六三年才開始有一部「刑事訴訟法」草案的初稿；在這之前，哪個機關以何種程序才可以抓人，都沒有法律規定，都依行政命令或依指示隨機行事，人身自由無法得到明確保障。

新實施的「刑事訴訟法」有下列進步的地方：

① 不以「主義思想」為指導原則，而回歸到「以憲法為依據」。這避免了官僚自由解釋、擴大解釋法條的現象。

② 明確規定了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三機構以外的任何機關無權對人民採取逮捕、判刑，且明文規定三機關必須相互制衡。

③ 被告的辯護權獲得了保障。如第八條規定：「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人民法院有義務保證被告獲得辯護。」也加入了抓人後二十四小時內要通知家人的規定。

④ 該法明文規定「死刑的執行要公布，但不得示眾」，廢止了以前在死刑現場糾集大眾觀看的陋規，是值得讚許的地方。這一點也是我一再呼籲的。很慶幸的，直到今天沒有再看到死刑執行示眾之事。

這次總算完成了一部比較合理的「刑事訴訟法」，但是也有許多尚待改進的地方，譬如：

- ① 如何貫徹「一事不再重複提訴」原則，亦即同一案件不可再以刑事案件重複提審。
- ② 嚴守刑事案件之審理時間，不得無限期拘押人民。

二、在社會主義現代化中推動社會經濟立法

一九七九年以後，中國進入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時代，雖然仍然強調四項基本原則的總指導原則，但傾全力以經濟建設作為國家的工作重點。因此，創制有關現代經濟和現代社會的新法律，是刻不容緩的事。這些責任都由人大常委會和法制委員會承擔。然而，在兼顧社會主義原則和中國的現實條件下，推進現代法律的創制，的確面臨極大的挑戰。

在一九七九年六月舉行的五屆人大第二次大會，通過了〈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後，同年七月九日，由彭真擔任主任的法制委員會上，武祕書急切地報告了：「今後在業務部分要整頓幹起來，特別有關民法、民事訴訟法、婚姻法、經濟合同法、中外經濟企業法、勞動工資法等，有必要先由行政業務部門來起草，可參考古今中外的任何做法。」會上，康生和陳伯達發言說：「日本的東西可攝取，蘇修的東西也可參考，奴隸主封建的很多東西都可參考，都是為了九億人民著想，創造不要脫離歷史，錯了就要改，各負責單位主管要先提出，要什麼法起草來。」其他委員都提出許多有待制定的法律，如能源問題、污染問題、商法、行政訴訟法、新聞出版法……等等。

準備參加各種法條的擬定

八月八日我用常委會便箋寫給法制委員會主任彭真，準備參加下列各項法律條例之研究和擬定工作：

- (一) 國家建委
基本建設法 城市規劃法 國家建設徵用土地法
- (二) 國家計委
計畫法 統計法
- (三) 國家經委
工業企業管理條例
- (四) 財政部
投資法 稅收法 個人所得稅法 利息專利收入稅法
- (五) 外貿部
海關法
- (六) 工商管理總局
合資企業登記法 企業登記法 合同法

- (七) 中國人民銀行
銀行法
- (八) 中國銀行
外匯管理條例
- (九) 國家勞動總局
勞動法
- (十) 公安部
治安管理處罰條例 治安保衛委員會組織條例
派出所組織條例 人民警察條例 勞改條例
刑滿釋放後安置就業辦法
刑滿釋放後安置就業辦法
保證公民集會、遊行安全條例
- (十一) 全國婦聯 婚姻家庭法
- (十二) 計畫生育辦公室 計畫生育法
- (十三) 民政部 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獎懲條例
- (十四) 國家出版局 出版法 版權法
- (十五) 中華全總工會 工會法

參加全國政協法制組的經濟立法研究

在我擔任第五屆人大常委期間，許多日本、美國的生意人或華僑資本家想來中國投資，都透過人的介紹來找我，我深深感覺到中國應加快立法的腳步，特別在經濟立法上。因此我除了參加人大法制組會議外，還主動參加了政協全國委員會法制組經濟立法小組的活動。這個小組的成員包括有李文杰、葉篤義等七人，都是幹練的法律家。大家都滿懷熱誠希望藉由對經濟立法的討論凝聚共識，向中央提出立法的建議。一九八〇年四月，在我住的北京飯店四〇六五室，召開了第三次會議，向大家印發了〈對於「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及有關法令的意見〉，大家提出報告。

李文杰報告：最近中央領導很重視經濟立法工作，有關方面正就〈公司法〉、〈合同法〉等加速起草工作；〈合營企業所得稅法〉及〈個人所得稅法〉草案已由財政部稅務總局幾經修改定稿；工商行政管理總局也已起草了〈商標法〉、〈經濟合同管理試行條例〉、〈工商企業登記管理條例〉等草案，現在正在徵求意見中。

我認為：對於若干政策性問題應該有原則性的決定，使當事者在與外國投資者接談項目時，心中有底；但在執行過程還會碰到這樣那樣的問題，有關單位應統一對外窗口，密切配合互通聲氣、顧全大局，千萬不可政出多門，亂踢皮球，給外國投資者以鑽門子的機會。

委員們就《民事訴訟法》第四稿中外國人的訴訟權和義務的內容，以及經濟合同案件的

訴訟和仲裁等問題進行了研究。鄧季惺說：〈民法〉是實體法，〈民事訴訟法〉是程序法，〈民法〉的制定和公布施行是前提；葉篤義說：〈民法〉在今年內不可能制定公布；李文杰說：〈民法〉一時不能訂好，先搞個〈合資法〉、〈公司法〉也是個辦法，他還就《民事訴訟法》的部分內容，提出了書面意見，並希望五屆人大第二次會議能夠通過二、三個經濟立法，使〈合資法〉的配套前進一步。

在未承認私有財產權下，難定〈民法〉、〈公司法〉

從一九八〇年年底開始，人大常委法制組彭真主任就交代任務要趕快起草經濟合同法，調集了很多工作人員，集了不少資料。法制小組於一九八一年二月擬出大綱，六月把草稿發給各省市徵求意見，並請國際貿易委員會擬出一個合同法規。在擬定過程中，我提出意見，要求先把「法人」的觀念弄清楚，法人分營利法人和非營利法人，營利法人就是一般民間公司，這要另有〈公司法〉規範之；法人有法律認定的獨立存在的人格，必須有獨立的財產，其代表人如何產生如何登記等等，如此法人才能夠訂約履約，承擔損益，有提出告訴和被告的行為能力等法律責任。然而，這牽涉到私有財產的根本問題，當時中國又不承認私有財產，因此立法過程充滿矛盾。

在還未通過〈民法〉和〈公司法〉的情況下，五屆人大第四次大會於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十三日通過了〈經濟合同法〉，同時也通過了〈民事訴訟法草案〉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在我任期中，中國快速走上經濟發展的道路，雖然絕大部分還是公有經濟，但私有經濟已誕生。有各種各樣的營利單位在大小樓間掛上某某公司的招牌，因而法制小組也開始著手制定〈公司法〉。要訂〈公司法〉一定要先訂〈民法〉，先承認私有財產。然而當時中國還未到承認私有財產的階段，因此無法制定。關於〈民法〉的審定，法制小組也曾努力過，但都同樣碰到承認私有財產的問題而擱置。

《民事訴訟法》的特色

《民事訴訟法》，與人民生活有重大的關係，受到大家的關注。因此該法通過後，新華社記者來探訪我對該法的看法（一九八二年三月八日）。我表示：該法既從中國的具體情形出發，又吸收了外面民事訴訟法的長處；既便於人民群眾進行訴訟，又便於人民法院辦案。我進一步說明：該法與歐美日的民事訴訟法比較起來具有許多特色。

① 這個法的最大特點是注重調解。據統計，全國民間糾紛和民事案件中，十分之八九是經過調解得以解決的。但是，為避免久調不決的偏向，該法還規定：「調解無效的，應予判決。」

② 另一個特點，是實行兩審終審制，並在不少條文中規定了期限。

③ 許多國家的民訴法內容繁多，條文多達五、六百條，甚至一千多條，查閱起來費事。中國的新民事訴訟法，現在只一百多條，比起一些國家來，文字簡明多了。

④ 該法第七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應當根據需要與可能，派出法庭巡迴審理，就地辦案。」這樣，法院就可以派出法庭到農村人民公社的辦公地點、學校、戲院等公共場所去審理案件，方便廣大人民群眾。

通過〈環境保護法〉、〈家庭婚姻法〉等諸法

其他在各種法案的審查中，我都盡力依良知良識提出見解；譬如，在審查〈環境保護法〉時，我發言：「在第三條的『造福人民』的四個字之前，加上『工礦企業之必要利潤，不得優於住民之健康』。」

還有，我主張環保法不宜作「試行草案」，而應該以法律案讓它通過。我說明環境保護刻不容緩，並舉日本從戰後以來在經濟發展中發生的嚴重環境公害為例，要求大家立即通過這法案，我的發言獲得委員們拍手通過。

另外，在審議〈家庭婚姻法〉和〈生育計畫法〉時，我主張法定婚姻年齡應是男二十歲、女十八歲。又我一直堅持主張二胎政策，這不但顧及人權也為了解決中國的生產率問題。在男女婚姻問題上，我主張：如果一方堅持要離婚，經調節不成，又夫婦沒法恢復和好，斷絕

關係三年以上時，法院應該判決離婚。

三、對審理四人幫的法律意見（一九八〇年九月—一九八一年一月）

一九八〇年九月，開始準備審理「林彪江青等反革命集團案」。為了審理四人幫，先在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上通過成立「特別檢察廳」及「特別法庭」，然後在這臨時特別法庭上經過四個月漫長審判，一直到隔年一月二十五日才完成宣判。在整個審理結束後，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會議通過了撤銷「特別檢查廳」和「特別法庭」。

我曾表示想參加法庭旁聽，都沒有如願，只有在電視轉播觀看審判過程。畫面上出現的江青態度時而平然時而倔強囂張，在最後陳述時她真的理直氣壯。其他如姚文元、張春橋等人不是表情疲憊，就是態度狼狽。我一向反對四人幫，認為他們空有理論鬥爭不講實際，在審判過程中大部分的人都主張處重刑，但我認為應依法論事。在一次政協主辦的「林江案座談會」上，我就法律問題提出三點意見：

- ① 從刑法第九條規定，刑法施行前之行為應當依當時的法令政策處理，且判刑輕重，要到下判決時才能決定；所以，在事實調查階段就決定依現行刑法辦理，是不合理的。
- ② 採證要公平。既容許證人指責被告江青，亦應容許江青辯明，不能說「你沒有權利發言！」不容被告辯明。

③ 審判員有三十五名，分為二組，那麼有一組必定是雙數，這可能會發生不能表決的情況。法庭有事先考慮不周到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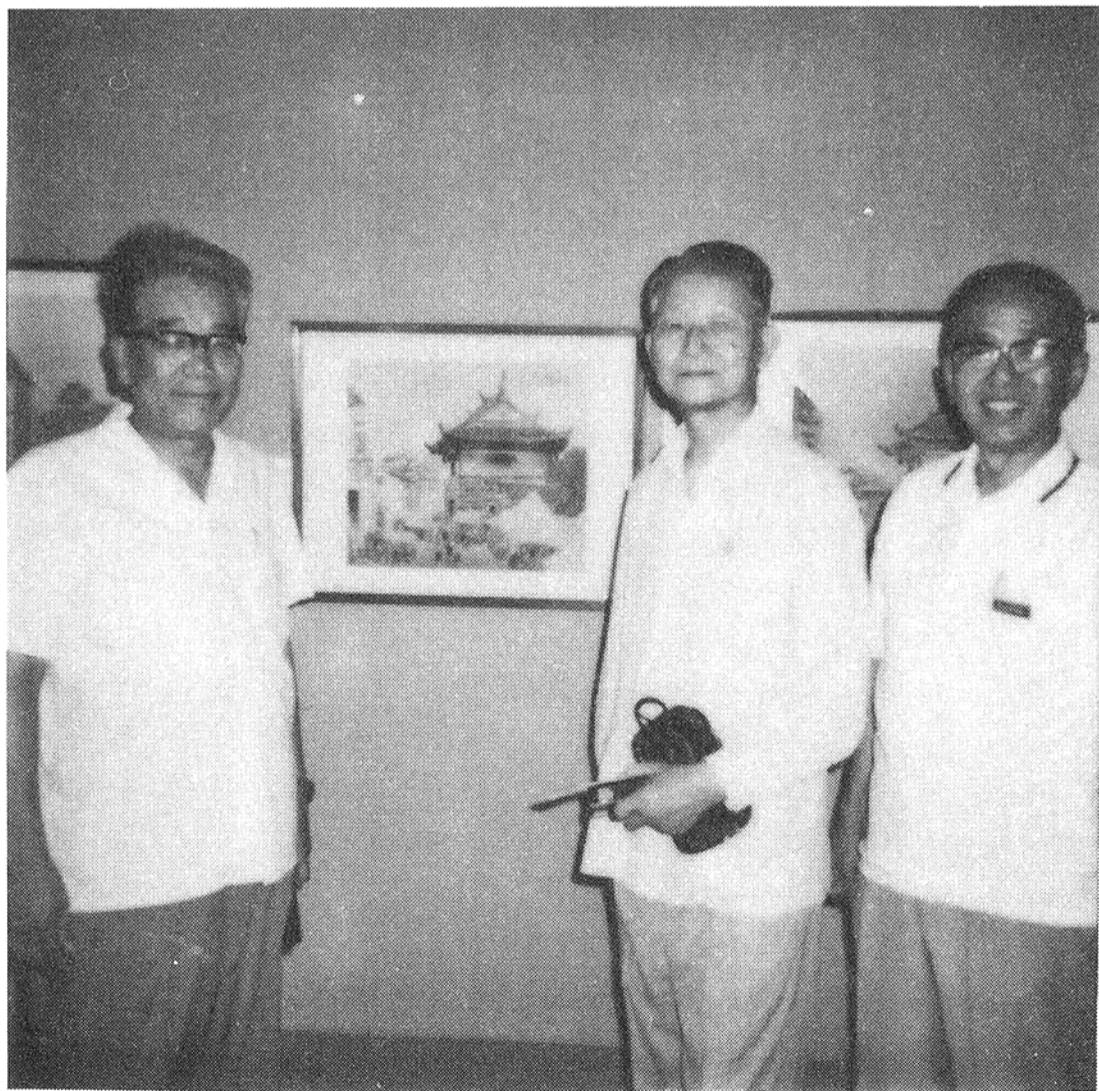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一章

八十回顧

一、一九八〇年初記事

兩度南下福建廈門漳浦祖居地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二日，老友郭雪湖與林盛中來訪，又叫了魏正明和王碧雲夫婦一起來，共用中飯。八月二日，我和內人玲玉一起坐車到北京展覽館參加郭雪湖畫展開幕，日本駐北京的符法大使也蒞臨會場，十分盛大，我們以畫為背景拍了很多照片。



1979年8月3日，與郭雪湖（右一）攝於北京展覽館郭雪湖畫展。

十二月二十六日，泉州華僑大學來電報，邀請我去參加該校董事會。為此，從一九八〇年一月三日到三十日，我南下福州、泉州、廈門、漳浦、上海，到合肥再回北京。參加了為期二天的泉州華僑大學董事會；再南下廈門，在廈門大學與陳朝璧、李景禧等法學教授討論廈大創設法律系以及如何建設法制問題。十三日到十八日到祖居地漳州漳浦縣參訪，看古鎮、古蹟，夜觀賞薊劇，又去參訪當地鮑扇貝的產殖情況，深入體驗了祖居地的風俗民情和經濟文化情形。之後返回上海，與分別了三十三年的顏永賢（顏光）見面，滿懷別情話不了。離開上海後飛合肥，會見老友葉松榮，同時見到了台胞顏明明（顏光之女）、林有泉（林木順的叔父）和李志民（汐止人），三十日回北京。回京後，陳朝璧邀我去廈大擔任客座教授，對法律系內教師講學。又，東京大學石田雄教授也邀請我去日本講學，講「日本刑事法制變遷史」。

隔年四月十四日，因為接到廈門大學的請柬，邀請我參加廈大六十周年校慶，我再度南下福建。這次先到上海，住錦江飯店，約見了顏光、林朝權和郭炤烈，還特別去探視了病危的郭振乾（子春）；沒想到探視後第二天，他竟然溘去了，是不是真等待老朋友來見他呢？十九日入住廈大招待所，當晚參加「台灣師生座會」，會上碰到了葉紀東、黃樹民（愛荷華大學）、曾仁壽（原日本法政大學畢業，後回中國）、林秀英（林良材妻、已離）、方生（原名陳實，就讀台大時「四六事件」的主角，逃回大陸，現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會上我講了話。二十日，在廈大映雪樓二樓，開廈大法律系首次科學討論會開幕式。我講了〈國家現代化之立法方針〉，陳朝璧講了〈社會主義新中華法系的形成和發展〉。第二天再到映雪樓作學術

報告，我把昨天的講題再進一步說明，分五項目講了一百十分鐘。二十二日，再訪祖居地漳州、漳浦和赤湖。到古雷頭視察鰻魚養殖，與當地水產局的領導討論解決水產事業問題；參訪了手工藝工廠，並遊黃道周講學處。於五月一日回到北京。接著，從五月二十六日到六月二十五日，隨人大常委到山東各地去視察（濰坊、煙台、衛海）。

一九八一年三月開始，我用功讀《周易》和魏晉玄學思想，並研究《易繫辭傳》。

兩度赴日接受報紙媒體專訪和各地演講

一九八〇年五月三十日我到日本，一直停留到八月十九日。主要參加六月八日岡山六高八十年祭，與永野重雄、宮內勇、法眼晉作等好友重逢，一起緬懷激越的青春歲月，歡樂中有一絲感慨。七月七日，早上，去國學院大學演講，講題《中國的現代



1980年6月10日，日本岡山六高同學會（二中古稀會總會）。

化與法制〉。下午《朝日新聞》社安排了我與西川潤（早稻田大學教授，西川滿之子）進行了一場對談，題目為〈現代化與中國社會主義的未來〉。

對談中我指出，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階段還未終了；中國一部分已進入社會主義，另一部分還在朝向完成新民主主義的階段。中國，還殘留著封建殘滓，雖然帝國主義已沒有立足點，但還留有傷痕；為了除去這些殘留和傷痕，還有必要實施新民主主義的政策，應該更多開放民主黨派。有人說現在中國是「進二步，退一步」，我希望能夠「進三步，退一步」，革命或者改革並非一直線進展，中國有過去的沉重包袱，所以「倒退」也很深。

七月八日，我應邀到日本工商會議所演講，共有三百九十三名參加（其中公司法人代表三百五十三人，個人四十人）。日本的大企業社長、會長幾乎都參加，如三井、三菱等大企業；包括貿易、金融、建築、機械、汽車……各行各業的老闆都付費來聽講，我的講題是〈中國的現代化與法制〉，特別談到「仁義」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批判標準。會後，我收到五十萬日元謝禮。

七月二十五日，接受NHK教育電視台的邀約，與西川潤以及Alan Tuney（清泉女子大學教授）進行一場對談，講題為〈從仁義道德看中日關係〉。

七月二十七日，日本《共同通信》社來採訪。首先，我表明談話純屬個人的見解，完全不代表官方立場。我指出，中國當面最大的課題乃「政治和思想的現代化」，現在日歐美資本主義都已自我修正，社會主義國家也有必要擺脫僵直的思想，進行自我修正。說到台灣問



1980年攝於東京日本商工會議所會客室。前座左起陳逸松、林玲玉。後排左起日本經團連理事長、永野重雄、宮內勇、邱泰寬。



1980年7月25日晚，在日本NHK節目上談〈從仁義道德看中日關係〉。右起陳逸松、Alan Tuney、西川潤。

題，我指出：台灣問題，牽涉到一、國民黨政權的統治；二、一千多萬人的漢民族後裔；三、對岸母國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三個要素糾結在一起，使問題變得十分複雜。有人認為中國不用武力解放台灣是因為中國沒有實力，這是不對的想法，實際上，是因為中國不願看到台灣人民流血。中國希望台灣當局體察民意，蔣經國要理解世界大勢，顧及民族大義，應該接受中國提出的開放兩岸人員往來、自由通信和貿易的條件。

八月二日，我又應《讀賣新聞》的要求，與野村浩一（立教大學教授）進行了長時間的對談。總題是〈中國的新課題〉，在毛主席去世、四人幫倒台後，中國進入了「再評價毛澤東」、「四個現代化」和「建設民主法制」的新階段，圍繞著這些議題進行了坦率的對談。

八月十八日，《每日新聞》晚報登出了我為日本 Suntory 威士忌寫的廣告文章。

一九八二年四月，再到美國之前在日本留停了二個月。四月三日住進飯店，日本警察馬上來詢問，說是上司交待要保護我。到日本目的主要處理藏書被強占的法律問題。五月十三日，再應《讀賣新聞》邀約，再度與野村浩一教授對談，談〈中國大轉變——新憲法草案〉。五月十八日，應宮崎滔天之會的邀請，參加在中日經濟協會舉行的座談會。廣島女子大學校長今堀城二主持，很多人出席，我講了四十多分鐘關於中國憲法修改草案的問題，讓大家一起問一答，頗為熱烈，林歲德在場大聲叱責大陸法律狀態不穩定。

在六月二日離日飛美前一天，國學館大學教授向山寬夫來說，我的藏書（約一萬兩千冊），若依據他的學校圖書館常來往的古書店估價，單單洋書、日書、中文書九千一百冊，就值



1982年5月18日，於昔日義助孫文革命的宮崎滔天後人宅留影，「推心置腹」乃孫文贈宮崎的墨寶。後排左起川田泰代、宮崎智雄、宮崎露冬、陳逸松，林玲玉。

七千五百萬日元。從一九七三年被郭榮桔趁火打劫去後，已過了九年，若不再採取法律行動，恐怕會過了法律時效。因此，託付向山寬夫教授替我委託律師採取法律行動。

離日赴美後，一直在美國停留到十一月二十五日才又回北京，參加五屆人大第五次大會。

二、民族感情和認同

我們是漢民族，與維吾爾族、朝鮮族等其他五十六族一樣，同是孫文所說的中國民族國家的一個組成。

所謂中國民族國家是一個政治用語，是由多個民族組成的一個國家，像美國也是一個多民族國家。

民族感情和國族認同，像我一生的海航

圖一樣，在政治的波濤中指引前進。由於中國的民族內戰和帝國主義介入，使得我在這歷程中受到了極大的衝擊和動搖，備嘗了民族的苦惱。

對於戰後剛到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一開始，我把他們當作自己的民族歡迎；但後來他們的所作所為非常錯誤。即使異民族也不可以這樣對待台灣人，何況同是漢族同胞。他們一來，就把日資日產收為公有，貪官污吏橫行，在公務人員任用上台灣人大多屈居中下級，可說非常不平等。不久就物資缺乏、物價高騰，本來生產米糖的台灣居然沒有米也沒有糖，民生困苦，這就埋下了二二八事件的原因。我當選國民參政員，是認為這是當時中國的最高民意機關，可以為台灣人發言、謀福利；去擔任考試委員也是想建立公平公正的人事制度，為台灣培養人才；當央行常務理事，也都在為台灣經濟、民生爭取合理的安排。在國府治下當律師，由於語言的問題經常有無力感。在法庭上不可用台灣話講，我只有用不全的國語講，他們聽不懂，就說我們沒有道理，而他們講的我們又聽不懂，他說那才有道理，真是豈有此理。因為法律辯論用的語言屈居下風，在法庭上經常居於不利的地位。

一九七一年，國民黨特務抓我，我真沒想到同是漢民族而且我還是律師身分，他們竟用這樣的暴力對待我，使我對國民黨政府徹底死心，萌生打倒它的想法。在這事件中，我看到了，同是台灣人的台獨分子做法真是不怕人死，只會在日本不斷喊台灣獨立，不顧台灣人死活；另一方面，異民族的日本友人看到我受到國民黨的壓迫，挺身而出聲援我（譬如中村哲和川田泰代等），這時日本人變成了自己人。

一九七二年我一個人離開台灣，是對國民黨政府的徹底失望，決定唾棄它，另求新世界。原先只想到美國與子女們同住，頤養天年，並沒有想到要回去中國。沒想到在日本碰到一位林姓僑領說「中國好像不太了解台灣的情形」，叫我寫一封信給中國國務院。經他轉介，這信件竟到了周總理之手，周總理看了信，誠懇地請我回去走一趟。我才於一九七三年四月，突破各種難關回到北京。我回中國大陸在當時造成極大轟動。各路的政治派別，包括國府、台獨、島內的黨外運動以及海外留學生僑界都紛紛猜測我回去的動機；有的說我愛做官，也有的說我思想左傾贊同社會主義。其實，我回去的動機很簡單，原先只想回去到處走走，看看新中國後再出來，並趁機看看好朋友如蘇新等，有機會就幫他們，替他們說說話。沒想到受到周總理的親切接待和三次深談，他邀請我當人大常委，我想這可以貢獻於中國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建設，造福十多億的中國人民，進而可以為台灣人民的和平幸福和解放盡一點力量，促進民族團結那更好，因此留了下來。

現在，大家都喊「台灣人出頭天」，我同意，但回顧過去我走過的路，經過的歷史，要出頭天不是喊喊就有。做為一個台灣人，在國民政府中我站在第一級的位置，但從沒有受到真正平等之對待，只將我當一個樣板；中國共產黨有沒有將我當樣板，我說過了，極端地說也是一種樣板。但是他們不一樣，他們要找我這種愛批評且據理力爭的人，並接納我，那就比國民黨好太多了。還有，當國民政府的官如參政員、考試委員、央行常務理事，只一任就把你踢掉了。中國共產黨不一樣，我當了一屆人大常委，經常在國外媒體上直抒己見批評時

政，他們也無所謂，又再叫我當第二任。十年到了，我想出來美國養老，他們還是請我當政協常委，一當就兩屆十年，而且可以不去開會，只要提意見就可以，這就比國民黨更能容忍異見，有民主的心胸，更有情有義了！

可是，在大陸期間也碰過十分不愉快的事。不是因為歧視或不尊重，而是因為他們對台灣的不了解而造成誤解，這種誤解讓我難以忍受。

你是高山族嗎？

到北京後，我從來沒有受到不尊重或歧視，只有在一個場合碰到一個官員表現了對台灣的無知，令我氣憤。

在釋放了第一批戰犯後不久，共產黨再釋放第二批戰犯。這批戰犯大多是國民黨派來大陸當特務被抓的，在四、五十個人中台灣人十四、五人，官階都很低。釋放戰犯儀式由一位統戰部副部長主持，幾個主要的台胞中央代表如我和林麗韞等都參加了。儀式中，統戰部副部長在發證書時，都會問原籍，叫到台灣人時都一個一個問說：「你是高山族嗎？」他們都說不是，看到這情形，我內心十分不愉快，甚感氣憤。

我不是有輕視高山族之意。首先我氣憤，一個做到統戰部副部長的人竟然對台灣這麼無知，還想要統一台灣呢，這麼沒常識，還當到統戰部副部長。其次，氣憤台灣人自己不爭氣，

不自立自強，唱來唱去只會唱〈補破網〉之類的哭調，很難看，讓人瞧不起。

那晚設宴招待那些被釋放戰犯席上，我和副部長、林麗韞、蘇子蘅坐同桌。我先問蘇子蘅：「喂！老蘇啊！」他雖大我一點，我們平常都互不客氣，他人很「古意」，我學副部長口氣問他：「你是台灣人嗎？」同桌台灣人都很訝異以為我瘋了，老蘇答說：「是啊！」我再問：「你是不是高山族？」蘇答：「不是，不是。」我說：「好！乾杯，你會不會乾杯，不會不行啊！」接著，我還是用同樣口氣問蔡子民、林麗韞、蔡嘯等「你是不是高山族？」，沒有一個放過。後來，整桌台灣人知道我故意要捉弄那個統戰部副部長，他還不明白傻傻地笑著，我發火了，直接問他「你是不是高山族？」，這時他才醒悟到我要對付他，就支支吾吾「啊！不是不是，來，再來一杯，再來一杯！」想敷衍過去。

那晚我連乾了十二杯茅台，從來沒這麼醉過。其實從更大的眼光看，這不都是因為兩岸民族隔絕造成的結果嗎？

三、論台獨運動

從日本帝國主義戰敗的歷史教訓來看，過度的精神勝利法和道德論不但無濟於事且會招致亡國滅種的危機。還有，國際關係如果沒有實力和國力為基礎，根本沒有講話的餘地，這是很現實的問題。現在台獨這些人聽了會說「唉呀！你話說得那麼大！」，如彭明敏說：你

管那麼多事，我們自己的事做好就好。這是昧於國際現實自我催眠的話，對台灣人的幸福並沒有什麼好處。

當然，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和政治、文化的現代化建設仍有很漫長的道路要走。中國是一個擁有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巨大國家，全體的變革非一蹴即至，需要時間，前面也滿是荊棘。台灣人不能自外於中國，不管保持現狀、獨立還是統一，都不能忽略中國的變化。台灣人應幫助中國完成現代化，如此才對台灣人的幸福有利；如果刻意要去挑釁他，無異故意掙虎鬚，對台灣人將是非常危險的事。

許多從事台獨運動的人，都是我的老朋友或是我認識的一些後輩青年；在關心台灣人民的命運和幸福上，我們是一樣的。從歷史來看，台獨運動有三種：

第一，是日本統治時期的反日運動。這是當時第三國際領導下的世界性殖民地獨立運動的一部分。當時日本的資本主義正在蓬勃發展，中國處於封建的次殖民地地位，中國大陸在軍閥混戰狀態，台灣的進步分子無法和中國任何一個軍閥談統一。他們的目標是爭取與日本分離，倘若不能完全分離，就設法成立台灣議會，所以也叫「台灣議會設置運動」，林獻堂就是當時主張設議會的民眾領袖之一。這個運動進行了十年，每年都派代表到東京去遊說提請願書，但是都沒有結果。

第二，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的兩三年中，台灣沒有任何獨立運動。當時台灣人只一心一意的要回歸祖國，那是大家說自己是「台灣人」正像說你是「河南人」一樣，是中國人這個大概

念中的一部分。沒想到蔣介石到台灣後，台灣人民由憎恨而自然發展出獨立的思想。這是逼上梁山。三十年來，台灣人民不但和祖國隔絕，不了解祖國進步的情況，同時由於反共宣傳，更造就了大家恐共心理。三十年來台灣人民所看到的，只是騎在自己頭上的國民黨政權，所以有些人認為，只有獨立才是最好的出路。

第三種獨立思想是受帝國主義慫恿的賣國行為。第二種獨立思想是情有可諒，第三種是絕不可恕。但最危險的是，第三種台獨往往披著第二種的台獨外衣出現，以反蔣口號來搞分離。目前台灣島內同胞對這些人還缺乏警覺，海外的不關心派，也時常對這兩種台獨混淆不清。台灣人民絕不會同意第二、三種混合的台獨思想。¹

我反對所謂「台灣民族」的說法

首先，台灣人在語言、文化、風俗習慣和福建閩南一樣，祖先都是那邊來的，只是來台有先後。陳家我算第三代，是祖父時候渡台。在北京期間，我曾數度回到福建閩南漳浦原鄉，還找到了叔公後代的堂兄弟們。大多數台灣人祠堂上，不是寫著穎川就是寫著西河，祖譜也都有記載著來台根源。戰爭末期，日本殖民者曾想利用皇民化或寺廟整理等高壓政策來消滅

1 《密西根簡報》，一九七六年三月五日，趙浩生（在北京訪台籍人大常委陳逸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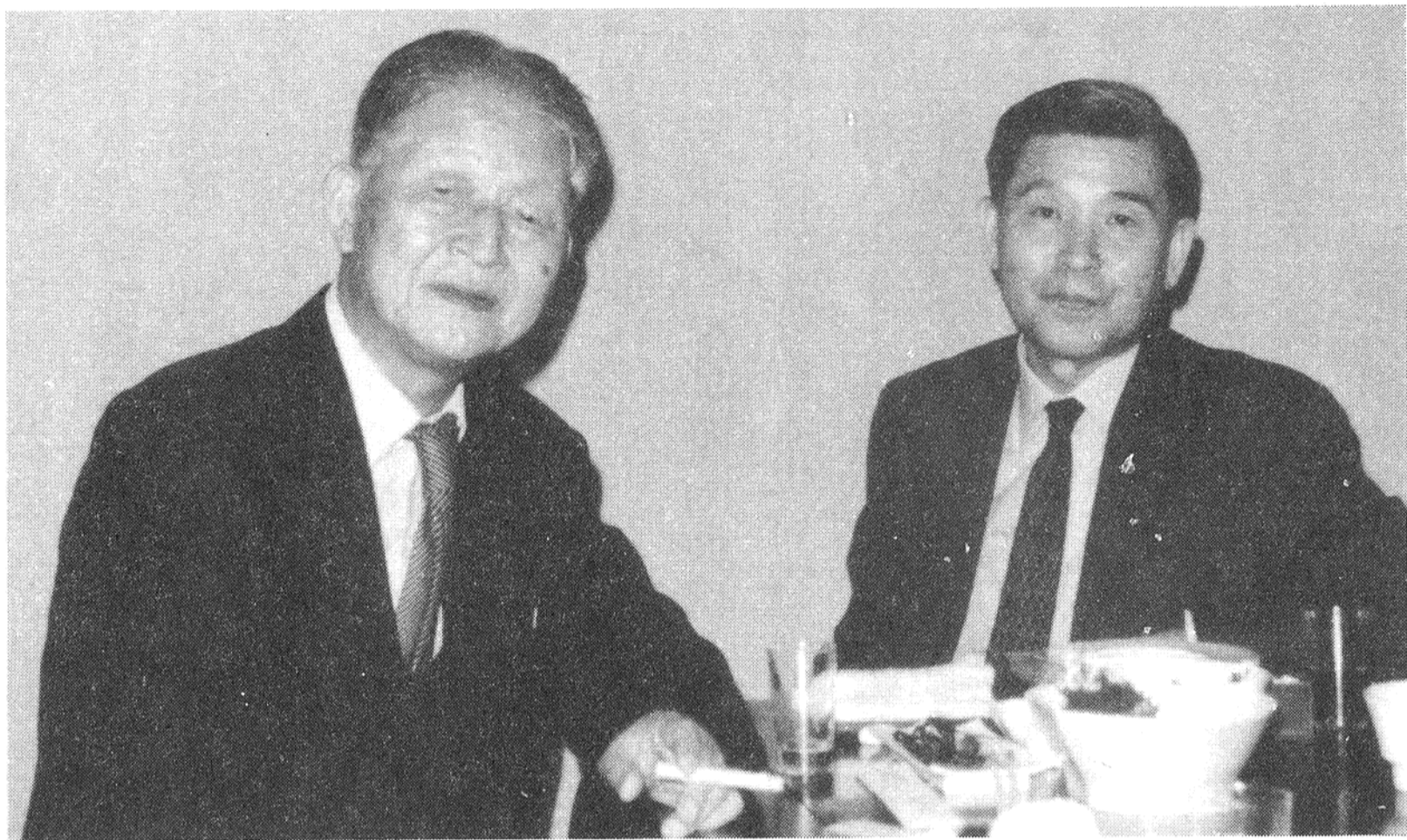
台灣人的漢民族意識，但都徒勞無功。現在，台獨想另立一個「台灣民族」，我想也同樣徒勞無功吧！

台灣意識

我要向主張台灣意識的人說，什麼是台灣意識？若是強調台灣這個地方美麗，台灣人樸實、克苦耐勞、有開拓精神，這種台灣意識我贊同。但是，如果單為了方便與外省人鬥爭或與中國大陸鬥爭而主張台灣意識，這何必呢？以我一生的經歷，與日本人鬥和與外省人鬥兩者不一樣，與日本人之間是異民族之間的鬥爭，即使你爭得社會平等，但民族上還是不同，骨不能改；而與外省人之間是民族內部矛盾，如果你有辦法爭得與他平等甚至勝過他，他就不敢輕視你，甚至尊敬你，這點，我從光復以來都不斷強調。

四、論與日本民族的關係

說到對日本或日本人的看法，這的確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非一言能道盡，因為這糾葛著我個人的生命歷史。我一出生就在日本殖民統治下，三十八年間，我受日本教育，畢業於日本最頂端的東京帝大，生活在日本的社會中，結交朋友執業律師，從飲食生活習慣到思想文



陳逸松與好友外務省次官法眼晉作。

化都深受日本影響。另一方面，我從小就覺悟到自己是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漢民族，畢竟與日本統治性民族不同，日台間民族是不平等的。因此在讀岡山六高時，就經常到東京去找編《台灣青年》雜誌的林呈祿，贊同石煥長和蔡培火他們主張的台灣人解放之路，關心台灣青年的團結和自覺。這種自然形成的民族感情和意識，左右了我一生的思想和行動。所以在皇民化的狂潮中，我一直沒有改姓名，也沒有成為「國語家庭」，更沒有成為「御用紳士」。

因此，我認為應分兩個層面來看日本問題。

從整個民族來看，從十九世紀中葉後成為帝國主義的日本民族（大和民族），不但可怕且可恨。我自己的前半生都在日本民族的殖民統治下生活，處處受到民族的差別和歧視。執業律師的十三年間，我採取了體制內的抵抗，替台灣人爭取平等和尊嚴。至於和日本人之間的個人交往，則和民族關

係不一樣，我與日本友人之間的情誼十分深厚，譬如與鹽見俊二、高原一家人、永野重雄、法眼晉作等無數日本友人的交往，完全超越了民族的障礙，友情一生不變。他們都很有情感也重情義，也許是日本人那種情感豐富的社會生活，培養了我現在的有些想法和做法也說不定。

但是日本人也有各種各樣的人，我也曾被日本人騙過錢。有一個叫奧山賢次的人，在戰後五、六〇年代就來台與我相識，我還是從他那邊第一次知道，有所謂的人造纖維和東西放著隨便人看的「超市」。後來他說公司要發薪水沒錢，向我借錢，但一直沒還，向他要，都一直避不見面。

若說我一生被騙的經驗，大部分是被台灣人騙，也許因為我絕大多時間生活在台灣人社會中的緣故。外省人也有幾個但不多，譬如姓孫的那個比較特別，我那麼照顧他，他竟然告我。但這種人很少，在我一生中，騙我的都是台灣人。

我的意思是個人之間的交往應以人為本位，不要分台灣人外省人，不要分台灣人中國人或日本人，不要有「什麼人」就一定怎麼樣的偏見，台灣人、外省人、日本人都有好人也有壞人。

但是，民族國家之間的關係就不同了！

我在中國擔任人大常委期間，經常出入日本，有時停留二、三個月。每次去日本，日本警視廳都會派一組特殊警察跟監我，一方面可能因為我是中國人大常委的特殊身分，另一方面

面可能是預防國民黨特務來騷擾，所以特別派人來監視兼保護吧！有一次，一位住神戶的朋友用車載我到六甲山溫泉看落日，發現後面有車一直跟著我們，我們走錯路倒車，他們也跟著倒頭，相碰面時，彼此裝著沒看見。在日本住宿，我也有意地經常換飯店或房間，盡量甩開日本警察跟監。這就不是個人關係，而完全是國家和國家之間的關係了。

第二十一章

轉任政協 · 告別和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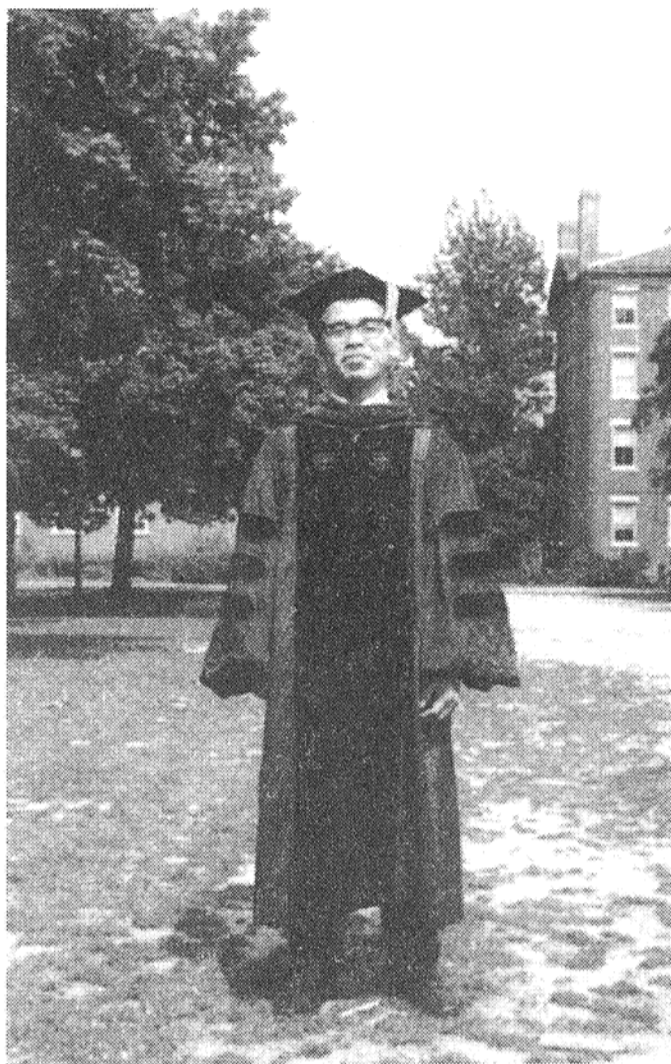
一、轉任政協常委（一九八三年五月八日）

第五屆人大常委職務於一九八三年屆滿，我沒有再續任第六屆人大代表，而是轉任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擔任政協常務委員。第六屆政協常委於一九八八年期滿後，又續任第七屆政協委員，一直到一九九三年，我已八十六高齡，該退休了。

從人大常委轉任政協常委的變動有一定的轉折，有必要說明。

戲劇性的轉任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一日，在中南海國務院小禮堂召開了台胞在中央機關工作人員的會議。



林盛中獲美國布朗大學博士學位時攝於校園。

行了四天的密集分組會議再進行選舉。先是由一位組長說明：經過與領導小組商量，推舉了十七名的候選人，但仍然可以全部調換。其實，當場分給大家的十七名候選人名單早已印刷好了，竟然沒有我的名字在內，名單內第五屆台籍人大委員只留下八名。在進行分組討論中，許多人紛紛起來發言說：陳逸松是老前輩又是法律家，對海外影響大，應該把他排入候選人名單內。但主持會議的李辰、林雲好像胸有成竹，對此不發一言，反而要大家對其他問題多發言；林盛中又特別再提議，要求把我加入候選人名單內。次日，林麗韞說，名單大家都一致同意了，陳老上面另有安排；李辰說，這次都是由中央安排的，雖然黨中央的推舉也有些不妥當的地方；林盛中起來直言說，把陳老安排在政協不如安排在人大，因為人大是立法機關，台灣人懂法律的沒有多少，中央既早已內定好了，那何必又再來一次選舉呢？

以推薦下一屆全國人大的協商代表（推舉下一屆參加全國人大台灣代表的候選人）。會上的選舉中我獲得三十八票最高票，其他得票數依序為王茂雄、陳蕙娟、吳國禎、林盛中，這五人被推選為新一屆全國人大的協商代表。可是過了一個月後，人選又發生了變化。另外，從四月十二日到十五日又召集了一百〇九名台胞代表住進總政招待所，進

但是，不管會中有多少人發表不同意見，還是照內定名單進行選舉。十五日下午舉行全體會議，進行無記名投票，依得票數結果由林麗韞、李辰、蔡子民、江水生、盧國松、田富達、劉彩品、吳國禎、范增勝、郭平坦、陳木森、李志民、邱寶雲等十三名當選第六屆人大台灣團代表。

一場預先安排的選舉結束後，我回到家把結果告訴內人玲，讚美她早有先見之明。因為，她常說我經常與外國記者往來，特別在日本的新聞媒體上說得太多話，又在人大常委上經常提出太多進步的意見，令人頭痛。

第二天，在人民大會堂上有上級領導的接見儀式，彭真跟大家一一握手，廖承志向大家講了勉勵的話。儀式結束後，廖承志單獨和我談了一個小時。首先我表示，在立法上我盡力完成了〈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但〈民法〉和〈公司法〉等牽涉到私有財產權的問題，尚未解決，我力量有限也只能做到這地步了。現在我年事已高，小孩都在美國，想出去。他說要安排我擔任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委，希望我在制定法律上繼續幫忙，目前國家正逢大轉折，前面還有很多事要我盡力，現在六屆政協馬上要召開，請我屈就屈就，一定要參加。他還表示，以後我可以出入自由，出國不必申請，若出國去，開會時再回來參加也可，不能參加也沒關係。他態度真誠寬容，憂國憂民，又是我十年前回來時第一個接待我的人，已是老朋友，我心存感念，所以接受了他政協常委的安排。另一方面，我想大概有人覺得我意見太多，經常在常委會上爭得面紅耳赤，又與外國關係太多太複雜，有人不放心，所以把我安排到政協，可以讓我一展建言之才能，可以暢所欲言。

我參加的政協活動

政治協商會議原本是抗戰勝利後，一九四五年在重慶舉行的國共和談中提出來，各政黨間進行政治協商的組織。一九四六年一月，在重慶由國民黨、共產黨、民盟、無黨派人士四方共同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但不久國民黨背棄了會中達成的五項政治協議，使協商破裂而國共內戰再開。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北平由中國共產黨及八個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共同召開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這個會議代行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完成了建立新中國的歷史使命。

目前，政協是由中國共產黨以及包括台盟在內的八個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人民團體、各少數民族和各界代表、港澳特別行政區人士、台灣同胞和歸國僑胞代表及特別邀請人士所組成，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絕大多數政協委員，都是閱歷豐富的政治家、社會名流以及各方面的學者專家。政協的主要職能，是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和參政、議政。事實上，在北京我為了擴大生活範圍，除了參加大定期會議之外，從一九七八年起也主動積極參加了政協的各種活動。

政協（政治協商會議）本是由各行各業、各種黨派和政治立場代表人物聚集的會議。它經常分組召開各種各樣的報告會和討論會，比較多元生動，參加這些活動可以吸收到更多知識和消息，也可以接觸更多人。一九七八年七月，我發信給政協全國委員會工作組，表示願

意參加「國際問題」、「法制」、「對台宣傳」三組的活動；內人林玉玲也希望參加「對台宣傳組」。以後政協有會議都會通知我們，我有空都會去參加。

譬如，八月三十日有婦女組、法制組聯合舉行的關於婚姻法問題的座談會，我到政協禮堂去參加，由韓幽桐說明開會宗旨及國內社會各方面臨的與家庭有關的社會問題，後由三、四人發言，憂國憂民之言，衝人肺腑。其後，關於「婚姻家庭法」草案的討論也開了好幾次會。我發言說：法定婚齡應保留原來的男二十女十八，不應改為男二十二；又，男女有「結婚的自由」亦應規定有「離婚的自由」，雖有一方反對，但經過一次調解仍失敗後，應判決離婚。

有一次，在葉劍英發布了〈告台灣同胞書〉後，去參加政協的「對台宣傳座談會」，由艾嘯主持會議。會上都是劉仲庸、杜聿明、謝瑤章、李覺、葉子綱、宋希濂等原國民政府大員起義過來的老一輩，他們都談要如何與蔣幫和談問題，吳英輔（台南人，美國亞利桑那大學數學博士，一九七三回國任教於北京師範大學，曾與我同任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起來說：這些都是小節，若沒有台灣人逼蔣幫，它穩坐江山絕不會來和談。我想他講得很有道理。在會上，他們都講要如何與蔣幫和解，我心情很不好，沒有講話的氣力，遂與內人坐在一旁聽講。從二月十七日開始到三月十六日，中國對越南進行了自衛反擊作戰，政協也組織了對越戰爭的報告。

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前後，中國的政治社會開始出現了寬鬆的現象。此時政協召開了許多新議題的會議，譬如：

- 「社會主義現代化」演講會。
- 「民主法制」座談會。有許多老法學家報告，很值得聽。
- 「台灣二二八」座談會。請蘇新、廖秋忠講話。會後觀看台灣電影《家在台北》，我看了第三次，還是流下了眼淚。
- 「談〈告台灣同胞書〉發表後各方面的反應」，由葉紀東報告。
- 「台灣政情報告」。由中央廣播電台台播部趙郁美報告，對台灣民主勢力有很詳細的分析。蘇新也參加了，會後我順路送他回南榆錢胡同。
- 「議會與選舉」演講會。請日本教授一圓一億先生講日本國會對國政調查權的運用和實際，以及民主選舉的好壞兩面。
- 由政協對台宣傳組主辦，在青藝劇場演出《歸航》一劇。在排練中的批評會上，我提了兩個意見：一、全體的台灣氣氛和色彩不足，二、現在歷史正在進行中，不要在劇終作出太果斷的結論。

• 「台灣經濟近況匯報」。由郭達凱局長報告，蘇新、吳克泰、林盛中都一同出席了會議。

當選第六屆政協常委（一九八二年五月八日）

五月八日，各報刊出了六屆政協全國委員名單（共二千〇三十六名），我列在無黨派民

主人士中。原本他們要把我列在台盟中，我要求把我排在無黨派民主人士中，以符合我志為無黨派民主人士的心願。六月三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第六屆政協預備會議，我被提名擔任主席團。六月十七日，開六屆政協第一次大會，選出鄧穎超政協主席以及二百多名常務委員，我名列常委，共得到一千七百多票。六月二十二日，六屆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在經過了四次大會，通過了許多提案後閉幕。我在會議期間的分組討論中，再三提議希望政協支持台灣黨外民主運動，又提議修改計畫生育法，改為二胎制，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二、告別的時候

在政協開會期間，我同時列席了第六屆人大各次會議，從預備會議、開幕，經過全體大會一直到閉幕，我都全程參加。這是憲法規定的職權，也表示我有始有終、負責任的態度。

最讓人悲痛的是，廖承志同志在開大會期間驟然過世了。記得才不久前見過面談過話，一轉眼竟然永別了。我依例到北京醫院向廖承志遺體告別，六月二十四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追悼會，有四千人參加，國家主席李先念致哀悼辭，備極榮哀。這象徵了第一代革命人物和歷史的告別。



1983年，陳逸松夫婦與葉松榮全家登黃山，左三為葉松榮。

與葉松榮爬黃山

送走廖承志後，我到久已神往的黃山一遊。兩週間，我沉浸在如畫的岩、峰、松、雲中，或隱或現，瞬息萬變；真正體會了黃山的真面目，以及黃山歸來步步雲的感覺。這次黃山遊，最值得懷念的地方是，在合肥的老友葉松榮一家陪我們度過了爬黃山的歡樂時光。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七日，葉松榮帶一位解放軍醫務人員嚴某到北京飯店來見面，這也是分隔了三十多年後的再見。彼此都很興奮，他叫了一聲：「唉！逸松兄。」眼淚就掉了下來。最初他在新聞上看到我回大陸的消息，就輾轉寫信來，說好久未見一定要到北京來相見。

葉松榮乳名叫葉BaBa，後來戶籍登記時改為葉貓貓。他是台灣大地主許丙太太的弟弟，大學醫科畢業後才改名葉松榮。他曾經幫助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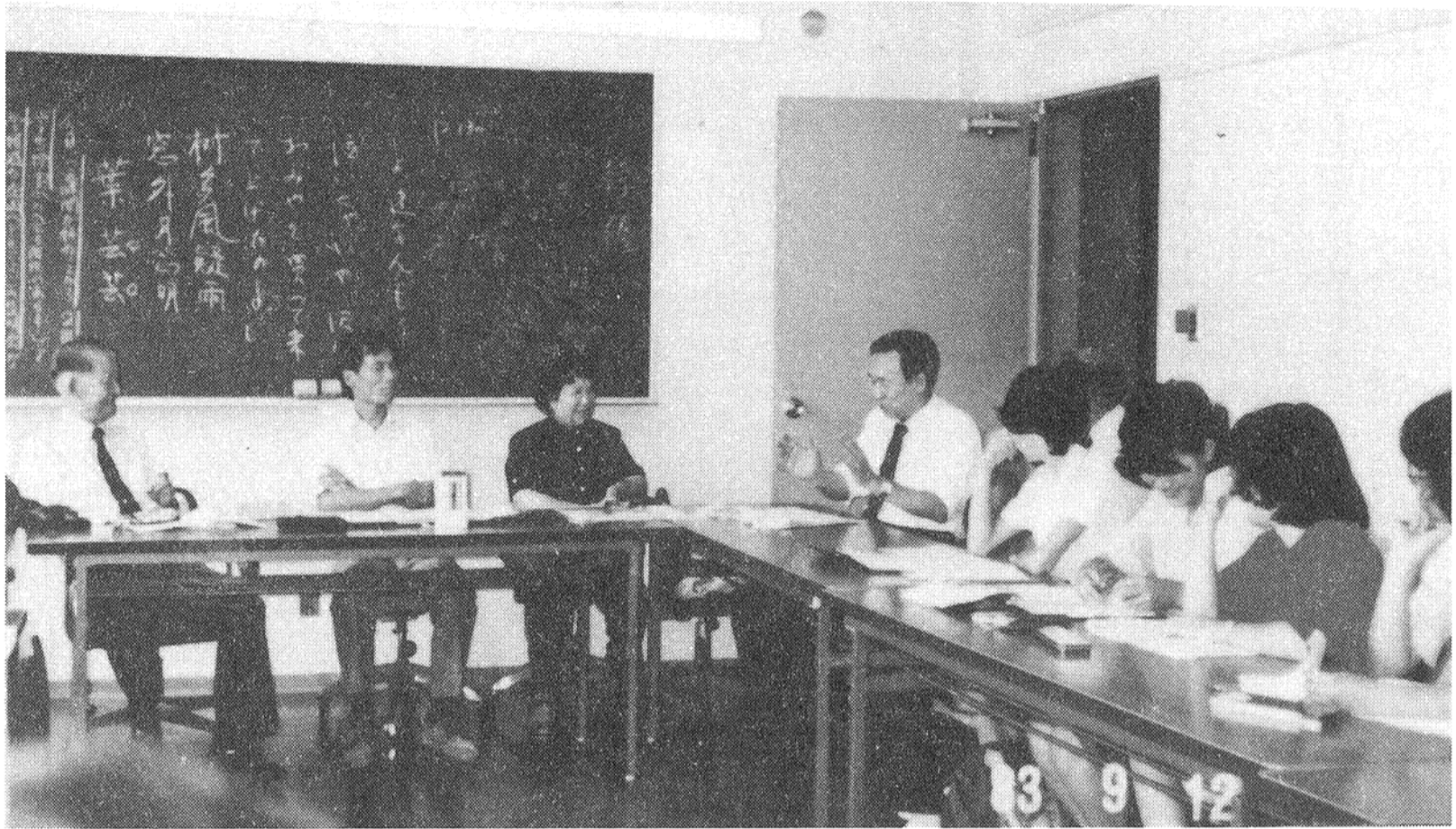
聰明從事研究戒除鴉片毒癮的方法，也曾去施乾愛愛寮幫助治療乞丐，後在大稻埕開花柳科醫院。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醫院樓上開舞場，放唱片讓大家跳舞，在台北大稻埕首開風氣之先，跳交際舞由他開始；當時大家爭著去看，都很驚訝，怎麼會男人和女人抱在一起跳來跳去。

日據末期，我和他被日軍徵調去修建軍用機場，不久他跑到上海教書，後到廣東開醫院，便一直留在大陸。文革期間他到了安徽合肥，因鄉下缺乏藥品，他就開始研究中草藥，用中草藥治療痔瘡而成為全國知名醫師。現在他在合肥一個很大的軍醫院擔任痔瘡科主任，官拜少將，出門還有衛兵隨從。

在北京期間，我去合肥找過他兩次。第一次是我到上海福建之旅，順便到合肥去看他，他帶我到合肥各處參訪。第二次，是我要出來美國的前夕，和他全家一起到黃山、九華山走了一趟。本來他一直勸留我們，叫我們不要出去，後來他知道我們一定要出去，就向林麗韞說逸松年紀也大了，要出去看孩子，在人情義理上是應該的。他自己在台灣的元配早已逝世，子女有在台灣的，也有在美國的，不知道他後來有沒有出來。

離開北京途經日本到美國（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一日——九月二十八日）

從黃山回北京後，我辦了日美簽證，交代了宋保才每一個月要來我家打掃清潔一下。於是，在八月十一日搭機離開了生活整整十年的北京，先飛往東京。在日本期間，主要與近藤律師討



1983年9月12日，在日本筑波大學張良澤主持的台灣文學講座上，陳逸松講述台灣文學史及其作品〈姐妹〉的創作經過。



1983年陳逸松夫婦參拜日本和歌山縣徐福廟。

論，要如何對付郭榮桔和宗像隆幸侵占我藏書的事，並決定以他兩人為共同被告，請求返還書籍，如不返還時，請求損害賠償。近藤律師說已由憲村先生拿到三十萬日幣的律師費以及五萬日幣做為訴訟費，近日可提出訴訟。又應張良澤之邀到筑波大學演講，他翻譯了我在日據期《台灣文學》上以疑雨山人筆名發表的日文小說〈姐妹〉，刊載在美國發行的《台灣與世界》雜誌上（第二十三期）。張良澤的譯筆相當細緻周到，經書信往來約定了這次在日本見面。

到達日本一星期，驟聞老友林加才逝世。我參加了在國立市林加才宅中由日本華僑總會替加才兄辦的葬儀，並受家屬之託致追悼辭。我與蘇子蘅以中國全國政協常委的職稱送了花籃。加才兄和我都是一九三〇年在東京台灣青年會「社會科學研究部」的會員，當時他是早稻田大學學生，我是東京帝大學生，大家都一起研究社會主義理論，熱心左翼運動。後來各奔東西，我每次到日本都會去找他，現在又要永別了，不可能再見面了。三〇年代在東京「社會科學研究部」的台灣左翼青年，大都已入鬼籍，獨留我形單孤影又回不得台灣，只有到在美國的女兒處去了。

九月二十八日，我搭機經夏威夷到了美國。

定居德州休斯頓「待月停琴軒」

我於一九八三年九月來到美國，定居於德州休斯頓後，品茶讀書，過退休的生活，但政



中國領事館人員與林麗韜（左三）來訪陳逸松夫婦。

協常委的職位一直持續到一九九三年才結束。這期間，我有任何建言都可以透過中國駐外單位的特別信件轉達，所以議政的管道暢通無礙，且歷屆的中國外長如黃華、韓敘、錢其琛等訪美，都會來拜訪我，或請我去見面，他們都會交代屬下說陳老在此年紀大了，要特別照顧，因此使館的人經常會來問安。十年的政協任期中都有支薪，只不過薪資得到國內去領取，我一直沒去領，他們會替我存起來，可是物價高漲，薪資也貶值了，幸好我住的北京寓所還保留著。記得一九八二年四月我要到美國時，候職德跟我說：「無論如何，我的待遇不會降低，房子可以永遠保存。」

我一生大部分的時間都奔走於政治，都是為台灣人的尊嚴和幸福著想。我當過日據期台北市會議員，光復後組織過三青團，當選國府的參政員，擔任考試委員和央行常務理事，都是在台灣最困頓的時候挺身而出。特別在一九七三年我不計毀譽，不顧安全，散



1995年陳逸松於休斯頓寓所「待月停琴軒」書房中。



1995年休斯頓台灣同鄉歡迎宴上，陳逸松（左起）、陳定南、陳錦鐘合影。

盡家財，衝破反共和冷戰的壁壘回到北京，擔任中國大陸的人大常委和政協常委，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參與了修訂憲法和創制法律的工作。雖然自己並不滿意，但已盡了心力，無愧於心。

一九八三年離開北京後定居美國德州休斯頓，寓所命名為「待月停琴軒」，表明我退休後的心境，我曾為此時的心境寫了一首七言詩：

十年漂泊浪淘沙

小畜異鄉成我家

待月停琴翻子史

中原再望塞翁馬

「小畜」，乃易經之一卦，文王囚於羑里時卜而得之。

我愛安靜，不喜歡人吵，在這裡洗盡俗塵品茗讀書，有時接待來往朋友，許多台灣鄉親和黨外人士來訪，縱談時論，樂趣無窮。我還下了相當的功夫研究了自然法學和《易經》哲學。閒居中，經常回憶起以前我住過的地方。

在北投的「疑雨山莊」，我與內人和四個幼女在此度過了難忘的時光。我自己為這山莊寫過一首短詩：

樹多風疑雨

窗外月正明



1983年1月30日，攝於北京復興門外大街二十二號樓的「寓樓」書齋。

一九八〇年五月，在北京市復興門外大街（木樨地）我配得一間公寓。從一九七二年匆匆離台後，八年間居無定所，這次終得一落腳之處，有了可以藏書的家。我命名這住所為「寓樓書房」，書房中掛了張伯英的墨寶：

無邊風月閒中味

一室圖書靜後功

在對聯中間掛有查士標的墨寶：

終年浪跡張文紀

下杜鄉園另五秋

重過江山更千里

薪山深處一孤舟

這兩幅對聯寫出了我一九八〇年後的心境。

三、九年後重遊大陸有感（一九九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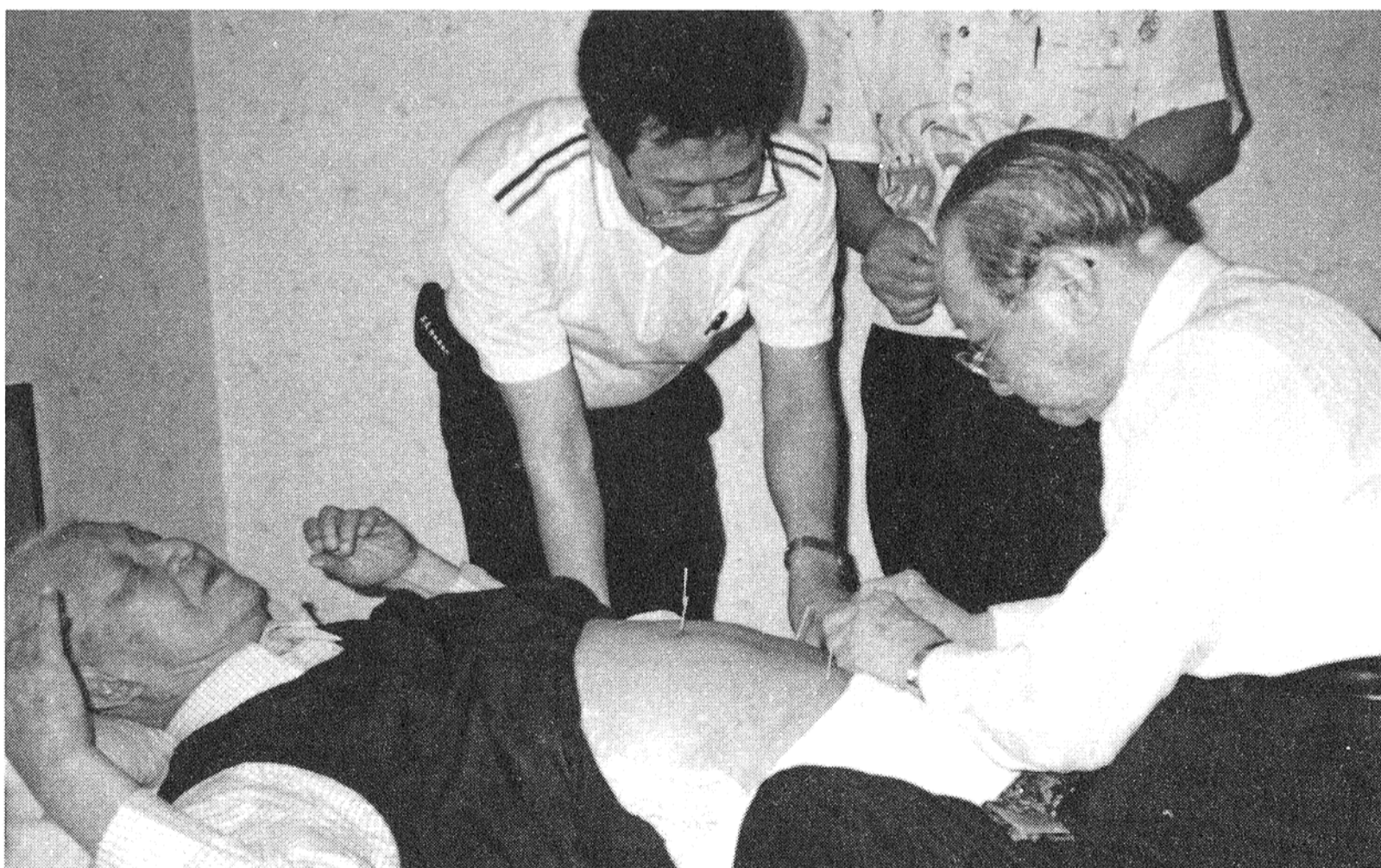
自從一九八三年秋天離開北京定居美國後，晴耕雨讀含飴弄孫，過著安靜的晚年，不知不覺竟然有九年沒有再出國到過亞洲；雖然中國、台灣、日本等亞洲各地的變化我時時刻刻都關心。一九九二年，我已八十五高齡，決心再到日本、中國大陸走一遍；雖然一直想回夢縈魂牽的台灣走走，且老朋友王昶雄、陳重光、謝聰敏等都頻頻邀我回去，無奈國民黨當局還把我列入黑名單，因此只有隔海望鄉了。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我們從洛杉磯到東京，見了許多日本的老朋友。有一件令我傷感的事，友人法眼晉作竟然中風了，講話也不清楚走路吃飯都不行了，只是腦筋還清楚，他還比我年輕呢！

在出發之前我就寫信給政協的宋保才，請他吩咐車宗貴把我北京復興門外大街二十二號樓住家的水電等生活設備整備好，以方便居住。在北京見到了黃順興、林麗韞、傅莉莉、蘇新遺孀翁大夫及其兒女。在北京住不到一個月就到南方旅行，到了福州、泉州、莆田、石獅、廈門、漳州、赤湖（我祖居地）、廣州、深圳、珠海、香港等地走了一趟，主要去視察改革開放最先端地方的經濟發展情況。然後再回北京，參加政協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後，經日本，七月二十一日回美國。前後近三個月的旅程。



1992年5月29日，在祖居地漳州漳浦縣。



1992年6月，在廈門接受陳應龍醫師的針灸治療。

中國大陸九年的大變化

這次回去，覺得變化很大。工業發達很多，特別是地方企業、鄉鎮企業如雨後春筍，令人刮目相看。吃用的東西比較豐富也花俏多了，如飲食店，大型娛樂場所、KTV都出現了，這在九年以前是不可想像的。感覺到年輕人很會做生意，腦筋很靈活，一般人跟著也較勢利眼，只講錢，人情較薄，脫離了共產社會，不一樣了。另一方面，人民的自由度比以前好多了，比較敢講話，有的還講得比較過分呢！現在社會風氣不好，治安也比較差，有人會懷念毛澤東時代，但時代不同，時代也在進步，怎麼可以與沒有蒼蠅沒有娼妓的時代比呢？

九年間就完全不一樣了，我想再過九年，發展腳步必定會更快，國民總生產一定會倍數的增加，人民生活可更好，然而，這可能是我比較樂觀的看法。

初到大陸看到的「感心」景象

譬如七三年我最初去大陸時，以為大陸工業很落後。我問他們，你們有生產鋼珠的工廠嗎？因為機器轉動都需要軸承，而軸承都要用到特製鋼珠，以前我開過工廠知道這是關鍵性零件，台灣自己不會做，都依賴日本進口。他們笑說怎麼沒有，咱們原子彈和衛星都打上去了；後來到長春汽車廠去看，才實際見識到大陸的基礎工業水平。



陳逸松夫婦於 1992 年 6 月重訪北京，與陳炳基及家人合影。

我初去大陸時，要求到各地參訪，特別深入到農村和少數民族地區。我發現人民生活很艱苦，但國防建設和基礎工業建設很進步，很紮實，且都自立更生，不靠外力。到農村看，水利建設和土地規劃整理都很進步，每個縣只要有山就有水庫，有水庫就有發電廠，農田的水利灌溉系統都很發達，且農村道路都拉直，四通八達。還沒有到大陸之前，我在日本看過一部有名的紀錄片，叫《黎明之國》。描寫文革剛開始的中國，裡面報導中國街道乾淨農村沒有蒼蠅，我不相信，回去看，的確如此。剛回去時，北京市的街道打掃得很乾淨，娼妓、地痞流氓、花柳病都根絕，農村也沒有蒼蠅，我看了真的很「感心」。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我來過大陸好多次，也到各處旅行，兩相比較真是天差地別。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國家四分五裂，到處都有外國軍隊，農村荒廢，民不聊生，蒼蠅蚊子更不要說了。

這些建設，大都在中共建國後一直到一九五八年的十年間打下的基礎，後來漸漸排斥知識分子，過度傾向精神勝利法，變成非科學性的管理，以致於逐漸停滯了下來。

四、參加政協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發言

我也於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參加了政協第七屆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在會上我提出了意見：

衷心擁護祖國的改革開放

「近年我一直住在美國，這次回國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去福建、廣東許多地方訪問，與十年前相比，我總的感覺是『翻天覆地的變化』。十年前，深圳不過是香港和廣州間的一個小鎮，現在變成大都市，比香港還廣闊，從兩翼對香港形成包圍之勢，變化很驚人。鄧小平南巡談話後，海外華僑非常矚目今年國內的改革開放，大家一致認為國內改革開放的大方向是正確的。建國四十年了，改革開放十年取得的成就比過去三十年還大，不改革開放，整個國家和民族沒有希望。這次回國，在福建、廣東詢問了不少人，沒有一個人願意回到十多年前的時代中去，大家不滿意的只是改革開放太慢了，我衷心擁護祖國進一步改革開放。」

一定要解放思想開闊心胸

我又進一步提出了諫言：

「搞改革、搞現代化是任何進步的國家都一直在做的事情，資本主義本身也在不斷改革，無論哪種社會制度，時間一長都會有不相適應的地方，都需要改革，都需研究新東西，不斷地『現代化』。反對改革和現代化是沒道理的。我們國內目前禁忌還太多，怕這怕那，往往辦一件事到處去送審，管理體制很僵硬。我國有十一億人口，誰有本事吃掉我們？我們應該開放心胸，不要那樣畏縮。應該敞開國門，願出國而對方接受的，盡量放出去，留學生一段時間不回來也用不著害怕，無論怎麼變，我們都是黃皮膚、黑頭髮，共同的民族、語言、習慣會緊緊把大家連在一起的。」¹

五、八七高齡：我仍抱著希望——中國民主法制的建設

我原本抱著理想和希望回到中國大陸，到後來發現個人的力量實在有限，許多理想都無

¹引自〈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簡報〉，第三十六期。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法實現，因而感到失望；但失望並非絕望也不是無奈，而是在失望中仍然抱有希望。希望中國繼續走改革的路，絕對不要回頭。除了實現四個現代化之外，還要實現思想和政治的現代化，而最要緊的是民主與法制的建設，亦即「以民主為基礎的法律制度」建設。因為沒有民主只有法治不行，是其法治必然不合民心；而只有民主沒有法治也不行，是其民主必然導致紛亂，因此民主與法治如車之兩輪，缺一不可。

以前我在日本報紙的專訪中一再強調：雖然中國共產黨建立了新中國，但是「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國」這種說法是不對的；因為歷史事實表明，有中國這個民族國家才有中國共產黨，才有國民黨，就像有日本國才有自民黨一樣。政黨和國家是相附相生的，有時一個政黨建立一個國家，但國家建立後黨一定要還政，現在中國最重要的，是整個中國民族國家要如何建設的問題。

於今，我希望台獨不要去挑釁中國，我反對急獨和急統，最好統獨問題不要拿到檯面講，這只會傷感情無濟於事。我主張雙方都致力於民主和法制的建設，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台灣這邊要實施民主政治和兩黨政治，並且要立法治嚴格執行法律，對中國共產黨，台灣只要站在民主法治的立場去講就好，敏感問題不要碰，不要用台獨去刺激它。只要雙方都達到民主法治的境界，自然水到渠成，鄧小平不是說過等一百年也沒關係嗎？然而，這又與台獨的人說的「大陸這麼大，人那麼多，我們沒辦法去管，我們台灣自己弄好就好」不同，因為這牽涉到整個中國民族國家的建設問題。

我今年已八十七高齡了，沒什麼病，我想還可活二十年，最壞也十五年；再過幾年就到二十一世紀，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國民族國家可以達到一個更理想的政治形態。在達到這個理想境界之前，我仍然有任務，雖然現在人已不在中央，但立場比較獨立超然，為兩岸人民利益我隨時可以向中國中央政府反映。

六、九十高齡得償返鄉夙願（一九九七年）

一九九七年，我已九十高齡。這時台灣已解嚴十年，民主化有相當進展，當然惡名昭彰的所謂黑名單早已廢除。剛好，林宗義醫師為紀念其父林茂生先生百十歲周年成立「林茂生愛鄉文化基金會」，邀請我回台參加，我欣然同意。林宗義醫師要成立基金會時，還親自到休斯頓家中長談，我率先捐了一筆錢贊助基金會。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在二女兒綺紅的全程陪伴下，我終於踏上了闊別二十五年的故土。在桃園機場受到許多親朋好友的歡迎，特別是僅存的老友王昶雄先生特地趕到機場來，令我感激萬分。在歡迎宴上，彼此都不勝酒力了。我們下榻仁愛路福華飯店，飯店創辦人廖先生夙仰我名，特地安排我住高等套房，還數次來房長談，並安排我們到中南部旅遊。

十一月十三日，我參加了林茂生先生百年紀念演講會，登台為五十年前在二二八中犧牲的林茂生致紀念辭，五十年前那慘烈的一幕令人傷心。後來，女兒女婿也帶我去看「二二八和



1997年10月25日返台，在機場與來迎接的親朋好友合影。



陳逸松夫婦（前排右二位）返台後於福華飯店合影。前排左二位為王昶雄夫婦。

平紀念館」，館中陣列的歷史也正是我生命中最難忘的一章。

回台期間，去中和母親墓前祭拜，重遊了日月潭，又到林忠勝在宜蘭創設的慧燈中學演講，並與巫永福等殘年好友相聚。這期間，林忠勝經常陪我到處走，銘感在心。九十高齡始得償返鄉夙願，感慨良多，真不知將來還有再相聚的機會嗎？

*後註：

陳逸松先生於二〇〇〇年七月五日，在美國休斯頓宅中安祥辭世，享年九十四歲。

陳逸松治喪委員會

總召集人
主任委員
委員

翁和毓	王敦正	王敦正	孔承先	沈廣強	邱垂真	吳國禎	林重謨	林盛中	姚嘉文	翁和毓	張川田	陳伯文	陳炳基	黃天福	蔡同榮	劉守成	藍世聰	翁和毓	陳伯文	倪一偉
王維力	王維力	古兆楨	李川信	吳乃仁	林安中	林濁水	卓榮泰	洪奇昌	倪一偉	張旭成	陳家鼎	陳維國	葉宜津	蔡明憲	劉虛心	藍美津	王維力	周本初	周本初	周本初
王雪峰	王雪峰	江重光	李應元	吳成文	林宗義	林明濂	周本初	涂李質	郭時南	張俊宏	陳金濂	管碧玲	楊朝諭	顏錦福	謝長廷	蘇民生	劉虛心	劉虛心	劉虛心	劉虛心
王義雄	王義雄	沈富雄	李鎮源	吳克泰	林陳玉美	林義雄	周濟玉	翁金珠	許陽明	張子平	陳濟貴	曹啓鴻	鄭寶濟	顏永賢	謝聰敏	蘇治芬	蘇治芬	蘇治芬	蘇治芬	蘇治芬

陳逸松治喪委員會名單。

附錄

訪問陳逸松甘苦談

吳君瑩

出生於宜蘭的先夫林忠勝先生，一生從事教育工作，他研究歷史，尤其致力口述歷史工作。早在師大歷史系求學時，就有感於自己生長地——台灣歷史的研究非常缺乏、史料嚴重不足，遂毅然以自己的力量，訪問台灣耆老，留下記錄，陸續出版《陳逸松回憶錄》、《朱昭陽回憶錄》、《楊基銓回憶錄》、《廖欽福回憶錄》、《劉盛烈回憶錄》、及《高玉樹回憶錄》等著述，為台灣歷史網住一片真。

一九〇七年出生於宜蘭的陳逸松先生，十三歲赴日本讀書，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科畢業。一九三三年，回台後在台北大稻埕設立「陳逸松律師事務所」，為台灣人仗義執言，是日治時期著名的「人權律師」，並於一九三五年當選台北市第一屆市議員。他維護台灣傳統文化，反抗皇民化運動，為民喉舌，不遺餘力。一九四八年，膺選考試院第一屆考試委員；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遷台後出任中央銀行常務理事。一九七三年，前往中國大陸，擔任兩

屆中共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及兩屆政治協商會議常務委員。

陳逸松先生一生歷經日治、國府和中共三個政權，並活躍其間，是一位非常特殊而值得訪問的耆老。林忠勝的好友李界木先生和陳逸松三公子陳希寬先生熟識，經他介紹，我們得到陳逸松先生首肯，於是在一九九〇年間開始著手訪問工作。在一九六九年，忠勝因為熱愛鄉土及史料保存，他毅然辭去教職到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追隨沈雲龍先生從事口述歷史研究工作，兩年中完成了《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為積極進行保存台灣人史料，在一九九〇年，林忠勝、李正三和我共同向美國政府申請成立非營利性的「台灣口述歷史研究室」。

一九九〇年三月，我們代表剛在美國成立的「台灣口述歷史研究室」，從台灣赴美到紐澤西自宅，三十一日帶著相機、錄音機、錄音帶及相關的書籍和資料等笨重行李，再從紐澤西搭機前往德州休士頓，開始第一階段的訪談工作。我們在陳逸松先生住家附近的一間 Motel，租了一個套房、一部轎車，每天訪談約六至八小時。我們輪流做東，一起用餐，幾乎吃遍了在 Bellaire 附近的中國餐廳。常常在吃飯當中，忠勝一想到問題，依舊提問並立即做筆記，他的敬業精神可想而知。第一次訪談到同年四月十日告一段落，就整裝回紐澤西。

第二次訪談，是在一九九〇年五月六日到五月二十二日；第三次，是在一九九四年一月五日到一月十一日。前後總共為期三十五天。

也許同是宜蘭人的緣故吧！人親土親，和陳逸松夫婦首次見面就非常投緣，在每天幾乎

長達八個小時的口述訪談錄音過程中，高齡八十三歲的陳逸松先生身材挺拔硬朗，神采奕奕，毫無倦容！他時而站起，時而坐下，比手劃腳，表情豐富。陳夫人則是從旁幫助回憶，並為我們準備茶水。雖然和我們年齡相差三十幾歲，卻像是相識多年的知己，豪爽地與我們暢談他們多彩多姿的滄桑往事，並深深地流露出對故土台灣永不磨滅的摯愛！

我不是學歷史的，也沒有從事過口述歷史工作，教職退休之後，跟著忠勝奔波於台灣、美國兩地之間。鑑於口述歷史工作繁重艱辛，若聘僱專人所費不貲，因此他徵求我同意當他的助手。在訪問過程中，忠勝胸有成竹地提出一個個的問題，老人家話匣子一打開，就滔滔不絕，時而神采飛揚，時而黯然神傷，有時又是天馬行空，如風箏般地任意飛翔，忠勝就得適時拉住線頭，回歸主題；我則負責錄音及攝影工作。晚餐後回到住處，忠勝就開始教我如何聽錄音帶、寫逐字稿。起初我是一股熱情，興緻勃勃，但很快發現談何容易！老人家使用台語，語音不很清楚，很多台語又是有音無字，常常一句話即使重聽多次也很難下筆，因此，一卷九十分鐘的錄音帶往往要花十幾個鐘頭才能完成逐字稿。第二天還要將逐字稿送給口述者過目，遇有不清楚或無法下筆的部分還要再請問他。有些字連他自己也不知如何寫，我們就得事後查台語字典或請教台語專家。

前後三次共三十五天的訪問，都是在這樣緊湊而有效率的過程中完成，每次都是專注工作，也不曾到德州任何名勝遊玩，就整裝回紐澤西繼續整理訪談的後續工作。

記得第二次訪問結束那一天，大家都鬆了一口氣，因為雙方都深覺成果豐碩而高興萬分！

陳逸松先生的興奮更是不在話下。第二天，八十三歲高齡的他，親自下廚，烹煮他年少時留學日本學到的 *sukiyaki*（壽喜燒）招待我們。他說：「昨晚我一夜好眠，今天一大早起床，獨自步行到你們住宿的 Motel，知道你們辛苦了這麼久，一定很累了！雖然還很想和你們再談談，卻又不忍心叫醒你們，就在旅館前後繞了幾圈，才又慢慢地走回家。」

抱著六、七十卷寶貴的錄音帶回到紐澤西，我每天忙完家事，就打開錄音機，日夜趕工，努力聽寫逐字稿。由於常常倒帶重聽，錄音機被我轉壞了好幾台，耳朵也因長期聽錄音，以致造成耳鳴重聽的問題。但我不得不趕工！因為必須先完成逐字稿，忠勝才能根據它再尋找相關資料，加以考證、補充、編撰。在撰寫當中，他還常常打長途電話到 Huston，以電話繼續訪談陳逸松先生，往往一談就好幾個鐘頭。除此之外，為求回憶錄內容更完整客觀，我們還四處奔走訪問王昶雄、巫永福、高玉樹，甚至遠在中國的蘇子蘅、甘瑩夫婦……等十幾位陳逸松的老朋友。我將陳逸松的訪問錄音逐字稿全數聽寫完成後（包括日治時代、戰後以及大膽前往中國前後的詳細經過），忠勝則更需費功夫，不顧兒女們應以健康為重不該過度勞累的勸告，始終夜以繼日地投入編撰工作。四年後，終於完成日治時代篇的陳逸松回憶錄。首先在《自立晚報》和《台灣文藝》發表前面幾個章節，一九九四年六月全冊由前衛出版社出版。

在台灣人經歷苦難的時代，為台灣的歷史留下見證，替台灣的歷史補足空白，我們夫婦義不容辭、不計代價、無怨無悔！記得新書出版後不久，一位日治時代名記者楊千鶴女士曾

說一句話：「林忠勝寫這本《陳逸松回憶錄（日據時代篇）》，讓已被人們淡忘的陳逸松復活了！」

由於《陳逸松回憶錄（日據時代篇）》出版後，引起不小的回響，以致為耆老寫回憶錄的要求紛至沓來。忠勝義無反顧，幾年之間，又陸續完成了朱昭陽、楊基銓、廖欽福、劉盛烈、高玉樹等五本回憶錄。

至於，「陳逸松回憶錄下集：戰後篇」的撰寫工作，由於上述原因，加上陳逸松日記簿家屬遲未提供，忠勝又因工作過勞，健康出了問題，導致其家屬必須另請他人撰寫，我乃將所有的訪問錄音帶七十四卷、謄滿將近千頁稿紙的逐字稿以及所有相關資料與相片，於二〇一二年，全數交由陳正德先生轉借給其家屬，再由家屬轉借戰後篇的執筆者曾健民醫師，做為編纂之依據。

陳逸松先生天資聰穎，才識淵博，有宜蘭人的反骨性格，有知識分子的傲氣，有文人的浪漫情懷，有政治家的遠見理想。他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同情弱勢，孝順母親，對朋友重義氣，愛鄉土，愛台灣！他痛恨威權統治，始終殷切地期盼，台灣人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早日由自己「當家做主」，傲立於世界！夫人林玲玉女士是位秀外慧中的賢妻良母，她照顧先生無微不至，能投其所好，夫唱婦隨，兩人鶼鶼情深。他們育有四位千金，都是十分優秀的人才。至於他和第一位夫人，育有二男二女，也都非常傑出。

《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在《陳逸松回憶錄（日據時代篇）》出版二十一年後，由

和先夫林忠勝一樣熱衷於「撥開歷史迷失，揭露歷史的真實面貌」的曾健民醫師繼續完成，實在是一件非常難能可貴、可喜可賀的事。

最後，我衷心地感謝曾醫師不辭勞苦，繼續整理並完成先夫林忠勝未能完成的《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工作，讓我們得以更加認識這一位非凡的台灣人——陳逸松先生個人豐富的生命史，以及他對台灣現代史做出艱鉅而寶貴的貢獻。

曾健民醫師鴻文出版在即，幾天前受他和陳逸松先生么女陳雪梨女士之託，要我寫一篇當年忠勝和我訪問陳逸松先生的緣起和始末概況，以加入本書之中，匆促走筆，不逮之處，尚祈見諒。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三日於宜蘭

附錄

陳逸松年表

(曾健民製表)

個人記事

一九〇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出生於宜蘭羅東南門外九份的陳家大宅。

一九一四年

入羅東公學校就讀，並跟隨張阿合先生讀漢文。

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日

與堂兄陳進東等共五人跟隨佐藤老師到日本求學。

一九二〇年九月——一九二二年三月

入日本岡山師範學校附屬小學入讀，寄宿在高原小吉先生家。

歷史記事

一九二二年四月——一九二五年三月

就讀岡山二中。

一九二三年夏

到台北初次拜訪同鄉前輩蔣渭水，爾後每年暑假回台時均會前往台北找蔣渭水長談。

一九二五年四月——一九二八年三月

考入岡山六高就讀。加入「社會科學部」。

一九二八年四月——一九三一年三月

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科。加入東大進步學生組織「新人會」，並加入東京台灣青年會的「社會科學研究部」。蘇新、劉明、蕭坤裕、林加才同為研究部成員，並結為終生朋友。

一九二八年九月

十一月昭和天皇登基，日本警方到處抓人。陳逸松遭日警拘捕，被關三十天，遭受嚴刑拷打。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七日

四月十六日，日警對日共進行大逮捕，世稱「四一六」大檢舉，東京台灣青年會和社會科學研究部的幹部都被逮捕殆盡。四月十七日，陳逸松被逮捕，遭嚴刑拷打四十天。

一九三一年四月

東京帝大畢業後，九月考取律師資格，七月至九月曾到中國大陸遊歷。

一九三二年

參加日本「自由法曹團」，為朝鮮勞工、日本佃農以及遭起訴的日本共產黨黨員，爭取權益，站在法庭上辯護。

一九三三年三月

返台，在台北大稻埕開設「陳逸松律師事務所」。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當選台北市會議員，年僅二十八歲。

一九三二年八月五日

蔣渭水去世。

一九三六年

在廈門開設「陳逸松法律事務所」，宜蘭同鄉李友三在廈門擔任事務員負責庶務。

一九三六年六月

參加《日日新報》社主辦的「南洋考察團」。

一九三六年九月

在陽明山買下日本人旅館，命名「白雲莊」，成立一個文化人聚會的俱樂部。

一九三九年

在大稻埕太平町三丁目買地興建六棟三層樓房當作事務所和住家。

在「皇民化運動」中，拒不改姓名，爭取和維護台灣漢民族的文化習俗和服飾。

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出資與張文環、王井泉共同創刊《台灣文學》，與西川滿《文藝台灣》的皇民文學抗衡。

一九四三年九月

與林博秋、王井泉、張文環共組「厚生演劇研究社」，在「永樂座」演出張文環小說改編的《閩雞》，與《興南新聞》的演劇挺身隊「南國之花」對抗。

一九四四年五月

被徵召參加台北州的「勞動奉公隊」，到林口修築飛機場。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陳逸松和王井泉在山水亭上迎接了日本投降的大喜劇。

一九四五年九月初

陳逸松接受張士德的「日日命令」，擔任「三青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籌備處主任，向全省發展組織，擔任台北分團主任。

一九四五年九月

蘇新從台南來台北，與顏永賢、陳逢源、陳忻等共創「政治經濟研究會」。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台灣復歸中國。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國民政府特任陳儀為台灣省行政長官。

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

在重慶市成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第一批十八名中美軍政人員來台。其中有台灣義勇隊副隊長張士德，銜命來台發展「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組織。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率三青團團員到松山機場歡迎陳儀蒞台。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參加中山堂舉行的「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下午，同地舉行「台灣光復慶祝大會」。

獨資創辦《政經報》出版。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參加「台灣文化協進會」籌備大會，擔任理事。

一九四六年三、四月間

離開（登報聲明）「三青團台灣支團部」台北分團團長職務。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政經報》停刊。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日

當選第四屆國民參政會台灣省參政員。

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

在南京原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大禮堂，舉行「中國戰區日本投降簽字典禮」

一九四五年十月五日

行政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來台。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在台北市公會堂，早上舉行「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下午舉行「台灣光復慶祝大會」。台灣正式復歸中國，以這一天為台灣光復節。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

國共達成停戰協定，召開政治協商會議。

一九四六年六月

國民政府撕毀政治協商會議的五點協議，爆發全面內戰。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十月五日

參加「台灣光復致敬團」到陝西遙祭黃陵，並到南京晉見蔣介石。

一九四七年一月五日

成立國民參政會台灣省參政員（共七人）聯誼會。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三月七日

台灣爆發二二八事件，陳逸松參加「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並草擬委員會組織章程。

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

陳逸松參加「緝菸血案調查委員會」。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

「緝菸血案調查委員會」改組為「二二八處理委員會」，陳逸松草擬委員會組織章程。

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或八日

國軍登陸，得知被列為通緝名單，在劉明催促下逃避通緝十天。

一九四七年一月

上海爆發黃金風潮，迅速波及台灣。

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美國退出「軍事調處執行部」，宣布「調處」國共內戰失敗。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蔣介石通知中共駐重慶南京和上海的和談代表，全部撤回延安。國共和談完全破裂。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

白崇禧將軍抵台。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或十五日

陳逸松由宗親陳達元陪同面見陳儀，取得放行條，逃過一劫。

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

赴南京參加國民參政會。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日

被總統推薦為行憲後第一屆考試院考試委員，經立法院投票通過，於七月十日就職。

一九四九年二月初

三大戰役結束，蔣介石下野，陳逸松離開南京，經上海搭軍機返台。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

陳逸松被指名擔任中央銀行常務理事，直到一九五二年屆滿。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

南京召開國民參政會，上海爆發大規模的學生示威遊行與警察發生衝突，史稱「五二日運動」。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國民政府舉行全國「行憲國大」選舉。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在南京召開第一屆「行憲國大」選舉總統、副總統，原國民參政會結束。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日

國共內戰爆發三大戰役（遼瀋戰役、徐蚌會戰、平津戰役）。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蔣介石宣布下野。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

國共第二次和談破裂，當晚，解放軍渡江，二十一日占領南京。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

國民政府行政院遷台。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

蔣介石從成都飛台北。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

朝鮮戰爭爆發，美國於六月二十七日宣告

「海峽中立化宣言」，第七艦隊進入台海，

自此兩岸長期隔離對峙。

一九五〇年

白色恐怖風暴，好友劉明、蕭坤裕因「光明報」案遭判刑。

與徐朝風創立「厚生橡膠公司」擔任董事長，

一九五四年退出。

一九五四年

第一屆考試院考試委員屆滿，離開考試院。

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

與張深切共組「藝林電影公司」，拍攝《邱罔舍》。

一九五七年

創立「同泰化工公司」，到日本購買機器，順便旅遊三個月。自從一九三三年離開日本

後，第一次重訪日本，遍訪同學舊識。

一九六四年

參選台北市長失利。

一九六五年

一年中連續痛失三位文化界好友，王井泉（五月十九日）去世，王白淵（十月三日）去世，張深切（十一月八日）去世。

一九六五年五月

廖文毅聲明放棄台獨返台。黃朝琴設宴國賓飯店，陳逸松應邀參加。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九六八年九月

環遊世界一周，在日本與王育德、黃昭堂、宋重陽等台獨分子接觸，初識台獨運動。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九日——二十一日

因「羊羹事件」（台北市美國花旗銀行爆炸案）誤遭警總拘押，經三日夜疲勞審訊查無實據後釋放。

一九六四年二月

法國與中國建交，國民政府在外交上受到極大的打擊，台灣政局不穩。

一九六八年

美國尼克森總統與中國開始展開乒乓外交。

一九七一年

以美國為中心，爆發了留學生保衛釣魚台運動。

一九七一年八月

開設「二十一世紀畫廊」。

一九七二年八月

由邱永漢作保，取得護照和出境證後匆匆離台，經琉球到日本、經日本神戶僑領林伯耀先生的建議，寫一封建議書給中國政府，此信周恩來親閱。

一九七三年

周恩來透過聯合國中國職員轉達，邀請陳逸松回國參訪。

一九七三年四月六日——十二日

由波士頓出發，繞道巴黎、雅典、巴基斯坦喀拉蚩，再飛上海，十二日到達北京。入住

一九七一年七月及十月

季辛吉二度訪問北京。

一九七一年十月

台灣國民政府喪失聯合國席位，中國大陸代表中國進入聯合國。

一九七二年二月

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大陸發表「上海公報」，宣布了「一個中國」政策，「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一九七二年九月

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搶先與中國建交。

北京和平賓館。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三日

接受中國國務院外交部顧問，老革命家廖承志的宴請。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七日

接受周恩來總理和夫人鄧穎超的宴請。前後談了三小時，主要圍繞著台灣和日本兩大議題。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應周總理之邀，陪訪華的墨西哥總統埃切維里亞上山西大寨人民公社參訪。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九日

周總理設宴招待陳逸松一家，包括陳逸松夫人林玲玉、女兒陳文惠及女婿黃維幸。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八月三日

到陝西長安、延安、謁黃陵。後到蘇州、杭州各地重遊江南。

一九七三年九月六日——二十八日

到東北，參訪大慶油田，登上珍寶島，到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參訪。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答應周總理的盛邀，留下來代表台灣人民擔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並參與修憲工作。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八日

與蘇新重逢。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參加二二八事件二十七周年紀念會，首度公開來北京消息。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日——九月十八日

南方之旅（廣東、海南、福建、江西、湖南、廣西）。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月

以台灣省代表參加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擔任主席團團員，並獲選為人大常委。

一九七五年六月八日

參加人大常委會舉辦的西南考察團（四川、雲南、貴州、兩湖）。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七日

唐山大地震後，搬離和平賓館入住北京飯店三〇二一房。

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月

參加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的逝世追悼會。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以人大常委身分參加天安門「慶祝華國鋒任中共主席及軍委主席」百萬群眾慶祝大會。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辭別蘇新、蘇子蘅，以及在廖承志、熊向暉、徐向前、鄧穎超等的宴別中，持第一本中國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

蔣介石逝世。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

周恩來逝世。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

第一次天安門事件。

一九七六年七月五日

朱德逝世。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唐山大地震。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

毛澤東逝世。

外交部發行的護照離開北京，經日本到美國。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十二月二十七日

到日本遍訪老友及日本政界、新聞界朋友。

一九七七年一月——一九七八年二月

訪美一年。歷訪舊金山、洛杉磯、芝加哥、紐約、波士頓等地，與愛鄉、愛國僑胞、學生交流、座談。會見王育德、郭雨新談台灣解放問題。

一九七八年一月五日

在舊金山奧克蘭的保釣志士九十人的送別聲中，離開美國，經日本回北京。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七日

抵達北京，入住北京飯店。

一九七八年二月十四日——三月七日

參加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大會，當選人大常

一九七六年十月三十一日——二十四日

「粉碎四人幫大遊行」。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慶祝華國鋒任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及中央軍委會主席」天安門百萬群眾大集會。

委並擔任法制委員會委員。負責修訂憲法，

新訂法律。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日——十一月十七日

到新疆、青海、甘肅西北旅遊考察。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人大常委會通過〈告台灣同胞書〉。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二十二日

中共舉行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會議通過了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來。在民主集中制中，特別強調民主與法治，並高度評價「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鄧小平復出任中國政協主席。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中美領導人，華國鋒主席和美國卡特總統分別在北京和華盛頓發表建交「聯合公報」。宣布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並立即與台灣國府斷交、廢約、撤軍。

一九七九年元旦

人大常委會發布〈告台灣同胞書〉。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日

到北京展覽館看郭雪湖畫展開幕。在八寶山烈士公墓參加蔣時欽（改名陳玉堂）追悼會。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完稿〈「告台灣同胞書」發表一年有感〉文。

一九八〇年一月

日本《法律時報》刊出陳逸松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刑法〉一文。

一九八〇年一月三日——一月二十日

南方之旅。到福建參加泉州華僑大學校董事會，擔任董事。去廈門大學與陳朝璧等法律教授談籌備法律系事。到漳浦赤湖祖居地參訪。到上海與顏永賢（顏光）會面，到安徽合肥與葉松榮等友人重逢。

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九日——五月十日

搬離北京飯店，入住木樨地部長樓。北京新家在北北京復興門外大街二十二號樓二門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高雄爆發「美麗島事件」。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九日

北京成立「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台聯），推選林麗韞為首任會長。

二十一號（十一樓）。

一九八〇年五月三十日——八月十九日

到日本，參加岡山六高八十周年校慶。七月二十五日接受日本NHK電視台專訪，與西川潤、Alan Turney教授談〈從仁義道德看中日關係〉。在日本商工會會議所演講。

一九八〇年八月

日本《法律時報》刊出陳逸松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刑事訴訟法〉一文。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七日——五月一日

福建行。參加廈門大學六十周年校慶活動，在法律系討論會上演講〈國家現代化之立法方針〉，再訪祖居地漳浦、赤湖。

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召開五屆人大第三次會議。華國鋒講話，為黨政分離原則辭去總理，提名趙紫陽任新總理。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一九八一年三月

成立特別法庭審判「林彪、江青」案。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六月二十五日

人大常委會到山東各地視察。

一九八一年六月三日

參加「宋慶齡名譽主席」追悼會。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八月三日

到北戴河渡假。

一九八二年四月三日——六月二日

在人大祕書長楊尚昆的宴別後，離北京到日

本，處理藏書被侵吞的法律訴訟問題。

五月十三日，接受日本《讀賣新聞》專訪談

中國的新憲法。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宋慶齡名譽主席逝世。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

中共舉行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胡耀邦中央
委員會主席，趙紫陽、華國鋒副主席，鄧小
平軍委會主席。

一九八一年九月三日

舉行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

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

人大常委會主委葉劍英發表關於台灣回歸祖
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提出九條建
議（葉九條）。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日——十一月二十五日

到美國停留近半年，後經日本回北京。在美國與謝聰敏、葉治平、王古勳、陳玉璽、葉芸芸等朋友見面。並在休斯頓購房，命名「待月停琴軒」。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十二月十日

參加五屆人大第五次大會，提出修憲意見。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到八寶山烈士公墓參加陳文彬追悼會。

一九八三年三月——四月

推舉六屆人大台灣省代表。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六日

與廖承志見面，廖面邀陳逸松轉任第六屆政協委員。

一九八三年五月八日

各報刊出第六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名單，陳逸松列名無黨派民主人士。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四日

五屆人大第五次大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通稱「八二憲法」）。

一九八三年二月

楊煥西回台灣，被警總逮捕。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七日

召開六屆政協第一次大會，陳逸松獲選為常務委員。會上，再三提議政協應該支援台灣
的黨外民主運動。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參加廖承志追悼會。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七月二日

與葉松榮一家一起爬黃山、九華山。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一日——九月二十八日

離開北京，飛往東京。停留一個半月，處理
藏書被侵吞的法律訴訟。參加老友林加才的
追悼會。

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搭機經夏威夷到美國，定居德州休斯頓，寓
「待月停琴軒」以終老。

一九八八年

續任第七屆政協委員，到一九九三年為止。

一九九〇年三月三十一日——四月十日

接受「台灣口述歷史研究室」林忠勝、吳君瑩第一次訪談。

一九九〇年五月六日——二十二日

接受「台灣口述歷史研究室」林忠勝、吳君瑩第二次訪談。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七月二十一日

重遊中國大陸。先停留日本訪友，後到福建、廣州、香港各地，訪察現代化經濟建設情形，再到北京參加政協會議，後返回美國。

一九九四年一月五日——十一日

接受「台灣口述歷史研究室」林忠勝、吳君瑩第三次訪談。

一九九四年六月

《陳逸松回憶錄 日據時代篇——太陽旗下風滿台》台灣版出版。陳逸松口述、吳君瑩記錄、林忠勝撰述，由前衛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返回台灣，與高玉樹、巫永福、廖欽福夫婦、王昶雄夫婦、林忠勝夫婦等重逢。參加「林茂生愛鄉文化基金會」成立大會。

一九九七年十月

回故鄉宜蘭。參訪宜蘭縣私立慧燈中學，並對學生演說。

二〇〇〇年七月五日

病逝美國休斯頓，享年九十四歲。

歷史大講堂

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放瞻兩岸波濤路

2015年11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35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者 曾 健 民
發行人 林 載 爵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編輯部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叢書編輯電話 (02) 87876242 轉 224
台北聯經書房：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02) 23620308
台中分公司：台中市北區崇德路一段198號
暨門市電話：(04) 22312023
台中電子信箱：e-mail：linking2@ms42.hinet.net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02) 23620308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銷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話：(02) 29178022

叢書編輯 陳 逸 華
封面設計 江 宜 蔚
校對 施 亞 蒨
內文排版 綠 貝 殼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台北聯經書房更換。 ISBN 978-957-08-4646-1 (平裝)

聯經網址：www.linkingbooks.com.tw

電子信箱：linking@udngroup.com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放膽兩岸波濤路／

陳宜中著．初版．臺北市．聯經．2015年11月（民104年）．408面．14.8×21公分（歷史大講堂）

ISBN 978-957-08-4646-1（平裝）

1.陳逸松 2.台灣傳記

783.3886

104022122